

下

SHIJIE MINGREN ZHUANJI CONGSHU

(俄)亚历山德拉 托尔斯泰娅著



托尔斯泰传

世界名人传记文学
青苹果数据中心制作

天地有正义

托尔斯泰传

下

第三十八章

“走向何方？”

1883 年秋，托尔斯泰与弗拉基米尔·格里戈里耶维奇·契尔特科夫相识。

契尔特科夫出身于一个非常富有的、自由主义的贵族家庭。只须看一眼他那匀称漂亮的身躯，头颅高傲的姿态、突出而寒气逼人的大眼睛和生了小痣的鼻子，只须看一眼，你就会了解，他简直是个命运的宠儿，惯于驾御别人和充当一名角色。每当他身着骑兵近卫军制服在宫廷舞会上露面的时候，女士们简直要为他发疯了。契尔特科夫对待她们越是冷淡，他获得的成就就越大。据说，沙皇亲属有一名女性有次在宫廷舞会上跳华尔兹舞时，走到他跟前，伸出一

只手搭在他的肩头上，想跟他跳一圈华尔兹。契尔特科夫大模大样地一鞠躬，对他说，他不想跳。这是前所未闻的放肆无礼，廷臣吓得要命，上流社会的长舌妇们则兴高采烈，互相传播这位年轻军官的大胆行径。

契尔特科夫是很机智的。他说笑话或开玩笑时，旁人听了大笑不止，而他本人却表情严肃，一本正经。他的法国话和德国话说得很好，说英国话简直是个地道的英国佬，稍带被夸张了的不列颠语调。但他的俄国话说得不好，总带有明显的外国腔调，象许多通过欧洲语言接受教育的贵族一样。

1879年契尔特科夫打算退伍。但是，他的父亲格利戈里·伊凡诺维奇，那位一生在宫廷做官、初为尼古拉一世陛下的侍从武官、后为亚历山大一世和二世陛下的参谋总长的人梦寐以求的便是儿子官运亨通，这时便劝说儿子告假出访英国一年。契尔特科夫从小就认识亚历山大二世，这位沙皇常常不拘礼节地在他母亲那儿作客。沙皇被刺事件使他震惊。可是，他还是不顾父亲的反对，于1881年退伍，决定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契尔特科夫的母亲，一位非常聪明、老练又漂亮的女人，对儿子有很大的影响。她的家庭跟十二月党

人有着紧密的关系。她的叔父查哈尔·格利戈里耶维奇·车尔尼雪夫伯爵曾参加十二月党人的起义，为此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伊丽莎白·伊凡诺夫娜的姑姑嫁给了著名的十二月党人穆拉维约夫。此人曾被判死刑，后减刑流放西伯利亚。

伊丽莎白·伊凡诺夫娜的姐姐嫁给了一个有钱的地主、近卫军重骑兵团退伍上校巴希可夫。1874年巴希可夫结识了英国传教士列特斯托克勋爵，他醉心于这位传教士的学说——对赎罪的信仰、对基督为世人所流的血的信仰可以拯救灵魂以免于罪恶。巴希可夫醉心于这个学说到了很深的程度，以至舍弃了世俗生活，全心全意深信列德斯托克的传教，接着，在他周围组成了一个教派，这个教派被称为“巴希可夫派”。巴希可夫派的坚定信徒之一便是契尔特科夫的母亲伊丽莎白·伊凡诺夫娜。因此，对于年青的契尔特科夫来说，自由的、突破专制政体和东正教的框框的观点已经不算新鲜的了。

赌博、酗酒、女色，这些构成彼得堡辉煌的青年的生活中吸引人的东西，契尔特科夫却很反感。他，正象托尔斯泰一样，开始探求生活的意义了。他回到沃龙涅什省自己的田庄，尽力帮助农民。在自己的朋

友皮萨列夫家里遇见图拉区检查官、曾经访问过雅斯纳雅·波良纳的达维多夫，契尔特科夫得知，他的观点跟托尔斯泰的观点非常接近。他非常高兴，很快就到莫斯科去拜访托尔斯泰。

对于托尔斯泰来说，跟契尔特科夫的会见是平生一大快事。初次见面就已经看出来，他两人的观点没有严重的分歧。契尔特科夫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叙述了这初次会见的情形。

“在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身上，”他写道，“我看到了对服军役跟我抱完完全全彻底相同的态度的第一人。当我提出自己通常提的问题以后，他随手从书桌上拿起一篇手稿念了起来作为回答，这篇文章就是《我信仰什么？》，从基督教的观点对服军役加以无条件的否定。我真心花怒放了……”^①

“就我所知，他也同样在我身上发现了第一个志同道合者。”这个话，契尔特科夫说错了，他并非托尔斯泰的第一个志同道合的人。农民休塔耶夫和尼·尼·盖才首先是托尔斯泰的志同道合的人。契尔特科夫是个把一生献给了托尔斯泰的作品的传播的第一名信徒。

当时，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盖在结识托尔斯泰以后，便成了家中的自己人，亲密无间，以致托

尔斯泰对他特开例外，那是最亲近的人中间的任何人所享受不到的。托尔斯泰在莫斯科的书房是完全与外界隔绝的：坐落在宅子最远的角落，天花板很低，伸手就可摸到。蒙上黑漆布的柔软的家具——沙发、宽大的扶手椅、窗前摆一张三面装有小本栅栏的大书桌。这儿，这书房里，静悄悄的，城市的噪音进不来，窗子朝花园开着，小孩子的吵闹和家务的烦忙之声也到不了这儿。

托尔斯泰按照自己的老习惯鼓起腮帮，牵动嘴唇，专心写作《我信仰什么？》。盖爷爷蹑手蹑脚溜进书房，生怕打扰朋友，他随身带着调色板和颜料。两人都作声，各自潜心于自己的劳作。

某个时候盖给托尔斯泰写生的肖像画可以说是托尔斯泰最好的一张肖像。看那姿势，头微微低着，握笔的右手描绘得很出色——深刻地刻划了他精神高度集中的神色。

虽然托尔斯泰的宗教哲学论文遭到书报检查机关的禁止，但却在俄国广泛流传开来，而托尔斯泰的追随者也日益增多。一篇论文的抄本传进了莫斯科尼古拉贵族女子学院的围墙之内，这是帝国正教最高学府。落入两位修女的手中，她们是奥尔加·亚列克谢耶夫娜·巴尔肖娃和玛丽娅·亚历山大罗夫娜

·施米特。这篇文章对两位女士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她们决心把托尔斯泰有关宗教的文章全都找来读一读，并且毫不迟疑就去拜访托尔斯泰，希望从他那儿得到四福音书的译本和注释。

塔吉娅娜·里沃夫娜·苏霍京娜——托尔斯泰娅在其回忆录中说，托尔斯泰“亲切地接待了两位修女，友好地跟她们交谈，因此她们立即感到他是个十分亲近可爱的人。”

“从此，”她继续写道，“玛丽娅·亚历山大罗夫娜和奥尔加·亚列克谢耶夫娜常常上我们家来。我们管她们叫‘爸爸的修女’。大家对她们都很亲切友好。”^②

这两位修女一直生活在城市里学院的环境里，不熟悉农村，不会干活。但她们却满腔热忱。处理了自己在城里的财物之后，她们便随身带了一笔不大的款子上高加索去了。路上钱被扒光。但她们很快就心平气和了。她们力求平民化，努力适应在田地里的劳动和乡下的生活，不需要金钱。“上帝回过头看我们一眼，”后来玛·亚·施米特说，“便让我们丧失金钱——这诱惑之源。”奥尔加·亚列克谢耶夫娜忍受不了严酷的生活，死了；而玛丽亚·亚历山大罗娜在其女友死后则继续过着自食其力的劳动生活，住在

雅斯纳雅·波良纳不远。

托尔斯泰的女儿们要理解父母复杂的体验是不容易的。父亲新结交的朋友们在女儿们心里往往激起善意的嘲讽。年青人希望不象别的人那样狡猾地卖弄聪明。但是，当他们外出快快活活玩耍时，不可能不感到父亲对他们的不满，这点使他们心里难过，各人按自己的方式感到难过。

1883年至1884年冬塔妮娅出门旅行。她二十岁。家里人都看重她，爱她。每当父母吵嘴时，塔妮娅便尽可能劝解和安慰他们；每当兄弟们对母亲态度粗暴时，她便进行开导使他们感到羞愧，他们也就听从她了。小孩子们依偎着她，伊里亚以这位姐姐为骄傲，他对他的意见他听了远非无动于衷。甚至大哥谢尔盖，当时已经二十一岁，也承认塔妮娅的权威。谢尔盖为人诚实，是个直性子。他宁可说出赤裸裸的真话，甚至这真话有些粗鲁也在所不计，这等时候，塔妮娅生怕开罪于人，便赶忙出来打圆场。谢尔盖是个优秀的大学生，上学听课，弹得一手好钢琴，迷恋音乐。塔妮娅则迷恋美术，在绘画雕塑学校学习很有进步，她具有捕捉形象的非凡的才华，因此盖爷爷乐意辅导她，技法上给她提出许多意见。塔妮娅热爱人，富有吸引人的魅力，她不怕显露自己的感情，对

父亲和母亲同样热爱。谢尔盖则较为内向，不大表露自己的感情，为之感到害臊，但是，接近他爱他的人都知道，在这个宽肩膀的、不漂亮的青年的严肃的外表下面，深藏着善良的、有时竟是温柔的感情。倘若有时谢尔盖不能掩饰自己内心的激动，而这时又有人看到了他那夹鼻眼镜下的一双灰色近视眼噙着止不住的泪水，谢尔盖便责备自己“多愁善感”而生自己的气了，接着便把怒火向别人发泄。

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托尔斯泰娅，这位著名作家的美貌的、还算年轻的夫人出现于上流社会，随身带着一个好看的女儿——这件事引起了莫斯科社会的注意。她们被各处邀请。在交际场中，在学校内塔妮娅都有不少追求者。父亲不赞成她过这种懒散的生活，他怀着忐忑不安和厌恶的心情鄙视那批追求者。母亲则相反，为女儿的成功而兴高采烈，她为自己的女儿仔细端详那些好样的情郎。塔妮娅并不漂亮，但她极富魅力。肤色出奇的好，灰色眼睛水汪汪，短短的鼻子好一似雕削而成，富于奋发热忱的表情，栗色的头发卷曲有致，苗条的身材窈窕多姿——这一切使外貌与内心非常和谐地融合在一起：才气横溢，聪明伶俐，生气勃勃。塔妮娅是那类生灵中间的一个，上帝赋予她们的才华和智慧，赋予她们

富有魅力的而非平庸艳丽的外貌。老年人和青年人都喜欢她。在社交界她令大家着迷，因为她待人接物很有分寸，善于控制自己，聪明伶俐和快乐大方。老百姓对她也有好感，因为她心地善良，平易近人。

“你此刻一定在准备赴舞会。我非常惋惜你和塔妮娅哩！”1884年1月30日托尔斯泰写给妻子的信中说（信寄雅斯纳雅·波良纳，他现在离开莫斯科去那里更勤了）。

1月30日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写信给丈夫：

“我跟塔妮娅今日中午一点才起床，她就睡在我房里。昨晚的舞会很好，我们适可而止，打算五点钟回家。但是，没有车子，不得不等到六点。真遗憾！可是我们倒不疲倦。多尔戈鲁可夫也到了那儿，他再一次央求我们今晚赴他家的舞会。这非常枯燥，但我还是要去，只是动身会晚一点。”^①

多尔戈鲁可夫公爵当时是莫斯科总督，被邀请赴他家舞会，那是很光彩的。

“昨晚多尔戈鲁可夫，”1月31日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写道，“在舞会上比以往任何时候显得更加殷勤可爱。他吩咐搬来椅子，坐在我身旁，交谈了足有一小时，准定他事先就打定主意要对我表示特殊的关注，这一来，倒使我感到有点莫明其妙。对塔妮

娅他也说了许多大献殷勤的话。”

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为了安慰丈夫，继续写道：“但是，昨晚我和塔妮娅可一点也不快乐，大概是太累了。”^⑤

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给她的妹妹塔妮娅的信中谈到在萨马林家的舞会：“真是出色的舞会，晚宴和排场真是前所未有的豪华。塔妮娅穿着玫瑰色的薄纱布拉吉，配戴了大红的蔷薇，我穿着紫色的天鹅绒衣，比大家的衣裳都深暗，配戴黄色蝴蝶花。后来又赴总督的舞会，晚上，杰普洛夫家有戏剧演出，还为小孩子举办松树游艺会，今晚奥尔洛夫—达维多夫伯爵家又开舞会，我跟塔妮娅又去参加。她有一件出色的衣裳 *tulle illusion* *，带点绿光的天蓝色，周身是略带蔷薇色调的铃兰。明晚奥波连斯基家又开大舞会，又要跳舞。我和塔妮娅应接不暇，简直疲于奔命了。”^⑥

塔妮娅仅只二十岁！青春占了上风。完全可以理解，当时她对“爸爸的修女们”的平民化是不会感兴趣的，对雅斯纳雅·波良纳的劳动生活是不会感兴趣的。

* 法语：薄纱

而托尔斯泰却在雅斯纳雅·波良纳过着朴素简单的生活——不要仆人伺候，不要厨师，自己动手劈柴，向雅斯纳雅·波良纳的一名鞋匠学习做皮靴。

1884年2月3日他写信给妻子：“我健康懒散。在读蒙田，滑雪徒劳无益，弄得身体疲惫不堪，做做靴子，心里想，从今努力不再得罪任何人了。甚至于人有益的事也不必费力去做，因为那很难做到，近乎不可能。今日工作了不多（做靴子），洗了个澡，浑身疲倦。”^⑦

早晨他写道，昨夜读了不少书。这一段时期正是八十年代思想活动特别紧张的阶段，托尔斯泰读了许多书：从马克·阿夫列里·艾比克杰特、孔子和老子直到巴斯克、曼琴、巴尔克尔、爱米尔松。“我很想编出阅读园地”^⑧1885年6月4日他写给契尔特科夫的信中说。

托尔斯泰继续劝说妻子改变生活方式：放弃奢侈的、游手好闲的生活，让全家过朴素的、自食其力的劳动生活。儿女们无所事事，甚至不会料理自己的生活，他们对生活没有严肃的要求和深刻的兴趣，这使得他很难过。“音乐、唱歌、闲谈……简直是过狂欢节！”3月1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心里很沉重，真痛心。”3月18日他又这么写。

他跟妻子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了。

“灵魂痉挛，可怕！不但难受，痛心，而且毫无办法。”5月3日他在日记中这样写。“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发疯，我好比生活在被疯子管理的疯人院里。”5月28日他这么写道。

这时，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正怀了第九个孩子。她不想再要孩子了，因此在怀妊的初期她曾想方设法力图摆脱掉这个婴儿。无止境地生儿育女、喂奶和生病，弄得她心力交瘁，神经衰弱。

这年春季托尔斯泰多次想离家出走。但是，对妻子的爱（虽然有思想分歧），对儿女的爱拖住了他。6月17日至18日夜托尔斯泰夫妇之间爆发了一场厉害的争吵。托尔斯泰受不住便离开了家，但他又想到妻子快要分娩，于是回心转意又回来了。

“黄昏，在宅旁割草，一个农民来报告庄园的事。”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去洗澡。回转时，生气勃勃，快快活活，可是，妻子突然没头没脑责备我，其由头是有关几匹马的事，这几匹马，我不需要又不想脱手。我什么也没说，但心里很气闷。我走了，真想一走了事，可是，她行将分娩，这又迫使我在去图拉的半路上转回来。家里有两个汉子在玩文特牌——我们两个成年的儿子。姨妹塔妮娅对我说：‘她在玩

槌球戏，你没看见?’ ‘我不想看她。’我便回到自己房间，睡在沙发上，心里难过睡不着。唉！多难受啊！总之，我还是可怜她。三点才睡着，她进来，把我叫醒，说：‘原谅我！我就要生孩子了，很可能，会死去。’她上楼去了。开始分娩——这本当是家庭内最欢乐最幸福的事，不知怎地却变得不必要和令人心情沉重。派定了奶妈喂奶。倘若有谁管教我家的事，我要责骂他。这真是毫无办法和残忍，对她残忍。我看到，她正以加速度走向死亡和痛苦——精神的痛苦——可怕的痛苦。八点入睡。十二点醒来。等到清醒，坐下动笔。等到我兄弟从图拉来访，我便平生第一次向他痛陈此情此境的可怕。”^⑨

6月18日托尔斯泰家生下了第三个女儿，为了向愿做婴儿的教母的亚历山德拉·安德列耶夫娜·托尔斯泰娅致敬，特取名为亚历山德拉*。

这一天托尔斯泰在日记中写道：“唉！心情多么沉重啊！总之，我还是可怜她……至今还不相信，姓完全麻木了……我看到，她正以加速度走向死亡和痛苦——精神的痛苦——可怕的痛苦……”“家里都游手好闲，大吃大喝，互相怨恨。”^⑩6月28日他写道。

* 即本书作者。

很难想象托尔斯泰这一时期复杂的内心斗争。他寻找着出路但没找到。而继续过这种生活，他又认为卑劣——他简直办不到。他觉得，他无权抛弃妻室儿女，可又没有一个人能够向他提出解决的办法。

“我不知道应当怎样拯救自己摆脱痛苦，拯救她摆脱她正全力以赴的灭亡。”他这样问自己。

“我不离家出走，也是枉然。看来，此事尚未了结。虽然非常怜惜儿女。我越来越爱他们和可怜他们。”1884年7月14日他写道。

托尔斯泰夫妇争吵的起因之一便是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坚决拒绝自己给新生的婴儿喂奶，雇佣了邻村的一位健康肥胖的农妇安努什卡。她给萨莎·托尔斯泰娅和自己的婴儿同时哺乳。

“我家物质方面一切都很优越，”6月24日他给契尔特科夫的信中说，“我妻子生下一个女孩。这本是件喜事，但对我来说，喜事遭到破坏，因为我的妻子违背我明确的观点，即雇佣奶妈，使她放弃自己婴儿去给别人的婴儿喂奶，是不人道的、不合理的、违反基督精神的行为，总之，没有任何理由从一个活生生的婴孩身旁夺走给他哺乳的妈妈。这件事在做着，不可理解，象是做梦。我跟自己作斗争，但感到难受，可怜妻子。”^①

在同一封信中他又说：

“我们多可怜，迷惘到何等地步。我家里此刻有一大堆人——我的女儿和库兹明一家。我往往不无恐惧地看待这种不道德的生活：游手好闲和大吃大喝。他们人这么多，都是成人了，身体健壮。而我亲眼看到并且深知农民劳动的艰苦，我周围就有人进行这种劳动。而他们却叉手坐着，弄脏衣服、被褥和住房。别人为他们做一切事，而他们不为任何人，甚至不为自己做一点事。这一点，所有的人都认为理所当然，我本也是这么看；这种事物的秩序我也曾参与遵循。我清楚地看到了这点，时刻不会忘记。我感到，对于他们来说我倒是个惹人讨厌的人物，但我以为，他们开始感觉到，有点不对劲。有时交谈交谈，很好。前不久，小女儿玛莎病了，我去看她，便跟几个女孩子谈话，谈谈他们每个人在这一天做了什么事。大家都不好意思了，只是告诉我，别的人做了什么事。第二天晚上我们又一次谈论这个话题。我真恨不得把他们拖进这种活动——每晚碰头，各自说出自己一天所做的工作和所犯的罪过。我看，这么做是很好的，当然，这么做可得完全自觉自愿。”

两个女儿——富有魅力的塔妮娅，和十三岁的瘦瘦的玛莎。她俩已经敏锐地听从父亲的话了。玛莎

象父亲。一双同样深凹的聪明的灰色眼睛，能看透五脏六腑，智慧的、宽广的前额，不漂亮的大嘴巴。看到这个拖着小辫子的细细的、病态的小女孩，特别是跟塔妮娅一比，第一眼的印象就是：“可怜的孩子！真不漂亮，灰溜溜的……”而玛莎一定感到了这一点，因而很腼腆。她不曾受到母亲的爱抚。比她大一岁的列夫，有病的安德留沙以及塔妮娅都是母亲的宠儿。小姑娘能看透人心的眼睛往往停留在父亲身上，父亲说的话，有时她还不完全理解，却深深印进她心里。玛莎懂得很多，虽然大人们对这点没有在意。她整个心身都渴望爱，因而胆怯地倾心于父亲。

有时家庭纠纷暂时平息，托尔斯泰便专心致意于写作——研究和翻译四福音书以及批判教理问答。他这时脾气好，尽量适应家庭生活。

“我家住在乡下，”1884年10月3日他写给契尔特科夫的信中说，“我、妻子、两个女儿、三个小儿子和一个新生的女儿。说我家很好，这并没错：干净、和睦和并非不信神。这个夏天我这儿有的是静静的、巨大的欢乐。家庭内，大家都亲近我。这种欣慰，我不能够向您表达。但是，另外的欢乐，比如看到别人心向善、弃绝昨日之非和承认真理，这种欢乐我从未体验过。两个大儿子在莫斯科，按照惯性原则，我们

应当上那儿去。我妻说，20号左右动身。不过，在莫斯科的生活将是另外的样子。社交界就不必提了。我还是难以想象我怎么去。我觉得，我什么地方也不应当去……”^⑫

10月23日，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从莫斯科给雅斯纳雅·波良纳的丈夫写信，全家去莫斯科以后他一个人呆在那儿。

“我看到，你留在雅斯纳雅不是为了著作（我是把它放在高于一切之上的），而是为了某种鲁滨逊式的玩意儿。你放走了亚得里安，他本想呆一个月的，你也放走了厨子，他本也有同样的打算，即白白拿一个月的工钱；这么一来，你就得从早到晚自己动手干那种不相称的体力劳动，平常那是年轻的男女工人做的。跟儿女一道生活到底要好得多，有益得多。你当然会说，这么生活是符合你的信念的，你觉得这样好。这是另外一回事了。我只得对你说：‘你就享受吧！’。不过，终究感到可惜，你这么有智慧的精力居然浪费于劈柴、烧茶饭和做靴子——这也好，作为休息，换一换劳动方式，但切莫作为专业来干。”^⑬

第二天，10月24日，托尔斯泰写信给妻子，陈述不要管家自己动手整理雅斯纳雅·波良纳田产的计划。

……“我看得清清楚楚了，”他写道，“如果我所确认的真理和人们的行为准则成为生活中实际的准则，那么，要实现它只有一种方式，即我们这些有钱有势的人自愿放弃财富和暴力；而这一点也不是一蹴而就，需要慢慢来的过程，水到渠成。只有当我们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主要的是，只有当我们跟那些为我们工作的老百姓直接打交道的时候，这个过程才能够完成。”^④

10月25日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回信给他：“我自己也恰好想到这件事。你呆在此处虽说只半年，自己不干活就觉得内疚（指对老百姓的关系而言），在庄园内收益可以获得同样多，我以为是够多的了；而所损失、偷盗、经营不善所浪费掉的一切，如果管理得当，本来是可以用来帮助和分给老百姓的。跟老百姓的关系会处理得很好的——雅斯纳雅的进项甚微，不值一提，而你又善于经营，脑子又灵（只需你愿意干），你会把任何事情办好的。你看怎么样？如果这是你下乡的一个借口，那也好，你为了那养活我们，教育儿女用的家产，抛下我们，那就不会于心不安和感到枯燥了。——这么说，是否算是正确理解了您，我不知道，反正我怎么想就怎么回答您。”^⑤

托尔斯泰家的家庭生活就如此过下去，有时好象一切都很平静，夫妇俩可以共同生活在一起，各走各的路。这种情况也并非不可能，如果没有孩子。对于托尔斯泰来说，儿女接受教育的环境是他万难忍受的。他写给契尔特科夫的信中说：

“著述工作没有进展。体力劳动几乎没有目的，即并非生活所迫。跟周围人的交往几乎断绝。乞丐来了，我给他们几个小钱，他们就走了。眼睁睁但见家里的小孩按部就班堕落下去，但见得给他们的脖子挂上一盘盘石磨。当然，我有错，但我不愿在您面前掩饰而故作镇静，那其实是没有的。我不怕死，甚至但求快死。但这种情形是可怕的，这就意味着，上帝赋予我指导生活以求得完美福祉的那一根线我却把它弄掉了。我迷惘了，但求一死，离家出走的想法又来了，或者，利用我的地位从而根本改变整个生活。”^⑩

时不时，每当他特别感到心情沉重的时候，他便离开莫斯科的家，往往去雅斯纳雅·波良纳。1885年3月，他跟他的朋友乌鲁索夫公爵去了克里米亚。乌鲁索夫生病，大夫们指定他前往气候温和的地方去疗养。塞瓦斯托波尔战役以后，托尔斯泰第一次到达克里米亚。

“经过那些曾有敌人的炮垒而显得不可接近的地方，心里感到很奇怪：对战争的回忆竟至跟青春和朝气蓬勃之感结合在一起。”^{①7}

在克里米亚的日子他几乎每天写信给妻子。象往常一样，他欣赏自然景色，作长距离的旅游，有时骑马，有时步行。但托尔斯泰的思想和注意力并非专注于克里米亚的美景，虽则他也提到香气扑鼻的紫罗兰、悬崖峭壁、参天的柏树和潺潺的喷泉。托尔斯泰到处看到穷苦人、被有钱有势的人欺凌的老头和老太婆、被抛弃在小村子里的鞑靼人的孤儿寡妇。

8月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理当住在莫斯科，因为两个儿子伊里亚和列夫要补考。她的操劳和责任更大了。她已经亲自经管能获得巨大的收入的丈夫著作的出版的事务，亲自校对清样，监视收入和支出。可是，令母亲伤心的是伊里亚考试不及格。他一心想从事农业和打猎，想定居农村。他对科学不感兴趣，决定离开学校。伊里亚回到了雅斯纳雅·波良纳，母亲留在莫斯科，他身边还有另一个儿子列夫，他比较成功地通过了补考。

“我不知道冬天我要做什么，”1885年8月20日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给丈夫的信中写道，“搬家或

者不搬。读书要付出巨大的劳动，要求我在场，如果列夫又考不及格，那么，为了这些书而活着就不值得了。目前，在这儿我已经够苦了，这段时期我什么也没有想，什么也没有做，再加上只我一个人受罪。”^⑧

下一封信，8月21日她向丈夫谈到伊里亚：

“我劝他留在7年级，可是，他脑子里除了狗，啥也没有。很明显，我真恨不得消灭这傻瓜式的、老爷式的、残酷的玩意儿——打猎……”^⑨

托尔斯泰跟塔妮娅和几个年幼的孩子住在雅斯纳雅·波良纳。他的信徒不断来找他，其中有契尔特科夫、比留科夫、英国人弗列。这年秋天有个犹太人弗列涅尔曼来到雅斯纳雅·波良纳，他在村子里定居下来，开始教雅斯纳雅·波良纳的孩子识字。但是，授课遭到当局禁止。为了取得教师的资格，弗列涅尔曼理当接受东正教。弗列涅尔曼便在当地教堂受洗，塔妮娅做他的教母。而孩子们的家庭教师madame Seuron*，因为有grande dame**的气概，托尔斯泰家里的人都管她叫公主。这时，她因塔妮娅

* 法语：塞龙太太。

** 法语：贵妇人。

做了教母而惊恐万状。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得知这件 *post factum** 以后，便怒气冲天。这事更引起了她跟丈夫之间新的争吵。

1885年8月29日托尔斯泰就这件事写信给契尔特科夫：“弗列涅尔曼改信东正教，我没有异议。我觉得，要是我，这点就做不到，因为我不能想象那种处在其中则对于真理必定少说为佳的境地。”^②

况且，改信东正教对于弗列涅尔曼并没有什么帮助。当局仍然没有批准他做雅斯纳雅·波良纳学校的教师。

象往常一样，托尔斯泰呆在雅斯纳雅·波良纳直至深秋。他没定出任何计划。他写信给妻子说：“生活，因为暂时没有死。”他孤孤单单，因不跟家里人在一起而烦闷，特别是因为两个女儿不在跟前，她们越来越接近他了。他的影响不知不觉在她们身上显示出来——她们力求生活得更完美，很少游手好闲，自己动手收拾房间，不再吃肉。托尔斯泰自己这时早已成了个素食主义者并且努力戒烟。

可是，跟妻子的和睦平安状态并没有维持多久。到了莫斯科，他重新又陷进了城市无所事事的老爷式的生活之中，这种生活他是极端鄙视的，因此他又

* 拉丁语：事后的呈文。

极其苦恼。10月末他已达到绝望和气愤的极限。

“已经发生了那种多次发生过的事情。”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写信给妹妹塔妮娅说，“略沃奇卡产生了极端神经质和抑郁的情绪。他坐下，动手写，又走了。我一看，他脸色真吓人！直到此刻我们生活倒不错：一句不愉快的话也没说，实实在在没有说。‘我来告诉你，我想跟你离婚，我不能这么过下去，我要去巴黎或者美国。’”

“你要知道，塔妮娅，倘若整个房子垮下来落在头上，我也不会这么惊讶。我惊恐地问：‘发生了什么事？’‘没有什么，但是，如果给车子上的东西越堆越多，马就拉不动了。’——堆什么东西呢？不知道！可是，大喊大叫，无端责难，吐出一大堆粗鲁的话，越来越糟，终于，我忍受不住了，忍受不住了！我几乎啥也不回答，只看见一个疯子，当他说：‘你到哪里，哪里的空气就污染了，’我吩咐搬一口大箱子来，把我装进去好了。我想去你那儿那怕只住几天。孩子们跑过来，又哭又叫。塔妮娅说：‘这是干吗？我跟你一道走。’他便央求留下。我就留下来，但陡然间又开始神经质地号啕痛哭。简直要命！你想想，略沃奇卡哭得浑身发抖和痉挛。我有点可怜他了。四个儿女：塔妮娅、伊里亚、略瓦和玛莎都叫起来。我发呆

了，不吭声不哭，真想痛骂一通，但又不敢，于是不吭声，闭嘴三个小时，即使打我也不说。就这样收场。但气闷、痛苦、裂痕、视若路人的病态的状况——这一切都留在心里。你可知道，我常常愚蠢地问自己：此刻，所为何来？我没离开家门一步，为出版的事不声不响工作到夜里三点，此刻我爱他们，了解他们比任何时候更甚。这一切，所为何来？”^①

“做什么好？”托尔斯泰 10 月 9 日至 15 日给契尔特科夫的信中写道。“此刻我在撒谎，正如此刻我用自己全部生活在撒谎一样，坐在桌子旁，躺在床上，允许出卖文章，签署关于选举权的文件，允许命令农民追缴地租和依照我的委托追究农民偷盗我的私有财产的案子，这不是用我的全部生活在撒谎吗？或者是斩断这一切——义愤填膺。斩断这一切，要把自己从谎言中解放出来而没有一腔愤火我是办不到的，现在还不行。我祷告上帝，即向上帝那儿寻找解决困难之途。我没找到。”*

这封信的结尾如下：

“这封信是两天前写的。昨天忍受不住了，开口说话，气愤已极，结果是闭眼不看、塞耳不听，结果

* 原注：这封信并未寄出

还是气愤。整天我一个人自个儿哭，不能支撑了。”^②

这一次重大冲突以后，托尔斯泰便跟女儿塔妮娅一道去了他的朋友奥尔苏费耶夫家的莫斯科近郊的田庄。

10月20日，心境平和以后，他写信给妻子：“我过去和现在只说一件事：应当弄清楚并且确定，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以及向哪个方面走；倘若弄不清楚，那么不必惊慌，你得自己受苦，别人也跟着你受苦。关于必要之事，现在无从做起，无从说起，因为对于不愁衣食住行的有钱人来说，必要之事根本没有，只除开盘算生活得更好这一件事。好了！看上帝的情面，从今别再谈这事了。我不会再谈了。”^③

- ① 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二卷，第496页。
- ② 苏霍京娜—托尔斯泰娅：《雅斯纳雅·波良纳的朋友和宾客》，第146页。
- ③ 《1862—1910年列·尼·托尔斯泰伯爵致夫人的书信集》，格鲁津斯基出版社1913年版，第213页。
- ④ 《索·安·托尔斯泰娅致列·尼·托尔斯泰书信集》，Academia，出版社1936年版，第246页。
- ⑤ 同上，第205页。
- ⑥ 穆拉托夫：《托尔斯泰与契尔特科夫》，第76页。
- ⑦ 《列·尼·托尔斯泰伯爵致夫人书信集》，第216页。

-
- ⑧ 《全集》，第八十五卷，第 69 页。
- ⑨ 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二卷，第 512 页。
- ⑩ 同上，第 513 页。
- ⑪ 《全集》第八十五卷，第 69 页。
- ⑫ 同上，第 105 页。
- ⑬ 索·安·托尔斯泰娅：《致托尔斯泰书信集》，第 256 页。
- ⑭ 《列·尼·托尔斯泰伯爵致夫人的书信集》，第 223 页。
- ⑮ 索·安·托尔斯泰娅：《致托尔斯泰书信集》，第 261 页。
- ⑯ 《全集》，第八十五卷，第 223 页。
- ⑰ 《列·尼·托尔斯泰伯爵致夫人的书信集》，第 260 页。
- ⑱ 索·安·托尔斯泰娅：《致托尔斯泰书信集》，第 322 页。
- ⑲ 同上，第 25 页。
- ⑳ 《全集》，第八十五卷，第 25 页。
- ㉑ 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二卷，第 551 页。
- ㉒ 《全集》，第八十五卷，第 295 页。
- ㉓ 《列·尼·托尔斯泰伯爵致夫人的书信集》，第 286 页。

第三十九章

人民的“精神食粮”

关于人民精神发展的必要性的思想，托尔斯泰一直惦记在心。

还是二十四岁的青年时期，托尔斯泰参加多瑙河远征，他就打算出版一本士兵的杂志《开卷有益（道德的）》，1853年12月20日他在日记中记录了这事。

我们已经知道，托尔斯泰在六十年代初为办学校的事，后来在1871年和1872年又为编写《识字课本》与《阅读园地》花费了多少精力。

1884年2月17日托尔斯泰写给契尔特科夫的信中说：

“为了教育俄国人而出版书籍这个想法越来越引起我的兴趣。我避免使用‘为人民’这个说法，因为思想的实质在于不要区别人民与非人民……”^①

当时在俄国有一种所谓“木刻书”。书贩子挨村串户出卖色彩鲜艳的图片、粗俗的诗集、详梦书和歌曲集。这种没有多大趣味的、艺术性不强的粗俗书籍不可能促进来自人民的读者的道德和智力的发展。

与此同时，精神食粮的需求在增长。工人农民虽然文化不高，但他们却很懂得真正的文艺创作，懂得真诚的、正确的语言并且能觉察出送给他们面前的假人民文学的虚伪性和才智平乏。

1884年2月5日托尔斯泰从雅斯纳雅·波良纳写给妻子的信中说：

“彼得·奥西波夫*谈到人民读物时非常有趣。他给我搬来了他的图书馆——一口书箱。那里头有《圣徒言行录》、《教义问答》、《祖国语言》、《历史读本》、《地理读本》、《俄罗斯公报》、冈拉霍夫编的文选和一些长篇小说。他说了自己对每一类书籍的看法。这一切使我很感兴趣，迫使我重新反复思考了有关人民读物这个问题。”^②

* 雅斯纳雅·波良纳的一个农民。

作家Г·И·达尼列夫斯基于1885年9月拜访了托尔斯泰，他在其回忆录中引用了托尔斯泰关于上述问题的谈话：

“这千百万有文化的俄罗斯人站在我们面前，好似一群雏鸦张大着嘴，”托尔斯泰说，“他们对我们说：‘先生们！亲爱的作家们！请给我们的嘴里投下有益于我们也无愧于你们的精神食粮吧！为渴望生动的文学作品的我们写作吧！这一本本木板的叶鲁斯兰诺夫·拉扎列维奇们、米罗尔多夫们、格奥尔戈夫们以及其他杂货摊子上的食物我们享用得够了，请拯救我们吧！’纯朴而光荣的俄罗斯人民值得我们对他们善良而正直的灵魂的号召作出回答。”^③

“关于这点我想了很多，”达尼列夫斯基补充记录道，“我下了决心，尽自己的能力在这个领域试试看。”可是，仅有良好的愿望是不够的。《高加索囚徒》、《上帝看得见，但不说出来》、《人靠什么生活》、《哪儿有爱，那儿便有上帝》以及其他民间故事是自然而然出自托尔斯泰笔下的。他不是写作‘试试看’。他不能不写。”

1884年秋，媒介出版社成立，它的同人所碰到的主要困难之一便是寻找这一类通俗的文艺书籍，虽然契尔特科夫已经非常热心在着手干这件事。他事

先已征得一批比较著名的作家和艺术家的赞同跟“媒介”合作，建议出版商伊凡·德米特里耶维奇·瑟京负责人民小册子和图片的出版与发行，用以替代木刻书，那是瑟京已经出版过许多的。

瑟京本人出身于农民，读了农业学校四年级，文化不高，但为人聪明能干。他是那类实干家中间的一个，关于他们这号人，俗话说：“别人的，一点不拿；自己的，分毫不让。”多亏他的才干和顽强奋斗，瑟京才成了一个人物。一个短时期在一家他父母送他去学徒的铺子里当小伙计，他仔细观察了店内的事务，后来自己开了一个书店，这书店逐渐扩展，终于变成了俄国最大的出版社之一。《俄罗斯言论报》便是瑟琴所出版的，它是俄国发行最广的大报之一。

1884年11月的一天，一个穿着翻皮大衣的、贵族派头的高个子漂亮年轻人走进了瑟京的书店里，他对瑟京热情洋溢地宣传必须给人民进行启蒙教育。瑟京看待任何事物总习惯于从赢利观点出发，关于人民的福利、基督徒的道义以及必须为工人农民准备精神食粮这类思想，他听起来自然感到新鲜和陌生。可是，契尔特科夫的贵族风度、他的顽强执着的劲头和不容反驳的气派使得瑟京肃然起敬。作家托尔斯泰、列斯可夫、迦尔询、柯罗连科，画家盖、

列宾、克拉姆斯柯依等人，契尔特科夫提到他们的名字时好象他们已经是未来出版社的同人似的。瑟京早已听说过他们的大名，稍稍犹豫以后，他便同意出版为了在人民群众中普及的廉价读物了（按八十戈比一百页计算）。

1884年末，契尔特科夫介绍自己的朋友比留科夫跟托尔斯泰认识。比留科夫出身于柯斯特罗姆贵族，毕业于海军学院，在海军部门本有远大前程。但他对此不感兴趣。他学习了托尔斯泰的思想以后，便跟契尔特科夫一道，热情地为媒介出版社而工作了。

事情并不容易办。不但书籍应当在艺术性方面是第一流的。而且，印出的材料必须不违背“媒介”的主要合作者的基本思想。

托尔斯泰和契尔特科夫之间书信往返很频繁，讨论哲学和宗教问题，同样也讨论托尔斯泰本人著作的出版事宜。

事情自然而然地发展，结果是契尔特科夫从事于托尔斯泰的著作的推广和翻译成外语的工作，逐渐变成了托尔斯泰著作的主编。干这件事，他是心甘情愿的。他注视着托尔斯泰的创作，不让他稍稍抵触和偏离自己的原则。他按自己的观点评价托尔斯泰的文艺创作，但对在教派环境中成长的契尔特科夫

说来，其主要作用在于不让托尔斯泰的著作跟他的宗教观点发生矛盾。托尔斯泰不能不爱农民：对他来说，农民根基是俄国生活的本质。契尔特科夫则完全不熟悉、不了解、不热爱农民，但他尊敬农民，把农民看成俄国“劳动的”和不幸的阶级。

在托尔斯泰的文艺创作中，完全没有道德教训的成分，尤其是在他的民间故事中更是如此。可以从内容中引出这一或那一结论，但牵强强附会的地方却没有。文艺作品，正如果戈里所说，是作为一个有其正面和反面品质的被描写的典型的整体而从心坎里“唱出来”的。在文学作品中，正如在音乐作品中一样，任何一个虚伪的音调都会破坏整体的和谐，即破坏艺术作品的价值。这一点，契尔特科夫了解吗？

1885年1月31日，他写给托尔斯泰的信中说：“我现在才第一次读到您的《高加索囚徒》。我极其喜爱这篇故事。但我得开诚布公向您指出一点……第二十页是这么写的：‘有一次鞑靼人病了，人们走到日林面前，对他说：‘去给他治治。’日林根本不懂得治病。他去了，看了看，心里想：‘兴许他自己会好。’他走进棚子里，舀了一碗水，抓把沙子放在碗里搅一搅。当着鞑靼人的面，对着那碗水嘴里念念有辞，然后端给病人喝。这一来，鞑靼人的病就好了。’往下

第二十三页：‘日林想上山去观察四周的地形，对监视他的小伙子说：‘我不走远了，只到那座山头上看看：寻找一种草药，给你们的人治病……’

“倘若把日林作为自有其优点和缺点的活人的形象来审视，那么，从文学观点看来，这里指出的缺点可能赋予这个典型以更多的现实性。但是，从对敏感的读者的影响这个角度来看，我以为这两处地方必定会在读者中间引起赞许的微笑，从而自然给占压倒优势的倾向以推动，这种倾向认为，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是极其实际可行的。因此，我很想请您允许我在木刻本中删掉这几行……

“一旦触及这个问题，我还得向您说明一点，您的故事《上帝看得见》中间有一处早就令我发愁。当长官询问关于阴谋之事，对阿克辛诺夫说：‘老头！你是个正直的人，在上帝面前你对我直说了吧，这事是谁干的？’阿克辛诺夫回答：‘我没看，不知道。’而其实他是看见的，知道的。”^①

对契尔特科夫的信，托尔斯泰回答道：

“您提出要删掉的地方，我完全同意并且非常感谢您。只是请您自己动手”（着重点是本书作者所加）。作为艺术家，托尔斯泰自己不能够做这种修改。

跟契尔特科夫对待他的宗教观点的忠诚和牺牲

精神相比较，上述小问题对于托尔斯泰来说能有多大的意义呢？托尔斯泰是孤独的。契尔特科夫的同情和帮助使他心里充满感激之情。他用心地、敏感地听取契尔特科夫的意见。

“从我最近这部书*中您要删节什么呢？”1884年8月28日的信中托尔斯泰问契尔特科夫。而现在，以他素有的委婉的口吻颇有预见地说道：“这并非空洞的和自私的问题。相反，我想知道，您觉得什么是诱惑性的。这完全不是为了争论，而是为了删节和冲淡，主要的是在往后可以确知，对于别人什么是诱惑性的。”^⑥

托尔斯泰是多么需要亲近的人的支持啊！这从他6月6日和7日给契尔特科夫的信中可以看出：“我心情沉重，已经六天了。只有一点可以告慰，这是暂时的精神状态。我心情沉重，但并不绝望，我知道，我会找到那根丢掉的线的，上帝没有遗弃我，我并不孤单。在这样的时刻你会体验到缺少亲近的活人——巴希可夫教派和正教徒则有他们的公社和教堂。现在我真想把自己的疑难提交给具有同样信仰的人们去评判，并且去做他们要我做的事。有的时候，你自己在促进自己，感到浑身是劲，但有的时候，

* 指《我信仰什么？》

你不想休息，倒想把自己贡献给你所信赖的们，让他们指挥你。”

写作《那么咱们可怎么办？》这篇文章很费力，托尔斯泰怎也不能完成，弄得他疲惫不堪。他想回到文学创作上来。

“我想开始并完成一部新作品。或者是法官之死，或者是《疯人笔记》。”^⑧1884年4月27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或者叫做《法官之死》还是在1882年托尔斯泰就动手写了。这个题目是已故图拉区法院的法官之死所引发的。托尔斯泰写了一些片断，扔掉，又重新拾起，间隔一段时期，直到1886年3月才完成。

象法官伊凡·伊里奇这类官吏家庭为数甚多。他们象这个阶级中所有的人一样生活，步步升官，每月20日领取薪水，公余去戏院看戏或去作客，生病，死掉。法官伊凡·伊里奇死了。他的痛苦是难以忍受的。可是，他感到恐惧，这与其说是由于肉体的痛楚，无宁说是因为意识到死亡之不可避免。在毫无出路的绝望中伊凡·伊里奇呻吟着，挣扎着。他的妻儿因为可怜他以及完全无能为力帮助他而跟他一同受苦。这样拖了三天。

可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读者心中对这个人产生了新的兴趣。在这个官吏灰色的、枯燥乏味的外壳之下突然苏醒了一个不朽的人性的灵魂。

“这是第三天将尽在他死前两个小时发生的事情。正在这时，中学生蹑手蹑脚溜进房，走到父亲的床边，临终的人依然绝望地呻吟并且挥着手。他的手放到中学生的头上。中学生抓住它贴紧自己的嘴唇，哭了起来。

“……突然他心里一亮，那个东西，那个折磨他，赖在他身上不走的東西，突然一下子向外跑，从两面、从十面、从各方面向外跑。他怜惜他们，应该使他们别受苦。‘多么好！多么简单！’他心里想。‘痛楚呢？’他问自己，‘痛楚挪到哪儿去了？好了！你在哪儿？这痛楚。’他细心地听。

“对！那就是它。怎么？放开这痛楚。

“可死亡呢？它在哪儿？

“他寻找自己往日对死亡习惯性的恐惧，但没有找到。它在哪儿？死亡是什么样子？恐惧一点儿也没有了，因为连死亡也没有了。

“替代死亡，一片光明。

“‘就这么回事！’突然他出声地说。‘多么快乐啊！……’”^⑨

这期间，1884—86年间，托尔斯泰为“媒介”写了一系列民间故事。《人靠什么生活》（尼·尼·盖作插图）、《两个老头》、《三位老人》这几篇故事的题材是托尔斯泰从奥罗涅茨农民B·П·谢戈连柯那里听来的，托尔斯泰于1879年跟他结识。另外几篇的题材是取自民间传说，还有的来自现实生活，或者是托尔斯泰虚构的，例如《傻瓜伊凡的故事》。

过了许多年以后，有人问托尔斯泰，他的那几部作品他自己认为是最好的。他回答：民间故事《人靠什么生活》和《哪儿有爱，那儿便有上帝》。

前往克里米亚旅行期间（他陪伴生病的朋友Л·Д·乌鲁索夫去该地），托尔斯泰收到契尔特科夫寄的杂志《俄国工人》，上面登载了故事《玛尔登叔叔》。托尔斯泰非常喜欢它，立即改写，后来改名为《哪儿有爱，那儿便有上帝》。托尔斯泰不知道，这篇故事《玛尔登叔叔》是法国作家塞仑斯于八十年代写的。1888年当塞仑斯控告他剽窃时，他很难过，立即道歉。

托尔斯泰为人民所写的文学作品中包括了各方面的题材：积攒私产到头来一场空的题材——《人需

要很多的土地吗?》，论酗酒的危害——《第一个造酒者》，还有关于爱情、关于上帝、关于饶恕的主题。但是，托尔斯泰的哲学表现得最鲜明的作品莫过于关于傻瓜伊凡的故事了。伊凡不会狡猾地卖弄聪明，按照上帝的意旨老老实实过活，力求不欺侮任何人，跟所有的人和平相处。与此同时，他的兄弟军人谢明却想要统治世界，但印度国王比他更强。“印度国王不让谢明的军队来得及进行射击就派遣自己的娘们从空中向谢明的军队丢炸弹。娘们开始从高空向谢明的军队进攻，好似风暴扫蟑螂；谢明的军队纷纷逃命，只剩下国王谢明一个人*。悲惨的命运也降临到为自己积攒了大量钱财另一个兄弟、大肚子塔拉斯的头上。一个商人使他破产。被魔鬼引诱的两兄弟越来越迷途难返，而傻瓜伊凡却安安稳稳生活在跟他自己一样傻的傻瓜们的王国里。傻瓜们拒绝打仗，不需要金钱。他们劳动，自己养活自己，对于一切想和平生活和劳动的人，他们都给以休养生息之地。人类生活及其文明、军队、国家的划分和资本的积累，他

* 原注：《关于傻瓜伊凡和他的两个兄弟军人谢明、大肚子塔拉斯、哑巴妹妹玛拉尼娅、老鬼以及三个小鬼的故事》写于1885年，当时飞机还没有发明。

们全不理解。他们是一群傻瓜，作为傻瓜，他们甚至不能意识到自己哲学皈朴返真的大智大慧和正义性。

作家阿克萨科夫对待托尔斯泰的民间故事的态度是很有意思的。1885年7月5日，斯特拉霍夫写信给丹尼列夫斯基谈到托尔斯泰的故事《蜡烛》和《两个老头》：

“在这些故事里，”阿克萨科夫说，“显示出托尔斯泰跟神圣的真理处于赤忱的亲密的关系之中，这种关系的秘密不应该归我们来分析，使他这位作者处于我们的审判之外。很明显，他跟上帝另有自己的默契。”^⑩

媒介出版社的同人热情奋发地工作。迦尔询跟托尔斯泰合作给列宾的画《我主耶稣基督受难图》写了说明文字。这幅画托尔斯泰大为赞赏。

1885年5月2日，他写信给契尔特科夫：

“如果您见到了列宾，请告诉他，我一贯爱他，但这幅基督像使他跟我比过去更亲近了。只要我回想起这张脸和这只手，眼泪便夺眶而出。”^⑪

尼·尼·盖给《人靠什么生活》和关于傻瓜伊凡的故事画了插图。

除了托尔斯泰的书以外，媒介出版社还印行了

A·M·卡尔梅可娃的小册子《希腊导师苏格拉底》，为了改写这部作品，托尔斯泰花了不少工夫。还印行了一些圣徒言行录以及其他许多书籍。这些小书印刷了几十万册，发行到全俄各地。

农民的状况，他们的贫困和缺乏土地的情况一贯使托尔斯泰深感不安。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使他们受教育还是远远不够的，还该改善他们物质生活状况。但是，怎样做到这一点呢？

正好托尔斯泰读到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的书《论进步与贫困》。该书作者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就是全部土地国有化并且与土地的质量相适应征收统一的国家农业税。乔治的理论托尔斯泰很感兴趣。这个理论使有钱人占有大量土地从而损害劳动农民这个问题得到直接的、合乎逻辑的回答和解决办法。

“我如饥似渴地读了乔治的《Progress and poverty》* 最后一卷和第一卷。”1885年2月24日他写信给契尔特科夫说，“这部书对我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和愉快的印象。”^⑫

同年，即1885年托尔斯泰收到了农民T·M·邦达列夫的一篇文章的手稿：《热爱劳动与不劳而

* 英文：《进步与贫困》

获，或者叫庄稼汉的胜利》。邦达列夫的观点跟托尔斯泰对待农业劳动的观点不谋而合。1886年5月，他为这篇文章写了一篇序言。序言中托尔斯泰陈述了邦达列夫关于劳动的观点，这些观点在关于傻瓜伊凡的故事和《让你脸上的汗水挣来自己嘴里的面包吧！》这篇作品里已经表达得非常鲜明扼要了。

“种地的劳动，”邦达列夫说，“是拯救人类的一剂药方。人们得承认这首要的法律是上帝制定的和万古不变的，每个人得承认种地的劳动是自己的天职，为的是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而人们信仰一个上帝，信仰互相之间的爱，从而团结在一起，消灭使人受苦的天灾人祸。所有的人都将劳动，吃自己劳动所得的面包。面包和生活必需品不会成为买卖之物。”^⑬

邦达列夫的卓越的智慧、思维的清晰程度和坚定性使托尔斯泰惊讶。托尔斯泰曾经对A·C·普鲁加文说过：“您知道，我得告诉您，有两个俄罗斯农民，普普通通，刚够得上知书识字的水平，可我得益于这两个人比得益于全世界所有有学问的作家还要多。”

托尔斯泰指的是休达耶夫和邦达列夫。

托尔斯泰想出版邦达列夫的文章，但是，估计书

报检查机关是很难通过的。政府采取越来越严厉的措施以对付托尔斯泰及其追随者自由思想的著作的传播。托尔斯泰信徒的圈子日益扩大，令政府惶惶不安。人们脱离正教教会，不屈服于政府的压力。

1884年，有个名叫查留波夫斯基的青年人写了一封信给托尔斯泰，由于宗教信仰的原因他想拒绝服兵役。托尔斯泰决定不给他回信，觉得在这个严重的问题上不可能影响这位青年人。何况查留波夫斯基已经拒绝了接受武器。他被逮捕，投进牢房，于军纪营判处两年惩罚性服役。

托尔斯泰写了一封信给查留波夫斯基的兄弟，信中说：“被告认为自己是个基督徒，努力按照基督福音生活。福音建立在如下的五戒的基础之上：①不向兄弟发怒，②不跟妻子离婚，③不以暴力抗恶，④绝不发誓，⑤爱敌人。立足于这五戒，你兄弟拒绝宣誓，拒绝使用武器和拒绝参与军事行动……你兄弟过去和现在所做的事是一项人在生活中所能完成的伟大事业。我不知道我会怎样经受这种考验，但是，为我自己和我的孩子，但愿经受此种考验。”^⑤

托尔斯泰求助于彼得堡的艺术评论家B·B·斯塔索夫，请他尽一切可能帮助查留波夫斯基。他信中写道：“我写信告知您的这件事有很大的重要性，

从来没有任何事情象此事这般于我心显得如此亲近和重要。”^⑩

托尔斯泰不但在俄国国内寻求对自己信仰和学说的承认。其他国家的人的见解也使他很感兴趣，他收到美国黑人的捍卫者、同样宣传不以暴力抵抗邪恶的威廉—加里逊的儿子的一封信，他非常高兴。

1886年1月18日，一个新的灾难降临托尔斯泰家。小儿子阿廖沙死了，患的是喉病，大夫确诊为喉头炎。阿廖沙气喘，发高烧，过了三十六小时就死了。

真好比一朵乌云飘浮在托尔斯泰家的上空。大家都爱四岁的阿廖沙，唯有两岁的萨莎啥也不懂，依然笑逐颜开，象往常一样，欢天喜地地生活。

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不曾离开阿廖沙的病床半步，她告诉大家，阿廖沙临终时突然张开灰色的、有着长长睫毛的大眼睛，开口说：“我看见，我看见……”就这样，他死了，小脸蛋带有惊喜和兴奋的表情。对于父母，他的死是个沉重的打击。1886年1月18日，托尔斯泰写信给契尔特科夫：“谈论这事是不可能的。我只知道，小孩的死我过去觉得是不可能理解的和残酷的，现在看来，倒觉得是合理的和幸福的了。死亡把我们所有的人团结得比过去更加亲近和友爱。”^⑪

但是，对于母亲来说，小儿子的死确是不可思议的残酷的事。她久久不能平息自己的悲恸情绪，于是操持家务，发行书籍，不停顿地紧张工作着，力图借以驱除折磨她的思念。唯有略沃奇卡一个人能够理解她，可怜她，但她觉得，他正在离她越来越远了。

“家里所有的人，首先是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在他后面，则是象一群羊似的小家伙，大家全都硬要我起一根鞭子的作用。”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在1886年10月25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他们卸下这副担子和对儿女的责任不管，不管家务，不管一切银钱往来，不管儿女的教育，不管一切家产和一切物质福利，只知享受现成的，比我享受的多得多，打扮得象一个大善人，摆出一副官场的、冷冰冰的、事先早已装扮好的姿态走到我面前，要马，要钱，要面粉等等。我没管过乡下的产业——我不会管，也没时间——因此我不能当家作主，我不知道，这等时刻农事上是否需要马匹，这些公事公办式的需求再加上我对情况的无知，弄得我心烦意乱和发闷气了。”^⑧

7月里有一天，托尔斯泰在叉草把装大车，伤了脚。大家以为伤势不重，但那只脚痛得厉害，发高烧。托尔斯泰患了丹毒性炎症。他在床上躺了两个月。

同一天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在日记中写道：

“最近这两个月——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病了——从一个方面看，是我最近的痛苦时光，从另一个方面看，又是幸福的时光（说来真奇怪）。我日夜看护他；我有了一件如此幸福无疑的事情可干了——这是我能干得好的唯一的事情。这是为了我所爱的一个人作出的牺牲。越困难，我就越幸福。现在他能走了，差不多完全康复。他让我觉得，他不再需要我看护了，这一来，我又当作一件不必要的东西再度被抛弃了。大家只期待和要求我一件事（在生活和家庭中一贯如此），就是放弃私有财产（这是不确定的，无法办到的），放弃信念，放弃对子女的教育和来日的幸福。这点不但我无力办到（虽然我是个精力尚未衰竭的女人），就是成千上万的人也办不到，甚至坚信这些信念的正确性的人也办不到。”^①

这年年底，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的母亲柳鲍夫·亚历山德罗夫娜·贝尔斯去世。但是，很少跟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见面的这位老母亲的死，对女儿来说，并不太伤心，比起发生在自己家里的那一连串事情来，老太太的死显得颇为平淡。

① 《全集》，第八十五卷，第27页。

② 同上，第424页。

- ③ 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二卷，第 519 页，又见丹尼列夫斯基著《雅斯纳雅·波良纳访问记》，载《历史导报》，1886 年第三期，第 529 页。
- ④ 《全集》，第八十五卷，第 140 页。
- ⑤ 同上，第 139 页。
- ⑥ 同上，第 90 页。
- ⑦ 同上，第 223 页。
- ⑧ 《全集》，第二十六卷，第 681 页 Л·П·格罗斯曼的文章：《〈伊凡·伊里奇之死〉的写作与出版经过》。
- ⑨ 《伊凡·伊里奇之死》，《全集》第二十六卷，第 112 页。
- ⑩ 《俄罗斯导报》，1901 年 3 月号，第 140 页。
- ⑪ 《全集》，第八十五卷，第 174 页。
- ⑫ 同上，第 144 页。
- ⑬ 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二卷，第 603 页。
- ⑭ 弗拉基米洛夫：《季·米·邦达列夫与列·尼·托尔斯泰》，第 56 页，1938 年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出版。
- ⑮ 《全集》，第六十三卷，第 302 页。
- ⑯ 《1878—1906 年托尔斯泰与斯塔索夫通讯集》第 70 页。
- ⑰ 《全集》，第八十五卷，第 314 页。
- ⑱ 《1860—1891 年索·安·托尔斯泰娅日记》，第 132 页。
- ⑲ 同上，第 133 页。

第四十章

“向上帝忏悔，别畏惧世人”

托尔斯泰一家人的生活分裂为二。他的两个女儿站在父亲一边。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跟几个儿子则另有自己的生活兴趣。他们讨厌托尔斯泰的学说以及他结交的新朋友。而两个女儿却年纪还太轻，不可能毫无保留地献身于父亲的学说并身体力行。塔妮娅感到很为难。她爱父母，常常调解父母之间的纠纷。塔妮娅喜爱世俗生活，跟上流社会受过教育的、文化修养高的人士交往，她感到轻松愉快。她喜爱并且理解艺术，爱美，喜欢好的家俱、做工精致的衣裳和各种珍贵物品。她生性爱欢乐，并且只要她出现在哪里，便把快乐带到那儿。总有一伙年轻人围着

她团团转，向她献殷勤，而她却不知不觉地稍稍跟他们调情。

父亲赞赏她，严厉地看待那批倾慕者，生怕有人胆敢用放肆的言语和眼风将她水晶般的纯洁灵魂弄脏了。

玛莎成长为一个不漂亮的敏感的姑娘，有一双严肃的、沉思的眼睛。她穿着非常朴素，把不服贴的、蓬松的头发费力梳理得平平整整，在后脑勺上紧紧扎成一小把。她跟母亲之间没有亲昵的关系。它崇拜父亲，把他的话如饥似渴地牢记心间。她是在他的观点的影响下成长、发展和成熟的。她天性敏感，总能猜出他的想法和意愿。她谦虚，不为人注意，逐渐变成了父亲身旁不可缺少的人，开初，她做做父亲委托她办的最寻常的小事：轻快的、不声不响的跑腿去为他端一杯水，拿一本书；往后，她便跟塔妮娅一同抄写父亲的手稿了。父亲交给她的任务越困难，玛莎去完成的劲头就越足。

父亲的客人，那帮身穿羊皮膻气直冲鼻子的腌脏的短皮袄、脚着腌脏的毡鞋或皮靴的人，遇见这位穿着朴素的姑娘，她亲切的眼睛注视着他们走进父亲的书房，这帮人定然会感到很自在的。

这些人全都是农民和工人，他们赞赏托尔斯泰

对宗教、对土地私有制和对组织基督教土地公社的观点。有时，托尔斯泰向他们朗读自己新写的文章和故事或别的作者的作品，大伙儿讨论那些作品对于人民教育究竟有没有用这个问题。

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不喜那些托尔斯泰主义者。家里有个人，不是塔妮娅姑姑就是索尼娅姑姑，把那帮人叫做“阴沉的人”。这个雅号便叫开了。

“谁在伯爵房里？”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问仆人。

“说不清，夫人！”仆人回话，“大概是个阴沉的人”。

雇用的职员也不喜欢“阴沉的人”。他们从不给酒钱，浑身尘土，鞋子把镶木地板弄脏，发出焦油的臭味，并且，毫无顾忌全都径直钻进伯爵本人的书房。

伯爵夫人的客人们可就不同了。他们全都干干净净，保养得很好，坐车驾上自己的马匹，有时还随身带着仆人，有的人给酒钱很慷慨。就这样，熟人逐渐分化成两种人：“光洁的人”和“阴沉的人”，而“阴沉的人”中间只有几个人才取得托尔斯泰家朋友的资格。他们是比留科夫，契尔特科夫，施米特，盖爷爷。

上流社会的熟人中的绝大多数不跟“阴沉的人”打交道。不过，也有那么几家，拜倒在托尔斯泰“文字天才”之前，他们便“饶恕”他误入歧途，因而宽容俯就，对待“阴沉的人”颇为亲切，并且喜爱常常上托尔斯泰家里来。属于这类人的有伯爵奥尔苏菲耶夫一家和斯塔霍维奇一家。

奥尔苏菲耶夫家的人特别有教养，文化程度高。塔妮娅跟丽莎·奥尔苏菲耶娃和她那个兄弟米沙和米佳很要好。年青人中间都以为塔妮娅·托尔斯泰爱上了老大米沙，而与此同时，老二米佳倒真爱上了塔妮娅。大家都喜欢心地善良、和蔼可亲的老伯爵，但托尔斯泰却跟伯爵夫人安娜·米哈依洛夫娜特别友善。她是个出奇地敏感和聪明的女人，深刻理解托尔斯泰，虽则对他的宗教观点不表赞同。在奥尔苏菲耶夫家，托尔斯泰可以得到休息，他为了摆脱数不清的拜访者和那个家庭环境，有时携带女儿塔妮娅去访问奥尔苏菲耶夫家的庄园，并且在那儿住很久。

跟托尔斯泰家要好的第二个家庭是斯塔霍维奇一家。那是些有钱的、受过良好教育的辉煌的人物。其中的两名跟托尔斯泰一家特别亲密。卓霞·斯塔霍维奇把托尔斯泰作为艺术家崇拜得五体投地，能

把《战争与和平》整章整章地背出来。这位独立不羁的、高傲的美人，天生一副端端正正的古典型的面庞，比塔妮娅大一岁，追求她的人比塔妮娅还要多，但她居高临下俯视这一帮年轻儿郎，因而被视为冷漠和高不可攀。

米海依尔·亚历山大洛维奇·斯塔霍维奇（即米沙）常常在雅斯纳雅·波良纳一住就是几个星期。这是个名符其实的大少爷。他衣冠楚楚，讲究自己本来很漂亮的仪表，挥金如土，赏赐酒钱不用银币而用金币。曾经有一段时期受到托尔斯泰的影响，跟他一道上农民田地里去劳动，割草、打场、耕地，样样都干，可是，这点影响为期短暂。米沙·斯塔霍维奇也曾爱上了塔妮娅，也力争无愧于这爱情而平民化。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喜欢米沙，心里但求塔妮娅嫁给他，因为是“天生的一对儿”。

看起来，这家的父亲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洛维奇·斯塔霍维奇从小就培养自己儿女对文学的爱好。文学方面他不但是个大大的行家，也是个出色的朗诵者。每当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洛维奇诵朗奥斯特洛夫斯基和果戈里的作品的时候，托尔斯泰总是听得入神。有时，黄昏时候，托尔斯泰一家人和客人们聚集在雅斯纳雅·波良纳的客厅里，围坐红木圆

桌旁，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或织补小孩穿的袜子，或给自己众多的儿女编织毛线衣，年纪小的孩子帮母亲缠绕柔细的、毛茸茸的线团，塔妮娅在屋脊里给某个人画像，而斯塔霍维奇则大声朗诵。

托尔斯泰比别人更受感动。他特别喜爱听《贫非罪》和《生活别随心所欲》的朗诵。托尔斯泰希望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剧作拿到媒介出版社出版，剧作家逝世前不久托尔斯泰曾写信给他，请他允许把他的戏剧作品以普及本形式印行，但没有得到回答。因为奥斯特洛夫斯基死了。

1886年秋天，斯塔霍维奇在雅斯纳雅·波良纳朗读了《生活别随心所欲》。三个星期过后，他再次来雅斯纳雅·波良纳，托尔斯泰对他说：“我非常高兴您又来了。您的朗诵启发了我。您走了以后我写了一出戏……或者是因为我好久没有给剧院写东西了，或者，确实出现了奇迹。”^①

8月末托尔斯泰收到了《优伶》剧院经理请他支持该剧院的一封信。可能这是促使托尔斯泰动手写《黑暗的势力》的原因之一，而朗读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剧本这件事却成了一个新的推动力，促使他拿起笔来。可能，当他脚生病长期躺在床上时，努力思索，挑选，他脑子里总是堆满了许多题材，最后偶然挑中

了一个，其内容是还在 1880 年由图拉州法院检察官尼古拉·华西里耶维奇·达维多夫告诉他的。

为什么恰好是这个故事对托尔斯泰产生了如许深刻的印象？暴行、罪恶、谋杀，在这世界上还嫌少吗？托尔斯泰碰上了这件活生生的事，使他震惊的是如下情况：那个美少年、农民柯洛斯可夫犯了一连串的罪，他跟继女通奸，生下一个婴儿，被他掐死，他敢于当众忏悔自己的暴行。

“潮湿的、沉闷的秋天！”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于 1886 年 10 月写道，“安德留沙和米沙到下面池塘里溜冰，塔妮娅和玛莎牙疼。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打算写一出取自农民生活题材的戏剧”。^②

10 月 26 日，索·安又在日记中写道：“略沃奇卡写完了第一幕。我要抄写。干吗我不再相信他作为作家的潜力了呢？”

10 月 30 日，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抄好了第二幕，不到一个月，《黑暗的势力》草稿已经写完。只是再加修饰，将老百姓的口语更精确地加以运用，某几个场景再加以修改就成了。

11 月末，一部新的作品在托尔斯泰笔下诞生了，此消息在莫斯科和彼得堡早已传开了。亚历山大剧院著名的女演员萨文娜写信给托尔斯泰，请求他将

首轮上演权让给该剧院以是她生日纪念生辉。

可是，《黑暗的势力》不但被禁止上演，而且禁止出版。

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激动起来，立即给出版总署长官叶·米·费阿克季斯托夫写了一封信，请求他批准剧本发行。对此，费阿克季斯托夫回了一信，文曰：“该剧描绘诸般淫乱与仇杀，对公众势必产生极恶劣之影响，”剧本因其“无耻之尤而内容实属可畏”“……兹遵照书报检查及出版总署署长之钧旨”，剧本“因其淫秽及缺乏任何文学趣味”^④，不准发行。

与次同时，斯塔霍维奇却对《黑暗的势力》倾倒备至，他在彼得堡宫廷小圈子里朗诵。1887年1月27日他在亚历山大三世的皇宫总监沃隆曹夫—达希可夫伯爵的府邸内诵读了《黑暗的势力》。皇帝本人、几位公主、好些近臣参加了朗诵会。斯塔霍维奇对这件事描述如下：

“第四幕给人产生了强烈的印象。可以看出，它抓住了在座全体听众的心。朗诵休息时，全都众口一辞从四面八方加以赞扬。五幕读完，全都默然不语，皇帝开口说：

‘真是绝妙之作！’

这一句话便启封了大家的嘴巴。全都说好：有的说剧中人尼基塔的表白出自心坎，有的说阿基姆的欢乐之情圣洁无瑕，有的说，盲目的阿库琳娜恋爱尼基塔，一心想拯救他，把他的罪孽一肩挑在自己身上……异口同声：绝妙之作！绝妙之作！周围爆发出一片赞颂之声”^⑤。

接着亚历山大剧院立即准备上演这个剧本。已经排演了十七次。剧院还派人前往雅斯纳雅·波良纳来研究农民的生活环境——茅屋、衣着、生活习惯。

与此并行，2月初，《黑暗的势力》收进由索·安·托尔斯泰娅编订的、媒介出版社发行的全集之中，最初印了一万二千册，每本小书售价三个戈比。

但是，亚历山大剧院上演《黑暗的势力》的打算并未兑现。费阿克季斯托夫得知皇上对剧本有好感并打算让亚历山大剧院上演该剧之后，便气急败坏，写了一信呈递巴别达诺斯采夫，并送去托尔斯泰的这个剧本请他审阅。

而巴别达诺斯采夫，大权在握，东正教最高会议总长，闻此则暴跳如雷，特呈奏摺于皇上，请求撤销于亚历山大剧院上演《黑暗的势力》之事。

“该剧于帝国各剧院上演之日必将是我国舞台

急剧堕落之时”。^⑥巴别达诺斯采夫这样说。

皇帝不想开罪东正教最高会议总长，只好同意，“鉴于该剧过分现实以及情节令人恐怖，上演该剧不能允许”。

因此，剧本便被禁止了。

然而，从 1888 年开始，《黑暗的势力》便在欧洲各国风行：法国、瑞士、意大利……而在俄国，虽然皇帝称誉它为“绝妙之作”，但观众却被剥夺了在舞台上观赏本国最伟大作家之一的这一剧作的权利。

直到 1895 年，《黑暗的势力》才准许在俄国上演，其时已是尼古拉二世在位了。

书报检查好不容易才通过托尔斯泰这个剧本，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在《黑暗的势力》中，以不可思议的力量表现了任何人类的惩罚的荒谬。警察、监狱、流放跟上帝的惩罚相比，跟良心上的痛苦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忏悔的罪人在上帝面前只有一个赤裸裸的灵魂。长年累月折磨他的一切，他的一切深重的罪孽，他都在上帝和人们的面前暴露无遗。再也没有什么好掩饰，再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了。最可怕的事情已在身后。

“一个赤脚的、披头散发的人跪在人们的面前，挨个请求大伙饶恕他的罪孽。

“‘抓住他!’警察喊叫。‘派村长去!叫证人!应当草拟起诉书……’

“但尼基塔的父亲、老头儿阿基姆却推开警察,把他当成妨碍主要事情的、不相干的一具行尸走肉。

“‘你这个人嘛!看起来,制服上的扣子倒挺亮,这么说,走着瞧吧!……上帝的事情在进行……有人忏悔啦!……’

“但是,‘上帝的事情’很少使警察感兴趣。他必须显示权威,惩罚罪犯。

“‘村长听着!’——他粗声大嗓地下命令。

“‘让上帝的事情做完再说吧!’阿基姆央求他。‘说吧!好孩子!都吐出来……心里会轻松些!’

“老头子是幸福的。他知道,他儿子此刻已经走上了正道。‘向上帝忏悔吧!别害怕世人。有个上帝呀!他无所畏惧……’^⑦

① 《托尔斯泰年鉴》，1912年，第27页。

② 《索·安·托尔斯泰娅日记》，第一卷，第133页。

③ 同上，第一卷，第134页。

④ 《全集》，第二十六卷，第751页。

⑤ 《托尔斯泰年鉴》，1912年，第42页。

⑥ 《巴别达诺斯采夫致亚历山大三世的书信集》，中央档案馆，第二卷，第132页。

⑦ 《黑暗的势力》，《全集》第二十六卷，第241页。

第四十一章

“直 线”

1887年6月20日，托尔斯泰写信给契尔特科夫说：“灵魂最美好的状态——不是不做有罪之人，而恰恰是深感自己是个有罪之人。”^①

这个话不只是口里说说而已。他确实确实感到自己是个有罪之人。面对妻子他感到自己有罪，面对那个散步时遇到的、向他诉苦的农民他感到自己有罪，在孩子面前他感到自己有罪，在一群托尔斯泰主义者面前他感到自己有罪。

他跟妻子的关系尤其紧张痛苦。他什么也改变不了，情况不由自主地迫使他痛苦。1887年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四十三岁。她还显得很年轻。她的脸色

极好，甚至不扑粉也会令任何大美人由衷羡慕。她光洁的、白里透红的脸上没有一丝皱纹。由于她不间断地生下许多孩子，她发胖了，腰身粗了。她的风度、谈吐、她拿手镜凑近近视眼的姿态，自有一种安详的自信。敏捷的动作、轻快的脚步跟她宽大的体形有点不相称。她不戴眼镜或夹鼻镜，为的是不损害面容。由于她有一双近视眼，她常常不能觉察对话者脸上的表情，不能觉察想搞恶作剧的孩子们挤眉弄眼，不能觉察略沃奇卡紧锁眉头的一脸苦相。因为近视，她甚至认不出人，把人弄混了，以致搞得她很难为情。

至于托尔斯泰，无论如何不能说他老了。虽然他年过花甲，但他身体健康、精力旺盛。

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喜爱谈论自己年轻而他却年老。不过实际上这不过是说说而已。这一点她并未感觉到。如果他不以自己的古怪的念头来折磨她，她会一如既往一贯爱他——这位独特的、天才的、不漂亮的、缺了牙的人。她生下十二个孩子，眼下怀了第十三个。这一大批孩子，除了萨莎，她都自己喂奶，而他们，八个活下来的——大的和小的——便构成了她生活中主要的操劳。

此时，她肩上担负着为出版丈夫的著作的操心劳力的全部重任。这些著作的收入成了全家支出的

主要来源。她总是烦躁不安，因为出版的事不如人意，她担心破产，而破产和贫困，对她来说，天底下没有更可怕的事情了。而略沃奇卡对这点恰恰不这么看，这使得她气愤。他希望妻子儿女全都平民化，去干活，孩子们应中断读书。对待这位身兼作家、地主和猎人的略沃奇卡该怎么办呢？这位她“真正的”略沃奇卡被以契尔特科夫为首的“阴沉的”人们所篡夺，他们向他提出一些要求，把他塑造成一个宣扬自我牺牲、自我克制、爱邻人、放弃私有财产的导师的形象，这对她是格格不入的。这位导师反对正教教会，揭露政府，而这正是她从小就尊敬的。（她小时候，父亲是克里姆林宫的御医）。这位导师批评抽烟，喝酒、吃肉以及孩子们天真的游乐：跳舞、演戏、穿好看的衣裳。他最终发展到宣扬全面的贞节——而她，作为他的妻子，由于某种原因便成了他罪孽和诱惑的根由。

“去雅斯纳雅·波良纳我不会早于5月20日”，1887年7月11日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从莫斯科写给丈夫的信中说，“一想起跟费涅尔曼之流一同生活的前景委实令人难以忍受，倒不如干脆不去为好。”^②

费涅尔曼是个犹太人，是索菲娅·安德列耶夫

娜特别讨厌的“阴沉的”人物中的一个。那时他正在雅斯纳雅·波良纳。虽然他已经受洗，目的是想当一名乡村教师，但当局并未认可他这一职务。作为托尔斯泰的真正的信徒，费涅尔曼一心想要平民化，受雇于一个农家当牧人，一个夏季挣八十个卢布的工钱。托尔斯泰告知索菲娅·安德列耶夫那关于费涅尔曼的打算的信中，他还补充说，他非常羡慕费涅尔曼将去放牧牲口。

“费涅尔曼毫无可羡慕的地方，”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4月13日回信说，“你在世上所做的事情，费涅尔曼之流做不出。他啥也做不成的，会成为一个蹩脚的牧人。这伙人，要真正干活就什么也不会了。他们拣最轻松的事情来干，那根本算不得工作。”^③

在关于“阴沉的”人们的另一封信中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写道：“这一批败类往哪儿钻呢？都钻到了你身边。正派人总是或干正经事，或呆在家里。你又会说我生气了，我不是生气，但很遗憾，我看人大致有健全的观点。我不象你，不可能不看到他们的本来面目。你脑子里和想象中只有典型，没有活人。而你对人，补充一些缺点，扔掉一些不当之处，把他们全都塞进许多典型之内，把他们理想化并赋予灵性。”^④

当托尔斯泰带着几个女儿回到了雅斯纳雅·波良纳的时候，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不高兴了。她有点妒忌现在差不多总是抄写他的手稿的女儿们了。她为他的健康而心焦，认为除了她自己，任何别人都不会安排他的饮食和照看他。他越来越频繁地发病，大概是胆囊结石。他疼得厉害，浑身出冷汗，大声呻吟，有一次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发觉他在厅堂里——他扶住一把很重的椅子，摇摇晃晃，痛得直哼。

为了安抚妻子，托尔斯泰有时也从村里请来一位厨子，他是过去的农奴尼古拉·米哈依洛维奇。但这个老头体弱多病。结果往往是托尔斯泰和他的女儿们以及来访的客人们自己动手：烹饪、收拾、洗涮餐具。

1887年4月，布拉格大学教授马萨里克来访雅斯纳雅·波良纳。还在莫斯科的时候，托尔斯泰通过莫斯科大学哲学教授尼·雅·格罗特的介绍认识了他，后来，马萨里克在俄国逗留期间有好几次访问过托尔斯泰。

4月30日，托尔斯泰写信给妻子：“马萨里克在我家住了两天。跟他在一起我很愉快。”这封信结尾处他又补充道：“跟马萨里克散步到了柯兹洛夫卡。收到你两封很好的信。得知你心境很好以及大家都

快快活活，我感到很高兴。马萨里克动手生茶炊，用嘴巴鼓风，很好，而他的理解力和思考力也同样好。”^⑤

5月3日，托尔斯泰又写道：“今日天气是各种天时的集合：雷雨、闷热、夜莺、紫罗兰、林子绿了一半，这个上帝的世界多么美好和快乐啊！昨日我犁田半天。相当累，但心境好极了，这就好。犁田并非我一人，是跟康斯坦丁一道。他用我的马柯贝洛夫，明天我跟他合伙。今日我写作了。别以为我心情不好和不舒服——妙极了。只可惜你不在这儿。”^⑥

早晨他写作，饭后在院子里或田地上干活：犁田、锯木头、割草。每逢礼拜六浴室便生火。那是池塘旁边一间圆木头砌成的、屋顶盖草的普通茅屋。木桶运来清水倒进铁锅和水箱里。地上铺垫一层新鲜的、散发出黑麦香味的麦秸。木桶里的水哗啦哗啦地流，溅到滚烫的砖地上吱吱地响，随后便化作一团团浓重的蒸气袅袅升腾。人在此洗澡一连几个钟头，不断冒汗，再洗，再冒汗，冬日里有时在此热得疲惫不堪，便跑到严寒中去滑雪，然后再来洗澡。浴室是个休憩、享受和必需的处所。并非所有的俄国家庭（甚至是富裕的家庭）都自备浴室。在雅斯纳雅·波良纳，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坚持要建个浴室。但这儿

取水的办法跟在莫斯科不同，那儿家里如果谁要洗澡，就得叫仆人驾车从一俄里半之外运水，一桶桶倒进水箱里。

差不多 1887 年全年托尔斯泰都在写一篇文章《论生活与死亡》，写了几个月后，他便把标题简简单单改成《论生活》——死亡不复存在，人的灵魂不朽。

《论生活》这篇文章直接反对唯物主义无神论学说。托尔斯泰指出，生活的唯一的意义在灵而不在肉。当一个人的“理性的意识”觉醒了之后，再“继续个人的生活”，只力求个人幸福，那简直是不可能的。

生活的意义只是在于弃绝整个肉体的个人，在于热爱别人和为他们服务。

“真正的爱永远以舍弃个人幸福为基础，并且由此而泛爱众……只有这种爱才赋予生活以真正的幸福，并且解决理性意识跟那个动物之间仿佛存在的矛盾。”

“以你的全心、以你的整个灵魂、以你的全部良知去热爱你主上帝吧！此种爱乃是最高戒律。”

“爱身边之人，象爱你自己一样。”

托尔斯泰补充道：“真正的爱便是生活本身……谁能够爱谁便有生命。”^⑦

《论生活》一文知之者甚少，但是，它比托尔斯泰其他著作更能说明，什么事情在他身上发生了：一粒种子发芽了，个人生活已经没有意义。生活的主要意义从此便包含在日益成长的精神觉醒之中。

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本质上理解《论生活》这篇文章吗？不过，侥幸的很，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没有骂政府和教会，因此，她喜欢这篇文章。她不但为丈夫把该文誊写一遍，而且自告奋勇把文章译成法文，令丈夫非常高兴。

托尔斯泰请格罗特教授校对《论生活》一文。格罗特很乐意。近来他是托尔斯泰的常客之一。跟格罗特交谈、跟斯特拉霍夫交谈，托尔斯泰觉得很有价值。他们之间的争论和分歧，不但使对方信服，反而使自己的观点得到加强。斯特拉霍夫、格罗特教授都是哲学家、理论家。他们的议论全是抽象的。而托尔斯泰却想尽量赶快阐明自己对生活的观点，把自己献给上帝和世人。

他亲眼看到有钱人奴婢成群，从早到晚吃下油腻的、丰富的食物，抽烟喝酒。另一方面，他又亲眼看到农村可怕的贫困，孤儿，寡妇，病人，无人帮助他们耕种巴掌大的土地，农民没有马，没有牛，生下的一堆孩子，赤脚，头发衰白，没有牛奶喝，靠吃土

豆和酸白菜长大，肚子鼓胀，两腿瘦得象两根柴棍子。

他又观察到，城里的工人和乡村的农民绝望之余便把袋里最后几个子儿拿去喝酒。他看到被力不胜任的劳动所折磨又半饥不饱的妇女，丈夫要把家里简陋的家什拿给酒店老板去典当，她们就一把抓住死不放手。

托尔斯泰戒烟以后，感到一身轻，用他自己的话说，“经过了洗涤”。因此他便起意帮助别人戒烟戒酒。就这个问题他写了一组文章——《为何有人自我麻醉？》一文，1890年夏天写完。他决定组织“志愿戒酒协会”。这个协会逐渐扩大，1890年拥有会员七百四十一人。倘若此事不与办理手续的巨大困难有关，托尔斯泰会亲自动手注册主持这个协会的。

1889年2月在致契尔特科夫的一封信中，托尔斯泰画了一根直线——人的意识通往道德完善之间的最短距离。可是，“人怎能有另外的走法呢？只是他是这么走的：走直线便犯罪，出现了我知道的罪恶并为此而忏悔，但是，我不昧良心，不欺骗上帝。而欺骗比犯罪更坏——是对圣灵的亵渎。”^⑧

当时，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托尔斯泰深深感到所谓文明的人类业已丧失了正确的发展方向。无

神论者、社会主义者的呼声越来越响亮，越来越大。受过教育的人们对宗教问题越来越冷淡。而亿万俄国农民群众却依然以古老的、虽则简朴但却独特的宗教传统生存下去。这一点托尔斯泰看到了。难怪他号召一切作家把自己的劳作贡献给俄国人民的启蒙事业，他们渴望启蒙，正如“嗷嗷待哺之雏”。

从这些观点便引发出托尔斯泰的另一部著作《什么是艺术？》他当时即开始构思这部著作。

大部分俄国知识分子脱离人民，不熟悉也不了解人民。因此，给人民以坚定的精神领导是不可能的。

托尔斯泰在这篇文章中总括地写道：“启蒙，如果不建立在道德生活的基础之上，过去不是也永远不会是启蒙，而只能是蒙昧和腐化。”

- ① 《全集》，第八十六卷，第 61 页。
- ② 索·安·托尔斯泰娅：《致列·尼·托尔斯泰书信集》，第 394 页。
- ③ 同上，第 398 页。
- ④ 《列·尼·托尔斯泰致夫人书信集》，第 313 页。
- ⑤ 同上，第 315 页。
- ⑥ 《全集》，1913 年瑟京出版社，第十七卷，第 208—312 页。
- ⑦ 《全集》，第八十六卷，第 216 页。
- ⑧ 《索·安·托尔斯泰娅致列·尼·托尔斯泰的书信集》，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第 401 页。

第四十二章

托尔斯泰的声望与日俱增

探求生活的精神意义的人们，不由自主地都向托尔斯泰求教。托尔斯泰跟全世界有书信往来，访问他的人的数目大增，有从俄国四面八方来的，也有的人来自国外。除开偶尔来访问的人以外，来雅斯纳雅·波良纳的还有不计其数的老百姓。每年夏天厢房里住下了库兹明斯基一家。两个大女儿——玛莎，叫她小玛莎（用以跟托尔斯泰的女儿大玛莎相区别），她比塔妮娅小一点儿；而维拉比玛莎·托尔斯泰娅小一点儿。还有三个男孩：米沙、萨沙和瓦沙。这一来，青年们的生活就更活跃了。

托尔斯泰和库兹明斯基两家的孩子、两位母亲

——索妮娅姑姑和塔妮娅姑姑——几位家庭女教师、几位保姆，他们的生活混杂在一起，几乎密不可分。一道读书，一道开儿童音乐会，一道坐车去沃朗卡河游泳，一道采蘑菇，一道骑马，一道玩槌球。大伙儿快快活活，吵嘴，打架。接着秋季将临，又得分手，经过一个漫长的冬季不能见面。托尔斯泰一家将去莫斯科过冬，库兹明斯基家将去彼得堡。分手时有人哭，伤心地抱怨夏天过得太快。

好些朋友在雅斯纳雅·波良纳长大，成了家里人。画家盖（我们叫他盖爷爷）和他的儿子柯列奇卡，多年来成了一家人。不能不爱这位爷爷。他是那么纯朴善良。他做的一切事情，都做得十分轻快和朴实，他生活乐观，从不教训任何人，也从不强制自己和自己的孩子。爷爷从来不说他要放弃私有财产。他穿一件破旧的上衣，力求按照基督教教义生活，尤其热爱基督。他画基督像，按照自己的理解的“他”来画，画出的不是神，而是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导师，充满着生的欢乐和善的光辉，其整个形象显示出：做个仁慈的好人比做个凶狠的恶人要轻松和快活得多。

爷爷不能忍受弄虚作假、装腔作势、夸夸其谈，有点看不起契尔特科夫的道德说教，而对自己的缺点毫不迁就。他爱吃甜食，常常走到索菲娅·安德列

耶夫娜的跟前，用带着南方口音的柔和语气对她说：“老妈妈！您这里有点儿好吃的东西吗？”老妈妈便走进自己房里，打开红木食品柜的小门，取出点儿东西款待爷爷。

他儿子柯列奇卡是个可爱的、生气勃勃的人，笑得很甜。当他一笑——别人也就跟着笑，因为他的笑有传染性。谢尔盖·托尔斯泰爱说双关语和笑话。柯列奇卡认真地听，随着讲述的过程，他的面皮，尤其领头上的皮便打折，变成深深的褶皱，象是手风琴的风箱收拢来，随即又放开，柯列奇卡全身无声地颤动，有时笑得眼泪纵横，笑得疲惫不堪。这种场合，如果有孩子们在场，那么，他们虽不理解笑话的含义，却会纵声大笑，尤其萨莎，她一有机会就找碴子拌嘴，为的是好借此大笑一场。

托尔斯泰家里的孩子有点怕契尔特科夫。虽然托尔斯泰家的大孩子们跟他“你我”相称，但契尔特科夫使他们感到拘束，他们回避他。这不能怪契尔特科夫。他非常想跟孩子们搞好关系，但他没有达到目的。不能说他不诚恳。他作了自我牺牲为托尔斯泰服务，宣传他的学说，为媒介出版社尽力，为托尔斯泰的作品的校对和出版做了许多工作。他使这些作品在国外，主要是在英国出版。虽然如此，但他身上有

着某种东西使人难以接近。或有可能，这东西便是他身上的贵族风度，表现在他巨大身躯的一举一动之中，表现在他漂亮的脸上，表现在他英国化的口音中，这种风度跟他的平民化不相称。或者也可能因为他一心想教训人。或者也可能因为年轻人感到在他身上有些不自然，那是施米特和比留科夫所没有的。总之，很难说得清。

托尔斯泰的儿子们私下笑他，窃窃私语说他的闲话，说是有一次农忙季节，全村人和以托尔斯泰本人为首的他的家庭某些成员运送粮草，忙得一身汗透和筋疲力尽，但却碰到不知从哪里钻出来的契尔特科夫，身穿漂亮的长过膝盖的上衣。兄弟们问他从哪里来，他回答：“我到村子里找农民谈话去了。”

1886年，契尔特科夫跟安娜·康斯坦丁诺夫娜结婚。为了不使双方父母难堪（契尔特科夫的母亲伊丽莎白·伊万诺夫娜和季切里赫斯将军一家），新郎新娘在教堂里结婚。安娜·康斯坦丁诺夫娜·季切里赫斯是个讲习班女学生利民粹派，有着完全自由主义的观点，虽然她出身保守家庭，却跟契尔特科夫在媒介出版社相识了。她完全赞同丈夫的观点，跟她丈夫一样，在她身上也缺乏生活的乐观精神。她长得很好看，轮廓端正，樱桃小口，嘴唇上翘，一头鬈发，

一双黑黑的大眼睛，但这是某种病态的悲剧的美。仿佛她眼看就会在生活的重负下被压垮，她脆弱的身躯会受不住的。而在她奇异的、看不透的、美丽的眼睛里，在她低沉的嗓音里（她歌唱得很好）令人感到有点不自然。

1888年，托尔斯泰家里发生了两件大事：2月28日伊里亚结婚。2月13日托尔斯泰写信给盖爷爷：“……我们一切都好——甚至非常好。我妻一月后将分娩。伊里亚结婚了，跟费拉索沃娃结婚。（你大概知道她是个朴实的、健康的、纯洁的姑娘）。2月28日他们处在新郎新娘必处的那种失掉自制力的状态之中。对他说来，生活似乎停滞了，但一切还在前面……”^①

3月31日生下第六个儿子，取名伊万，一个瘦小、羸弱、有病的婴儿。就这件事，尼·尼·盖写信给托尔斯泰说：“让我吻新生下来的万尼奇卡。上帝保佑，让他身上有约翰·波戈斯诺夫*这位最可爱的作家和人的精神复活。”^②

被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接待而能进入托尔斯泰家里的“阴沉的人”不多。其中之一便是比留科夫，

* 约翰·波戈斯诺夫俄国古代作家。约翰即伊万，与托尔斯泰的小儿子同名。

大家都叫他波夏。他不属于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所鄙视的托尔斯泰信徒的那个小集团。他出身于良好的家庭，是个受过教育的年轻小伙子，这一点起了很大的作用。在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的眼睛里他不是懒汉，在媒介出版社工作不是为了消遣，而是出自内心。他对托尔斯泰及其学说一片赤忱。当1899年波夏向玛莎求婚，玛莎决定嫁给他时，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对他的态度有了点儿变了。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不想他们结婚，因为波夏是个托尔斯泰主义者，也因为凭她做母亲的心感到，玛莎并不爱她，决定嫁他是为了跟他一道过劳动生活，遵循父亲的原则。列夫·托尔斯泰也害怕他们结婚，但他的感情要复杂得多。他不完全了解，玛莎真正爱波夏到了什么程度，并且另一方面，他担心，如果玛莎不嫁人，那是为了他这个做父亲的。为了继续跟他在一起，而这一点正是他内心深处所希望的。年复一年他越来越依恋玛莎，现在要离开她对他是困难的。

1889年4月25日，他在日记中说道，玛莎“我对她有巨大的柔情。对她一个人。她似乎可以顶替其他的一切人。”

婚姻破坏了，大家满意，只除开可怜的波夏，他长时间不能宽解。

1889年托尔斯泰的一个新的信徒——伊万·伊万诺维奇·戈尔布诺夫——巴萨多夫参与媒介出版社的工作，日后他成了这个出版社的主编和发行人。跟戈尔布诺夫相识以后，托尔斯泰在日记中写道：“很聪明，有才华，为人纯朴。”看来，进一步跟他交往以后，托尔斯泰还可以补充说：心地善良，多愁善感，虚怀若谷。伊万·伊万诺维奇简直把托尔斯泰当成了一尊神一样加以崇敬。他记录下托尔斯泰的每一句话。每当托尔斯泰出声朗读自己的作品时，戈尔布诺夫便象个小孩子似的撅起嘴巴，鼻孔喷气，偷偷地用他那不太干净的手绢擦他那双善良的、深情的天蓝色眼睛。有时为了掩饰自己的激动，他在情绪难以控制时陡然站起来，在房间里忧郁地走来走去，擦擦他那长着柔软的鼻子和厚厚的嘴唇的、典型俄罗斯式的面孔上的汗珠。

这些人，虽然被叫做“阴沉的人”，但却都具有独特的精神品质。列昂尼达·弗明尼奇娜·安宁可娃不知不觉在托尔斯泰的家里出现，并且一下子作为亲近的朋友被接待，不费气力就赢得了托尔斯泰全家的好感。她全身显得柔和、丰满，有着柔和的南方口音，她这个人非常令人喜爱，就象是她手中永远在编织的那一团毛线一样，柔和的，香喷喷的。她说

话很少，更多的是聆听她所热爱的导师说话，并且不事声张地把她听了就永远坚信的导师的话贯彻到自己生活之中。

1889年12月26日，托尔斯泰写信给安宁可娃：“上帝助你！请写信给我们。我非常高兴。我收到了您寄的大批短袜子、长袜子、手套。这一切都美。”^③

托尔斯泰主义者中的大多数人靠托尔斯泰抚养。其中的一个是加夫里尔·安德列耶维奇·鲁萨诺夫。“托尔斯泰给了我幸福，而我成了基督徒。”^④鲁萨诺夫这样写道。但是，鲁萨诺夫也回赠了托尔斯泰许多东西。虽然托尔斯泰很少跟他见面（因为鲁萨诺夫患了脊髓结核症，长年困坐在椅子上），但托尔斯泰经常跟他通讯，并接受他的关于自己的写作的忠告和意见。象许多经历丰富的人一样，鲁萨诺夫受过苦，达到很大的精神高度。托尔斯泰认为他是所遇到的最好的人物之一，爱他，尊敬他。

虽然索菲娅·安德列耶夫不赞同托尔斯泰主义者的观点，但她本能地感到他们中的许多人的本色和赤忱并且尊敬他们。属于这类的人有：施米特、波夏·比留科夫、盖爷爷、列·弗·安宁可娃和其他几个人。但每当其他一类人表现虚伪、做作、一心想讨

好托尔斯泰主义的时候，她便一眼看出，不讲情面。

有一个新的信徒不知怎的来访问托尔斯泰。他叫克罗卜斯基。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比别人更快地一下子看穿了他。而他也给她添了许多麻烦。

“克罗卜斯基来了。”1891年1月14日她在日记中写道，“他非常讨厌。多么阴沉的人啊！”^⑤

过了一天她再写道：“多么重大的斗争此刻正在进行。今日早晨孩子们在楼下做功课，而这个克罗卜斯基跑到了那里。他对安德留沙说：‘干吗你们要学习，糟蹋自己的灵魂呢？要知道，你父亲不希望这样。’女孩子们立即拥护，准备为了感谢他这句话而握他高贵的手了。男孩子们跑到我面前把情况都告诉了我。”^⑥

安德留沙十四岁，一贯学习不好，看来，他非常乐意接受这一“忠告”，但是，做母亲的拿了他怎么办呢？

还有好些托尔斯泰的朋友——他们既不能称之为社交界人物，也不能叫做“阴沉的人”——他们是学者、作家、艺术家、音乐家，统称访问者。

格罗特教授写信给他兄弟说：“我跟托尔斯泰结识了，简直爱上了他……这是个我所知道的、（按照‘人’这个字眼最充分的意义上所使用的）、唯一的神

奇的人”。

格罗特并非托尔斯泰的信徒，但他成了托尔斯泰家的常客和朋友。此外，还有一个情况促进了这一友谊：格罗特人口众多的家庭在莫斯科住在织匠街托尔斯泰住宅的旁边，两家的孩子们经常一同在花园里玩耍，互相到对方家里做客。

这段时期托尔斯泰跟画家列宾的友谊也开始了。这以前，当列宾为托尔斯泰的民间故事画插图的时候这种友谊就开了个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列宾跟托尔斯泰全家往来，并且常常在雅斯纳雅·波良纳住一段很长的时间。

1887年，列宾在雅斯纳雅·波良纳为托尔斯泰画了两张肖像：托尔斯泰手拿书本坐在靠椅上的肖像和托尔斯泰耕田的肖像。托尔斯泰不能摆姿式当模特儿，这有两个原因：摆姿式费劲、枯燥、费时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这么做就更加强调了托尔斯泰“声誉”的意义，而声誉是他一心想忘却的，声誉成了他的负担，妨碍他跟“虚荣心的罪恶”（用他自己的话说）进行不断的斗争。可是他又不愿使列宾伤心。虽然列宾早已出名——他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伊凡杀子》和其他绘画已经名噪一时、誉满全国——但他还是虚怀若谷，这正赢得了托尔斯泰的

好感。善意的、忧郁之中带点嘲弄的微笑总离不开他的面孔。每当托尔斯泰说话时，他总是默默地、聚精汇神地听着，旁人猜不透，他这是在深入领悟托尔斯泰谈话的内容呢？还是锐意研究托尔斯泰脸上表情的变化呢？他画托尔斯泰耕田那张画花费了他许多气力。托尔斯泰在做他认为最重要的事情的当儿，无论如何不同意摆弄姿态当模特儿。筋肉隆起的有力的手里握着沉重的犁把，托尔斯泰不停地走，踩进松软的泥土里，这当口，列宾却从田地的一端到另一端来回奔跑，费力地描模耕田人的形象。列宾自己也想试一试犁田的滋味，他从托尔斯泰手里接过犁把，犁了一沟。但马不听他使唤，他犁得歪歪斜斜，他累了，把木犁再交给托尔斯泰。

同年，1887年4月，列斯可夫访问托尔斯泰。他的短篇小说《基督在农民家里作客》，曾经征得他自己的同意在媒介出版社出版，是该社印行的最早的作品之一。这篇小说零售价为半个戈比。4月24—25日致契尔特科夫的信中托尔斯泰写道：“列斯可夫来此。这是个多么聪明而独特的人啊！”^⑦

这年夏天，著名的法学家柯尼来到雅斯纳雅·波良纳。这个人具有非凡的智慧和广阔的眼界，他谈锋很健，才气奔放。

柯尼作客期间，托尔斯泰带他跟自己一道去散步，走得很远。只有很少的人才配得到这个礼遇，那只有托尔斯泰对之特别感兴趣和抱同情的人方能有此福分，因为他平日总是一个人散步。托尔斯泰脑子里想也没有想过，对于这个彼得堡人，这种远足对他委实受不了。“托尔斯泰步履矫健轻快（相对他的年岁来说），他跑上小山，跳过溪涧，富有弹性的一双腿快速果敢。”^⑧柯尼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他们谈论文学，这题目是他两位都熟知的，还谈到柯尼的法律事务。柯尼告诉托尔斯泰的案件中有一个使他产生了很深的印象，于是，托尔斯泰请柯尼把它记录下来。这件案子——柯尼说的故事便成了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复活》的主题。

这年夏天，“姑奶奶”——亚历山德拉·安德列耶夫娜·托尔斯泰娅来到雅斯纳雅·波良纳，她有好久没有过来了。老朋友见面的机会如今非常稀少。每当他们碰面或通信时，他们总是互相问候。“姑奶奶”怎么也不能够理解托尔斯泰的世界观，不能够理解他竟然敢反对教会和否定国家。但虽然如此，昔日的温情暖人心坎，而主要的是，他们心里互相深深尊敬之情还原封未动，且不说“姑奶奶”非常珍视作为伟大艺术家的托尔斯泰。

“姑奶奶”描述在雅斯纳雅·波良纳作客时，这样写道：“我非常喜欢这些早晨的时光。列夫早起神清气爽，处于精神最好的状态，非常和蔼可亲。我们谈话，相对怡然。他常常朗读一些他所喜爱的丘特切夫的诗和几首他看重的霍米亚可夫的诗给我听。诗中某个地方如果出现基督的名字，他念起来便嗓音颤抖，眼眶里噙着泪水……这些回忆到现在还使我欣慰。他自己还不自觉，他已经深深地热爱教主，在救主身上看到一个非凡的人。他的言论和感情难以令人理解。

“他回到他书房里去工作时便把前一天收到的书报杂志以及信件留给我看。难以想象，每天每日一大堆文件不但从俄国，而且也从欧洲和美洲各国汇寄到这儿——全都散发出顶礼焚香的气味……我常常感到惊讶，他居然不被这个所窒息，我甚至觉得这倒是他建立的伟大功勋。”^⑨

有时，当托尔斯泰必须赶快誊写某部著作时，他便把它交给大家分头抄写：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女儿们和客人们都有份。这一次，当托尔斯泰写完了《论生活》这篇文章以后，情形也一样。这次抄写人中还有亚·安·托尔斯泰娅和亚·米·库兹明斯基。第二天托尔斯泰便出声朗读了自己这篇文章。

“朗读花了两小时。”“姑奶奶”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所理解的比原来期待的要多得多。有的地方非常出色。但我心里并不为之激动，也不感到温暖。我觉得，我好似坐在解剖室里，又好象陷身半明不暗的迷宫里沿着迂回曲折的小路奔跑，总是搞不清方向，心乱如麻，心中忐忑，不能自由地呼吸。这种心情我不曾告诉任何人。”^⑩

托尔斯泰的声誉远扬国外，他跟欧洲、美利坚合众国各处有书信往还。外国人经常来访，以便结识托尔斯泰。

一个青年人，巴黎高级师范学校学生名叫罗曼·罗兰的写信给托尔斯泰，请教他应当怎样建设生活、怎样组织手工劳动。托尔斯泰回了罗兰一封很长的、内容广泛的信。托尔斯泰曾经打算把这封信改写成一篇文章。

托尔斯泰收到一切进步的报刊杂志，有俄国的，也有外国的。在《The World's Thought》* 杂志上有一篇乔治·肯兰的关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要塞和西伯利亚流放的文章，该文托尔斯泰看了。肯兰到过西伯利亚，见到过苦役犯，写了一本书叫《西伯利亚与流放》。1887年在俄国时，肯兰拜访了托尔斯

* 英文：《世界思想》

泰。

其他美国人来访的有：理查白·哈普罗德，往后有托尔斯泰作品的女翻译家、记者威廉·斯杰德和别的人。但对托尔斯泰说来最大的快乐莫过于跟他观点一致的人交往，即象他一样宣扬不以暴力抵抗邪恶的信仰基督学说的人。艾琴·巴卢的《Christian Nonresistance》* 一书是 1889 年 6 月托尔斯泰从波士顿惟一教派教堂那里得到的。他在自己日记中说：“非常好！”

1889 年 10 月，托尔斯泰写信给波夏：

“第一，谈谈巴卢的书。我很高兴，这本书给我产生的印象正跟给你的印象一样——欣悦，想跟他交往，对他表示友爱与感谢之情。”^①

对待托尔斯泰如果采用对待一般政治犯的办法——那是不行的。如果把他流放，驱逐到欧洲或美国，那将更糟，会引起各文明国家的抗议，这反而提高了托尔斯泰在俄国的声望。抓他坐牢或者流放西伯利亚也是不可能的——那会激起全俄国的骚动、学生的示威和罢课，仍然会增加他的光荣。怎么办？于是政府选择了两条出路：迫害他的信徒和禁止他的书籍出版。零售廉价版的《黑暗的势力》一书就被

* 英文：《基督教不抵抗主义》

禁止。

托尔斯泰写的民间故事，我们都知道，其内容全都渗透着宗教情绪——就是这些作品也遭到当局的非难。呈递给大司祭、书报灵魂检查官吉洪作最终裁决的托尔斯泰的故事获得了如下的评语：“作品渗透同一倾向鲜明之插科打诨之精神，虽然表面具有道德教诲之性质，实则于读者之灵魂并无教益，反而有悖于修身养性之道。”^⑫

随后出版事业委员会作出决议，禁止由媒介出版的其中有几篇托尔斯泰故事的文集发行。这还不够，托尔斯泰写的民间故事：《上帝看见真理，但不马上说出来》，《人靠什么生活》，《哪里有爱，哪里就有上帝》，《三个老人》，《一个人需要许多土地吗？》，《鸡蛋大的麦粒》，《第一个造酒者》，《两个老头》等等的单行本也遭到禁止。

但是镇压的措施一点也不曾削弱托尔斯泰对当时青年产生的影响。且不说他们被托尔斯泰的学说所吸引——基督徒生活、自我克制、舍己为人、禁欲主义，这一切吸引着青年人，此外，还有革命性的因素，对现存秩序的反抗，这些情绪早就在俄国知识分子的圈子里沸腾了。他们聚集在媒介出版社里，讨论着，如饥似渴地阅读托尔斯泰的一切最新作品，而其

结果则是不满足于口头议论，而是立刻付诸行动。他们组织了小组，建立了托尔斯泰主义的基督教会公社。这些公社内，土地公有，人人必须劳动，食物是最简单的素食，男女之间是兄弟姊妹的关系。不多几个公社站稳了脚跟，坚持下来，而多数公社衰败的主要原因便是关于私有财产的争论、误会以及旁人的和他们相互之间的指责。

托尔斯泰写信给尼·尼·盖说：“安某今年秋天在我这儿，他和他们都生活得很好。例如，性的问题他们处理得很好，完全克制，生活很纯洁。但是，上帝呀！饶恕我的罪孽吧！——他们给我的印象十分沉重。这并不是因为我自己生活肮脏而妒忌他们生活纯洁，不是这样，我承认他们高尚，为此而深感喜悦，但总感到有点不大对头。我亲爱的好人！请您别把此信给他们看，那会使他们难过的；而我，也很有可能错了。”^⑬

还在 1887 年警察就对托尔斯泰的信徒米·阿·诺沃谢多夫家进行过搜查。从他那儿搜出托尔斯泰的一篇文章《棍子尼古拉》（揭露皇帝尼古拉一世），诺沃谢多夫立即被捕。

1888 年初，内务部长德·阿·托尔斯泰伯爵向沙皇亚历山大报告关于在诺沃谢多夫家搜出列·尼

·托尔斯泰的文章一事，阐明不宜因文章的反政府的性质而对列·尼·托尔斯泰进行追究。德·阿·托尔斯泰还补充说，列夫·托尔斯泰写那篇文章并未触及任何法网，并无任何犯罪意图，而是处于宗教狂的影响之下，因而审讯此人将遭致完全不良的非议及后果。

往后，内务部长建议莫斯科总督“邀请”列夫·托尔斯泰伯爵前往作客，并且给他作了必要的指示，同时又建议他将他手中的该版所有小册子当面拿给托尔斯泰看。皇帝批准了内务部长的报告。

列夫·托尔斯泰对待总督的邀请的态度是可以预见得到的。他通过自己的熟人，总督办公室主任伊斯托明告诉当局，“为了自己无论任何作品而自愿前往辩解，”他坚决拒绝，“因为此类邀请可以视为对内心世界的侵犯。”此外，他宣称，《棍子尼古拉》的清样他从未见过。多尔戈鲁科夫认为“列·尼·托尔斯泰的声明只好相信”：除开他的天才的崇高威望以外，“针对列夫·托尔斯泰伯爵的任何惩罚措施只能使他蒙上殉道者的光环并从而更加促进其思想与学说的广泛传播。”^①

过了不久，诺沃谢多夫被释放，但对托尔斯泰主义者的镇压并未停止。1889年7月，托尔斯泰的信徒

阿·维·阿列辛所组织的公社被抄查。

在雅斯纳雅·波良纳有一个非常寒伧的教区小学校，在那里教书的有初通文墨的几位教师，还有托尔斯泰的几个女儿，她们步父亲的后尘，决心教农村孩子们读书识字。托尔斯泰有时也来听听女儿们上课，向她们提提意见，他自己也不时动心了，积习未改，又跟孩子们一道学习起来。

政府对这件事不满，责成省长加以干预，下令学校关门。这时图拉省长是尼·维·季诺维耶夫，他是离托尔斯泰家不远的邻居，也曾时常带了女儿们拜访雅斯纳雅·波良纳。季诺维耶夫很不愿意执行这道命令，但又别无他办法。1890年3月，国民学校督学来到雅斯纳雅·波良纳，但托尔斯泰没有接见他。省长不得不自己出面承担这一任务。

季诺维耶夫本人到了雅斯纳雅·波良纳，以彬彬有礼的方式请求托尔斯泰的女儿们中止对孩子们的教学活动，因为政府不允许非法的学校继续存在下去。学校关门了，但托尔斯泰本人对政府的不满依然不予理会。他的同志们被迫害，他气愤已极，于是继续自由地大声疾呼，大胆说出自己的观点。不管政府如何煞费苦心，要阻挡托尔斯泰的影响增长它却无能为力。

-
- ① 《列·尼·托尔斯泰与尼·尼·盖通讯集》阿萨迪米亚出版社 1930 年版，第 108 页。
 - ② 同上，110 页。
 - ③ 《全集》，瑟京出版社，1913 年版，第二十二卷，第 62 页。
 - ④ 《全集》，第八十六卷，第 120 页。
 - ⑤ 《索·安·托尔斯泰娅日记》，169 页。
 - ⑥ 同上，169 页。
 - ⑦ 《全集》，第八十六卷，第 49 页
 - ⑧ 亚·费·柯尼《在生活的道路上》第二卷，第 32 页。
 - ⑨ 《列·尼·托尔斯泰与亚·安·托尔斯泰娅通讯集》，第 35 页。
 - ⑩ 同上，第 41 页。
 - ⑪ 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三卷，第 123 页。
 - ⑫ 古谢夫：《托尔斯泰年谱》第 374 页。
 - ⑬ 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三卷，第 123 页。
 - ⑭ 古谢夫：《托尔斯泰年谱》第 382 页。

第四十三章

“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接受的，
唯独赐给他，谁才能接受。”

（马太福音十九章，第十、十一节）

这件事发生在春天，在莫斯科织匠街的宅子里。客人们来了，其中有列宾，有演员安德列耶夫—布尔拉克，有音乐学院的一个学生，有托尔斯泰儿子安德留沙和米沙的教师，还有提琴家拉索多。大家都要谢辽沙和拉索多演奏点什么。^①

谢辽沙跟托尔斯泰的另外几个儿子不同，他禀性内向，不苟言笑，且非常害羞他故作鲁莽和生硬，把自己的一切感受，把脉脉柔情和火热衷肠都掩盖起来。他是托尔斯泰家的兄弟们中间最严肃和勤奋

的，过着孤僻的生活，不偏爱父亲，也不偏爱母亲，很少跟家里人交流思想，把一切深藏心底。每当他在钢琴旁坐下来，接连几个小时弹奏心爱的肖邦、贝多芬、巴哈、格里克的乐曲并且自己也跃跃欲试想谱写点曲子的时候，大家便不由自主地听得入神了。大家总是说谢辽沙具有非凡的音乐天才。实际上，他的心也果真只对一架钢琴才打开来：在时而热情奔放，时而情意缠绵的滚滚音浪之中，这个不漂亮的、内向的少年的内心斗争与忧郁之情才尽情流露。

1888年春天的一夜，两个年青人大概怀着特殊的激情演奏了贝多芬献给克莱采的索拿大。托尔斯泰特别喜爱的索拿大第一部对大家产生了强烈的印象。大伙儿纷纷议论说，假如托尔斯泰用克莱采索拿大这个题目写一部小说，再由列宾为小说作插图，演员安德列耶夫—布尔拉克进行表演，那该有多好！这个打算并未实现。安德列耶夫—布尔拉克不久就死了。但是，在托尔斯泰的脑子里，这个构思却继续酝酿。很难确定《克莱采索拿大》的构思在托尔斯泰的脑子里是何时产生的。是在音乐的影响之下的这个晚上吗？或者更早，是在七十年代他草拟《谋杀妻子》这篇小说的时候吗？那时，或许他一面听音乐，脑子一面在构思，或许心里早已创作了这部中篇小

说。

1889年4月3日，当托尔斯泰在斯巴斯柯耶村他的朋友乌鲁索夫家做客时，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时间还早。想写点新东西，但是，刚刚浏览了开头部分，心里便转到《克莱采索拿大》上头去了。”4月5日日记：“《克莱采索拿大》写了很多，不好。”^②1890年12月28日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在日记中写道：“他（指托尔斯泰）想创作一部真杰的小说的念头是演员兼出色的说故事能手安德列耶夫—布尔拉克所启示的。”“他告诉他（指托尔斯泰），说是有一次在火车上遇见的一位先生倾诉了自己的不幸：妻子不忠。这个情节便被略沃奇卡采用了。”^③

托尔斯泰在描写主人公波罗佐夫的生活时，无疑反映了他自己跟妻子的关系中的某些方面：柔情和冷淡的阶段、不和、争吵。这一切都取自他们两人的家庭生活。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感觉到了这一点，因此她不喜欢《克莱采索拿大》这部作品。

在《克莱采索拿大》中，托尔斯泰是这般描写的：“为了一杯咖啡，为了一块桌布，为了一辆轻便马车，为了一圈牌局而发生口角，这一桩桩一件件，对于彼此双方，实在是鸡毛蒜皮，毫无意义。至少在我心坎里，对她的仇恨常常冒出来按捺不下。有时，我冷眼

观察她如何倒茶，如何抬腿，如何抓起一把勺子送到嘴边，咂吧着嘴唇吸进汤汁吞下喉咙，我恨呀！恨的就是这些，仿佛这便是天底下最恶心的举止。当时我并没有觉察，仇恨的阶段在我心里跟所谓爱情的阶段完全不谋而合，准时，周而复始。先是爱情，接着便是嫌弃，然后是疯狂的爱欲，再下去便是长时期的憎恶，接着又是稍微减弱了的爱情，然后又是短时期的憎恨……我俩简直好比被一挂脚镣锁在一起的囚犯，彼此扼杀对方的生命但却力求睁眼不看这一点。那时我还不曾看出，百分之九十的夫妇跟我一样，在这个地狱里讨生活，不可能有别的结局。”

描写波罗佐夫跟妻子的关系时，托尔斯泰吸取了自己生活中的某些特点。例如，丈夫对妻子的忌妒心等等……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有个摇晃大腿的神经质的习惯，往往一连几小时用脚均匀地叩打地板，弄得她家里人不得安宁。又例如，她吞吃东西时咂吧嘴唇，响声惊人。这些地方难道不正是表现了托尔斯泰本人的感受？

托尔斯泰写道：“在正常的甚至不正常的生活中，不约而同的情况何等相似！只要等到父母亲感到生活彼此不能忍受，那时，为了教育孩子，城市生活条件就变成必需的了。于是，非得搬进城里去不

可。”^④

可是，托尔斯泰还用自己的“思想”使妻子生气。他的关于婚姻的贞洁和禁欲的谈话令她恼怒……莫非她不是他的合法妻子吗？

“你在约束自己和杀害自己，”1889年4月19日她写信给在雅斯纳雅·波良纳的托尔斯泰，“我想，你不吃肉，不抽烟，工作过度，脑子得不到营养，因此四肢无力，昏昏欲睡。素食主义是多么愚蠢啊！戕害自己的生命，扼杀肉体上的本能和需要——你干吗不一下子自杀呢？要知道，你正在进行慢性自杀，有什么区别呢？”^⑤

1890年12月14日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在日记中写道：

“略沃奇卡今日在日记中写到一处地方，他是这么写的：‘爱情是没有的，只有肉体上的需要以及在生活中对一个女伴侣的精神需要。’不错，倘若二十九年 before 我读到他这个信念，无论如何我不会嫁给他。”^⑥

因为思想上跟妻子有分歧，他责备自己，但他还是依恋着作为女人的妻子。每当肉体倾向占上风的时候，他便憎恶自己，鄙视自己。

《克莱采索拿大》的写作差不多拖了两年。托尔

斯泰时断时续，时而对这部小说很冷漠，时而又满腔激情去写它。1889年3月14日，托尔斯泰给自己的朋友鲁萨诺夫的信中说：

“关于中篇小说的传闻是有根据的。还在两年以前我就草拟了这一部确系谈论性爱问题的中篇小说，但写得很草率，不能令人满意，因此懒得动手修改。倘若这个构思再拿起来，那么，得从头再来。”^⑦ 1889年12月8日托尔斯泰在日记中写道：“修改《克莱采索拿大》……厌烦了。”^⑧

每当托尔斯泰说他的作品使他“厌烦了”，那就说明，作品快写完了。小说还没有完成之前就已经流传开来，托尔斯泰便写了《后记》。因为他收到关于《克莱采索拿大》的许许多多不同的反应：有人表示疑惑不解，有人指责他，有人善意地提出批评，也有人热烈欢呼。

在《后记》里托尔斯泰想尽力回答向他提出的许多问题。

他写道：“请你们只把贞节作为理想，请你们确认任何男人和任何女人的一切堕落便是那唯一的贯彻一生的婚姻所造成，那么，很清楚，基督所赐予的指导不但是充分的，而且是唯一可行的。”^⑨

1890年2月10日在致B·И·阿列克谢耶夫的

信中，托尔斯泰说：“我所写的这部作品的内容，对我自己来说也是新奇的，正如读它的人那样感到新奇。在这方面所发现的理想跟我的实际行为相距是那样遥远，以致开初我吓坏了而不敢说出来，到了后来我便坚信了，忏悔了并且感到由衷的快乐，因为在我和他人的面前发生了一个令人快慰的过程。”^⑩

斯特拉霍夫虽然从小说的形式方面批评了《克莱采索拿大》，但他给托尔斯泰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赞颂它的内容。

托尔斯泰在写给他的回信中说：“谢谢您，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我非常珍视您的意见，您的评判过分宽容，超过了我的期待。我知道，在艺术方面，这部作品经不起任何批评。因为它使用两种手法，而二者之间又不协调，因此它很丑陋，这一点您已经看出来。虽然如此，我还是让它保持原样，也不为此惋惜，但我不能修改它（并非懒惰）。我不惋惜，因为确信无疑，我所写的这个东西并非毫无益处，对于世人倒是非常有益的和相当新鲜的。如果要艺术性地写（这一点我并未发誓戒绝），那么，应该从头再干并且要一气呵成。”^⑪

契尔特科夫的批评是针对作品的内容的本质的。

“读了您的小说后，推动我的幻想往那个方向继续，”他写给托尔斯泰的信中说，“目前这个样子的这部小说只能在读者心中引起疑惑和问题，却不能阐明它，如果引进基督的信念作为小说的中心，你本来有能力阐明它的，这种信念在小说中暂时还不存在。”^⑫

这位朋友的这个批评，看来使托尔斯泰很伤心。1889年10月3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昨日收到契尔特科夫的一封长信。他批评《克莱采索拿大》，很正确，想遵照他的忠告办，但没有兴趣了。冷漠，忧郁，颓丧。”^⑬

托尔斯泰需要这个批评吗？他对待自己比任何人对待他都要严格。“我写的《克莱采索拿大》甚至《艺术论》两者都是反面的，恶劣的，很想写点善良的东西。”^⑭1889年6月24日的日记中他写了这样的话。

在托尔斯泰创作的这一时期中，他觉得文章的修饰和风格是多余的奢侈，他认为主要的任务在于及时地说出能够于人有所教益的自己的思想。

“论艺术写了一些——有点脱离正轨了。”1889年9月12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出于作者想讨好的意图进行了修改。接下去便写了那些已写了的东

西。”

对托尔斯泰来说，亲近的人的反应并不是无所谓的，但是最主要的东西却是他面对自己的良心的正义感。他写给尼·尼·盖的信中说：“但求纯洁，即去除一切淫欲：饕餮、烟酒、性欲以及尘世浮名；但求谦逊，即时刻准备为我的著作挨骂以及把我本人搞臭。”^⑮

果然，托尔斯泰挨了骂，遭人污辱。现在，有人说，他先前过的是放荡的生活，到了暮年他却来宣扬贞洁和节欲了。

“斗争，这便是最充分的生活。”——他在《论两性关系》一文中这样写道。

接下去他又说：“并不是要提出保持童贞这个任务，而是人应该接近童贞。”^⑯

《克莱采索拿大》遭到禁止，虽然到处都在谈论它，它手手相传，许多人阅读了。亚·安·托尔斯泰娅在她的回忆录里写道：“很难设想竟然会发生这样的事，例如，《克莱采索拿大》和《黑暗的势力》出现时的情况。这两部作品在还没有被批准出版之前，就已经辗转传抄成百上千册，人们手手相传，翻译成多种文字，人们怀着不可思议的热情阅读着。有时看起来，公众业已忘怀了个人的私事，只关心托尔斯泰

伯爵的文学著作了。最重大的政治事件也很少如此有力地 and 充分地吸引着所有的人。”^⑰

- ① 《列宾与托尔斯泰及其家庭通信集》，国家出版社 1949 年版，第 106 页。谢尔盖因柯：《列·尼·托尔斯泰是怎样生活和工作的》，莫斯科，1896 年版，第 72 至 73 页。
- ② 《全集》，第二十七卷，第 569 页。
- ③ 《索·安·托尔斯泰娅日记》，第三卷，第 106 页。
- ④ 《全集》，1913 年瑟京出版社版，第十卷，第 78 页。
- ⑤ 索·安·托尔斯泰娅：《致列·尼·托尔斯泰娅书信集》，第 413 页。
- ⑥ 《索·安·托尔斯泰娅日记》，第三卷，第 153 页。
- ⑦ 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三卷，第 94 页。
- ⑧ 古谢夫：《托尔斯泰年谱》，第 414 页。
- ⑨ 《全集》，1913 年瑟京出版社版，第十卷，第 117 页。
- ⑩ 《全集》，诞生百年纪念版，第二十七卷，第 563 页。
- ⑪ 《托尔斯泰与斯特拉霍夫通信集》，托尔斯泰纪念馆版，第 397 页。
- ⑫ 《全集》，第八十六卷，第 273 页。
- ⑬ 同上，第二十七卷，第 583 页。
- ⑭ 同上，第 578 页。
- ⑮ 《全集》，1913 年瑟京出版社版，第二十二卷，第 45 页。
- ⑯ 同上，第十八卷，第 215、217 页。
- ⑰ 《列·尼·托尔斯泰与亚·安·托尔斯泰娅通信集》，第 56 页。

第四十四章

放弃私有财产

论不抵抗的文章，即往后叫做《天国在我们心中》这篇文章写得很慢。它是在艾琴·巴卢的影响下开始写的。这个人物的死亡使托尔斯泰很伤心，因为此人是他最亲近的一个人。找到一个志同道合的人，尤其是远居海外的志同道合者，这是托尔斯泰生活中最大的安慰之一。

《天国在我们心中》的写作时断时续。其他许多构思把它岔开了：翻译和改写莫泊桑的《在港口》，写作《为什么人们受蒙蔽》。11月中旬托尔斯泰写信给鲁萨诺夫：“我老早就埋头干这个（论不抵抗的文章），但不能写完它，又不能放弃，以便腾手出来从

事别的吸引我的艺术创作的计划。”^①11月1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很想写自由的、文艺性的作品，但这件事没有做完之前，我不允许自己放手。”^②

1891年3月2日，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在日记中写道：“略沃奇卡闷闷不乐，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写作不顺手。写什么？——关于不抵抗的论文。还会不顺手！这个问题弄得大家和他自己都非常讨厌了，翻来复去从各个方面他都谈过了。他本想写文艺作品，但开头很困难。文艺作品中要大肆说教是不行的。纯正的文艺创作的洪流汹涌澎湃——他也不再阻止它，这时，勿抗恶的文章便突然显得很碍事，而要阻止那洪流又办不到，白白让它流逝他感到可怕，这就是为什么他心里闷闷不乐的原因。”^③

1890年和1891年是托尔斯泰和妻子的关系特别紧张的年代。1890年冬天，雅斯纳雅·波良纳的几个农民砍了托尔斯泰种的几株树并把它们从林子里运走了。这件事震动了托尔斯泰。他还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痛苦地感到他的信念和事实本来面目之间的矛盾。由于要维护他所反对的私有财产，那几个农民定要受审并且被捕入狱，而他们砍几株树，很可能，都不过因为穷困所逼……

“我丧失平衡了，”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在日

记中写道，“说起来倒容易，但每时每刻一大堆事情要我操心：上学和生病的孩子们，丈夫的卫生和精神状态，业已成人的儿子们和他们孩子们的家务，债务和职务，出卖萨马拉田庄，拟定出卖方案——要抄写好些份送买主手里；出版包括被禁的《克莱采索拿大》的全集第十三卷；上呈文请求发行与阿夫西亚尼切斯基神父有关的那一部分；十三卷的清样；玛莎要做新袍子；安德留沙要做被单和靴子；别让房子的支付过期，保险，田庄纳税，人口的护照，算账，书信往来，等等，等等，这一切都要我过问。”^④

儿子伊里亚年轻不懂事，他经营不得法，养了一群猎狗和好马，入不敷出，而他的妻子又要生第二孩子了。儿子列夫是个有病的人，神经质，坚持不了学习，母亲为他很担心。玛莎还是想要嫁给比留科夫，而索菲亚·安德列耶夫娜又不同意。她不赞成玛莎的“平民化”，不赞成她自己动手洗衣，从事体力劳动把自己弄得疲惫不堪。孙子们学习很糟糕。塔妮娅怎么也安排不好自己的生活，找不到一个可以嫁给他的人，跟“阴沉的人”波波夫很要好，她显然爱上了他。万尼奇卡害病。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在日记中承认，她不应该把农民送去受审。没有什么事情会比这个行动更使“略沃奇卡”伤心的了。

她和丈夫之间发生了一场争论，直到早上五点钟，两人互相指责，不能够心平气和。她就这件事情在日记中写道：“就这样，当这次争吵发生的时候，昨晚我看到，我错了，没有了主意，不意使略沃奇卡伤心透了。这次争吵，正如料到的那样，起因是由于六个礼拜前逮捕了在巴萨特卡偷树的那几个农民。当我们地方自治会长官提出控告以后，我们曾设想在判决以后放了他们。但是，看起来，刑事案件无论如何不能宽恕了事。这就使略沃奇卡绝望了，居然因为维护他的私有财产而把雅先斯克的农民抓去坐牢了。他夜不成眠，从床上爬起来，在厅堂里走来走去，激动得气喘吁吁，自然指责我，毫不留情地、残酷地责备我。”^⑤

托尔斯泰打算决然离家出走，每天夜里受尽折磨，睡不着。

“我想向政府宣布，”他在11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不承认私有财产，随他们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反正我是对的。”^⑥这里的“他们”当然是指家里的人。

这次事件以后，托尔斯泰越来越频繁地思考一个问题：他应该如何摆脱那压迫他的私有财产。他的成年的儿子们，尤其是伊里亚，想要保持独立，因而

支持父亲的决定。因此，4月份全家都汇集到一起。家产被估价了，被分成九份。最小的儿子万尼奇卡依照惯例得到雅斯纳雅·波良纳的一半和一栋正屋。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获得其他的一半和厢房。大儿子谢尔盖获得了祖传的田庄尼科尔斯科耶—维亚泽姆斯科耶。女儿玛莎，遵循父亲的原则，拒绝接受财产。儿子伊里亚得到了切尔恩斯科的田庄格里尼约夫卡。儿子列夫得到莫斯科的一栋房子。女儿塔妮娅得到离雅斯纳雅·波良纳只有七俄里的奥夫西尼可沃的田庄，另外还有一部分现金。安德列，米沙和萨沙得到萨马拉田庄。

关于这件事，托尔斯泰给自己的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此刻，我的儿女们都到齐了……我决定分掉产业……我要签署赠与证明书，这就使我摆脱掉了私有财产。但起，签署赠与证明这是从原则上作了让步。我还得签署，因为不这么办，那我会招来罪恶。”

托尔斯泰还打算放弃版权，让自己的作品任人出版，这就更加激起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的剧烈反对。在她面前又重新出现了那个她所说的“倾家荡产”的问题。那就要改变生活方式，她自己，还有她的儿女们（玛莎除外）是不能适应的。儿子列夫害病，

女儿塔妮娅过惯了奢侈和无忧无虑的生活，万尼奇卡也有病。如何教育小孙子们？怎么能让他们上学？她不愿作如此重大的牺牲。这一点她办不到。

如果她对于这个不断闪现在她眼前的“倾家荡产”的幻觉不那么害怕，如果她受到的是另外一种教育，如果她象其他家庭的千百万人那样，既无遗产，又无固定的稿费收入，如果她明白怎么生活，明白怎样教育儿女从小就参加严格的劳动，那么，她就不至于这么害怕了。但另一种生活，托尔斯泰想让她过的另一种生活，她却不理解。她决不让步，决不把一部分土地分给农民，虽然经营那些土地年年亏本。她生长在城市，不喜爱同时丝毫也不了解耕种土地、饲养牲畜和栽培蔬菜。自从托尔斯泰停止经营以来，田庄每况愈下。她本当让步，本当毫不勉强地把那些托尔斯泰特别喜爱的八十年代的作品（民间故事和文章）献给社会，本当大大方方、心甘情愿地作出让步，那会使托尔斯泰感到宽慰的。托尔斯泰将会怀着感激之情兴高采烈地接受这个牺牲！但是，她决不那么做。

1891年7月12日，托尔斯泰写信给妻子^⑦：

“我一直在考虑写出和公布关于放弃我近年来的作品的版权的声明，但大家都不这么想。现在，我

想出了一个可行的好办法，你可以用股东的名义写给出版人一封公开信，那你就免于舆论指责你进行剥削了。信可以这样写：

“‘我丈夫，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决定放弃他近年的作品的版权，凡愿意者，任何人都可无偿地印行和出售这些作品。这些作品的清单如下：（这里列出所有民间故事，近年来的论文，《教育的果实》，《为什么人们被蒙蔽》，《克莱采索拿大》，《后记》）

“‘让此事为大家所知道，我恳请诸位想印行上述作品的人注意，作品文字请按我所编订的版本印行。此致崇高的敬意。伯爵夫人索菲娅·托尔斯泰娅’”

托尔斯泰在信的末尾又补充写道：“我想，这么做如果你不喜欢，那你就别干，不以你的名义登出去，而改用我的名义，那么办也好。那就这么写：

“‘尊敬的先生！我决定放弃我近年来的著作的版权，我把这些作品提供给凡愿意印行和出售它们的人……这些作品的清单如下……请接受我崇高的敬意。等等。’”

对这封信，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提出以下意见：

“对这个提议我当然不能同意，认为是不公正的，会把我们人口众多的、如此不富的家庭弄得破产。我手头还有许多印好了的书。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于1891年9月提出的建议没有得到我的同意，而是他一个人的主张。”

托尔斯泰给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写了一封信。那时她为书籍的事已去莫斯科。她回来以后，托尔斯泰又提出放弃近年著作的版权以便公众使用的问题。

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大发雷霆，责骂丈夫，说什么他不关心全家，说什么为家务、出版以及为全家人的操劳的重担落到她一个人身上，说什么他自私自利，说什么他跟他那一帮“阴沉的人”以及他的乖张的行为气得她要发疯了，说什么她不想活了。而托尔斯泰认为，他把一切都献给了家庭，只要求很少的一点点——对他最珍视的东西作出一点让步，这就是，按照他的信念，不能拍卖他为了人们的幸福而写的那些文章，这些文章本应是公共的财产。他央求她作出这一点点让步，为他做做好事……

有一次这么大吵大闹时，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气得话也听不进，脑子也丧失思考能力了，她气得忘乎所以，从家里冲出去，徒步跑到火车站，打算卧

轨自尽。亚·米·库兹明斯基当时正悠哉游哉作每天饭后的散步，在大路上碰到了她。他立刻就明白了她要干什么，于是，马上劝说，把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拖回了家。

这一切，儿女们都看在眼里，各以自己的方式感到痛苦。塔妮娅努力想使父母和解。她非常爱母亲，但又同情父亲的见解，因此央求母亲让步。谢尔盖竭力不管这件事。伊里亚为他自己的物质利益和家庭操劳。列夫更多地站在母亲方面。玛莎跟母亲的关系很坏，她完全忠于父亲，她认为父亲所受的苦比所有的人更甚。

1891年1月21日，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在日记中写道：“总的说来，玛莎是上帝赐给我的一个十字架。从她出生之日起，除了痛苦，她没给我别的东西。在家里她是个陌生人，信仰方面也是个陌生人，她对比留科夫的爱情（幻想的爱情）令人不可理解。”^⑧

玛莎步父亲的后尘：她放弃分给她的那一份财产，她甘愿弃绝私利，甘愿自我牺牲，她扼杀身上的五情六欲，睡在只垫一层薄薄的褥子的硬板床上，长期吃素，从早到晚不停地干活，有时在田地里劳动，有时教教孩子们，有时又去帮助生病的人和受苦的

人，访问农民的家庭，到处带给别人以安慰和欢乐。村子里谁都认识她，大家直呼“玛莎”，跟她“你我”相称。晚上，她就坐下来抄写父亲写的手稿，字迹细小，工工整整。

倘若村子里发生了火灾，倘若农民的孩子患了猩红热或者白喉，倘若某个农家的妇女死了丈夫，玛莎一定就在那儿。要过这种生活对玛莎来说，是不容易的。她爱打网球，爱唱茨冈人的歌曲，吉它弹得很好，唱起歌来，嗓门虽不大，但吐词行腔很准。她也象塔妮娅一样，有许多男人追求她。虽说她面孔并不漂亮，但她身上有许多动人心弦的美，具有女性的温柔和深藏不露的如火如荼的热情。对母亲来说，玛莎是个十字架，而对父亲来说，她却是心爱的契友。

1891年9月16日，在长期动摇以后，在跟妻子发生多次争吵以后，托尔斯泰终于决定实现自己的意图，放弃近年著作的版权。

他给报纸编辑的信中写道：“尊敬的先生：关于我近年来的著作（收入1886年版第十二卷、今年即1891年出版的第十三卷以及从今天算起将要写出的著作）的出版、翻译和上演的各项事情，我经常收到许多请求许可的质询，现在，特请您在贵报上发表如下声明：

“我向一切愿意在俄国出版我的著作的人，向一切愿意在国外翻译我的著作的人，同样，向一切愿意上演我的剧作的人无偿地提供给他们出版、翻译和上演的权利。这些著作包括 1886 年出版的文集第十二卷和今年即 1891 年出版的文集第十三卷中所有作品以及从今天算起往后我将写出的尚未发表的一切作品。”^⑨

这期间，正当内部纠纷闹得不可开交，而托尔斯泰看起来也顾不上客人们的时候，在雅斯纳雅·波良纳的生活方式依然没有什么变化。长长的餐桌上总是坐满十到十四个人。野餐照旧，年轻人骑马出游照旧，人来客往照旧，帝国歌剧院演员、邻居费格涅罗夫夫妇的歌唱照旧。还是那些保姆，小孩泻肚子、吵架、调皮捣蛋，画家们、雕塑家们、格罗特教授以及许多外国人前来作客……夜晚弹吉它唱歌……谈笑风生，朗诵文艺作品……

早晨，托尔斯泰躲开鼎沸的热闹场面钻进自己的书房。现在，他在叫做“圆拱形”的房子里工作。在尼·谢·沃尔康斯基时代，这间小屋子本是做堆房用的。圆拱形的、低矮的天花板上钉了一个个沉重的铁环，昔日挂满了薰制的火腿。圆拱形的砖砌的天花板挡住了别的房间里的最细微的声响。光线从两

个高高的、安了铁栏干的窗子射进来。一个窗口下摆着一张书桌。墙上挂了劳动工具：大镰刀、锯子，屋角落里有一个鞋匠的工具箱。四堵墙壁光秃秃，家具简单，蒙了皮。

即使在这儿，托尔斯泰也躲不开人们。屋角里悄悄地坐着列宾，不敢说出一个字，手托调色板，正在给托尔斯泰画像。跟他在一起的，还有初次来访的雕塑家金茨贝格。

从车站上运来一包包粘土。但是，看起来，在公路边的所谓砂坑里不但有砂，而且也有各色粘土，质量不亚于购买来的。于是，在雅斯纳雅·波良纳，雕塑便成了一股风。艺术家们（盖·列宾、金茨贝格）雕塑，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和略瓦也雕塑，孩子们则雕塑动物和杯子……

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埋怨地板和家具被泥巴弄脏了，厅堂里和托尔斯泰的书房里摆了几个盖着湿布的胸像。托尔斯泰当模特儿让人塑像颇有耐性。

看看金茨贝格在他的回忆录中是怎样描写的吧！“动手安排了，我坐在列宾旁边，他已经完成了他的作品。这幅画使我惊叹不已：房间里的气氛，从窗口里射进来的光线以及托尔斯泰本人的身姿——这一切都描绘得出神入化，又准确，又富于艺术性。”

金茨贝格是对的。这张画《工作室里的托尔斯泰》未必不是托尔斯泰画像中最好的一张。

金茨贝格接下去回忆道：“我承认，我感到很难工作。我生怕弄出响声，这就逼着我老是坐着不敢动弹。可是，为了雕塑胸像必须走动，要从各个角度对模特儿进行观察。我觉得，有我们在场，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弄得很拘束。”

金茨贝格没有看错。当然，旁人在场，确实妨碍托尔斯泰写作。金茨贝格象条泥鳅一样围着胸像打圈子，跳一跳，蹲一蹲，眯起眼睛倒退几步，简直是瞄准了托尔斯泰不放。他确确实实没有一分钟稳坐在位子上。

金茨贝格很快就成了自己人并经常访问雅斯纳雅·波良纳，总是带着他的朋友一道来，那个人就是彼得堡公共图书馆文艺部主任，艺术批评家弗拉基米尔·华西里耶维奇·斯塔索夫。很难想象还有另外一对朋友象他俩一样外貌如此完全相反的了。金茨贝格黑黑的、个子矮小，一双黑眼睛很有精神，一双手很秀气，说话声音很小，秃头，是个谦和的人。而斯塔索夫却是个大块头，有着壮士般的魁伟身躯，蓄了一大把胡子，满头浓发，一开口就兴致勃勃，粗声大噪，声震屋瓦。“年高德劭”，“伟大的列夫”等

字眼不断从他口里吐出来，这些话，他不是简简单单地说，而是郑重其事地大声嚷嚷，弄得满座皆惊。

话说回头，也有过那种时候，那位矮小的、谦逊的金茨贝格却吸引了所有在座的人的注意，甚至也包括孩子们。他不开腔，不说一个字，模仿做衣的裁缝。他装模作样，量料子，拿粉笔划线，剪裁，穿针引线密密缝，大针绉脚，翘起二郎腿，在房里跳几下，活动活动坐麻的两条腿，衣服做好了，两脚轻快地往椅子上一跳便哼起小调来了。大伙儿捧腹大笑，叫起来：“再来一个！再来一个！表演一下太太！”他便又扮演太太了。

当时摆在雅斯雅纳·波良纳的三个雕塑的胸像中间，托尔斯泰认为最好的一个是盖的作品，但几名行家都以为金茨贝格的作品应该算第一。列宾做的胸像也很成功。但他这个作品跟他的那幅画《工作室里的托尔斯泰》一比，便较为逊色了。

还在7月份，在雅斯纳雅·波良纳就谈论饥荒了。1891年9月9日，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从莫斯科给丈夫的信中写道：

“冬纳耶夫和娜塔莎叙述了挨饿的人的情况，我听了心里很难过，真想不去想它，闭上眼睛不看，但不可能，而要帮助他们又做不到，急需帮助的太多。

可是，在莫斯科这一点丝毫看不出！一切都照常进行，照常奢侈豪华，照常跑马，商店里照常营业，大家购买物品，跟我一样，干干净净地庸俗地安置自己的窝巢，从这里我们遥望远方，那里人们正在饿死。倘若不是孩子们缠住我，我今年真会去做赈济饥民的工作，不管救济多少，不管募到什么东西，那总比袖手旁观，比心里干着急和什么也不做要好得多。”^⑩

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这样写，她可没想到，往后几个月她本人和她丈夫果真埋头去救济快要饿死的人们了。正是这件共同的工作使他们夫妇俩又重新互相了解了，虽然为期短暂。

① 《欧罗巴导报》，1915年第3期，第19页。

② 古谢夫：《托尔斯泰年谱》，第453页。

③ 《索·安·托尔斯泰娅日记》，第二卷，第13页。

④ 同上，第一卷，第155页。

⑤ 同上，第一卷，第155页。

⑥ 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三卷，第183页。

⑦ 《列·尼·托尔斯泰致夫人的书信集》，第354页。

⑧ 《索·安·托尔斯泰娅日记》，第一卷，第162页。

⑨ 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三卷，第202页。

⑩ 《索·安·托尔斯泰娅致列·尼·托尔斯泰书信集》，第447页。

第四十五章

饥 饿

托尔斯泰一贯讨厌慈善事业——游手好闲的有钱人扔给饥饿的不幸的人一小块面包，从而心安理得进行自我陶醉。年轻时，他跟屠格涅夫因慈善事业问题发生争吵，几乎弄到决斗的地步。

1891年6月末，他在日记中写道：“孩子们有时还给穷苦人面包、糖果和小钱，他们为此感到对自己很满意，为自己的怜悯心而受感动，心里想，他们做了一件好事。孩子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这面包和金钱是从哪里来的。但成人应该知道这一点并且应该理解到，从一个人手里夺走东西送给另一个人，这件事丝毫算不得什么好事。可是，许多成人并不懂得

这一点。”^①

……“由于发生饥荒便突然做做好事是不行的，谁倘若果真做好事，那么，他昨天和前天就做了，明天和后天会继续去做，发生饥荒时要做，饥荒过了，照样还要做。”^②

托尔斯泰给列斯可夫的回信中就是这样写的。列斯可夫曾经写信给托尔斯泰，探问有关萨马拉省、梁赞省和图拉省饥荒的威胁问题。

1891年仲夏就已经完全可以看出，小麦和黑麦已经旱死，歉收之势已成，预示着可怕的灾难。

托尔斯泰有过许多议论，认为对饥饿的人临时帮忙没有意义，认为应该热爱人，改变他们的生活，到那时，就不会有灾难了，因为已经铲除了社会不平等和贫困的根源。虽然如此，但是，关于饥荒的问题越来越使他痛苦不安。从梁赞省遭灾地区来了一位熟人——伊凡·伊凡诺维奇·拉耶夫斯基。他央求托尔斯泰帮助农民度过灾荒。9月，又有一位熟人来访，他叙述了灾情的严重性，令托尔斯泰为之骇然。“直到四点钟还不能入睡——老是忧虑着饥荒问题。”9月17日的日记中，托尔斯泰作了这样的记载。两天以后，他前往皮罗戈沃他兄弟那儿。歉收的草原地带从那儿开始。他又察访了其他几个草原上的县

份。过了几天他回到雅斯纳雅·波良纳，从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手中取了五百卢布作为第一次救济款，然后他前往图拉省和梁赞省的受灾地区。

托尔斯泰不能够无所作为了。他怀着 he 素有的火热的心肠干了起来。立刻写了一篇关于饥荒的文章，送给格罗特以备出版，而他本人则带了女儿玛莎和塔妮娅以及侄女维拉·库兹明斯卡娅前往别吉切夫卡村的拉耶夫斯基的田庄。儿子列夫则同时去到萨马拉省饥荒地区。

开初，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坚决反对丈夫带着两个女儿去梁赞省。

1891年10月8日的日记中，索菲娅·古德列耶夫娜写道：“他来了，向我宣布，他们不去莫斯科，将要到草原上去，这可使我担心害怕了。整个冬天要分开，那儿离车站还有三十俄里，略沃奇卡肠胃病时时发作，两个女孩子要离群索居，这些怎能使我不为他们操心呢？这事使我大吃一惊，未必能痛苦地解决一个问题……又会出现新的问题，又要求去解决。因这事我生病了。另外，略瓦写信来，他还不知道父亲要去拉耶夫斯基家，还以为我们都留在雅斯纳雅·波良纳，认为我到莫斯科去会妨碍他们三人的学习，我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必要的人了。这又是我痛苦的一

个新原因。二十九年来我为家庭而生后，舍弃一切构成年轻生命的欢乐和饱满的生活，如今谁也不需要我了！这段时期我流了多少眼泪啊！看来，我太坏了，但我爱过许多人，而爱被认为是善良的感情……”^③

女儿塔妮娅一开始同样不同情父亲。1891年10月，她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我们即将到顿河去。对这次出门我并不感到愉快，也没有一点劲头。这是因为，我发觉爸爸的行为不合逻辑，他用钱太大方，接受牺牲，刚刚把钱交给妈妈，立刻又从她手里拿走。我想，他自己应该看到这一点。他说话和写作（这一点我跟他有同感），认为人民的一切苦难是因为他们被剥削，是我们地主造成他们这种状况的，认为事情的关键在于，应该立即停止剥夺。这点无疑是正确的，而爸爸言行一致——停止了剥夺。我以为，进一步他就做不出什么了。但是，把别人剥夺的钱从别人手里拿过来进行支配，我以为，他是不应该的……还有一件事，我不以为然——爸爸说，如果要钱用，那么，他只要写点什么送给报刊就可以拿钱。我不会把我的想法告诉他，因为我的看法可能不对。如果他自己还没有认识到，那他决不会同意我的观点的。他的声望太高——当他已有 *first best** 在手，本可以选

* 英文：“第一个最好的”。

择 second best*，为此全都过分严厉地责备他。如果是我独当一面干事，那么，虽然手中没有 first best，我也会使劲抓住 second best，但跟他在一起，我不想做跟他不协调一致的事。我没有指责他和讨厌他的感情，为此感到高兴，只是怀疑和担心他犯错误。说不定我错了。这倒更有可能。”^⑤

但是，母亲和女儿的疑惑很快就烟消云散了。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也动手干起来，干劲很足，怀着她性格素有的满腔热情。

11月3日，她给《俄罗斯公报》写了一封公开信，号召为饥饿的人慷慨解囊。这封信在俄国所有报纸上都刊登了，国外也予以转载。

“我全家都奔赴各地去帮助受苦受难的人民。我丈夫列·尼·托尔斯泰伯爵带着两个女儿此时正在唐可夫县，力求开设更多的免费食堂（老百姓悲恸地叫做“孤寡收容所”）。两个大儿子目前正在红十字会里做事，忙于帮助切尔恩县的人民。三儿子去了萨马拉省，如果有可能，就在那里开办食堂。

情况不允许我离开莫斯科，身边有四个幼小的孩子，我只能用物质手段促进我全家人的举动。但他们需要的数量太大！而在这种巨大灾难面前，个别人

* 英文：“第二个最好的”。

的力量是渺小的。此刻，你咽下肚里的每一小片面包，你在温暖的房子里度过的每一天，都势必提醒你：此刻有某个人正在饿死。我们过着奢侈的生活，自己孩子哪怕一点点痛苦的神色我们也会忍受不了，难道我们能够对那些眼睁睁看着自己孩子正在饿死冻僵的痛苦已极的、发呆的母亲的惨不忍睹神色而无动于衷吗？对那些没有粒米下肚的老人无动于衷吗？我全家人目前正目睹那一切惨象。我女儿从唐可夫县给我写了一封信，谈到了当地地主拿钱办食堂的情况，下引一段：

“‘我到了两个食堂。一个食堂办在一间没有烟囱的小房子里。一个寡妇为二十五个人做饭。我走进去时，看到桌子旁边一大批小孩，规规矩矩捏紧面包，拿着勺子，正在喝汤。给他们吃菜汤和稀粥，有时还有冰冷的甜菜根汤。那儿还站着几名老太婆，等着轮班开饭。我找了个老婆婆谈话，她一开口讲她的苦难，立刻就哭了起来，其他几个也跟着哭。这些可怜的人全靠这食堂度命——家里什么也没有了，午饭前一直饿着肚子。一天开两餐，这么办，连柴火一起算，每人每月需要九十五戈比到一个卢布……’”

“这么说，只要十三个卢布就可以救活一个人，养他直到明年新谷登场。”^⑥

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还没来得及回顾一下，从四面八方立即送来捐款。不到两星期就收了一万三千卢布。其中有约翰·克尤旋达德斯基神父捐献的两百卢布。也有人送来或寄来面包干、布匹、衣服和其他物品……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除了无数要操心的事情之外，还有一大堆书信往来以及统计募捐来的款项和物资。

1891年11月4日，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在给丈夫的信中写道：“送来的钱是非常令人感动的。有的人走进来，划个十字，献上卢布。有个老头，吻吻我的手，一边哭一边说道：‘尊敬的伯爵夫人！请接受我的敬礼，收下这一点微薄的心意吧！’他给了四十个卢布。几名女教师来捐献了，其中一个说：‘昨晚读了您的公开信，我哭了。’有位骑马的老爷，穿着很考究，在大门口碰到安德留沙，问道：‘您是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儿子吗？’‘是。’‘您母亲在家吗？请把这东西交给她。’他便骑马走了。信封里有一百卢布。一群小孩子来了，捐献三个、五个、十个卢布。有位太太来捐献一块旧头巾包的小包袱。有位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小姐匆匆来了，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哎呀！您写的信多感动人呀！请接受我这点私房钱，我瞒着爸爸妈妈，全都献上。我心里非常高

兴!’那信封里装了一百零一卢布三十戈比。勃拉希宁拿出了两百卢布。

“我不知道你对我的乖张的行为怎样看。但是，我不能参与你们的事业而又着手坐着是感到非常气闷的。从昨天起，我甚至感到身体比原来好得多，看书作笔记，开收据，感谢公众，跟他们谈话，心里高兴，因为我能协助你们扩展事业，虽然用的是别人的捐款。”^⑦

11月初托尔斯泰给《俄罗斯公报》寄去了第二篇文章《一个可怕的问题》。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一个使他深感不安的问题：“明年收割以前，俄国的粮食够不够吃？”^⑧

托尔斯泰白操心了——俄国的粮食非常充足。他很快就对此深信不疑。

托尔斯泰和他的助手们了解农民的状况越深入，他们的活动就开展得越多样，越复杂。托尔斯泰反对把面粉交给农民手里——那样就会引起人与人之间的妒忌和怨恨。给饥饿的人办食堂这个办法更实际些，公平些。这办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弄清饥饿的情况并且只供应那些没有一粒粮食的人。跟吃饭问题一道，马上又出现了其他的需求：行将倒毙的马匹要吃草料，帮工要付工钱，农民要烧柴，有如此之

类的一大堆问题。黑麦、小麦、豌豆、土豆等粮食从别的省份运来了。工作繁忙。人手不够。

托尔斯泰的许多志同道合者渐渐汇合成一股势力，大学生和青年都渴望在这大灾难中出力帮一把。托尔斯泰娅两姊妹忘我地工作。塔妮娅的怀疑一扫而光。她全心投入到工作中去了，虽然，按照她素来的性格、所受的教育以及某种程度的娇生惯养的习气来说，她要适应那个环境是不大容易的，比玛莎要困难得多。玛莎毫无牵挂，跟着父亲向前，对她来说，艰难困苦正好是她灵魂求之不得的东西——就是舍己为人，为父亲和广大的人群服务。

1891年秋天这一短时期内，托尔斯泰失去了两位亲近的挚友。他童年时代的好朋友吉雅科夫去世了。托尔斯泰父女在那里安身并且在共同的慈善事业中增进了友谊的别吉切夫卡村的主人，伊凡·伊凡诺维奇·拉耶夫斯基也去世了。

任何一件好事，做起来就永远不可能不遇到巨大的障碍，不可能不激起仇恨，不可能不碰到大堆麻烦。政府当局在托尔斯泰的活动中偏偏看出了他想颠覆现存政权的不轨的图谋。巴别达诺斯采夫上书皇上，内称：“目前，这批人中间萌生了新的妄想，产生了新的希望，想趁饥荒之机煽动百姓。在国外的俄

罗斯的敌人，人数众多，社会主义者，各色无政府主义者，妄想以此饥荒为依据制定最凶狠的计划与措施。另有一批人则打算派遣密使潜入国境之内，以图煽动百姓蜂起反抗政府。不难理解，这批人根本不了解俄罗斯，但他们自以为事情不费吹灰之力。再有不少人，虽则并非居心不良，但为人愚妄。他们借此饥荒之机会，以救灾为借口企图宣扬自己的信念与虚妄的社会理想。托尔斯泰就这个题目写了一篇愚妄的文章。这篇文章当然不能在报刊上发表，但一定将以手抄本形式广泛流传。”^⑨

在《莫斯科新闻》上出现了几篇文章：《列·尼·托尔斯泰伯爵大人的一家》、《列·尼·托尔斯泰伯爵的计划》、《向社会上的煽动者进一言》。

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心里不安了。11月9日她写信给丈夫：“现在，《莫斯科新闻报》刊登你的文章，几乎把你打扮成一个革命家。他们在文章里下流地猜测某种隐蔽的政治含义。这份报纸全靠干坏事才得以生存。”^⑩

她无论如何不能平静下来。“今天我正在写一封给内政部长的信，谈谈《莫斯科新闻》上的那几篇文章。在我看来，他们的文章煽动革命，把托尔斯泰、格罗特和索罗维约夫跟某个他们设想的东山再起的

自由主义政党等量齐观，而这个政党却正在利用人民的灾难，企图在政治上干点什么。把这下流行径一一叙述是很困难的。你们可以把11月9日至11日的《莫斯科新闻》找来看看。我打算报告部长的中心思想如下：倘若把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和对社会的道德影响算作对革命者可疑的支撑，那么，他们一定深感幸运，肯定会起来再干。在目前这么做是非常可怕的和危险的。直到昨日我才知道，《莫斯科新闻报》的两名主要报人是非常卖力的革命者，而且目前却戴上了官方教会的假面具*“假面具下他们的面目还是看得一清二楚。”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给别吉切夫卡的家里的信中这么说。^①

在另一封信里她写道：

“亲爱的朋友略沃奇卡！你们处在那边蔽塞的地方，想象不到有怎样的威胁落到你们的头上。格罗特刚好在这儿，他说，出版总局已发给各报刊一道指令，禁止托尔斯泰的任何文章在任何刊物上刊载。《莫斯科新闻》因为你写了《一个可怕的问题》而大肆宣扬你是个革命家。干坏事方面，官方与《莫斯科新闻》二者之间是没有什么区别的。《莫斯科新闻》正在有步骤地准备革命，这一点，政府当局为何看不

* 指列夫·齐霍米洛夫。

到？——到时候将后悔莫及。”^⑫

难怪托尔斯泰写信给自己的朋友们说，在救济饥民的事业中，他跟妻子“好似从来没有这般情投意合过。”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好比一只保卫自己小雏的母鹰一样，随时准备迎击任何敌人以保卫自己的窝巢。她怀着她素有的激情不知不觉地投身到她丈夫和儿女在外地进行的事业中去了，虽然她家务繁忙，又要为长年生病的万尼奇卡担忧，还要为其他的孩子操心。^⑬

在1891年11月17日的同一封信中她写道：“现在，问题就这样明白摆着，那篇论饥民食堂的文章非常急需。我摘引了你的几封信中的几段读给大家听了，全都极其关心。而你的文章又被禁止了。对策有两个。一是署上塔吉娅娜·托尔斯泰娅的名字，本来她想写文章。另一个办法是你写了寄我，我去交给皇上本人审查。只要求你写文章带上更多的感情色彩，过去你写艺术作品时本是擅长这么做的。你要唤醒他，可别寻衅好斗，也别露出什么倾向性。最微小的感情却立刻可以引起共鸣——这就令人惊叹了。萨马拉省的农民非常高兴。昨天写了一信给玛莎。萨莎老是有病。其他的都好。正在下大雪。”^⑭

鉴于下达了关于托尔斯泰的任何文章不准刊载

的命令，下一篇文章只得署上塔吉娅娜·托尔斯泰娅的名字了。县警察局长来访问别吉切夫卡村了，突然来了两个神职人员，他们是图拉主教派来监视托尔斯泰的行为的。右翼黑帮分子的报刊越来越肆无忌惮了。托尔斯泰寄给英国人吉伦的关于饥荒的文章的摘要，由《莫斯科新闻》再译成俄文刊登，附有相应的注解。

宫廷里永远栖息于御座周围的一批小人趁机播弄是非，谣传要逮捕托尔斯泰，把他放逐到苏兹达尔修道院去。实际上，开始逮捕托尔斯泰的信徒，搜查他们的住宅。地方警察对托尔斯泰和他的信徒们进行最严密的监视。地方上的教会人士放出谣言，说什么托尔斯泰和他的信徒们是“反基督的孩子”，不信上帝，不做祷告，他们来到灾区是为了“诱惑百姓”，说什么要挽救他们。年轻的姑娘们，玛莎，塔妮娅，维拉·维利奇金娜一点也没料到，会有怎样的迫害加到他们身上，会有什么危险在威胁着她们。但是，农民却具有天生的智慧，准确地猜出了真情。“说什么反基督的孩子！他们是上帝派到这儿来的天使！”^⑮一个农民这样说。

“姑奶奶”亚历山德拉·安德列耶夫娜·托尔斯泰娅也深感不安了。

她在回忆录中写道：“可以想像得到，那批莫斯科的橇子会怎样怀着魔鬼似的幸灾乐祸的心情抓住这一篇文章。引述在他们的《莫斯科新闻》上他们自己写的注释，给作者的思想强加上别的含义，当然是更坏的含义……我不来描述这篇文章在整个欧洲引起的恐慌，也不来描述莫斯科的记者们给可怜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设想了多少种惩罚：他们算就了他要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关进要塞，驱逐出境甚至被判绞刑……”

她继续写道：“就这样，当我得知并看到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可能遭到怎样的危险的时候，我决定运用自己的影响力来拯救他。我写了一封信奏明皇上，说是我急于要见他并请他指定接见我的时间。我突然收到回信，皇上说他当天就到我家来，当时我高兴的心情是不难想象的。

“恭候御驾亲临，我万分激动，心里祈祷上帝保佑。终于，皇上进来了。我看出，他愁眉不展，心绪不佳。但是，这一点并没有改变我的初衷，反而使我的决心更大。皇上问我找他有什么问题，我直截了当地回答说：

‘听说陛下最近要把俄国最伟大的天才关进修道院里去，有这回事吗？’

“皇上的脸陡然变色，很严厉，满面愁容。

“‘您是说托尔斯泰吗?’他简短地问。

“‘您猜对了，陛下!’我回答。

“‘他蓄谋害我，您不知道?’皇上问道。

“但是，当皇上了解了事情的症结以后，他便下了一道圣旨：不要动托尔斯泰。

“他说：‘我根本不想成全他做个殉道者，那样就会引起普天之下的愤怒，我不敢当。倘若他有罪，那么，对他来说，就更不妙了。’”^⑩

但是，人心浮动的局势还在继续。外交部顾问官郎姆兹多尔夫伯爵在他的日记中作了记载，他说当时从四面八方搜罗那一期刊登了托尔斯泰的文章的《莫斯科新闻》。“花再多的钱也难买到那张报纸。据说，在莫斯科这张报纸要卖到二十五卢布。”^⑪

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不能够安心。她去找了谢尔盖·亚历山大洛维奇大公，请求他下令《莫斯科新闻》对托尔斯泰的文章辟谣。但是，谢尔盖·亚历山大洛维奇回答说，这件事须得托尔斯泰自己来做。于是，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央求丈夫给《莫斯科新闻》写篇文章作为回答。

1892年2月25日，托尔斯泰给妻子写了一封信，其中说：

“我很惋惜，亲爱的朋友！因为你为《莫斯科新闻》上关于我的文章的非议而感到不安，因为你就这件事去拜访过谢尔盖·亚历山大洛维奇。要知道，什么新的情况也没有发生。我在论饥荒的文章中所写的那些话，说过多次了，早已强烈地表达过了。还有什么新的东西好说呢？这都是群众的事业，是群众情绪感召社会的事业，象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辟谣的声明我写了。但是，亲爱的朋友，请你别改动一个字，也莫增删，千万别修改。每个字我都反复斟酌过了并且说出了全部真相，完全可以驳倒虚伪的责难。”^⑧

在这篇文章中托尔斯泰说：

“用小号铅字排印的我的文章中的摘录，与我早在10月份寄给莫斯科杂志的尚未发表的文字相比较，有很大的变动。这是因为经过了两次反复翻译的缘故，（先从俄文译成英文，再从英文译成俄文，并且译笔过分自由……）”托尔斯泰在信中得出结论：“《莫斯科新闻》上附在我的文章的摘译之后用大号铅字排印的地方，隐约暗示似乎是我的第二封信中表达的思想，即人民应当起来自己拯救自己免于饥饿，这完全是凭空臆造。此文的编者在此处利用了我的词句，但用法完全不同，变成了另外的意思，表达了与我的信念格格不入的以及完全相反的意思。”^⑨

不过，这么做并没有使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完全放心。她告诉丈夫，“据说，失望的年轻人觉得你这人很可疑，撕掉你的画像，等等。这就令人非常遗憾，应当挽救。”^{②0}她还给国外报刊上写信，就有关托尔斯泰被捕的谣言进行解释：“最高当局对我们全家一贯是怀着好意的。”^{②1}

1892年2月23日，托尔斯泰写给妻子的信中说：“你千万别用被告的口吻。那样就原告被告易位了。可以沉默。沉默如果做不到，那么，只须控诉——不是控诉《莫斯科新闻》，也不是控诉某某人，而是要控诉那些生活环境，在此生活环境中，我国可能发生的事居然发生了。”^{②2}

托尔斯泰越是深入了解农民的状况，他的事业就越是向纵深发展，这是素来如此的。办了上百个食堂。但是，跟吃饭问题一道，同时又产生了一大堆新的需求。农民被迫无所事事，这使托尔斯泰很担忧。应当让他们干活。托尔斯泰便订购树皮让他们做树皮鞋，订购麻布让他们缝衣。他看到马匹没有草料正在倒毙。应当去弄来草料。一部分牲畜转移到没有遭灾的地区，到了那里就可以养活它们了。还要给农民运去燃料。这一切，托尔斯泰的朋友们都购买了，用火车一车厢一车厢运送到受灾地区。

2月26日，托尔斯泰写给妻子的信中说：“另一件事就是给一岁至三岁的小孩开办收容所，给他们分发食物，或者说，分发麝牛奶的麦粒粥或黍米粥。这些收容所正在开办，初具规模。等这件事完全办好了再写信详细告诉你。总之，关于募捐以及关于已经办了什么事，还得写文章进行答复。自从上次小结以来，回顾一下，所做的事情不少。各种类型的食堂开办了一百二十个，还有儿童食堂。从昨天起，马匹有草料吃了，找到了各种办法帮助解决烧柴问题。我不时感到很奇怪：周围的人并不贫困，我问自己：如果他们并不贫困，我到这儿来干什么？可是，正因为我们来这儿，他们才不贫困，通过我们的手用掉了五万卢布……”^②

虽然有许多困难，参加救济饥民工作的托尔斯泰全家都体会到工作中的巨大欢乐。俄罗斯的所有优秀分子都同情托尔斯泰，协助他募捐，各尽其力。也从国外募得款项——从英国、美国。以自己的劳动协助这一工作的志愿者，从没被挡驾。工作开展得很起劲，大伙儿热情洋溢。

托尔斯泰的追随者第一批响应的有：比留科夫、波波夫、阿列亨兄弟、诺沃谢洛夫、卡斯杰夫以及其他的人。青年们也开始热心干起来。大学生和训练班

的学生，他们没有经验，不熟悉农村。那些对于托尔斯泰一家人显得容易而自然的事情，城里来的人都很难对付。他们不知怎样对待农民，跟农民相处互不了解。他们害怕在风雪和严寒时刻到远处的村子里去，不会套马和卸马，雪橇陷在雪堆里不会拖出来。但是，他们渐渐习惯和适应了环境。

大家共同生活，亲如一家。晚上大家坐在一起，有时诵读，谈话，交换经验和一天的感想，下棋。早上托尔斯泰照旧写他的文章《天国在我们心中》，而两个女儿则誊写他的手稿。

响彻在托尔斯泰头顶上的雷霆，对于他们不知不觉之间过去了，因为他们埋头工作，他们为之服务的人们的艰难困苦把他们的注意力全都吸引过去了。

年轻人围绕着塔妮娅和玛莎。一点也不枯燥。青春获得了自己的东西。别佳·拉耶夫斯基，一个秀美的年轻人，医科大学生，爱好打猎，爱唱茨冈人的歌，他爱上了玛莎。而她也倾心于他，接受了他献的殷勤。波波夫很痛苦，不敢公开追求塔妮娅，因为他已经结婚了。玛莎跟一个学医的训练班女学生很要好，她是维拉·维利奇金娜，来此参加救济饥民的工作，她向玛莎袒露了自己心灵的一切秘密。维拉·维利

奇金娜属于甘愿自我牺牲的、热情洋溢的一类姑娘，在俄国她们人数很多。他们大都长得不漂亮，在贫穷的知识分子家庭或半知识分子家庭里长大，从青春最初的年华开始，她们早就为人民服务了。她们有的当上了人民教师，有的做了医士，第三部分则参加革命者的行列，把推翻现存制度和干革命作为终身使命和人生目的。这类妇女的沉着镇定、自我牺牲以及坚忍不拔的精神实在令人惊叹。不管在哪个领域里工作，她们都把整个身心全部投进去，贯彻到底，不惜牺牲精力、时间甚至健康。她们渴望建立功勋和自我牺牲。维拉·维利奇金娜全心全意为饥民服务，满腔热忱。正如她日后全心全意干革命那样，后来她参加了布尔什维克社会民主党*。

有许多客人前来别吉切夫卡访问，那情景正跟在雅斯纳雅·波良纳一样。维拉·维利奇金娜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描绘了访问者中间的几个人：

“……第二天，我们这儿又来了两位客人。其中的一位一句俄国话也不懂，论国籍是个瑞典人，叫斯达得林格。他是一份英文报纸的记者，为了见见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和了解他救济饥民的工作，专程来

* 她后来成了列宁的私人秘书弗拉基米尔·波茨—布鲁耶维奇的妻子。

到我们这偏僻的地方……我把别吉切夫卡村的食堂指给斯达得林格看。食堂的样子是那么舒适，面包是那么好，饥民全都那么热烈地对待我们，这使得斯达得林格很满意。他在我们这别吉切夫卡村住了差不多两星期，跟全体工作人员衷心地融洽相处。我国农民的状况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印象。还在从车站到我们这儿来的路上，他见到我们广袤无垠的、荒芜的田地，惊诧地问他的女旅伴：这田地上干活的人都到哪里去了？他虽不懂一句俄国话，但他后来到了斑疹伤寒传行的萨克拉省，便立即热情地参加对病人的护理工作。不过，他可吓坏了我们附近的农民。多亏地方教会反对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宣传得力，他们一直生怕反基督的魔鬼降临，会诱惑他，打上魔鬼的印记。斯达得林格穿着拉普兰上衣，皮毛朝外，这使他的样子看起来很古怪。他又不会说俄国话，此外，他还有一架小小的照相机，他给自己感兴趣的人和一伙伙农民拍照。这一切产生了它的后果，那就是居然把他当成了反基督的魔鬼。后来当我去到他曾访问过的村子的时候，老乡们告诉我，反基督的魔鬼怎样到了他们那里，怎样给他们打上魔鬼的烙印。他注意地盯着某个人，然后他的匣子咔嚓一响，然后，谁被他打上魔鬼的印记，谁的灵魂就得搬家。我们现在

可真不知道该怎么办……”^②

1892年5月2日，托尔斯泰写信给莫斯科的妻子，信中说：

“三天前我们这儿来了一个老头，他有七十岁了，瑞典人，在美国住了三十年，到过中国、日本、印度。他一头灰黄的长发和大胡子，个儿矮小，戴顶宽大的帽子，衣裳破旧，他的样子有点像我，他宣扬要按照自然规律生活。英语说得很好，人很聪明，别具一格，很有风趣。他想在什么地方住下来（他到过雅斯纳雅），教人们学会一件事：一个人怎样不用马，只用铁锹就可以耕种四百沙绳土地以养活十个人。我已写了信给契尔特科夫谈到他，想把他打发到契尔特科夫那里去。而目前他在那儿挖土豆并向我们布道。他是个素食主义者，连牛奶、鸡蛋也不吃，喜欢吃生的东西。他打赤脚，睡在地板上，枕一只瓶子。”^③

这位瑞典人不吃鱼和肉，也不吃牛奶和鸡蛋。托尔斯泰的一个志同道合者斯柯洛霍多夫在其回忆录中说：“早餐后送来了茶炊，这个瑞典人站起来，俨然象个先知，指着茶炊说道：‘你们也崇拜这只偶像！中国人赋予我使命要我告诉你们，他们最好的土地都种茶了，已经没有土地种粮食了。这是因为茶叶供

不应求。你们应该拒绝喝茶。你们要知道，你们喝茶，实际上就是参与了剥夺咱们的同胞兄弟中国人嘴里的面包。’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困惑地从英语翻译了这段话并建议不再喝茶。他自己就不喝茶了，改喝大麦咖啡，茶炊收走了。”^{②③}

这瑞典人认为，土地如同空气一样，是公有的。每个人都有权拥有一定数量的土地，有权选择自己愿意居住的地方。他长期住在纽约，那里他有一栋房子。有一次他听到，租了他一间地下室的一个穷苦妇女抱怨自己命苦，咒骂他这个吸血鬼，因为他给她一间地下室却夺去了她最后几文钱。“我相信她说的是真话，我平静的内心被破坏了。我不再感到幸福，我扪心自问：倘若我的财富只是给别人带来痛苦，我要这些财富干什么？我再想：为了再变成一个幸福的人，我该怎么办？于是我决定把整栋房子让给人家不要一个钱。那个骂过我的女人咒骂得更凶了，她大叫：痛苦和贫困我们忍受过了，那时你威胁要把我们从地下室赶到街上去，你这吸血鬼榨干了我们的血汗钱。受了这么多年的苦，谁会出钱赔偿我们呢？’幸福没有得到，只有大苦恼。我便逃开了。我跑到印度，在那里靠自己劳动过活。在那儿我听到托尔斯泰的为人。‘That’s the man for me（这是个我所

需要的人!)’我想。‘我要到他身边去生活,教给他的孩子们生理学,这是为了让他们知道自然规律,并学会适应自然规律变成幸福的人。在他那儿我将在田间劳动……我就这么考虑并动身到他那里去。现在我到了这儿。’^{②7}

这个瑞典人搬进拉耶夫斯基的家里,牢牢靠靠,不打算走了。主人感到他是个包袱,但托尔斯泰对瑞典人很感兴趣。托尔斯泰发觉,此人很象伊耶列米亚先知,觉得他很有道理,甚至被他的理论所感染,停止吃牛奶和鸡蛋,决心吃生的东西。这个实验的结果不妙,托尔斯泰得了严重的胃病,因为他吃了瑞典人做的生麦饼。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到别吉切夫卡村小住了几天,看到一个肮脏、赤脚、半裸体的老头就睡在桌子下的地板上,她简直吓坏了。她问:“干吗还赤着脚?象一头牛睡在草地上,他锄地,在顿河里洗澡,吃得很多,睡在厨房里——只睡厨房。我们客客气气地告诉他,他应该离开。他答应了。”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就这么写信告诉当时已去朋友奥尔苏菲耶夫家休息的女儿塔妮娅。

把瑞典人从别吉切夫卡弄走的事没有成功,不久,他跟随托尔斯泰又到了雅斯纳雅·波良纳,这可使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害怕了。从雅斯纳雅·波

良纳他又到了奥夫西尼科沃村，那是塔吉雅娜·里沃夫娜的邻近的小田庄。只是等到秋天托尔斯泰全家回来并且寒冷的季节将临的时候，这才迫使他动身，从此在托尔斯泰一家人的视野中悄悄地消失了。

一些美国人响应了托尔斯泰关于拯救饥民的号召。从卡诺莫来访的一个美国人答应给托尔斯泰送来两节车厢的面粉。美国女记者霍普戈德给托尔斯泰汇来了款子。她 1891 年拜访了托尔斯泰并且后来把托尔斯泰的一系列作品翻译成了英文。

拜访托尔斯泰的还有一些时刻准备帮助受苦的人的英国战栗教派教徒，还有一批好奇的美国女旅游者……

4 月中旬写出了托尔斯泰关于救济饥民工作七个月来的总结：

开办了 187 个食堂，赡养了近一万人。

分配了燃料给饥民。

供养了饥民的马匹。

分发亚麻和树皮给饥民以使他们有活干。

开办了儿童食堂，收容婴儿至十三岁的儿童。

分发了种子和土豆给饥民以便播种。

购买了马匹分配给农民。

募捐 141, 000 卢布，实用去 108, 000 卢布。

从5月底开始，托尔斯泰在雅斯纳雅·波良纳与别吉切夫卡两地之间往返不断，救济饥民的工作在梁赞省和图拉省的几个县里还在继续。同时，在萨马拉省有他儿子列夫和比留科夫在工作。

1892年秋天，农民的灾难还在继续，粮食歉收，农民的谷囤是空的。伤寒流行。救济工作必须继续下去。

托尔斯泰在自己的秋季总结报告中说：“怎么办？难道又有了挨饿的人？饥民，食堂！食堂，饥民！老是这个问题，多么令人生厌啊！”

“你们在莫斯科和彼得堡感到很讨厌，但是，在这里，在你窗下或门口从早到晚都有人站着，只要你走到外面，准会听到同样的哀求的话语：‘两天没吃了，最后一头羊也宰掉了。日后怎么过日子呀？末日已到，只有死了。’”

“我想走过去，但抬头不意看见一个小孩。这小孩望着我，一双可怜无告的眼睛泪水汪汪，望着我，抱有希望，他这双灰色眼睛很美，一滴晶莹的泪珠儿挂在他的鼻子上，瞬间掉下来，掉在留有鞋子带来的雪花的木地板上。小孩这张可爱的痛苦的脸，一头圆圆的象一顶冠冕的褐色的鬃发，因为忍住不哭而不停地抽搐。对于我，他父亲所说的话，只不过是讨厌

的老生常谈。而对于他，父亲说的话却是对那可怕年代的回忆，他跟他父亲一同度过了那可怕的时代，他们终于来到我身边乞讨，在这个时刻父亲说的那几句话使他心酸，震撼着他的因挨饿而变虚弱了的神经。而这一切都使我非常讨厌，我只想快点走过去散步！

“这对我，是老习惯，而对他，却惊恐地感到新奇。

“不错，我们感到厌烦。可是，他们也照样想吃，照样想活下去，照样想得到幸福，照样想得到爱，这一点，我是看得一清二楚的，当我望着这双美丽的、注意着我的泪水汪汪的眼睛的时候——这个善良的、可怜的小孩，被穷苦所折磨，满怀对自己的天真的怜悯之心，他也想活下去……”^{②⑧}

从1892年秋天起，托尔斯泰把别吉切夫卡区的救济饥民工作交给波夏·比留科夫去领导。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要求全家的人都回去。伤寒在各村蔓延，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生怕他们感染。这年秋天，斯捷潘·安德列耶维奇的夫人玛丽娅·彼得洛夫娜·贝尔斯患伤寒去世了。

1892年7月26日，托尔斯泰写信给夫人说：“没有我在场，一切也会安排好，特别是因为招来了波

夏。在这儿我只再呆几天，四、五日，有可能，时间还要短些，现在我已动手写总结，哪怕打个草稿。为了写这个总结，必须就地核实。”

托尔斯泰跟救济饥民工作相联系的体验是很复杂的，正如他近年来的个人生活一样，非常复杂。在旁人看来，从公众的眼光看来，托尔斯泰的生活简直是接连不断的克己忍让，但是，赤裸裸地站在上帝面前，只有他自己一个人才能审问自己，他的所作所为是按照良心的命令还是出于自己自私自利的动机。

在这个时刻，他了解到，在人民的普遍灾难之中应该刻不容缓进行救济，并且只有他，托尔斯泰，有可能去从事救济，关于根本改变国家制度的一切议论应当暂时搁置一边，刻不容缓地给忍饥挨饿的人民弄来面包。他不可能有别的做法。他走自己的路，做他所不能不做的事，他一个人按照自己的良心作出决定。他知道，许多人，甚至最亲近的人都不理解他甚至责备他。

他在自己的小本本里写道：“敌人总是会有的。生活中，要做到没有敌人，不可能。相反，你生活得越好，敌人就越多。”

“会出现敌人。但是，要做到不要因为他们而苦恼。可以做到。要这样做，要不但使敌人不能成为苦

恼，反要成为快乐。”

“应该爱他们，这点不难。”

“我一个人，而人们却无数，所有这些人是各式各样的，因而我不能全都了解他们——所有这些印度人、马来人、日本人，甚至那些长年跟我相处的人——我的儿女、妻子……在这广大的人群之中我是一个，彻底孤立，只算一个……”^⑩

① 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三卷，第 203 页。

② 同上，第三卷，第 206 页。

③ 古谢夫：《托尔斯泰年谱》，第 453 页。

④ 《索·安·托尔斯泰娅日记（1891—1897）》，第 74 页。

⑤ 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三卷，第 216 页。

⑥ 同上，第 227 页。

⑦ 索·安·托尔斯泰娅：《致列·尼·托尔斯泰的书信集》，第 456 页。

⑧ 《全集》，1913 年瑟京出版社出版，第 18 卷，第 26 页。

⑨ 《巴别达诺斯采夫致亚历山大三世的书信集》，中央档案馆，《新思想》1926 年，第 251 页。

⑩ 索·安·托尔斯泰娅：《致列·尼·托尔斯泰的书信集》，第 462 页。

⑪ 同上，第 465 页。

⑫ 同上，第 467 页。

⑬ 古谢夫：《托尔斯泰年谱》，第 460 页。

⑭ 索·安·托尔斯泰娅：《致列·尼·托尔斯泰的书信集》，第 467 页。列·尼·托尔斯泰这时打算前往萨马拉省，因为那里也闹饥荒。11 月 20 日索·安写道：“募捐悄悄进行……大部分

款项我要给略瓦；他那儿饥荒可怕，更需要帮助。”

- ⑮ 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三卷，第 273 页。
- ⑯ 《列·尼·托尔斯泰与亚·安·托尔斯泰娅伯爵小姐通信集》，第 59 页。
- ⑰ 兰姆兹多尔夫：《日记》，第 254 页。
- ⑱ 《列·尼·托尔斯泰致夫人的书信集》，第 390 页。
- ⑲ 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三卷，第 255 页。
- ⑳ 索·安·托尔斯泰娅：《致列·尼·托尔斯泰的书信集》，第 505 页。
- ㉑ 同上，第 257 页。
- ㉒ 《列·尼·托尔斯泰致夫人的书信集》，第 397 页。
- ㉓ 同上，第 393 页。
- ㉔ 维·维利奇金娜：《饥荒之年跟列夫·托尔斯泰在一起》。
- ㉕ 《列·尼·托尔斯泰致夫人的书信集》，第 413 页。
- ㉖ 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三卷，第 279 页。
- ㉗ 塔·里·托尔斯泰娅：《雅斯纳雅·波良纳的朋友和客人》，第 131 页。
- ㉘ 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三卷，第 293—295 页。
- ㉙ 同上，第 299 页。

第四十六章

天国在我们心中

“天国很近——就在门口。”

“我不能够不考虑这点，我将怀着这个念头活着和死去。主要的一点在于：剩下的日子里，我想这么生活，即促成实现这一点。

“很可能，我现在做的不是为实现这一点而应该做的事，可能我陷入歧途了。但我知道，只有在这种生活当中，只有实现天国的生活之中，在天国和它对真理的探求之中才能有生命的全部意义。”^①

托尔斯泰的理想主义和乐观精神是无穷无尽的。1892年10月，他给奥波连斯基的信中说：“人生有三个阶段：1，为一己动物的人而生活，2，为人世

间的光荣而生活，3，为上帝而生活。”^②

托尔斯泰坚信，人们最终会明白，应该为上帝而生活。

没有什么东西比一个人身上神性的表现、他对人的爱和道德自我完善的努力更能使他得到快慰的了。1894年6月20日，托尔斯泰写信给波波夫说：“我看得越来越清楚，只需要一点：保持自己身上的这个神性的‘我’，培养它，使它以返归的形式移植到别生命中——它给那个生命留下的痕迹只不过是这个返归和自我完善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我担心，表现这一点只停留在词句上。对于我，这是行动，不但是行动，而简直是我与生活的唯一联系。只有这样才能昂首挺胸地、精力充沛地生活，这之后，至少在思想上，才会拒绝地上的、表面的享乐，拒绝把这种享乐当成生活的目的。地上的享乐，当你不把它们当成生活目的的时候，可以附带地实现。”^③

在《天国在我们心中》的结论部分，托尔斯泰描述了一个使他深感痛苦的事件：

“我做完了这个花了两年的工作，9月9日，我坐火车到去年闹饥荒、今年饥荒更为严重的梁赞省和图拉省农村的一个地方。在一个火车站上，我坐的这

列车跟一列专车相遇，这列专车由省长押运，载了一车官兵，他们全副武装，荷枪实弹，还背着树条子，他们是去镇压和屠杀那些快要饿死的农民的。

“虽然三十年前已经废除了体罚，但是，为了贯彻当局的决定而用树条子责罚人的事，在俄国近来发生得越来越频繁了。

“这种事我听说过，甚至在报刊上也读到过有关可怕的体罚的报导。尼日戈罗德省的省长巴拉诺夫似乎还在吹嘘他擅长体罚，说是在切尔尼戈沃、唐可夫、萨拉托夫、阿斯特拉罕和奥尔洛夫等地已经不断进行过了。但是，没有一次我有机会看到，而这一回，我却目睹这种事的执行。

“这一回，我目睹了一批批善良的、心中充满基督精神的俄国人，打着长枪，拿着树条，前往屠杀和镇压自己饥饿的兄弟。

“他们前往弹压的原因如下：

“一个有钱的地主的一处田庄上的农民在他们跟地主共有的牧场上培育了森林（所谓培育，就是说在森林生长期间保护它），他们一贯使用这个林子，因而认为这林子是他们的，或者，起码是跟地主共有的。而地主则把林子据为己有，开始砍伐。农民便去

告状。初审法官偏袒地主，判决案子不公平（我这儿使用‘不公平’一词，是引用检察官和省长的原话，他们理应是熟知案情的人）。以后几级法庭，其中包括大理院，虽然能够看出案子审判不公平，但是维持原判，森林便判归地主。地主便开始砍伐森林，可是，农民们不相信，这种一目了然的不公平的事怎么会由最高当局加害于他们头上。他们不服从判决，赶走地主派去砍伐森林的工人，宣布要控告到沙皇那里去，不让砍伐森林。

“这个案子报到彼得堡，从那里责令省长执行法庭的判决。省长要求派兵。就这样，士兵们除了配备树条以外，还挎着子弹带，坐上这列火车出发了，去执行最高当局的命令。”^①

跟人世间的罪恶面对面发生冲突，比肉体上的剧痛还要难受得多。托尔斯泰不禁潸然下泪，不能不为之大声叹息。道德的沦丧，人们的、特别是青年人的荒淫使他心情沉痛。他读波特莱尔的小说，深感痛苦，这小说他要读一读“为了对于荒淫的程度 *fin de siècle** 有所了解。”

* 法语：“有如世界末日”。

送走雅斯纳雅新征入伍的士兵的时候，他深感痛苦。这些年轻人，为了壮胆，喝得醉醺醺的，出尽了丑相，挥拳斗殴。

托尔斯泰眼见得有一个深渊，整个人类正象疯子一样往里面跳。无神论的革命者越来越对年轻人的头脑产生影响：响亮的豪言壮语——“为民众服务”，“为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博爱而斗争”。对这些为争取自由的战士的迫害这个事实以及地下工作——这一切对年轻人发生了刺激性的作用。

要求闪电般的冲击、勇敢和英雄主义的急进的革命道路，把年轻人吸引到自己那边。而托尔斯泰的道路——努力按照基督的教导生活，道德自我完善，不以暴力抵抗邪恶——这条道路，从布尔什维克的观点看来，是乌托邦。

托尔斯泰从事《天国在我们心中》一文的写作已经是第三个年头了。1893年2月3日他给契尔特科夫的信中写道，任何一部著作都没有花费这么大的劳动，象《天国在我们心中》这样。只是到了1893年4月底托尔斯泰才把手稿寄给在英国和法国的译者。

《天国在我们心中》一文中最终清楚地表述了托尔斯泰的世界观。

托尔斯泰眼见得道德和对上帝的信仰在衰落。他眼见得鼠目寸光的国家政权的粗鲁的单方面的政治，另一方面，则是差不多同样残酷的、局限的革命的宣传。救济饥民的工作使他更加接近农民，更加暴露出这些忍饥挨饿的、被遗忘的人跟富裕阶级之间的鸿沟。托尔斯泰眼见得有钱人洋洋自得、自私自利和无忧无虑，他们毫不动摇地深信，他们具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可以花天酒地、占有土地、使用仆役，与此同时，亿万人都必须半饥半饱，从早到晚干活，一贫如洗。

他知道，就这么下去是不行的。他预见到可能爆发革命并且害怕它。只有信仰上帝和走基督指引世人之路，才可能拯救人类。

“努力实现天国……”这就是托尔斯泰为自己选择的道路。

为什么他不舍弃家庭？为什么不离开那个他生活于其中但并未按自己的信念安排自己的生活的富裕的环境呢？

责备他的人群很难理解，这里面刚好包藏了他的苦恼，是他精神上的一个十字架。哪一种情况对他比较轻松？离家出走，摆脱掉那个他精神上早已弃绝了的压迫他的环境，移居到某个农村里去，跟心灵上非常亲近的农民们朝夕相处，他可以跟他们一道

挣得自己的衣食；或者，继续留在家中，不破坏这个家庭，不在家庭成员之间造成更多的不和，不舍弃他非常喜爱的儿女，不让他们丧失父亲；两种情况，哪一种更轻松呢？

离家出走，对他来说，当然容易得多。但留在这里，他认为自己的责任。而留在这里，他尽力想帮助自己的亲人看出那个他自己洞若观火的事情。对自己儿女中的每一个，父亲总是努力寻找好的东西并发展他们身上好的品质。他都爱，对每个儿女各有各的爱法，并且一贯怀着 he 素有的敏感和温情对待他们，不管是成年的还是幼小的。

“安德留沙怎么样了？”1892年11月18日，他给妻子的信中问她：“为什么你对他感到失望？而我却相反，总感到他很好，比他不知为什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实际要好得多。”^⑤

“萨莎如何？”下一封信中他问。

父亲对万尼奇卡有着特殊的感情。他在给妻子的一封信里说：“昨天我没来得及写信给你好好谈谈。今天万尼奇卡来我房里喝茶，我告诉他，你病了。我看到，这使他很难过。他说：‘怎么？她病得很厉害吗？’我回答：‘我们这就去看看她。’他说：‘把鲁

德涅夫*也带去吗?’然后略瓦进来了,派他去找塔妮娅问问昨日有信没有。应当看到,他都明白,高高兴兴跑去找塔妮娅。当略瓦担心他不会转告时,他伤心了。很可爱,非常可爱——一个好小子。”^⑥

有别吉切夫卡时(托尔斯泰如今有时去去那儿)他已经不习惯于游手好闲的富裕生活了。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对社会工作冷淡下来,她说:‘我们托尔斯泰家的人,事情已经做得够多了,让别人去操心劳力吧!’她跟托尔斯泰的关系变坏了。当托尔斯泰或者某个女儿(大都是玛莎)去别吉切夫卡的时候,她便疯狂反对。托尔斯泰又想离家出走了,这事诱惑他,折磨他。到了夏季,他的心情特别沉重,因为其时来了许多游手好闲的人,周围一片欢笑、吵闹、歌唱,忙忙碌碌。但是,这以后,秋天到来,大家走散,他一人跟两个女儿留在雅斯纳雅·波良纳。这时,他享受到了一种宁静和纯朴生活的喜悦。

库兹明斯卡娅讲过一件事,有一次她到雅斯纳雅·波良纳来看望她所说的“隐士们”。姨姨爱吃,因此,当给她端来的只有素菜时,她忿忿然说,她不能吃这乱七八糟的东西,要吃肉吃鸡。下一餐,当她走进来吃饭时,她惊讶地发现,桌子脚上吊了一只鸡,

* 图拉的医生,给托尔斯泰一家治病。

旁边放了一把菜刀。

“这是干什么？”姨姨问。

“你要吃鸡嘛！”托尔斯泰回答，忍不住笑，“我们这儿谁也不会杀鸡。我们这就给你一切都准备好了，请你自己动手。”*

1892年11月11日，托尔斯泰给妻子的信中说：

“我在这儿非常愉快，早上工作之后感到疲倦（我开始越来越感到疲倦了），然后是夜晚的寂静。什么也不分心，也不打扰。看看书、弹弹琴、喝喝茶，写写信，脑子里思考着优美的、严肃的事情，思考着那个伟大的行程，那个谁也一去不复返的行程。很好！只是读了你的信感到忧伤，你这次给塔妮娅的信中透露，你心情不好。怎样使你获得愉快、满足、生气勃勃的平和心境呢？这种心境我有时倒体验过。”^⑦

雅斯纳雅·波良纳四邻靠近草原地带的农民也同样收成不好。1893年2月1日，托尔斯泰给妻子的信中说：

“我去了雅先卡村** 找司书和村长，催他们快点整理好老乡们关于粮食的申请单，我又进一步了解

* 原注：根据本书作者个人回忆。

** 原注：距雅斯纳雅·波良纳七俄里的村子。

到饥荒的详细情况。我们就要分发面粉给他们了。一般说来，这儿不如别吉切夫卡村那样贫困。但某些人的情况同样也很糟。玛莎也有这个印象。如果塔妮娅想来，等她来了，我们就去别吉切夫卡村。^⑧

1893年夏，托尔斯泰还是忙于饥民问题，虽然实际上这件事已交给波夏·比留科夫和拉耶夫斯基家的老父伊凡去管理了。有些地方，情况好转，但某些村里饥荒情况仍然严重。1893年7月，托尔斯泰给妻子的信中说：

“昨天去塔吉谢沃村，得到的印象折磨人。没有更糟的村子了。一群群老老少少的瘦弱不堪的人把我团团围住，尤其几个头戴小帽的小孩，未老先衰，笑容满面。特别是其中一对孪生兄弟，看了令人心寒。我跟那个年长的夏拉波娃设法给他们弄来牛奶，但不能给小孩吃。必须这么办，因为目前小孩普遍闹腹泻。还得给没房子住的人安置一年的住处。这么一来，钱要用光，还会不够。”^⑨

1893年秋，托尔斯泰的救灾工作应该算是结束了。修改了比留科夫起草的总结报告，托尔斯泰把它送给《俄罗斯公报》，署名托尔斯泰和比留科夫，于1893年10月19日在该报刊登出来。

这时，托尔斯泰又可以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写作

了，他写完了《天国在我们心中》，又开始写一篇新文章《宗教与道德》。

1893年10月，托尔斯泰在报上读到关于土伦的胜利的文章。文章里的夸张的假爱国主义的调子令他吃惊，这一切都不真诚，但却以人民的名义说话，人民却根本不知法俄友好为何物。托尔斯泰这些思想在他的《基督教和爱国主义》一文中表达出来了。

象往常一样，托尔斯泰读了很多书。各种不同文字印行的许多书籍汇寄到雅斯纳雅·波良纳，其中有些附有作者的签名。

“我读书上隐了——《北方信使》，波达宾卡的小说，真好！一个十四岁的小孩知道了父亲有个情妇，而母亲又有个情夫，他为此感到气愤，表现了这种感情。看来，他就此破坏了家庭的幸福，行为不端。可怕！我好久没有读过这么令人气愤的作品了。可怕的是，所有这些舞文弄墨的人——波达宾卡们、契诃夫们、还有左拉甚至莫泊桑不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更有甚者，大都把坏的当成好的，而这一切都以艺术的面目出现，交给读者享用，从而使他们腐化。”^⑩1893年10月21日他给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的信中这么说。

在这书籍的洪流中，托尔斯泰选择了那些有关

现在构成了他生活主要兴趣的书籍。他收到了德文版的老子《道德经》，兴高采烈，在波波夫的帮助下，他立即动手翻译。

这时，格罗特教授介绍一个人与托尔斯泰认识，此人是基辅神学院后补博士和莫斯科心理学学会会员，日本人小西。小西精通汉语和俄语，翻译了孔夫子的《大学》和老子的《道德经》*。

小西是个可爱的年轻人，希望跟所有的人友善，他带来老子的译文，不意陷进了难堪的境地。

有一天晚上，小西走进莫斯科的托尔斯泰的低矮的书房里，手里拿着老子的译文。托尔斯泰浏览了一遍。

“不对，这是个错误。”托尔斯泰说，“老子不可能这么说。”他便出声朗读下面的句子：“谁如果为了对人的爱而打仗，那么必胜敌人。如果保卫人民，那

* 这两本书的译文登载于 1893 年一月号与五月号的《哲学问题》杂志上。1913 年在莫斯科出版的、注明由列·尼·托尔斯泰编定、杜雷林注释的《道德经》俄译单行本的《前言》中，小西说，他这本书是在 1895 年在托尔斯泰指导下进行翻译的。这是个明显的错误。托尔斯泰参与此书的俄译工作不会迟于 1892 年（原注）。

么，防御一定很坚固。”*

“但这是根据原文，”日本人胆怯地反驳。

“删掉！”托尔斯泰斩钉截铁地说。

“但我不能……”

托尔斯泰万分激动，不听小西说下去。

“删掉！我对您说，删掉！老子不可能这么说。他

* 译者按：经查对，此处译自老子《道德经》第六十七章：“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笔者译到此处，不得不佩服托翁的慧眼。日本人小西的译文，孤立地、表面地看，似乎并没有错，但实际上却错了。下引《道德经》中这一段如下：“吾有三宝，持而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今舍其慈且勇，舍其俭且广，舍其后且先，死矣！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托尔斯泰不懂汉语，但他一眼就看出译文有错，因为他把握了老子哲学的精髓（而他手头的资料并不多）。我国历代学者对老子《道德经》这一章的解释和阐发，正好与托尔斯泰的观点不谋而合。清人魏源《老子本义》说此章“非为用兵而设”，“而昧者遂至以老子为谈兵之书，其失甚矣！”魏源引韩非子《解老》，引叶梦得、焦竑、王弼诸家之说，足资证明自己的观点。焦竑曰：“盖至争者为兵，故借之以明不争之德也。”王弼曰：“士者卒之帅也。不武不怒者，后而不先，应而不唱也……言以哀慈谦退，用之以战，犹不须行列，不必攘臂，不用兵刃，而敌自无与之抗也。”

老子的无为哲学跟晚年的托尔斯泰的思想正好合拍。

反对战争。”

小西完全失望了，只得去找格罗特教授。

教授说：“不能改写《道德经》。您就照原样保存吧！但切莫告诉托尔斯泰。”

小西后来说：“当书出版以后，老子关于战争的话还是保留了。托尔斯泰看到了之后，心里非常难过。我真可怜他。”*

托尔斯泰在给格罗特教授（托尔斯泰经常就所读的哲学书籍请教他）的一封信中说：“您说，我不知道亚里斯多德。对，我不知道他，因为他的书中没有我所必须知道的东西。跟他在时间上相距不远的老子和孔子，我却知道得多些，因为我不能够不去了解他们。”^①

大约就是这个时候，即11月22日至24日，托尔斯泰读了萨巴齐耶的《弗兰西斯柯·亚西兹传》。这本书给他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出声朗读了其中的一些段落，托尔斯泰忍不住流出感动的热泪。

他写信给契尔特科夫说：“我收到了关于弗兰西斯柯·亚西兹的一本非常好的书……我读了三天，为自己的卑劣和软弱感到害怕，而读了之后感到好

* 根据本书作者个人回忆。亚力山德拉·托尔斯泰娅1929—1931年在日本时跟小西谈过话。

些了……”^⑫

当他在世界各国的圣贤的身上和书中找到对自己哲学观点的支持的时候，托尔斯泰便体验到巨大的喜悦。

对他来说，另一个大欢乐就是跟那些赞同他的学说的人交往。但这个欢乐却不时蒙上阴影。他周围，对他的信徒不断进行搜查、流放、逮捕，如今他写的东西，一概被禁止出版，人们由于保存托尔斯泰的手稿而被捕，至于他本人，政府决定不予触动。倘若抓了他去坐牢，把他流放，能为自己的信念而吃苦，那他真会高兴的了不得哩！6月25日，得知比留科夫和波波夫被抄家以后，托尔斯泰在日记中写道：“深感内疚！我自己倒是自由的，为此感到痛心。”这一点，对他也是个考验。

1894年1月27日，在沃龙涅什的监狱里，人民教师德罗仁去世了，他在托尔斯泰的文章的影响下，拒绝服兵役因而被捕。托尔斯泰给记述德罗仁的小册子写了前言，其中说：“由于文明的传播，生活方式大大地改变了，以至以往我们所理解的政权在这个世界上已经丧失了立足之地，只剩下残酷的暴力和欺骗了。而屈服于暴力和欺骗要‘发自内心，而非由于恐惧’，那是办不到的。”^⑬

德罗仁受苦和死去，好象早期基督教徒受苦和死去一样。开初，他被送到惩罚营，他写信给最同情他和朋友，也同样拒绝服兵役的伊玖姆琴柯说：“我们不会垂头丧气，因为我们并没有做任何坏事，但来到这因偷因盗而被惩罚的地方，我们什么也不怕，因为一切听从上帝的意旨：要杀就让他们杀，到那时，根本就没什么可以对上帝负责的了，杀我们审我们的人就会把我们一生的罪孽拿过去背在自己身上了。我坐了一年半牢，一点也不可惜，因为使徒行传中有言：‘当一个人受苦时，他就停止犯罪了。’这就是说，每过一天，我们必须回忆一下，这一天过得好还是坏，而谁如果被监禁或以其他方式在受苦忍耐时，那他就为自己在尽天职。”^①

读着德罗仁的信，托尔斯泰哭了，首先由于高兴而哭，因为世界上还存在着这样的人，其次由于悲痛而哭，因为他不可能分担此人的命运。“忍不住想效法他的榜样。”^②1894年3月6日托尔斯泰写给阿列亨的信中说。

当德罗仁在监狱中快死的时候，监狱里的医生和主管人员不禁为他的坚忍不拔感到惊讶。

“您被单独监禁了多久？”

“在惩罚营呆了十四个月。”

“您在那里很难过，是吗？”

“不！在那儿我觉得很好。”叶甫多基姆·尼基吉奇用平静柔和的声音回答。

“当一个人丧失了他最大的财富即自由的时候，他怎么会感到很好呢？”

“不，我是自由的。”

“怎么是自由的？”医生再问道。

“我可以想我愿意做的事情。”叶甫多基姆·尼基吉奇说。

医生走开了。^{①⑥}

被政府追逼的托尔斯泰的志同道合者们中间，最突然和残酷的打击落到了席尔可夫公爵和他夫人身上。

席尔可夫和他一家：他夫人与两个女儿，由于自己的信念被流放到了高加索。他有个时候试图创建基督教土地公社，参与了青年福音洗礼派运动。席尔可夫夫妇跟东正教脱离了关系，也没给自己的孩子举行洗礼。席尔可夫的母亲是个公爵夫人，却具有老派观点，忠于皇帝和正教，得知儿子行为以后，惊恐万状，便十分仇视席尔可夫的妻子泽齐莉亚·维涅尔。她得到约翰·克隆施达德斯基神父的赞同，得到皇上的命令，由警察局长出面，她把席尔可夫的两个

小孩夺过来，带到自己身边。

托尔斯泰给公爵夫人写了一封信，其中说：“写信给您这位为人之母的人，谈谈被暴力夺去了孩子的母亲的悲恸，谈谈这件案子的其他沉痛的情况，这种信，从我这方面说，似乎是没有多大意思的，因为我深信，这一切您都知道得更清楚，考虑得比我更周详，而倘若您这样做，那么，必须有某种特别的尚不为人知的原因，因此，我只允许自己向您提出唯一的请求。这就是，倘若您认为这么做是值得的，则请您告诉我，为什么您要这样做，有什么原因迫使您这样做并且您预见到这么做会产生什么样可以设想的后果。”^{①7}

但是，无论这封信也好，无论由比留科夫经过宫廷部长奏明皇上请求赦免的呈文也好，都一概不起作用。

“德罗仁之死和席尔可夫女儿被夺走，这是两个极其重要的事件。它们促使我们全体对自身作更大的道德上的要求。”^{①8}托尔斯泰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这样说。

无论他的朋友们和信徒们的劝说也罢，无论从世俗观点看来他个人的虚伪的处境（他个人的不可侵犯性）也罢，都一概不能阻挡他。凡是坚信的，

托尔斯泰都继续写文章议论。

“寻找天国和它的真理，其他的一切水到渠成。”人生的唯一目的在于促成天国在人间建立。这件事要通过每个人承认真理和宣传真理才能实现。

“天国不会以觉察得到的方式来到人间，不会说：它在这里或者它在那里：因为，‘天国在我们心中。’”

托尔斯泰真诚地相信，象德罗仁那样的基督徒所受的苦难决不会不留下痕迹，那个时代快要到来了，那时人们将醒悟起来，越来越努力实现地上的天国。

- ① 《全集》，瑟京出版社 1913 年版，第二十二卷，第 122 页。
- ② 同上，第 120 页。
- ③ 同上，第 137 页。
- ④ 《天国在我们心中》，柏林，拉德日尼可夫出版社 1920 年版，第 298 页。
- ⑤ 《列·尼·托尔斯泰致夫人的通讯集》第 436 页。
- ⑥ 同上，第 452 页。
- ⑦ 同上，第 434 页。
- ⑧ 同上，第 493 页。
- ⑨ 同上，第 449 页。
- ⑩ 同上，第 456 页。
- ⑪ 《全集》，瑟京出版社 1913 年版，第二十二卷，第 152 页。
- ⑫ 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三卷，第 352 页。

-
- ⑬ E·H·波波夫著《德罗仁的生和死》一书中列·尼·托尔斯泰所写的序言，1895年柏林出版，第23页。
- ⑭ 同上。
- ⑮ E·H·波波夫《德罗仁的生和死》，第83页。
- ⑯ 同上，第194页。
- ⑰ 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三卷，第347页。
- ⑱ 同上，第370页。

第四十七章

两个世界

冬天，托尔斯泰为了不使妻子难过，便到莫斯科去了。但是，象往常一样，城市生活使他觉得很难受。

1893年12月22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到莫斯科已经一月有余了。我感到很难受，恶心……这奢侈的生活，这发卖文稿这道德上的肮脏。这种手忙脚乱……主要的是，我甘愿受苦，我要大声疾呼宣扬真理，这真理灼痛我，不吐不快。”

他想念农村，想念体力劳动，在这儿，一大堆仆人伺候，令他反感，对小孩教育不当，令他反感。关于这点，他在给夫人的一封信中，描述了自己一次梦境时涉及到了：“我看到安德留沙骑自行车，便想到

他和玛莎。他们关心这尘世的福利太多了，因此没有时间考虑精神上的需要。”^①

一早起来，托尔斯泰穿上皮毛短上衣和毡靴，走到院子里，劳动个把钟头：从井里打水，赶车运到园子里，或者劈柴，屋里有许多炉子要生火，厨房里要烧柴。屋子里没有暖气。如果没有事情可干，托尔斯泰就出去散步。他喜欢在人少的街道上散步，经过坐落织匠巷尾的苏姆斯基团的营房旁边，往下走到莫斯科河边。这里，河面已经封冻，盖满积雪，显得较为宽敞，有点象农村。一条条践踏成的小路穿过河面，河岸上一栋栋的小屋子，里头住着普通工人，周围静悄悄的。有时，他从另外一边走到贞女地，经过贞女修道院旁走到莫斯科河边。从那儿可以看到《战争与和平》里描写过的麻雀山，当年拿破仑站立山顶曾俯瞰被他征服的莫斯科，想要莫斯科贵族前来欢迎他。

孩子们中的任何一个都差不多从来没有进过托尔斯泰的书房。那是一块“圣地”，只有当父亲想跟女儿中的某一个“谈谈”的时候，才有人进去，这种事简直是激动人心的重大事件。父亲工作后，立即又去散步，到了晚上，一批批“阴沉的人”就去找他。这些人，不但不吸引孩子们，相反倒真有点可怕：穿

着肮脏的短上衣，衣裳破烂，蓄着大胡子。

当父亲跟小孩子们玩的时候，他们可高兴了。把脏衬衫从大篮子里倒出来，万尼奇卡，有时还有萨莎（但她很快就变得难受了），跳进篮子里，由父亲和他的朋友杜纳耶夫拖起满屋跑。当篮子一停止，小孩子就得猜，到了什么地方。玩这种游戏，万尼奇卡和父亲倒底谁更高兴，那是搞不清的。

两个小孩，米沙和安德留沙，每天早上起床都要吵闹，咒骂轻轻摇他们肩膀的仆人：“起来吧！已经九点钟了，上学又会迟到”。很快马虎洗漱一下，孩子们站着狼吞虎咽几口咖啡，拿起奶油面包边走边吃，挎上黑色书包，脖子上撑着浆硬了的领子，大踏步跑进波里诺夫私立中学。妈妈睡到十二点。保姆服侍万尼奇卡，德特拉斯小姐教萨莎功课。她是个神经质的家庭女教师，瑞士人，有一张瘦削的脸，鹰钩大鼻子，青筋暴突，屁股肥大。萨莎不听话，不专心，时时想往花园里跑，弄得这位女教师苦不堪言。春天和秋天，萨莎跟邻居的小孩和一群狗在花园里奔跑，冬天则去溜冰。跟一切接受良好教育的小女孩那样，萨莎要规规矩矩散步，跟 Detras 小姐用法语谈话，这对她来说，是最大的痛苦。

聘请了许多教师到家里来。母亲想在教育方面

尽可能把一切都献给儿女。请来了给小孩们补课的老师，因为他们，尤其是安德列，学习很糟糕，春天里一定要为秋季不及格的功课补考。给米沙请了个小提琴教师，给萨莎请了个音乐教师。他们两个具有音乐天赋，但没有学过音乐课，懒得死啃冈诺夫的练习曲和练音阶。

孩子们都有各自的同庚，大都是所谓上流社会里的孩子。不是在这家，就是在那家经常举行晚会，猜字谜，*petits jeux**。春天则坐车出游，有时套上两匹黑马，小人们穿着鲜艳的春装，到野外去进野餐。厨师谢苗·尼古拉耶维奇烤了馅饼，炸了小鸡，煮了老鸡蛋。这些东西都包在上了浆的雪白的餐巾里，放进考究的食品箱内。小人们去玩耍，采集铃兰和勿忘我花，做老鹰抓小鸡和巫师做法事的游戏。

可是，最快乐的事情便是开儿童舞会，缝制了晚会服，买来跳舞鞋和白色的细皮手套。有时甚至请来理发师，法国人杰奥多尔给每个小孩卷发。大伙儿坐上车，车台上坐着仆人，于是驱车赴舞会。此行有妈妈、安德留沙、米沙、萨莎和万尼奇卡。

万尼奇卡虽然只有六岁，他跳舞可跳得真好，特别是跳玛祖卡舞。他飞起来，仿佛不碰地板，瘦小的

* 法语：游戏

个子，姿态优美。有时他原地碰响鞋后跟，有时又轻松地跳起来脚碰脚，有时又跪下一只脚，手牵舞伴（通常是比他大的女孩子）打转转。他的小脸蛋飞红，眼睛发亮，甩动披在肩头的金黄色长卷发。在每次儿童舞会上万尼卡总是年纪最小的一个，玛祖卡舞中他总是第一对中的一个，大人们总是夸他，赞赏他。回家时往往快一点钟了，万尼奇卡在车子里突然变成个小家伙，小脸蛋拉长，发白，睡在妈妈的膝头上，车摇晃着，他睡着了。

托尔斯泰家也得每年至少开一次晚会，并且，开得与众不同。谁也不及塔妮娅想得那么周到的了，因而这件事由她快快活活自愿承担。科奇里翁舞的舞场里放了气球。孩子们都跳着玛祖卡舞，五颜六色的气球在空中飘动，奏乐，父母坐在大厅的墙边，欣赏着这美妙的情景。突然，一切都停止了。大厅里走进来一些人，完全不是节日的打扮。大胡子托尔斯泰穿着短衫子，两只手插在腰带里，跟他进来的还有身材魁梧的弗拉基米尔·索罗维约夫，还有用快速动作抚摸尖胡子的列宾，还有秃头的鲁宾斯坦。一开始，谁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突然，通托尔斯泰的书房的走廊尽头，小小的侧门打开了，第二个托尔斯泰走出来。青年们全都哈哈大笑。两位托尔斯泰友好地握

手。看来，塔妮娅背地里唆使自己的朋友拉巴金，华西里·马克拉可夫，青盖尔假扮上述几个人物赶到了舞会上。这次舞会非常成功，在莫斯科人们纷纷谈论这事。

但是，塔妮娅对舞会的满意心情被破坏了。舞会前一天，当塔妮娅在屋里奔波劳碌的时候，她碰到一个穿着朴素的女人要求会见托尔斯泰。她手一挥，对那女人很不在意，说不能见托尔斯泰。后来塔妮娅才知道，这个女人就是被夺走儿女的席尔可夫的夫人。塔妮娅感到多么难过啊！她便跑到父亲那里请求帮助和安慰。

虽然托尔斯泰有时不由自主参加一些娱乐，但他总是力图不介入。他回避讲演会、音乐会和文学晚会。只要他一露面，人家便认出了他，交头接耳窃窃私议，不时转变成对他的欢呼，象在青盖尔教授的晚会上一样。他不能够长时间忍受莫斯科生活，一心想去雅斯纳雅·波良纳，在那儿他的心境要轻松得多。

有雅斯纳雅·波良纳夏天是吵吵闹闹的，那时，老屋子里挤满了年轻人、孩子、仆役和男女家庭教师。夏天过去了，周遭一片寂静平和——这正是托尔斯泰所需要的，不然，他总是感到心情抑郁和窒息。椴树林荫道，屋前的草地都覆盖一层厚厚的雪，不用

滑雪板休想通过这一带。但森林里运送木柴已经辗出了一条条车道。托尔斯泰穿着短皮袄和毡靴去散步，或步行或骑马。一切他都看在眼里：野兔深深的足迹、松鼠小小的脚印、饿狼拖成一条直线的大大的爪痕。家里很暖和。桦树干的劈柴在炉子里噼啪响。没有仆役。托尔斯泰自己运柴生炉子。女儿们和朋友们收拾房子、洗碗、做饭。为什么不就这样在平和安静之中，在自然的怀抱里生活下去呢？托尔斯泰觉得城市里忙碌、奢侈和无所事事是多么不必要，多么有害，多么腐蚀人的灵魂啊！

1984年在雅斯纳雅·波良纳跟托尔斯泰住在一起的有米·阿·施米特和波夏。比留科夫，稍后一点尼·尼·盖也来了。盖爷爷心情非常激动。他渴望把自己的大型油画《十字架上的耶稣》给托尔斯泰看。这幅画他刚刚完成。当朋友们都回到莫斯科以后，爷爷领着托尔斯泰到他私人的工作室，那幅画摆在那儿。关于这个场面比留科夫记述道：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走进了工作室，以洞察一切的眼光盯着那幅画。尼·尼·盖受不了这个考验，从工作室跑出去到了走廊里。过了几分钟，列·尼出来找他，看到他正在虚心等待审判。托尔斯泰伸过手去，一把抱住他。忍不住轻轻地哭。两人都哭了，

象小孩一样。我听到列·尼带着哭腔说：“您怎么能够做出这一切！”尼·尼·盖心花怒放。考试通过了。”^②

但皇宫里的大人们是不会同意托尔斯泰关于《十字架上的耶稣》的评价的。在彼得堡的画展上，艺术学院主席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洛维奇大公参观了画展，很生气。他转过脸，说：“这简直是屠宰场！”《十字架上的耶稣》这幅画的命运就这么决定了。把它取了下来。

“从画展上取下这幅画；这是您的胜利。”托尔斯泰写给盖的信中这么说，“当我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我就深信，它会被取下来。而现在，我想起了通常的画展上，陛下殿下光临，展出各色夫人肖像、风景画和许多 *nature morte* *，现在，想起你那幅画也陈列在那儿，真感到非常滑稽了。”^③

但盖这位老头子的心却忍受不住许多痛苦。1894年6月2日，守门人从车站带回来一份电报，得知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盖不幸突然逝世了。

托尔斯泰写给自己的朋友安宁可娃的信中说：“我不记得，还有没有别人的死亡这么厉害地冲击着

* 法语：裸体模特儿

我。一个亲近的人新近死亡时，生活便变得非常严肃，我们自己的弱点、罪孽、轻浮、爱人之心的缺乏等等，看得比那人还没有死时更加清楚了，简直觉得可怜。这个世界上又少了一个朋友，一个助手，一个干活的人了。”^①

最近这一段时期，略瓦的健康状况令父母非常担心。这个瘦弱的、神经质的、似乎在不断探求什么东西的略瓦，却无论如何不能够找到他自己。他有时接近父亲，帮他工作，素食，戒烟，有时又接近母亲，批评父亲的行为和观点。他终于精神紧张过度，病倒了，而医师们又不能确诊他患的什么病——只说是胃疼，虚弱。把他送到国外，送到巴黎，但是，一个人呆在大城市看来对他很不好。法国人索罗门，是托尔斯泰家的朋友和托尔斯泰作品的译者写了一封深感焦急的信请家里派个人去。塔妮娅去到了兄弟那儿，但呆的时间不长，不久，他们两人都回家了。这年春天托尔斯泰得到加丽娅·契尔特科娃重病的消息，契尔特科夫请求托尔斯泰到沃龙涅什省他们的田庄去一趟。

自从契尔特科夫夫妇丧失了他们的第一个婴儿、一岁零八个月的小女儿以来，加丽娅的健康一直时好时坏，常闹小病，而这个春天身体特别不好。跟

朋友见面倒是非常愉快的……“我跟他们在心灵上是这么亲近，我们有这么多共同的兴趣，而我们相见的机会又很稀少，因此我们两方面都感到很好……”^⑤1894年3月30日，托尔斯泰写给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的信中这样说。

回到莫斯科以前，托尔斯泰跟玛莎一道去沃龙涅什访问生病的挚友鲁萨诺夫。象鲁萨诺夫这样的亲近的朋友，只说半个字就能理解托尔斯泰要说的意思，跟托尔斯泰在思想上休戚与共，跟这样的人交往对托尔斯泰是莫大的乐事。

这类赞同托尔斯泰观点的人越来越多了，不但在俄国有，国外也有。

还是在1891年，托尔斯泰收到了美国人艾耐斯特·克劳斯贝的信。他对托尔斯泰的观点很感兴趣。1894年克劳斯贝本人前来访问托尔斯泰了。克劳斯贝是个漂亮的、衣着考究的、保养得很好的美国人，富有 Sense of humor*，谈笑风生，灵敏机智。从外表看来，他跟那些留了一大把胡子的、穿着往往不大干净的短衫的托尔斯泰主义者们是大异其趣的。大概，如果对克劳斯贝说，外表和衣着本是托尔斯泰主义必要的标志（某些“阴沉的人”正是这么想的），

* 英语：幽默感

那么，他恐怕会吃惊不小。托尔斯泰发觉克劳斯贝是个严肃的志同道合者，深入理解了自己的学说并且决心把这学说在美洲广为传播。

眼见得农民的贫困处境和缺乏土地，而另一方面，地主却拥有大量的土地，或雇用贫苦农民耕种或出租给他们，托尔斯泰不断思考着这个问题：怎样才能纠正这种不合理的现状，怎样才能提高农民的福利。“劳动者”用暴力剥夺地主的土地这种革命方法是托尔斯泰所不能接受的。钻研了亨利·乔治的体系以后，托尔斯泰便一把抓住了它，认为它是解决土地问题唯一公正和无弊病的方法。

所有土地按统一税则课税。土地越值钱（城市的商业用地，收房租的屋子占用地），收税越高。对于亲手耕种土地的农民，税金不多，他们很容易交纳。而雇用他人耕种土地之地主，则不得不拒绝拥有土地，因为他们将无力向国家缴付高额的土地税。

托尔斯泰和亨利·乔治怀着深厚的、互相尊敬的感情。在致美国记者马克—加汉的信中，托尔斯泰请他转告“亨利·乔治，感谢他写的书”，说这本书“观点明确，思想闪光，叙述很有文采，令人惊叹，”说亨利·乔治“第一个奠定了未来经济制度基础的人，”“人类将永远怀着感激和尊敬之情牢记他的姓

名”^⑥。

3月初，亨利·乔治给托尔斯泰回了一信，表示受宠若惊和敬爱之情，他问托尔斯泰在去欧洲旅行时可否到他那里去作客。对此邀请托尔斯泰欣然同意。但这次会见终于没有实现。

1897年10月24日托尔斯泰写信给妻子：

“谢辽沙昨天告诉我，亨利·乔治去世了。说来也怪，他的死使我震惊，好似一个最亲近的人死了。感到丧失一个真正的同志和朋友。今天在《彼得堡新闻》发表了他死亡的消息，但甚至没有提到他的杰出的主要著作。他由于演说，精神过度疲劳而死亡。”^⑦

1894年10月，亚历山大三世辞世。要说是托尔斯泰对沙皇怀有爱戴和尊敬的感情，那是可笑的。因为这个名字跟对托尔斯泰的信徒们的迫害分不开，沙皇夺去他们的孩子并且禁止他的作品出版。但托尔斯泰对这位君王并无象革命者心中所燃烧的那种仇恨、憎恶和报仇雪恨的感情。而托尔斯泰从小受到要忠于皇上的教育。这种情感在《战争与和平》中出色地描写过，尼古拉·罗斯托夫对亚历山大一世的感情几近五体投地。这种感情在托尔斯泰身上已经变成了对皇上怜悯的感情。按照他的观点，皇上的不

义和残暴行为使他自己深受其害。

当沙皇亚历山大三世重病时，托尔斯泰写信给契尔特科夫：“皇帝的病使我很受感动。我担心，他会死得心情沉重，衷心希望上帝保佑他，而他也会找到皈依上帝之路，虽然由于他的生活条件使他和上帝之间存在着重重的障碍。^⑧”

俄国人都激动不安：尼古拉二世登基以后俄国会发生怎样的变革呢？会不会颁布对政治犯的大赦令？镇压是不是减轻？年轻的沙皇会不会允许更多的自由？

但是，自从年轻沙皇即位之日就看得非常清楚，所期待的“自由”不会有了。

11月10日托尔斯泰在日记中写道：

“借此老沙皇去世新沙皇登基的机会疯狂和下流的勾当又来了。”^⑨

1895年1月27日，尼古拉二世向贵族发表的演说中宣称，他将捍卫专制政体的原则，象他父亲一样坚定和不屈不挠。这就说明，国家政治生活中重大的改革决不会发生。

1894年末，托尔斯泰写下了他的基本信念——表述他的信仰，象他写一切宗教哲学论文一样，写起来很费劲，不断修改、重写，时而失望，时而又全神

贯注。在做这件事时，突然，使他亲近的人，甚至可能使他本人都感到意外，一天早上，他正躺在床上，突然脑子里产生了一个新的文艺作品。“非常生动地想出了关于老板和工人的一个短篇小说。”他在9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

许多托尔斯泰的崇拜者认为，《老板和工人》是他所写的作品中最强的东西中间的一篇。这篇小说的力量就在于上帝的精神的突然觉醒，托尔斯泰相信，这种精神在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着，在那个一生只知搜刮钱财的最平凡的商人的心里也存在着。暴风雪来了，路看不清了，马站住不动了。老板、工人、马匹都冻僵了。唯有一死。在这最后一刻，商人笨重的身躯趴在工人的身体上，他用自己的体温挽救了工人免于死亡。

但是，对托尔斯泰说来，跟他的宗教哲学文章相比，跟上述他的基本信念的文章相比，短篇小说《老板和工人》简直象是个玩具——“够渺小的了”，他在12月末的一天的日记中这么说。

《老板和工人》出版以后，在马尔托夫编的文集《北方信使》中，批评家们写了一系列推崇备至的文章，但托尔斯泰的看法没有动摇。

1894年底，从奥匈帝国有个托尔斯泰的追随者

来到雅斯纳雅·波良纳，他是斯洛伐克人杜尚·彼得洛维奇·马科维茨基医师。

马科维茨基读了托尔斯泰的在国外出版的宗教哲学论文，热烈地赞同他的观点。他是个沉默寡言、谦虚谨慎的人，有一双温顺的、突出的灰色的眼睛，尖尖的淡黄色的胡子。托尔斯泰非常喜爱他和他的家庭。杜尚说俄语时念的重音令人可笑，年轻人和孩子们听了忍不住笑起来。

马科维茨基向托尔斯泰讲述了他的一个朋友希卡尔万的事，此人坚持自己的宗教信仰，拒绝服兵役。自从马科维茨基来访以后，托尔斯泰便开始和他以及他的朋友们通信了。

1895年2月初，托尔斯泰写给马科维茨基的信中道：“昨日收到您的信，亲爱的杜尚·彼得洛维奇！您告知我们共同的朋友希卡尔万的消息，我非常感动和震惊。每当我得知这类英勇的行为以后，我总是体会到一种痛苦、自豪、同情和欢乐的混合的情感……”^⑩

当托尔斯泰得知在高加索的弃绝仪式教派中间已经开始了一个强大的基督教运动的时候（那些人群众性地拒绝服兵役，遭到政府镇压），他体会到了什么样的感情，那是不难想象的。

弃绝仪式教派的首领彼得·维里根被捕了。把他解押到莫斯科，再流放到西伯利亚。托尔斯泰没有来得及与他会面，但他和比留科夫以及波波夫一道跟弃绝仪式教派的三个教徒见了面。他们三人是彼得·维里根的朋友和追随者。他们前往送别自己的首领。

他们是普通农民，不大识字，身体健康，精神和肉体方面都强壮有力。

“你们听着，古时候是怎么说的：不要杀生，谁杀生，谁就要受审判。我对你们说，每个对自己兄弟发怒的人必定要受审判。”

弃绝仪式教派就是这么坚信的，托尔斯泰也一样。对于托尔斯泰是个著名的作家这一点，他们不感兴趣。大概，这一点他们甚至还不知道。对于他们来说，托尔斯泰只不过是个跟他们一样的宣扬基督的学说的有智慧的一个老头子罢了。

① 《列·尼·托尔斯泰致夫人的书信集》，1913年版，第473页。

② 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三卷，第372页。

③ 同上，第374页。

④ 同上，第387页。

⑤ 《列·尼·托尔斯泰致夫人的书信集》，第468页。

⑥ 古谢夫：《托尔斯泰年谱》，第505页。

-
- ⑦ 《列·尼·托尔斯泰致夫人的书信集》，第 532 页。
 - ⑧ 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三卷，第 396 页。
 - ⑨ 古谢夫：《托尔斯泰年谱》，第 507 页。
 - ⑩ 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三卷，第 407 页。

第四十八章

“为 什 么？”

全家都感到压力。晚辈不再喧哗，恐惧地瞧着母亲，甚至万尼奇卡也安静下来。孩子们想离开家里。几乎见不着父亲了。他总是坐在自己的书房里，早饭一个人在里头吃，午饭前走出来，满面愁容，一言不发……玛莎皱起眉头，对母亲望也不望一眼。

争吵的起因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托尔斯泰听了契尔特科夫的请求，跟他的朋友们和媒介出版社的编辑们一道照了一张像（那是他最好的照片之一）。合影的人有契尔特科夫、比留科夫、戈尔布诺夫等人。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得知此事以后，不知为什么大发雷霆。从关紧的门里传出来索菲娅·安德列

耶夫娜强词夺理的刺耳的叫声，语气歇斯底里，托尔斯泰却压低嗓门，声音非常痛苦。照片被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撕成碎片，但直到她把这张倒霉的照像的底片消灭以后，她才放心了。不难想像，在对待朋友们的关系方面，托尔斯泰会有何感想。但是，他决心作出任何牺牲，但求避免妻子这类不成体统的、恶毒的歇斯底里大发作。

可是，这种无理取闹越来越厉害了。她那种搞不清对象的、毫无根据的忌妒心，如今变成了某种病态。当这种歇斯底里大发作之际，她便丧失了起码的自我控制的能力，她疑心别人欺凌和侮辱她，其实根本没有那么一回事。她也会毫无根据、毫无由头地顿生忌妒心。她生活热情有余，便放纵自己的头脑去胡思乱想，结果是陷进连她自己也不甚了然的感情的大浑沌之中。从而丧失了起码的精神上的平衡。她自己也非常痛苦，但又不断折磨周围的人。

最可怕的一场吵闹是因小说《老板和工人》而起。

在俄国出版的许多杂志中间，托尔斯泰最称心的是《北方信使》。这份杂志的主编是个名叫古列维奇的女人。托尔斯泰的一篇小故事《因果报应》在这个杂志上发表，他还答应把《老板和工人》给古列维

奇在《北方信使》往后某一期上发表。

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一想到她的略沃奇卡终于不写枯燥的宗教文章了，而是写某种优美的文艺作品，可他又不把这作品交给她这个做妻子的收进他的全集之中，反而交给如她所说的某个犹太女人古列维奇的手里。这使她醋劲大发，深感痛苦和屈辱，她已无力跟忌妒心作斗争了。

发生了一阵大吵大闹，她号啕痛哭。喊天叫娘之声透过了卧室薄薄的墙壁，全家都不吭一声。老媒姆和女管家冬尼奇卡吓得发抖，划着十字。男女仆人蹑手蹑脚溜进自己的小房间，生怕在伯爵夫人面前露面。

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在日记中写道：“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写了一篇绝妙的小说《老板和工人》。那个女阴谋家，半犹太女人古列维奇使出妖媚的狡猾手段，为她的杂志一贯索取到一些东西。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写东西如今不拿钱了。……”“他不把作品给我收进第十三卷，目的是不让我收入多余的钱。古列维奇又怎样？我真恨呀！我要想办法要求公众主持公道，古列维奇休想占便宜，要把她搞臭。我就这么办……”^①

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接下去自己描述了所发

生的事情：

“我首先想到她是个女人。我完全丧失了对自己的控制能力，为了不让他阻止我，我趁早从房里冲到街上，沿着巷子奔跑。他跟着我。我穿着长睡衣，他穿着长绒裤，没穿上衣，只穿坎肩。他哀求我回去，可我死了心——好歹要寻死。我号啕痛哭，记得这么叫喊道：让他们把我抓走，送到公安局里去，送到疯人院里去！略沃奇卡拖我。我倒在雪地上。我一双赤脚穿着便鞋，长睡衣下面只穿一件衬衣。我浑身湿透，看来，伤风感冒了，此刻已经病了并且心身很不正常，好比闷锁黑屋，一切都模糊不清了……”^②

第二天，同样的场面更加起劲。

“嫉妒、抱屈、怨恨的感情一齐爆发，心想他从来没有对我做过什么好事。略沃奇卡对我的爱很少，而我对他的却很多，想到此，触发了痛苦的老创伤。所有这一切一齐涌上心头，绝望得要命。”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在她的《往事》中就这么写的。“我把校样往桌上一扔，披上一件小皮袄，穿上套鞋，戴顶皮帽，从家里跑出去。很遗憾或者很不遗憾，玛莎看出我脸色不妙便紧紧跟随着我，刚开始我还没有发觉，后来才发觉了。我向圣贞女修道院走去，想去麻雀山某处林子里冻死。我记得，想到小说中华西里·

安德列耶维奇* 是冻死的，因为这篇小說发生争吵，我也要去冻死，想到这里，我很高兴。我没有什麼值得留恋了。我整个生活只是建立在一点上——对丈夫的爱，而这场賭博输了，活下去毫无意义。我不留恋儿女。总是觉得，我们爱儿女，而不是儿女爱我们，因此，我死了，他们照样过活……”^③

她想干什么？跳到莫斯科河里自尽吗？或者，虚张声势进行恫吓，想逼他满足她的要求吗？或者，这是发疯的先兆？

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的大发作没有停息。

“我的绝望还持续了两天，”她这样写，“我又想离家出走。第二天早上，我从街上叫来了一辆陌生的马车，坐上车去库尔斯克火车站。家里的儿女不知怎的正好猜到我往哪里去了。谢辽沙和玛莎又抓住了我，把我送回家。”^④

谁也不能帮助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无论是家里的人，还是看护她的医生都一筹莫展。看来，由于她更年期到了，她得暂时丧失一切身心的平衡。

托尔斯泰用什么办法才能制服她呢？唯有爱情之一法。而他把能给她的一切都给她了。可她想要的

* 托尔斯泰的小說《老板和工人》中的主人公，一位商人。他以自己的身体掩护工人，自己冻死了。

却还要多得多，可能，到底要什么，她自己也不知道。回忆起往日对她的爱情，她在《往事》中写道：“当时我哭得很厉害，他当即走进房里来，一鞠躬到地，跪下来，向我发誓并请求我饶恕他。倘若当时他心里的爱情还剩有一星半点，还长期残留着，那么，我可能依然是幸福的了。”

托尔斯泰在2月7日的信中写道：“上帝呀！帮助我吧！别让我离开你。请别忘记，我是谁，我是什么，我为什么活着。做做好事吧！……”^⑤

他脑子里常常冒出离家出走的念头，但他认为自己无权这么做。

他同意履行妻子力争的那件事，即把《老板和工人》送交《北方信使》的同时，又把这个作品交给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收进全集第十三卷出版，同样，也把这作品交给媒介出版社。这以后，他在2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

“上帝救我，用一个办法救我，即虽微弱但却在我心中萌生对我作恶人的爱，这即唯一的爱。只要这种爱萌生，开初即征服了我，使我燃烧，继而征服我亲近的人，一切便会过去，即是说，痛苦便过去了。——以后几天还要坏。她无疑已经近乎发疯和想自杀了。儿女们步步紧跟她，坐车追随她，终于把

她带回家中。她极端痛苦。是毫无根据的疯狂的忌妒心这个魔鬼在作祟。我得再爱她，我理解她的动机，不是说饶恕她，而是说要做到无需饶恕。”^⑥

托尔斯泰这期间记录下来的一些想法，无疑是由于他夫人的状况所致。他写道：“疯狂——这就是自私自利……那些已经丧失了为别人服务的这种需要的人，便是个人主义的疯狂……这类疯人不计其数……”^⑦

大人们以为孩子们什么也不知道，这种想法落空了。托尔斯泰家的孩子们即使不知道所发生的事情的详情，但却还是深深感到家里已经很和谐了。

不管媵姆如何把房门关紧，也不管她如何守护万尼奇卡使他安静，透过隔开儿童室和父母的卧室的木板壁，声音还是传了过来——一切都听到了。“上帝慈悲，救救我们这些罪人吧！”老媵姆喃喃地说，停下手中的袜子不织。“天呀！你看，会把万尼奇卡吵醒的。”

萨莎回避母亲，亲近媵姆，因为媵姆心里一切都明白，不象那个外国的家庭女教师。而万尼奇卡大胆地走到母亲跟前，跟她亲热。“妈妈，你病了吗？”他问。他伸出又白又瘦的小手摸她的头，把她尚未斑白的黑头发分做两边。

他安慰她，盯着她的眼睛，仿佛想弄明白，他这么做是不是安慰了她。而万尼奇卡的眼睛完全象父亲的眼睛，能看出并理解许多东西，比这个小孩用言语所能表达的东西要多得多。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小东西在全家的生活中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他常常开导大人，虽不愿这么做，但不加思考，出自本能，按照某种贯注于他心中的善的意识行事。

当母亲把雅斯纳雅·波良纳周围的地方指给他看，对他说：“你看，万尼亚！这些都是属于你的。”万尼奇卡皱起眉头说：“不需要，妈妈！这些都是大家的。”

看到好事，万尼奇卡就高兴，每当任何坏事一露头，他便痛哭和伤心。“妈妈！为什么嬷嬷生气了？”他眼泪汪汪地问，“为什么？告诉我。”当强壮有劲的捣蛋鬼米沙揍了萨莎几拳的时候，万尼奇卡便对米沙大叫：“不要打萨莎！”当妈妈斥责男仆或使女的时候，他便问：“你为什么骂他？”。人们本当友好地、愉快地相处，为什么他们心怀敌意，破坏自己的生活？

很显然，父亲对万尼奇卡怀着特殊的感情，虽然这种感情不常表露。他怀着恐惧的心情注视着围绕这个小孩的那些不正常不健康的生活条件。

“萨莎象往常一样，纯朴而热心。万尼奇卡，看

起来，特别逗人喜爱，因为你对他特别操心。他的身体很健康。给他吃黄瓜、苹果、蘑菇，这个问题我倒主张要小心……”^⑧列·尼写给妻子的信中这么说。

万尼奇卡常常害病。给他吃的奎宁和其他药物太多，不起作用，他依然瘦弱，苍白，总不见好。虽然如此，万尼奇卡倒是个真正的好孩子，快快活活，热爱生活，喜欢开玩笑，自己也懂得玩笑的意思，一个劲爱玩。当万尼奇卡和萨莎跟着父亲在雅斯纳雅·波良纳留下来的时候，万尼亚写了一信给妈妈，他口授，别人代笔：

“亲爱的妈妈！萨莎生了病，现在又好了。今天我跟塔妮娅想去柯兹洛夫卡村。但天气很冷，因此爸爸和嬷嬷不让我们去，萨莎想做一件礼物送给你，但她怕来不及了。鲁滨逊我们已经读完了，等你回来再从读一遍，如果你还记得，那就从最有趣味的地方读起。我们读完了鲁滨逊和另一本小书，又开始读格兰特船长了。有一页非常有趣，就是关于红色的狼那一段。我害怕。此刻爸爸到柯兹洛夫卡村去了，我这就来写信给你。我刚才跑来叫醒塔妮娅去柯兹洛夫卡村，我把手指头打湿给她脸上溅水，她就醒了。再见！亲爱的妈妈！我等着赶快去莫斯科。吻安德留沙、米沙、略瓦和所有在那里的人。我拥抱你。万尼亚

(万尼奇卡打手印)。”^⑨

除开年长的女儿们跟父亲留下来以外，其他的儿女都去莫斯科。托尔斯泰给他们写信，对每个人谈此人最感兴趣的事情：给萨莎的信中谈她的女友、厨师的女儿瓦尔卡，给男孩子们的信中则告诉他们一群马和狗的情况，给万尼奇卡的信特别严肃和写得长。

“我在楼下抓了三只大耗子，有一只夹紧尾巴，那尾巴比你的细手指头还要细。米沙和纳嘉·伊万诺夫娜拿去把它们放了。耗子很害怕，在库兹明斯基家里把它们放了，它们反而爬上板凳，吱吱地叫。而我把抓的那几只放了，它们跳到一俄尺高，一下子藏到树下面去了。玛丽娅·亚力山人罗夫娜在高加索也放过耗子，一个德国人告诉她，说是只要一放走它们，那它们就会比玛丽娅·亚力山大罗夫娜还要先到家。这是不对的。我看着它们跑，它们就躲在花园里。塔妮娅昨天告诉我，说是从奥夫西亚尼可沃村运来了一头公羊，因为所有的人都想吃肉，于是给斯达汉诺维奇、纳嘉·伊凡诺夫娜运来了一头公羊，并把它宰了。这个原则……”^⑩

万尼奇卡知道，爸爸有个原则，即认为杀动物和吃肉是犯罪。看来，万尼奇卡自己倒是要吃肉的，家

里人给他吃得太多，要他拼命地吃。父亲毫不怀疑，这一切他都会理解，对耗子也会可怜的。

万尼奇卡发冷发热，病了好几个月。仲冬退烧了，开始复原。谁也没料到会发生什么事情。谁也没想过，谁也不相信。通常总是那样，不幸的事情突如其来。

万尼奇卡病了。发高烧到四十一度。他还继续想着别的事。“没有什么，妈妈！别着急，总会好的。”当他意识清醒的短暂时刻他这么对母亲说。“嬷嬷！别哭。干吗要哭呢？”

儿科医生费拉托夫确诊是急性猩红热，无法挽救了。过了一天半万尼奇卡死了。

小棺材就放在那个如今业已毫无生气的育儿室里，风信子的香气扑鼻。整个屋子里都弥漫了凭什么也填补不了的可怕的空虚之感。大人小孩都不由得相依为命，力图填补这个空虚。在这庄严、圣洁和伟大的死亡面前，一切不和、一切怨恨、一切误会都烟消云散。每个人在心灵深处都努力不去考虑自己的苦处而关心别人。玛莎强忍痛哭，移动着轻轻的、几乎听不见的脚步在房子里走动。她照料母亲和父亲，首先发觉萨莎有病。萨莎发烧和喉痛，看来，也患了轻微的猩红热。孩子们努力表现好，规规矩矩坐在家

里学习。全家人的（主要是父亲的）爱戴、温情和关怀都集中到母亲身上。父亲一贯沉着，外表很安详，心里的悲恸不向任何人表露。但是，真分辨不清，什么更使孩子们揪心，是父亲默默无言的眼泪和某种既不象咳嗽、又不象叹气的发自胸腔的声音呢？还是母亲日夜不停的放声的嗥啕、叫喊和哭诉呢？

“为什么呢？”她大叫，拿脑袋碰墙壁，揪自己的头发，或者嗥啕大哭，从这个屋角跑到那个屋角。“为什么把他从我身边夺走？”过一会，又喊：“不对！他还活着！好！你们说说，为什么不作声！他并没有死，是吗？把他交给我！你们这些冷酷无情的人，为什么不作声？哦？哦！你们说：‘上帝慈悲’！为什么这慈悲的上帝把他从我手里夺走？为什么呢？！”

但是，别人怎么知道这个“为什么”呢？只有父亲知道。他知道，这个小孩，这个酷似他本人的小孩的生和死给周围世界，给一家人带来的是“爱”。

人们在悲恸的时刻常常跟自己曾经亲近的老朋友分担着悲哀。托尔斯泰知道，“姑奶奶”会理解一切的。

他写信给“姑奶奶”说：“最近这些日子里索尼娅跟孩子们以及跟经常严肃动人地作祷告的萨莎一道持斋和读圣经。可怜的索尼娅为小儿子的死伤透

了心。但我想，这也好。今日她要领圣餐，但索尼娅不能，因为她病了。昨天她到了一个非常聪明的神父瓦连金那里（妹妹玛申卡的导师），向他作了忏悔。他说得很好，告诉索尼娅，凡是丧失了儿子的母亲开初总是向上帝祈祷，过了一段时间又为日常生活而操劳，于是再度远离上帝，他劝她要防止这点。看来，这种情况并未发生。”

他在同一封信中写道：“每一个人的一生唯一的任务就在于使得自己心头的爱得以增长，增长爱的同时，用它来感染别人，使得他人心头的爱也得以增长。而现在，当生活本身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这小孩生活过又没有活到常人寿命的十分之一的时候就死了呢？且不考虑小孩们，得出的对于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的这个回答，既不适用于他的夭折，也不适用于我们大家周围所发生的情况，我却确认了这个回答的正义性。他活着，为了增长自己心头的爱，为了在爱中成长，因为派遣他来到人间的上帝需要这样，他回到爱的化身上帝那里去的时候，却在我们心头留下了他心灵深处全部成长了的爱，用这种爱使我们团结起来。我们全体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互相亲近，无论是在索尼娅身上，还是在我心里，我还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感到对爱的如此的需要以及对任何

分离和恶的厌恶。我还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爱过索妮娅。因此，我感到很好。”^①3月12日日记中表达了同样的思想：“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死亡悬在我们头顶上，威胁着我们并且可能使我们分离以及剥夺我们的爱；或者并无死亡，只有我们大家身上引起的一连串的变化（其中最明显的变化是死亡），而这些变化必然降临到我们头上，各各不同的组合，有的在前，有的居后，象波浪似的后浪推前浪。

“小孩的天折，从通常的观点看来，便是：大自然赏赐予人世以优秀的人物，但看到世界还没有为他们准备好，便把他收回去。但为了向前进，这种尝试是必须的。正如飞来太早的燕子，冻死了。但它们还是应当飞来。万尼奇卡正是这样。

“可是，这都是客观主义的，傻瓜式的议论。理性的看法便是：他做的事正是上帝的事业，天国的建立有赖于爱的增大，这小孩的贡献比许多活了五十岁或更长时间的人要多得多。”^②

① 《索·安·托尔斯泰娅日记（189—1897）》，沙巴希尼可夫兄弟出版社，第二部，第104页。

② 同上，107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

-
- ⑤ 同上，第 236 页。
 - ⑥ 同上。
 - ⑦ 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三卷，第 405 页。
 - ⑧ 《列·尼·托尔斯泰致夫人书信集》，第 474 页。
 - ⑨ 同上，第 479 页。
 - ⑩ 同上，第 483 页。
 - ⑪ 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三卷，第 413 页。
 - ⑫ 同上，第 411 页。

第四十九章

迫 害

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在她的日记中作了如下的记述：“因丧子而悲恸的做父母的我俩回到人去楼空的家里，我记得，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在楼下的饭厅里的沙发上坐下，哭了起来，说道：

“‘我想，万尼奇卡是在我死后将继续我人世间事业的儿子中的一个。’

“另一次，他也说了类似的话。

“‘我想象，万尼奇卡在我死之后将继续上帝的事业。怎么办？’”^①

她写信给妹妹说：

“略沃奇卡的背完全驼了，老了，面带愁容，一

双眼睛明亮，看得出，对他来说，老年最后一道光芒已经熄灭了。万尼奇卡死后第三天他呆坐着，哭着说：“平生第一回我感到没有出路了。”

但是，亲人里没有一个人有丝毫的怀疑：不论父亲的痛苦如何，他会担在自己身上，当作上帝降下来的一次新的考验。大家倒是为母亲担心。她能把这次丧子当成上帝的十字架承受下来吗？她能平静下来吗？她能找到再活下去的意义吗？她是否发现她那个已经飞向永恒的小儿子有些不自觉地吸引她前去的精神世界呢？

早春时节，托尔斯泰象往常一样没有去雅斯纳雅·波良纳。而是伴随妻子留在莫斯科，试图努力工作以减轻痛苦。而工作总是多得他无法完成。他经常说：“要是有多三次生命那就好了。”1895年3月12日他在日记中说，他“想写艺术作品——把已经开了头的和已经构思好了的写完：1. 《柯尼的故事》（即《复活》），2. 《谁有理》，3. 《谢尔盖神父》，4. 《地狱里的魔鬼》（《重建地狱》），5. 《票据》（《假票据》），6. 《母亲的笔记》，7. 《亚历山大一世》（《费多尔·库兹米奇老人身后的笔记》），8. 一个剧本（《光在黑暗中发亮》），9. 《移民和巴什基尔人》”^②。

1895年整个春天托尔斯泰努力写作《复活》，7

月1日前完成初稿。“《柯尼的故事》（《复活》）的草稿已经完成了。”7月4日他在日记中作了记载^③

鉴于妻子的精神状态，托尔斯泰比任何时候都更少考虑改变自己生活的外部条件的问题，他继续在那条件下生活，它们还是压郁着他。他不能够不想到这点，寻找着出路。这类想法他以遗嘱的形式表达得很清楚。这份遗嘱他于1895年3月27日写在日记中。玛莎当即抄写一份自己保存了。这遗嘱只是在1901年7月23日才签署。

下面引证这个遗嘱的几个要点^④：

“……将我埋在我死去的地方，做最便宜的坟墓，如果死在城里，用最便宜的棺材，要象埋葬叫化子那样。不要放鲜花和花圈，不要发表演说。如若可能，不请神父，不做安魂祈祷。但是，倘若这么做使主持丧事的人不愉快，那么，就按常规做安魂祈祷好了，不过要尽可能一切从简和节省……”

“我的所有文稿都交给我妻、契尔特科夫、弗拉基米尔、格里戈罗维奇、斯特拉霍夫以及我女儿塔妮娅和玛莎审阅和整理……我免除儿子们承担这一责任，并非因为我不爱他们（感谢上帝！我近来越来越爱他们了），也深信他们也爱我，但他们不完全理解我的思想，没有注视我的思想的发展进程……我请

求把我过单身汉生活时的日记消灭掉，这并非因为我想向人隐瞒我的卑劣的生活——我的生活是丧失原则的年轻人所过的通常的糟糕的生活，而是因为，这些只记载意识到犯罪而受折磨的事实的日记会产生虚假的片面的印象并且提供……此外，其他日记均照原样保留下来。从这些日记中至少可以看出，虽说我年轻时代非常卑劣和糟糕，但我终究没有被上帝所抛弃，待到老年，已稍许理解和爱戴上帝了……其他文稿，我请求整理它们的人不全拿去发表，只发表那些对人们有益的东西。

“我以往文章的出版权如下：我请求我的继承者将我的十卷集和识字课本献给社会，即放弃作者的版权。这一点我只请求这么办，决不作为遗嘱非办不可。能这么办当然好。对你们也很好。如果不这么办，那是你们的事情，那就说明，你们对此还缺乏精神准备。近十年来我的著作的出卖这件事，是生活中对我沉重的负担。

“还有一个主要之点，请求一切人，包括我的亲近的人和陌生的人，不要吹捧我（我知道会这么做，因为我在生之日他们已经以最不好的方式这么做过了），如果他们想整理我的著作，那么，请研究那些我深知上帝之力通过我而立言之处，并且请为了自

己的生活而利用它们。我曾有过一些时候感到自己是上帝意志的宣扬者。我常常并非那么圣洁，常常有五情六欲充满心头，因而真理之光往往被我的黑暗所掩蔽，但是，这真理终究照彻我的心灵，那便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上帝开恩，别让通过我立言而糟踏了真理，虽则人们通过我而获悉的性格渺小而不洁，但愿他们接受那些真理。我的作品的意义仅仅在此。因此，只能因我的作品而责骂我，无论如何不应吹捧我。

“遗嘱就这些，完。列夫·托尔斯泰”

6月初托尔斯泰家的人回到雅斯纳雅·波良纳。库兹明斯基一家人如今已不来消夏而暂住侧屋里了。两个以往友好相处的家庭之间，如今有了阴影。起因是由于库兹明斯基家的大儿子米沙，他是个无原则的荒淫的年轻人。托尔斯泰家的成年的儿子们，尤其是略瓦，生怕米沙对托尔斯泰家的小兄弟（安德留沙和米沙）产生坏的影响。如今，在所谓“库兹明斯基房子”——侧屋里住下了莫斯科音乐学院教授、钢琴家兼作曲家达涅耶夫。

这年夏天契尔特科夫带着妻子和小儿子季马住在离雅斯纳雅·波良纳四俄里的小屋子里。这房子是托尔斯泰为他们找的。两位朋友几乎天天见面，对

托尔斯泰来说，跟这位朋友亲近是很大的快乐。契尔特科夫每天注视着托尔斯泰写了什么，帮他抄写，代他写某些回信，完全进入他的生活之中。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和全家，甚至包括两个大儿子给了契尔特科夫应有的礼遇，看到父亲跟他友好相处心里高兴，但对他本人并不太喜欢。显然，其原因盖出于契尔特科夫的专横，他似乎掌握了托尔斯泰的所有思想和著作，按照契尔特科夫自己的方式进行解释，仿佛那就是他自己的私有财产似的。

8月初，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第一次访问了托尔斯泰，其时他正在写作他的《海鸥》。两位作家一见如故，互相怀着好感，两人在一起都感到轻松自如。“他才气横溢，心肠也好，但至今还没有明确的观点。”^⑤托尔斯泰写给在瑞典的儿子列夫的信中这么说。

达涅耶夫在8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谈到契诃夫，极力赞扬这位作家。‘如果能把契诃夫和迦尔询合而为一，那么会产生一个很大的作家。’列·尼说，‘契诃夫缺乏迦尔询所具有的东西。迦尔询永远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契诃夫却并不都知道自己想要什么。’”^⑥

看起来，契诃夫也对这次跟托尔斯泰的会见很

满意。

“我在托尔斯泰那里住了一天半，”契诃夫给苏沃林的信中说，“印象非常奇妙。我觉得象在家里一样轻松自如，我跟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谈话是非常轻松愉快的。”……往后，在下一封信中他又说：“托尔斯泰的女儿们非常令人喜爱。她们热爱父亲，狂热地信奉他。这说明，托尔斯泰具有伟大的道德力量，因为，倘若他不真诚和不是无可指责，那么，女儿首先就会对他持怀疑的态度，要知道女儿是一群麻雀：谷壳子骗不了她们……对未婚妻和情妇可以随便蒙骗，在热恋的女人的眼睛里，一头驴子甚至可以变成一位哲学家，但女儿却是另外一回事了。”^⑦

外国人时时不断前来拜访托尔斯泰：来了英国语言学家玛尔夏·布阿艾，此人非常聪明，是个出色的交谈者，托尔斯泰跟他保持了多年的友谊。

但是，不论来访的某些客人如何有趣和令人愉快，家里客人长年不断可终究是个负担。托尔斯泰家里人失去家庭生活。不论在进餐的时候，还是晚上在餐厅里，在吊灯的宽灯罩下面围坐圆桌旁的时候，不能只是全家人团聚随便聊天：谁在读什么书，谁在恋爱，谁怎么度过一天，谁买了什么新东西，一言以蔽之：托尔斯泰一家人丧失了通常每个家庭所珍视的

东西——即个人生活。他们在众目睽睽之下生活，好比罩上了一个玻璃罩子。围绕托尔斯泰的许多人记下了一切：他每天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托尔斯泰怀着几乎是少年似的进取心和对周围一切事物的浓厚的兴趣学骑自行车。这使他得到巨大的满足，但是……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却引起了纷纷议论。“托尔斯泰居然学骑自行车了！这么做合适吗？这是不是跟基督教学说矛盾？”契尔特科夫为此深感不安。

姑姑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托尔斯泰娅对这一切都非常理解。她具有博大的胸怀、敏感的心灵和热爱生活情操，正如她哥哥一样。这年夏季她从沙莫尔金诺修道院寂静的僧房来到这个她陌生的环境，置身于各色各样的复杂人群之中，可真不容易啊！要服从背离正教教会的哥哥的观点，更跟围绕着他和他一样背离正教的人们相处，在她的确是不容易的。但是，兄妹之间存在着另一种东西：什么也代替不了的手足之情以及两人虽则道路不同却都有对人生的意义的深刻理解。兄妹回避谈论观点的分歧。她知道，哥哥因小儿子夭折而深感悲恸，但这一点他们根本不谈，不提一字就互相了解。哥哥希望妹妹支持痛苦中的索尼娅，帮助她通过教会和信仰正教寻找安慰。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喜爱“玛申卡”（她就这

么称呼小姑)，而玛申卡小心翼翼地、怀着深切的同情对待她。外人看到在托尔斯泰家的环境里来了这么一个修女，大概会感到很奇怪。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全身穿着黑衣裳，包着黑头巾，遮住她宽阔的、聪明的前额的一半，指甲修剪干净的长长的手指不断掐拨着手持的念珠——很象她哥哥的手指，那是出家人的手相。她持斋极严，在自己房间里作长时间的祈祷。但在她身上丝毫没有修女道貌岸然的严肃的影子。她对一切都兴致勃勃，听音乐全神贯注，这方面她是个行家，钢琴弹得很出色。她热爱大自然和鲜花，懂得开玩笑和微妙的幽默。每当姑姑生气勃勃的棕色眼睛激奋地闪烁，牙齿脱落的嘴抿起来，现出狡猾会心的微笑，一语破的或者开个极其机智的玩笑的时候，大伙儿全都惊喜欲狂。

这个夏天托尔斯泰的平静生活被一个消息破坏了，大家为此深感不安。托尔斯泰的志同道合者席尔可夫公爵，原被流放到高加索，这时写给托尔斯泰一封信，其中谈到弃绝仪式教派群众性的宗教运动，谈到他们拒绝服兵役，引起政府的镇压。席尔可夫寄来一篇文章，请托尔斯泰照文章原有口吻在报章上发表，文章的内容托尔斯泰不大相信，因此他决定派波夏·比留科夫去高加索，以便核对事实和了解详情。

当时对弃绝仪式教派了解得很少，虽说它从十八世纪中叶就存在了。对他们的迫害从 1792 年开始，当时抓了就流放到西伯利亚，但到了十九世纪初亚历山大一世在位时期，则把他们迁居到高加索。叶卡杰林诺斯拉夫省的省长的论据是非常有意思的，他给彼得堡写了一份报告，其中宣称：“凡是受反偶像崇拜宣传的毒害之人不应得到人的待遇，因为该异端邪说特别危险，对盲从者具有蛊惑作用，其缘盖出于弃绝仪式教派中人的生活方式确系建立在最圣洁的原则基础之上，建立在关心天下人的普遍幸福基础之上，他们妄想多做好事以拯救灵魂。”^⑧

弃绝仪式教派学说的最主要的教义在于恪守与服从圣灵和真理。任何外表仪式，为拯救灵魂毫无必要，因而一概被弃绝^⑨。

他们确认三位一体的上帝是唯一不可知之神。他们相信，我们凭借思念可以接近圣父，凭借理智可以接近圣子，凭借意志可以接近圣灵。同理，神的第一殊相是我们的圣父（代表光明），第二殊相是我们的圣子（代表生活），第三殊相是我们的圣灵（代表宁静）。

独立存在的三位一体在自然中之表现，圣父代表高，圣子代表宽，圣灵代表深。这个界说在道德上

也有其意义：圣父仰之弥高，谁也不能在他之上；圣子因其理智无比宽广；圣灵无比深奥，谁也不能穷其究竟。

弃绝仪式教派认为，七重天表示圣经中的七种善行：

一重天表示温驯，二重天表示理解，三重天表示节制，四重天表示孝悌，五重天表示仁慈，六重天表示贤达，七重天表示博爱，上帝居于七重天之中。

与此相适应，圣经中的十二美德由十二个朋友加以体现。这十二朋友是：

1. 真理——救人于死亡。
2. 纯洁——引导人皈依上帝。
3. 爱——何处有爱，该处即有上帝。
4. 劳作——给人躯体以荣誉，给人灵魂救助。
5. 服从——通往得救之捷径。
6. 宽恕——灵魂得救无阻挡。
7. 推论——一切美德所不及。
8. 慈悲——为人慈悲，撒旦亦为之战栗。
9. 服众——我主基督本人之事业。
10. 斋戒祈祷——使人与上帝亲近。
11. 忏悔——世无法典与戒律在其上者。
12. 感恩——上帝及其诸天使为之快乐。

弃绝仪式教派不承认有高于上帝及其法律之上者。倘若政府命令他们去做与上帝的法律相抵触的事情，他们则拒绝服从。基督教导我们：“古时有言，你们听取：不要杀生，谁要杀生，将受审判。我告知你们，任何人，凡无故向兄弟发怒者，必要审判。”弃绝仪式教派中的人服兵役时拒绝杀人或拒绝学习杀人。

高加索自古以来就有佩带武器（短刀和长枪）的习惯，那是为了防御尚武民族、强盗和猛兽的袭击之用的。弃绝仪式教派坚信，任何杀戮都有罪，他们便吃素，并且认为，他们不需要武器。伊丽莎白堡省的卡尔斯克区和梯弗里斯省亚哈系卡拉克县为弃绝仪式教派主要的移民区，在那儿，他们把自己的武器收集到一起，堆成一大堆，放一把火，烧了两天，金属溶化了，他们在火堆旁高唱赞美诗。接着发生了一连串拒绝服兵役的事件。

关于发生的事件，他们的邻人向当局作了夸大失实的报告。政府认定那是暴动，便派哥萨克去“讨平”弃绝仪式派教徒。他们惨遭马鞭毒打，四个人被打死，将近两百人被捕并投入监狱，财产被抢光，土地被霸占，将近四千人被发配到亚美尼亚和格鲁吉的偏远山村。

这些事件震撼了托尔斯泰。唯有对上帝的深刻的信仰才能使这些人坚忍不拔，接受如许的考验。在弃绝仪式教派的运动中，托尔斯泰看到了真正的基督教在俄国人民中的复兴。另一方面，他深深地被激怒，在十九世纪末的所谓文明的世界里居然发生了如此残酷的事情，那些人只不过因为想要顺从基督的教导并力图按基督的启示的良心而生活，却居然犯了罪。

比留科夫在他的书《弃绝仪式教派信徒》中叙述了马特维·列别捷夫的兄弟费多尔·列别捷夫的故事。此人是拒绝服兵役的第一批人中间的一个，他受到了严厉的惩罚。这个行为提供了关于弃绝仪式教派坚定信念的鲜明的例证。

“弃绝仪式教派移民村罗吉诺夫卡押来一名囚犯（以一村接一村传递的办法押送过去）。轮到费多尔·列别捷夫押送囚犯了（即伊丽莎白堡拒绝服兵役的马特维的亲兄弟）。

“费多尔·列别捷夫向村长宣布，他不能解押囚犯，因为他不能对囚犯使用任何暴力，所以他将无能为力。他请村长就这么报告长官。村长回答：‘那是你的事情。我不会出卖你。我把犯人带进你的院子里就得了，随便你拿他怎么办。’

“费多尔·列别捷夫回到家，在自己小屋里落座，这时，村长果然把犯人带进了他的屋子里，交给他就走了。费多尔·列别捷夫象对待香客一样招待那一犯人；让他暖和身子，让他吃饱喝足，安顿他睡觉。第二天早上，他发觉那犯人却原来是个穷苦人，便给了他一卢布五十戈比，带他离开村子。当他们走到村子外面，他指着两条路：一条是挨村解押他去服刑的道路，另一条是自由之路。两条路随犯人自己走。犯人走上了第一条路，后来到达了服刑的地点。这件事没有产生坏的结果。”^⑩

当然，要在俄国报刊上登载有关镇压弃绝仪式教派的消息是不可能的。比留科夫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对俄国基督徒的迫害》，此文刊登在伦敦的《泰晤士报》上，由托尔斯泰校阅并写了前言，这篇文章以手抄本形式在俄国广为流传。关于对弃绝仪式教派的迫害，大家议论纷纷。美国和英国的战栗派教徒很关心弃绝仪式教派徒的命运。政府不公平地把一切弃绝仪式教派的运动归咎于托尔斯泰。在当局的心目中，托尔斯泰的活动变得越来越危险了。据说，巴别达诺斯采夫得知《泰晤士报》上刊登的文章以后，勃然大怒。托尔斯泰的许多朋友，其中包括比留科夫，遭到了警察的监视。象每次托尔斯泰的信徒遭

到压迫时一样，托尔斯泰身上产生两种感情：一是欢乐。“象分娩时的痛苦那样令人高兴，因为终究快到头了”（1895年11月5日的日记中他这么说）^⑪，指的是人的精神的复兴；第二种感情则是痛心，因为他自己被剥夺了这种受苦的权利。“有时恨不得故意用某种方式招来迫害。”1895年3月12日，他写给席尔可夫的信中这么说^⑫。

当时只因为阅读或传递托尔斯泰写的遭禁的小册子就被投入监狱。1896年4月，在发生了一系列新的逮捕事件以后，托尔斯泰忍不住了，便向司法部长和内政部长写了一封信，请求把对他的信徒们的迫害转移到他自己身上：

“……倘若当局定然要有所动作，想惩罚、恫吓和取缔那称之为恶的事物，那么，它能够做的最不愚蠢和最不非义之事就在于将一切惩罚、恫吓和取缔的措施集中于反对为政府所确认的恶的根源，亦即反对我本人，尤其因为，我事先宣布，我将继续做那些政府所确认为恶的事情，做那些我本人确认在上帝面前具有神圣职责的事情，有生之日，决不罢手。”^⑬

托尔斯泰的影响不但在俄国扩散开来，而且远及国外。时而在这一国，时而在另一国出现坚信托尔

斯泰学说的人。在荷兰、英国、美国、德国，甚至在日本都有。在奥匈帝国，马科维茨基有个朋友，斯洛伐克人施卡尔万，他是最真诚的和道德最纯洁的人之一，因拒绝服兵役而受苦，他写了一些笔记抒发自己的苦闷，笔记寄给了托尔斯泰。

英国人肯特沃尔基前来拜访托尔斯泰，他是几本论基督教的著作的作者，他组织了一个基督教公社“兄弟教会”，出版过《四福音书正义与译文》。

在美国有艾尔内斯特·克劳斯贝在传扬托尔斯泰的学说。美国真正的基督教有各种不同的解说，正如在欧洲所有国家里一样，正如一切宗教一样——堕落了，只剩下一个外壳而毫无内容。而敢于唤醒沉溺于资产阶级灰色的物质欲望中的良知的人们，则倡导基督徒的思想和生活方式，这批人反倒无法安身甚至为社会所敌视。克劳斯贝写信给托尔斯泰，请求支持他。托尔斯泰于1895年12月底回他一封很长的信，这封信实际上是一篇完整的论文，其中阐述了托尔斯泰所理解的基督的学说，宣扬了不以暴力抵抗邪恶的理论。

托尔斯泰写道：“遵守某个道德规则还是背离它，两者究竟哪种更道德，这一点难以确定。要反对它而不陷入两难的境地的道德原则是不会有。不

以暴力抵抗邪恶的问题属于同样的情形。人们知道，暴力是恶，但是，他们又很想依靠暴力继续生活下去，以致他们把自己心智的一切力量不用于阐明那个过去和现在都承认人有对别人施加暴力的权利的情况叫做恶，相反，他们把自己心智的一切力量用于维护这种权利。”^①

曾经有个一种错误的看法，即认为托尔斯泰对旁人施加道德上的压力，劝人这样或那样生活：把财产分给乞丐，不娶亲不嫁人，不吃肉，不服兵役等。许多人讥笑托尔斯泰的观点，说什么托尔斯泰教导人们“勿抗恶”，故意回避“暴力”一词，这样就根本歪曲他的学说的含义。

实际上，托尔斯泰研究人的心理细致入微，凭经验他就知道，一个人要达到精神发展每一新的境界是多么的困难。他担心人们，尤其是年轻人自不量力，采取过分狂热的行动以图一下子超越某些发展阶段，结果会掉下来，一跤摔痛。托尔斯泰则劝阻他们。

托尔斯泰的一个信徒从荷兰来信，问他一个问题：应如何劝导一个应征服兵役的青年。

托尔斯泰回他一封长信，其中说：“我发觉宣传某些行为或劝阻某些行为是无益的甚至往往是有害

的，例如拒绝服兵役等等。应当使人的行为的发生不是由于希望遵循众所周知的某些法则，而是由于找不到另一种做法的可能性。因此，如果我处在您目前面对这个年轻人时的地位，我总是建议去做要求他们所做的一切事情——去当兵，服役，宣誓等等——只要他们在道德上是可能的就行；他们那么做在道德上没有变成不可能的事情之前（好比举起一座山或飞起来那样办不到），什么也不要劝阻。我总是对他们这么说：如果你们想拒绝服兵役并准备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那么，请你们努力达到那种坚信和明确的认识程度，以便使宣誓和动武成为办不到，好似掐死婴儿或类似的行为那样办不到。但是，这点对你们如果是可能的，那你们就做吧，因为多一名士兵总比多一个伪君子或背叛学说的人要好些，因为事情的发生超乎参与其事者本人的力量。”^⑮

在绘画和雕塑学校里，塔妮娅跟一个可爱的、有才气的年轻人相识了，他叫苏列尔日茨基——他的同学就叫他苏列尔。大伙儿都喜欢他，他到哪里，就给哪里带来欢乐。看起来，苏列尔才气过多，弄得他自己也不知道拿了这么多才气怎么办。他是画家，又会演戏，谈笑风生，有着嘹亮的男高音的好嗓子，唱小俄罗斯和茨冈民歌很出色。苏列尔和他周围的人

都很愉快，因为大家都爱他，他也爱大家。

苏列尔要应征服兵役，但他拒绝了，便被投入监狱。他所有的朋友，其中包括托尔斯泰，为他的这一行动担心，这倒不是没有根据的。在狱中苏列尔精神完全达到失常的状态，长官便把他转移到莫斯科军医院考验他。托尔斯泰去会见了，劝他穿上军装。苏列尔同意服兵役，参加海军并远航去了的时候，无论是托尔斯泰，还是契尔特科夫和他的朋友中任何一个人都没有责备他胆小，反而特别亲切和小心地对待他。托尔斯泰写信给苏列尔：“请您继续快活地生活下去，跟周围的人平静地正直地相处——一切都会好的。”这封信还有一个附笔：“在您经历这一番痛苦之后，我更加无比地爱您了。”

12月，托尔斯泰打算写一个新剧本——《光在黑暗里头发亮》。他一动手写这个戏就全神贯注，晚上做梦也念叨着它，草稿几乎打好。但这个戏不中用，他便扔开它，没完成。戏里头有过多具有成见的、个人的、自己的东西——试图阐明自己的观点，有一部分牵涉到自己个人家庭的冲突，因而不成功。

很可能，由于《黑暗的势力》成功的结果，托尔斯泰脑子里便产生了再写一个戏的念头。《黑暗的势力》由尼古拉二世开禁上演，托尔斯泰便再次相信，

戏剧形式的创作可以产生很强烈的影响。

第一个上演《黑暗的势力》的是莫斯科“优伶”人民剧院。1895年11月和12月，这个戏在两个帝国剧院上演：彼得堡的亚历山大剧院和莫斯科的小剧院。两个戏院的导演、舞台美术家和服装技师对待自己的任务是极其认真的。他们来到雅斯纳雅·波良纳，画了茅屋的草图，购置了乡下娘们穿的衣裳，照了像并学习了民间口语的正确发音。

上演《黑暗的势力》的所有剧院都获得巨大的成功。11月29日，在小剧院演完戏以后，一群大学生集合到织匠街住宅的院子里。当时托尔斯泰不在家，稍后他正好从外面回来。大学生们跟着他走进前厅。一个大学生跳到椅子上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感谢托尔斯泰写了《黑暗的势力》。他们对托尔斯泰暴风雨般地欢呼，吻他的手，以此表达自己的狂喜。如若可能，托尔斯泰真的会逃跑。因为这种狂热和欢呼他受不了。他激动到了那种程度，以致开初几分钟他说不出一句话来。

那时在大学生中间正流行着反政府的不可遏止的风潮，他们游行集会。他们把托尔斯泰不但当成著名的作家，也当做革命家。可能，这是使托尔斯泰对那些狂热的表示和欢呼感到心情沉重的一个原因

吧！革命青年把托尔斯泰当成自己的同盟者，当成反对他们所憎恨的压迫劳动人民的沙皇政府的一名战士。和平的道路，对上帝的信仰，使人类逐步完善，不服从暴力（象弃绝仪式教派之所为）——这些，人们故意忽略了，不希望看到在托尔斯泰和革命者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

- ① 《索·安·托尔斯泰日记（1893—1897）》，万尼奇卡之死，第203页。
- ② 古谢夫：《托尔斯泰年谱》，第513页。
- ③ 同上，第519页。
- ④ 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三卷，第418—420页。
- ⑤ 同上，第433页。
- ⑥ 《С·И·达涅耶夫日记。个性、创作及其生平材料》，音乐出版社1925年版，第二卷，第62页。
- ⑦ 《安·巴·契诃夫全集》，国家出版社，第十六卷，书信，第271，273页。
- ⑧ 比留科夫·《弃绝仪式教派》。媒介出版社1908年版。
- ⑨ 同上。
- ⑩ 同上。
- ⑪ 《托尔斯泰与论托尔斯泰》，托尔斯泰纪念馆出版，第二版，第63页。
- ⑫ 古谢夫：《托尔斯泰年谱》，第513页。
- ⑬ 《全集》，瑟京出版社1914年版，第二十二卷，第176页。
- ⑭ 比留科夫：《托尔斯泰年谱》，第三卷，第447页。
- ⑮ 同上，第439页。

第 五 十 章

“天父，助我！”

1865年5月，托尔斯泰家的人——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米沙和萨莎都去莫斯科观看加冕大典。莫斯科已经变得认不出来了。政府里和军队里的大官、宫廷里的朝臣以及彼得堡整个“上流社会”全都涌到莫斯科来了。府邸、住宅和旅社都住满了人。有的莫斯科人全家挤到一间屋子里，而把其他的房间高价出租给前来观看加冕大典的人。街道上出现了身穿笔挺的近卫军制服的军人，全城用三色旗装饰一新，警察当局加强了巡逻，增派骑警或步警。克里姆林宫红门阶下搭起了观礼台，从这里可以观赏仪式的整个进程。当年轻的沙皇经过莫斯科街道的时

候，一群群老百姓向他欢呼。春天来得早，阳光灿烂。

霍登广场上发生了一件事，使这次加冕大典蒙上了一层阴影。筹备在那儿举办人民游艺活动，给老百姓分发沙皇的礼品——一个小包，内有各色小赠品，还有印了沙皇徽章和沙皇名号打头字母的一个小杯子，还有一张彩票。

数万人拥挤在霍登广场。群众没有人组织，秩序紊乱的人流向几个亭子跟前涌过去，开初那儿还分发礼品，到后来，干脆把礼品向人群头上乱扔下来。人们便去抢。你挤我，我挤你，有的倒下了，你踩我，我踩你，后面的往前挤，硬要冲到前面来。结果是人流从半死不活或者已经死了的人身上踩将过去。此时，人们已经不想要礼品了，只想赶快逃命。一些人成批掉进排水沟里，又不断有新的躯体纷纷落下……咒骂之声不绝于耳，惨叫，呻吟……

据说，这一回死了三千人，加冕大典黯然失色。老百姓议论纷纷，上流社会里也同样窃窃私议，说此事不是“好兆头”，预言尼古拉二世皇帝的统治将以悲剧告终。

托尔斯泰家的两个年幼的兄弟安德留沙和米沙不愿好好读书。安德留沙彻底逃离了中学。志愿报名去特维尔服兵役。母亲千方百计想使米沙哪怕拖到

毕业考试也罢。

父亲伤心的程度不亚于母亲。米沙能否在贵族中学毕业，这倒不那么要紧。令父亲伤心的事情是这两个儿子身上缺乏坚忍不拔的精神和不守纪律，道德上放荡，内心空虚。但是，这一点，谁也没有过错。生活就是这么复杂。这两个少年（安德留沙十八岁，米沙十六岁）能不能走上父亲的道路？他们尖锐地感到了家庭的分裂——两种人生观——而他们又不曾坚定地遵从父亲的教导，于是走上了抵抗力最小的道路，放纵自己从父母那儿继承下来火热的天性。年纪较大的儿女是在严格管教和有条不紊的正常条件下成长的，那时父亲亲自管教他们。年幼的儿女就不同了，各方面都在诱惑他们：结交了一批有钱的同伴，痛饮狂欢，夜里打马狂奔出城去找茨冈人寻欢作乐。孩子们挥金如土，特别是安德列。他在茨冈人那儿把钱荡光，第二天愁眉苦脸，找母亲无理取闹，又从她手里弄到了钱。

父亲深感痛苦。想到这两个孩子就心情抑郁，有时甚至无法工作。

他写道：“我要吻吻安德留沙。求上帝开恩帮助他走通向上帝的正道。主要的一点：让他怜惜和保持自己不朽的、上帝所赐的灵魂，而别玷污它。”^①

但是，怎么帮助他们呢？他知道，自己束手无策。并非他们自己挣得的金钱予取予求，对他们来说，简直是致命的东西。严格的劳动生活，工作的必要性——这是唯一能够约束他们免于一切诱惑的办法。而痛饮狂欢、跟农家姑娘和茨冈女人胡闹等等诱惑，托尔斯泰本人早已是过来人了。

米沙在中学六年级留级了，母亲便把他转入贵族中学，但她又惊恐地发现，在那儿米沙也不学习，经常旷课，不做功课。米沙本来聪明出众，富有多方面的才华和音乐天赋，这就更令人可惜了。以他小小的年纪而论，小提琴已经拉得很出色。他已经能够跟音乐教师合奏贝多芬和莫扎特的奏鸣曲了。这位老师预言他前程远大，但米沙认为凭听觉记忆在钢琴上弹奏茨冈民歌的浪漫曲要好得多，每当母亲强迫他呆在家里，在这些稀有的夜晚他便低声用男高音哼着那些茨冈浪漫曲。

10月底托尔斯泰给这个儿子写了一封长信。“基督学说教戒我们要防止的主要的、基本的诱惑就是相信幸福在于满足个人的淫欲。个人、动物性的个人总是寻求淫欲的满足，诱惑在于相信这种满足就是幸福。感到淫欲的吸引，相信满足它就是幸福，从而煽动这种淫欲，或者相反，心里明白，淫欲的满足会

使人脱离真正的幸福从而抑制它，这两种态度的区别是非常巨大的。”

在同一封信里，父亲教诫米沙应切忌引诱农家姑娘。

“为了使性爱成为纯洁的和高尚的，必须使钟情的男女双方处于崇高的同一精神发展的水平之上。此外，每当为了达到互相爱慕而必须作出巨大的努力，必须男方建立功勋，那么，这种性爱是会产生良好的影响的。可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除了会拉手风琴或送些甜饼干之外，什么也不需要，不是提高自己却反而降低自己以达到恋爱对象的水平，象你目前这样，那可实在要不得。这种性爱并非别的什么东西，只不过是为人民生活的原始状态所美化的动物的性欲罢了。”^②

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的信中写道：“米沙收到了你的信，当我走进的时候，看见他和安德留沙正在读信。安德留沙使劲在信里头寻找他不表赞同之处，他只记得一点，那就是他不能降低自己对一切表示赞同。这一点稍许感动了米沙……安德留沙出去了，我便拿着这封信试试向米沙讲明我的看法，这时他便开始用另外的态度说话了，看问题的角度也不同了。一般说来，他还是一块可塑性很大的材料，如

若对他的教育不放松，那么，会产生好影响，可以把他造就成一个有为的小子。今日，提琴教师说，越是教他，越是坚信米沙具有音乐方面巨大天赋。如果米沙糟蹋和埋没自己的才华，那可真遗憾呀！应当大力帮助他。”

两个年幼的儿子使父母担心，儿子略瓦有病，住在瑞典，在著名的医师维斯杰龙德处就医。儿子伊里亚手头越来越拮据。田庄的收入不够开支。他家添了人丁——他已经有了三个孩子了：安娜、小米沙和小安德列。小安德列经常生病，咳嗽，总不见好。”^③

两个大女儿虽然奉行指导她们生活的严格的戒律，虽然她们无限忠于父亲，但两姐妹还是渴望她们个人的幸福，希望建立自己的家庭。塔妮亚除了侍奉父亲以外，还弄弄艺术，画点画，借以充实生活，玛莎则学习医务并帮助周围的人。

谢尔盖跟玛妮娅·拉钦斯卡娅结婚了，这是全家一件大喜事。她是著名的彼得洛夫农业科学院院长的女儿。

很难想象，腼腆内向的、羞于表现一切情感的、长得不漂亮的谢辽沙会去追求美貌动人的姑娘玛妮娅·拉钦斯卡娅。她是塔妮娅的女友，长得很美，为人聪明可爱，受过很好的教育（毕业于英国的大学）。

1895年4月，托尔斯泰写信给妻子：

“早餐后我走进塔妮娅的房间。玛妮娅在那儿。我想她正在穿衣，我便想带关房门。她便说：‘不！您不会妨碍我。’这时谢辽沙很不好意思地从墙跟前走过来，也声称我没有妨碍他们。他俩很不好意思，我相信，事情不可挽回了。很不幸，当我骑罢自行车回来的时候，谢辽沙告诉我，玛妮娅今日就要离去。我问他，他和她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说：‘一言难尽’。她今天就去英国。”^④

但玛妮娅很快就回来了，7月10日，婚礼在莫斯科附近的彼得罗夫斯克—拉佐莫夫斯基教堂隆重举行。

1895年10月，托尔斯泰夫妇之间关系几乎破裂。托尔斯泰努力想用不断的温情和关怀来支持妻子自从万尼奇卡夭折以来即觉醒了的高涨的宗教情绪。他关心地观察着她。他满怀素有的乐观主义，但愿她以精神的、内心的兴致，以对孩子、对丈夫、对一切人的爱来填补万尼奇卡死后她心灵的空虚。他准备作出任何牺牲，但求跟她保持平和的爱的关系。妻子10月12日给他的一封信，令他很伤心，可能在最初的一刻激怒了他，但他还是把心头不良的感情压制下去了。

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给丈夫的这封信中说：“为什么你在日记里总是提到我的名字，对我这么狠毒？为什么你想让我们孙子们和后代骂我为轻浮的、恶毒的、使你遭受不幸的妻子？倘若这么干能使你成为牺牲品以增添荣誉，那么，对我却是多大的损害啊！倘若你由于在你看来我对你做了坏事而简简单单辱骂我甚至打我，那我心里还要轻松得多。那就一切都会过去，而现在却一切都依然如故……你答应过要删去你日记里那些针对我的狠毒的文字。但你并没有兑现，反而变本加利。或许，实际上你害怕，如果你不把我打扮成恶婆娘，而你自己却是个背着老婆这个十字架的受难者，那么，你死后的荣誉就会大为逊色了。

“如果我做了下流事，偷看了你日记，那么请你原谅。这件事是偶然发生的。我收拾你的房间，抹你的书桌，从桌子下边清除灰尘和蜘蛛网——这时掉下一片钥匙。想要窥伺你的灵魂的诱惑却难以抑制，我便这么做了。我看到大概是这么一句话：‘索菲娅从莫斯科归来。她跟波里谈话，自我标榜。自从万尼奇卡夭折以后，她变得越来越轻浮了。我得至死背着这个十字架。上帝助我！’等等……

“当我和你死了以后，这种‘轻浮’就由人家去

解释了，任何人都可以给你妻子脸上抹黑，你说出这些话以煽动任何人来骂我，你就得意了。

“这一切便是对我的报答，因为我一辈子服侍你和你的孩子们，因为我爱你胜过世间所有的人（万尼奇卡除外），因为我为人处世并不‘轻浮’（不象你告诉后代的那样），直到死，我灵魂和肉体都是你的妻子……

“……请把那些针对我的恶毒的话从你日记中删掉吧——如果这么做你不感到太困难的话。要知道，这不过是按照基督精神办事罢了。我不能要求你再爱我，但是，我可以要求你别糟蹋我的名字，这点你如果不感到困难，那你就这么做，不过，也随你的便。写这封信我深感痛苦，泪流满面。我永远也不善于用口头表达。别了！每次当我离开时，心头不由自主地想：跟你能不能再见面呢？

“饶恕我，如若可能。索·托尔斯泰娅”^⑤

看来，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自己也没料到她这封信竟然激起了那么大的反响。

托尔斯泰在 1895 年 10 月 13 日的日记中写道：“这些天我看到，有件事使索妮娅痛苦不堪。今日早上弄清楚了。她读了我在气头上写的针对她的刻毒的话。我不知怎地发火了，当即写了下来，随后便忘

记了。灵魂深处觉得，做了一件坏事。这样她就读到了。她真可怜，伤心透了，她没有记恨，给我写了这封信，她真好。我还从未象现在这样深感自己有错和深深激动。唉！倘若这一回使我跟她更加亲近，那该多好！倘若她不再相信无稽之谈，转而信赖自己的灵魂和理智，那该有多好！翻阅日记时我发现有几个地方，那儿我避免使用那些说到她时使用过的恶毒字眼——这些字眼是我气头上写下来的。现在我要再次告知此日记将落入其手中的所有的人，我经常由于她不假思索的快当脾气而对她发火。但是，正如费特说的，每一个男人都有一个他所需要的妻子。我已经看出，她就正是我所需要的妻子。她是按照异教徒的理解最理想的妻子——忠贞、操持家务、自我牺牲、异教徒式的对家庭的热爱，但在她身上却有着成长为基督徒的可能性。这一点是在万尼奇卡夭折后我才看出来的。基督徒的灵魂是否会在她身上觉醒？
圣父呀！帮助我吧！现在发生的这种事对我来说真是太好了。她已经并将要看到爱的力量——她对爱的力量。”^⑥

……“这两天来我在翻阅我的全部日记，目的在消灭一切不实之辞，我只找到一处地方，而这一处地方也远不如使我生气的那处地方那样卑劣。” 11月3

日他写信给她。

家里人除开玛莎，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玛莎很气愤。由于消灭了文件以及只从一个侧面加以说明，将来的历史会虚假地阐明父亲和母亲的关系。想到这点，令玛莎感到害怕了。托尔斯泰本人对这点倒没有考虑。他只责备自己不该对她产生不友善的感情并且于书信中在精神上支持她。

“要做到别激动就应当祷告。”1895年10月4日，他从和玛莎住在一起的雅斯纳雅·波良纳写信给住在特维尔的妻子，“你知道这一点，因为你自己现在也祷告了。只是我不按书本祷告，不用别人的语言而是用自己的话祷告。我把祈祷叫做在上帝和死神照耀之下（不是从世俗事件的观点）关于自己所处地位之思考，即过渡到上帝的怀抱或上帝的其他居处。这么做，使我内心平静并生动地理解和意识到，我在世间只是暂时的，我来到世间，不过是为了做对我来说必须做的事情。倘若我在此间尽力做着这件事，那么，又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能够发生在我身上呢？这世间没有，那彼岸也没有。我知道，对你来说，主要的痛苦是跟万尼奇卡的永诀。但这件事也同样可以得救和获得安慰：向上帝靠近——通过上帝——向万尼奇卡靠近。因此，在灾难与死亡的痛苦之

中我们得向着上帝，我们会感到，只有通过上帝才能跟亡人在一起。”^⑧

“我想给你写信，亲爱的朋友！”1895年10月25日，他从雅斯纳雅·波良纳发出的信中写道，“在你动身这一天，趁我感到的印象还新鲜的时候我就想写信给你，已经过了一天半了，只是到了此刻，我才动笔。我所体验的感情，是奇怪的动心、怜悯、全新的对你的爱，这种爱令我突然想到你并体验到你所体验到的同一感情。这是那种圣洁的、良好的感情，不该说出它来，但又知道，即使我说出来，它也不会变。相反，一动手写这信，我又再次体验到了同样的感情。咱们这种感情是很奇特的，好似天边的晚霞。你我之间的争吵象一朵乌云，它只不过偶尔减弱了那晚霞的光辉。我总希望，这朵乌云在天黑以前会消散，日落时的景色将是完全清朗和光明的。”^⑨

对这封信，她立刻作答：

“那一朵朵乌云，你觉得有时还在给我们的良好关系投下阴影——这是完全不必害怕的。它们完全是外部的东西——是生活和习惯的结果，再加上软弱和懒得改变它——但绝不是从内心深处引起的。从内心深处说，咱们的关系的根基是牢固的、严肃的和和谐的。我俩深知，什么是好的和什么是坏的，我

俩相亲相爱。为此真得感谢上帝！我俩都盯住一点——盯住从尘世直通彼岸之门，咱们都不怕它，携手共进以达到一个目的，即上帝。不管经过什么途径，这一点反正一样。我感到高兴，因为你我都健在并生活得不错。我应当羡慕，因为你们那儿没有裱糊匠、印刷工、家庭女教师、马车的喧哗、警察和从早到晚用钱如水。在这闹哄哄的环境里是难以领悟上帝和保持宁静的祈祷情绪的。我当努力蜕掉尘世这张皮以免沉湎而不能自拔。真难呀！”^⑩

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实际上很难蜕去尘世这张皮，她自己造成的她的生活把她紧紧地钳制住了。

1895年冬，修女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托尔斯泰娅的长女伊丽莎白·瓦列里扬诺夫娜·奥波连斯卡娅到托尔斯泰家来作客。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非常喜爱这一家的三个姊妹，因此，两家经常见面。有段时期奥波连斯基家的儿女，特别是老大柯拉莎就住在托尔斯泰家里。三个姊妹中丽赞卡是最通情达理和稳重的；瓦连卡（瓦尔瓦拉·瓦列里扬诺夫娜·纳戈尔诺娃）是大家都喜欢的女人。每当瓦连卡走上前来，她那酷似母亲的乌黑的眼睛里洋溢着那么多柔情和善意，大家便不由自主由衷地微笑了。她丈夫纳戈尔诺夫是个不富有的人，服过公务。他死了

以后，撑持一个大家庭的瓦连卡处境是很艰难的。但她并不气馁，好歹抚养和教育了自己的儿女。关于瓦连卡，托尔斯泰家的人喜欢讲述她漫不经心的许多笑话。有一次，瓦连卡坐在宴席旁，邻座是一位胸前挂满勋章的老将军。瓦连卡的膝盖发痒，她便轻轻地伸手到桌下面去搔膝盖，但奇痒未止。突然，她惊恐地看到，那位邻座的老将军满脸通红，眼睛瞪得大大的盯住她。其实，她搔痒之处并非她本人的膝盖，倒是老将军的膝盖。

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还讲了一件事。托尔斯泰收到《战争与和平》的稿费之后，他便给两个外甥女每人五千卢布的期票。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去找瓦连卡，一看，打破了的窗玻璃上糊了一张奇怪的纸。细细一看，却原来是那张五千卢布的期票。

第三个女儿连诺奇卡比两个姐姐年轻得多。她从来没有过幸福。她父亲是个瑞典人，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是跟他在外国相识的。据说，他是个很出色的、敏感的人。玛丽娅跟他非婚生下连诺奇卡，并且小女儿是在国外受的教育。这一桩罪过是那样折磨着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以至回国以后她便进了修道院。

两个大的姐妹非常亲近舅舅，特别是丽赞卡。她

一来，就给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帮忙，但只在织匠街住了几天，她便离开去朋友家了。

“托尔斯泰一家非常可爱、和蔼可亲、跟我们有血缘关系”。她写给大女儿 M·Л·马克拉可娃的信中说。“但他们的生活闹哄哄，骚动不安，那不象家庭的生活；从早晨到下午五点家里没有一个人，午餐时有三两个外人；晚上家里又没有人或者又是几个外人。塔妮娅学校里功课很忙，舅妈索尼娅身上发生了某种我们大家不以为然大变化。她变得烦躁不安，从不呆在家里，变得爱打扮，坦白地说，非常关心自己的外貌，经常上剧院和赴音乐会，一言以蔽之，她给人的印象是赶快享受生活，分秒必争。这么干，她自己解释说是自从万尼奇卡死后她不可能恢复以往的生活方式了，此外，还因为她对音乐突然发生了兴趣。但是，我们大伙儿以为，道理很简单，只不过她害怕变老罢了，她还想一个劲表现自己并非老太婆，而是一个富有魅力的女人。我想，这只不过是一个生理过程罢了。在这个女人身上，肉体永远占上风，压倒心灵。我对待她很小心，倘若发生了的这一切她并不值得别人怜悯的话。她自己感到了这一点并且说：‘我的生活有点儿骚乱不安，象是个堕落的女人，但我不能过另外的生活。’另一回，我故意

跟她谈万尼奇卡，为的是提醒她，目前充塞于她生活中的东西跟那种悲恸相比较，是显得多么渺小和无聊啊！说了这话，我便后悔了。她嚎啕痛哭，真吓死人。她求我从此永远别跟她再提万尼奇卡了。她的女儿们对她很好。她们，尤其是聪明伶俐的塔妮娅，看到母亲处于这种精神状态，心情是够沉重的了。但她们待她很温驯和委婉，当然，有点儿居高临下，好似大人看待小孩似的。这也怪不得，很难要求她们采取另一种态度。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很温和聪明。不论怎么评判他，在这个人身上终究具有大智大勇。玛莎我很少见到，但只要看见她，她总显得那么善良和温柔。”^①

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身上发生的变化，大家都看到了，托尔斯泰全家人都不高兴。谁也没有责备她，全都惋惜，不知不觉之间她丧失了儿女对她的尊敬。虽说他们有时粗暴和不听话，本来对母亲还是尊敬的。乍一看，对她也无可指责。母亲醉心于音乐，参加音乐晚会，邀请音乐家上家里来，难道这里头有什么坏心眼不成？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开始学音乐，她甘愿跟那位可爱的、有才气的作曲家兼钢琴家С·И·达涅耶夫共同消磨时光，这难道有点不体面吗？

这位母亲的行为毫无坏心眼，毫无不体面的嫌疑。但在她对音乐和达涅耶夫的爱好的爱好中令人感到有点不自然、做作和虚伪，托尔斯泰全家大小都为此而感到痛苦。

让我们来看看十二岁的萨莎心灵深处有何反应吧！她，萨莎，还是个天真未凿的、尚未充分发育的小姑娘，长得不漂亮，举动笨拙，病态地害臊，有着如英国人所说的，inferiority complex^{om*}的明显的表情。这小姑娘几乎整个儿被扔给几名家庭女教师和一个媵姆去照顾。

每当黄昏时候，织匠街的宅子里来了许多客人，楼上几间正房内摆了茶，倘若来了几位至亲好友，茶就摆在楼下饭厅里，一家人平日便在这儿进早餐和午餐。这是一个镶木地板的大房间，庞大的餐具橱立在墙边，一把把普通的橡木椅子上糊了深色花布，墙上挂了自鸣钟。

做完功课，萨莎便跑进餐厅，一心想在哪儿捞到苹果或糖果点心，总之是一点儿好吃的东西。萨莎知道，在那些日子里，每当妈妈白天离家去了猎人大道，从雪橇里卸下许多大包裹、香味扑鼻的小包裹、缠了绸带子的小盒子的时候，那么，肯定要来客人

* 英语：自卑感。

了。果真，在楼下的餐厅里桌子蒙上了洁白的台布。银制托盘上摆下了一个细腰身的大茶炊，热气腾腾，泡沫四溅。而桌面上……什么东西没有呀！有各色果酱，烤饼、水果、纸包糖、火腿面包、罐头鱼、煮老的鸡蛋和大颗粒的鱼子酱。

“今日有客？”萨莎问女管家冬涅奇卡，她正端一只高脚盘，那上头有撒了砂糖的无花果。

“干吗我要知道？伯爵夫人没告诉我……这个胖乎乎的音乐家，可能……别拿无花果！这可是谁干的好事？大概是你，鱼子酱把台布弄脏了！快走开！”

“吃个甜包子可以吗？”

“拿了快走！……你们家有桩罪孽了……”

九点钟，擦着冻僵了的手，达涅耶夫走了进来。他通红的、快乐的脸上容光焕发，显得心地善良。

“萨莎！快睡觉去！”妈妈说。“走吧！走吧！听见吗？”

离去时，萨莎斜眼瞟了达涅耶夫一下。“连一颗纸糖也不给我；难道都是为了招待这个人！”她睡不着。媵姆鼾声如雷，断断续续发出吹哨子似的声音。不知为什么，这个人一来，听到他气喘吁吁尖嗓门的笑声，全家人都很反感，心里令人痛苦地抱屈……不知该向谁发泄……

达涅耶夫跟萨莎很友好。她很高兴跟他玩羽毛球，跟他一道讥笑他的笨拙。听他弹琴，尤其是弹奏肖邦或莫扎特时，简直是一种巨大的享受；而听他弹奏他自己的作品则令人昏昏欲睡。萨莎很乐意跟母亲一道赴音乐会；她所能理解的音乐把她带到一个奇妙幻想和幸福的虚构的世界。可是，这一切却被玷污了。被什么东西玷污？她不能够回答。只是随着年岁的增长，一种对母亲敌视的心情在她心里发展了并且采取了较为确定的形式。跟这种敌对的感情作斗争是很难的。这种感情折磨着萨莎，使她的少年和青年时代蒙上一层阴影。随着年岁的增长，赴音乐会对她来说已经感到是一种负担。母亲预定一个季度的门票，固定在第六排，萨莎、母亲和达涅耶夫并排坐一起。正在演奏复杂的交响乐，母亲不断发表高见从而妨碍别人，达涅耶夫则不象妈妈和一般的听众那样，表情严肃，学究式的细心听着演奏。这一切，萨莎看在眼里，心情特别沉重。

但是，萨莎却力争不纠缠于这种复杂的、她还不是很了解的感受之中。她还有自己的喜爱，主要的是滑冰。滑冰场就在织匠街住宅的花园内。萨莎跟搬运工的孩子们一道，自己动手灌水，从一口井里打水注进大木桶，然后用雪橇运回。大家全都滑冰，米沙滑得

最好。他能象陀螺似的很快旋转，悬起一只脚从冰山上俯冲下来，以不可思议的灵巧动作在冰上跳西班牙舞。萨莎一连练习几小时，一心想模仿米沙。

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身体不好，斯涅吉列夫给她治疗。看样子，一点要紧的病也没有。不过有点儿不舒服罢了，再加年岁不饶人，与此相连，则她的神经和心理状态不佳。她丈夫所过的是孤独的、深入内心的生活，她越来越忍受不了。她要活动、听音乐、出入上流社会和与人交往。

1896年3月，她从莫斯科寄了一封信给丈夫，信中说：“向你说什么好呢？亲爱的！谈谈自己的内心生活吗？为了压制目前折磨我和至今使我心痛的一切往事，我还在继续追求忙乱的生活，这是不好的，我不知道也不敢承认这点。当斋戒祈祷时，情形好一些。而目前我重新又去寻欢作乐或找刺激了，或者感到苦闷无端袭来和神经发作，这时我便跑到某个地方——从家里跑开或者从自己跑开（指失去自制力——译者注）。谢天谢地！最近各种事情多的很。本想写信给塔妮娅，结果又写给了你。反正一样。我也爱她，记得她，使劲吻她。如果你们很好，我很高兴，但是我已经不喜爱清静了——去它的！尤其不爱孤独。”^⑫

托尔斯泰又一次细心地对待妻子的信，象往常一样，并且立即回信：

“……我想告诉你，你想忘怀一切，这个愿望虽说是很自然的，然而却不现实。倘若暂时忘怀一切，那只不过是把问题的解决往后拖罢了，问题依然存在，终究必须解决它，不在这个世界上解决，而是在将来，即在肉体死亡以后……自己和亲人的生与死的问题不可避免地应当解决，你是逃不掉的。早就想把这点告诉你，但我没有说，因为这一切必须自己体验并且准备着。我只说一点，如果那了如指掌的东西并非你所理解的东西，而是你感到生活不局限于此，倒是不可穷尽的，理解到这一点，那就非常好了。对于一切事物和感情的评价如今大大地变了，仿佛从狭小的牢房走出来到了上帝的世界，到了这真实的世界。”^⑬

1896年5月中旬，在瑞典著名的瑞典教授维斯杰尔隆德处就医的托尔斯泰的儿子列夫，跟这位教授的女儿多拉结婚了。塔妮娅和米沙去瑞典参加婚礼。开初，托尔斯泰家不知道是该高兴呢还是该发愁。但是，塔妮娅和米沙对瑞典和热爱列夫的心花怒放的十七岁的小嫂嫂却五体投地。

列夫跟这位不会俄语的外国女人结了婚，开初

托尔斯泰家的人只能用英语跟她交谈。但是，这婚姻是很如意的。对比之下，谢尔盖的婚事对于大家却是很悲惨的。把玛妮娅当亲人接到家，谢尔盖又那么爱她，干吗她突然遗弃了他呢？其中的真正原因谁也弄不清。旁人作过许多猜测（这种场合历来如此），全都指责玛妮娅，下流地造谣。谢尔盖不作声。他隐居到尼科里斯科耶—维亚泽姆斯科耶的小屋子里，深居简出，弹琴写文章，借音乐发泄自己满腔痛苦。玛妮娅生下一个儿子，取名谢尔盖。分娩后不久她患肺结核去世了。

1896年夏天，雅斯纳雅·波良纳宅子的厢房里住进了达涅耶夫和他的老嫫姆。这个老太婆，一双脚有病，满脸皱纹，脸上生满老斑和小小的白斑纹。达涅耶夫什么事情都参加一份——散步，玩槌球，晚上则跟托尔斯泰下象棋，或者用他第一流的弹奏艺术令大家欣赏。大概，他并没有职业钢琴家的技艺，但是，却富有音乐知识，理解其精微，善于传达出音乐作品的内容——这些都令人惊叹。只要他往钢琴旁边一坐下，弹出第一组和音，他便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了。周遭的一切，他都视而不见——他全心身都陶醉于音乐之中，以音乐为生命，从而把四周的所有听众都吸住了。他弹奏得特别好的是贝多芬的作品

和自己的一个奏鸣曲。听他弹琴的当口，别人很难设想，就是这同一个人刚才还粗野地、毫无意义地放开喉咙哈哈大笑，其原因只不过是萨莎故意把羽毛球打到他的胖肚子上。

达涅耶夫没有片刻怀疑过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对他另眼看待这件事有什么不好。她对他那种无微不至的关怀，他认为理所当然。这一点，他已经习惯成自然了。他的朋友们——玛斯洛夫一家（三个老处女及一个老光棍的兄弟），同样对他关怀备至。达涅耶夫是个非常正派和善良的人。倘若他脑子里能够意识到他的到来会使托尔斯泰感到沉重的话，那么，他一定会立即中断他跟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的一切关系。

1896年夏天，丽赞卡·奥波连斯卡娅到雅斯纳雅·波良纳作客。9月26日，她写信给自己女儿玛莎：“我在雅斯纳雅的最后这一天，舅母索妮娅回来了。她显得年轻、快活、漂亮、爱打扮。平生第一回我觉得她不大顺眼。她跟达涅耶夫的奇怪的关系（我说“奇怪”，因为我不知道怎样形容一个五十二岁的女人的感情），出格实在太远了，以至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终于忍受不住，跟她吵了一架。忌妒，我以为，不过是受欺瞒、被侮辱和愤怒的感情。当时，她拔腿

就朝柯兹洛夫卡跑去，好似乎打算卧轨自杀，殊不知她躲在花园里，让人一通晚找不着她，总之，脸已丢尽，到头来，把大家折磨得够呛。塔妮娅离家去了奥尔苏费耶夫家，玛莎因为神经紧张而病倒。我看透了，对于这样不识羞耻的母亲怎么能够尊敬？这事不是现在发生的，而是在夏天，8月份，在你离开雅斯纳雅这个‘声音嘈杂的布口袋’以后。这件事，对于舅母，等于水过鸭背，忘得干干净净。她还是依然故我，照例快快活活，照例气色鲜嫩，照例预订一个季度的门票，以便赴一切音乐晚会，其他一切，一概不放在心上。”^①

丽赞卡说的是实话。忌妒，根本无从谈起。可是，托尔斯泰怎能不感到气闷和痛苦呢？他的妻子，已经是许多成年孩子的母亲了，却居然把自己置于那样不自重不自然的地位。

1897年2月1日，托尔斯泰写了一封信给妻子，因为她一定要去彼得堡，当时在该地达涅耶夫的歌剧首轮演出。托尔斯泰的信中说：“你对我说过要让我安心，过后又说，你不去看排演。我有好久弄不明白：排演什么？而我从来没有想到就是这个。这真使人难过。真讨厌，比讨厌还要……我曾得知你什么时候要去彼得堡，虽则你已花了那么多时间反复盘算

和多方准备，但结果是，你去的时候正好是不该去的时候……我知道，你现在就去也没有什么了不得，但是，你不知不觉之间把此事当成儿戏，你自己在惹怒自己，我对此事的态度也使你生气。你把这事当成儿戏了。我坦白承认，这儿戏是可怕的，折磨人的，讨厌的，道义上可怕地令人疲倦的。你说你对此次旅行不能够另作安排。可是，只要你好好想一想，并且自己作一番自我分析，那么，你就会看到，你这话是不对的。第一，这次旅行没有非去不可的特别理由；第二，可以在这以前去或以后去——斋期再去。但你自作主张这么做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不必要的、在意义上没有任何趣味的人（达涅耶夫）却居然指挥我们的生活，居然毒化了最近两年或一年的我们的生活，这真可怕地令人痛心，讨厌，丢人。你硬要探听，此人何时前往何地，他的何种排演何时进行，这是不自重的，折磨人的。这真可怕，令人反感，真丢人！”^⑤

而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也确实感觉到，她身上有点不对头，并且以她自己的方式感到痛苦。1897年7月18日，她写道：“我知道这是一种病态的感情，爱情不亮，上帝的世界也就暗淡无光，这很恶劣，不应该——但我无力改变。”^⑥

她不能改变。与此同时，托尔斯泰夫妇之间的距离一年一年越来越远。

- ① 《列·尼·托尔斯泰致夫人书信集》，第 491 页。
- ② 《索·安·托尔斯泰娅致列·尼·托尔斯泰书信集》，科学院出版社 1936 年版社，第 629 页。
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三卷，第 438 页。
- ③ 《索·安·托尔斯泰娅致列·尼·托尔斯泰书信集》，第 628 页。
- ④ 《列·尼·托尔斯泰致夫人书信集》，第 488 页。
- ⑤ 《索·安·托尔斯泰娅致夫人书信集》，第 617 页。
- ⑥ 同上，第 618 页。
- ⑦ 《列·尼·托尔斯泰致夫人书信集》，第 493 页。
- ⑧ 同上，第 491 页。
- ⑨ 同上，第 492 页。
- ⑩ 《索·安·托尔斯泰娅致列·尼·托尔斯泰书信集》，第 624 页。
- ⑪ 《年鉴》，托尔斯泰文学纪念馆为纪念诞生一百二十周年出版，第二卷，莫斯科，1948 年。
- ⑫ 《索·安·》托尔斯泰娅致列·尼·托尔斯泰书信集》，第 642 页。
- ⑬ 《列·尼·托尔斯泰致夫人书信集》，第 501 页。
- ⑭ 《年鉴》，托尔斯泰文学纪念馆为纪念诞生一百二十周年出版，第二卷。
- ⑮ 《索·安·托尔斯泰娅致列·尼·托尔斯泰书信集》，第 669 页。
- ⑯ 同上，致 П·波波夫书信的前言，第 22 页。

第五十一章

“奖赏”与良心的事业

“我总是忙于工作，”托尔斯泰 1896 年 9 月写给妻子的信中说。“写到关于诸罪恶的一处地方总是大费周折。今晨似乎弄清楚了，可这会儿却又弄糊涂了，茫然不知所措。想写另一个东西，但又觉得应该写这一篇，心里想，良心安稳则不会犯错误，假设写这篇的时候心境不佳，那么就得允许自己写另外一篇。这大有裨益，有件不会引起怀疑的事情可干。这另一篇如果写完，那么，它便是对那篇已经开头又想写下去的东西的一个奖赏。”^①

托尔斯泰写完了《怎样读福音书》和《致自由主义者》。后一篇是因为关闭识字协会之事而写。该协

会的宗旨是在广大群众中普及文化，其活动跟媒介出版社并行不悖。这封信扩展成为一篇论文。

最近几年，托尔斯泰认为，写文艺作品是一种奢侈行为，这不是事业。但他喜欢它并允许自己在他认为的正事之余可以写写，所谓责任之所在的事业，契尔特科夫大力鼓励他去干。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斯塔霍维奇、斯塔索夫和其他世俗的朋友们则乐于看到他写出文艺作品。尤其是斯塔索夫，他总是兴高采烈地高声表达自己钦佩之情：“伟大的列夫！德高望重，高不可攀！”他往往这么叫喊。崇拜托尔斯泰的H·H·斯特拉霍夫，只有他一个人才怀着同样的兴趣接受托尔斯泰所写的一切作品。可是，托尔斯泰失去了这个朋友——一个敏锐聪明的批评家。斯特拉霍夫于年初患舌癌在极端痛苦中去世。

托尔斯泰把它叫做“奖赏”并不允许自己动手写它的那部作品就是中篇小说《哈泽·穆拉特》。

当他在兄弟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的田庄上作客时，于7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昨日我在翻耕了两遍的轮作地上走着，放眼望去，尽是黑土，别无其他——没有一根绿草。只是在灰色的尘土路边上有一株鞑靼花。它有三枝幼芽：一枝被折损，一朵肮脏的白色小花挂在枝头；另一枝也被折损，溅满泥浆，

它的茎快断了，陷在泥里；第三枝倒向一旁，也是又脏又黑，沾满尘土，但它依旧活着，正当中开着耀眼的红花。我想起了哈泽·穆拉特。想写出来。它捍卫生活直到最后一息，孤零零在广大田野上好歹捍卫住了自己的生命。”^②

高加索的景色有其壮丽之美，它那半野蛮的剽悍民族的风尚非常独特。托尔斯泰曾参加过征服这些民族的战争，坚强的契钦勇士、好汉穆拉特的形象老早就吸引着他。这一切都在他脑子里复萌了。鞑靼花难以折断。“且不说它的茎周围都长了刺，我的手包着手帕也给它扎了，”托尔斯泰在小说的序言中写道。“更有甚者，它是那样可怕地顽强，以至我跟它搏斗了五分钟，一丝一丝折断它的纤维方才把它折断。”……“可真是多么旺盛的精力和活力啊！我心里想，记起了摘那朵花的情况。他是多么顽强地捍卫自己的生命，多么昂贵地出让了它。”^③

他便给哈泽·穆拉特的历史打草稿。

“这时，我跟索妮娅去修道院，”他在日记中写道，“很好。写哈泽·穆拉特，很不好，很潦草。还是要继续写我阐明我信仰的文章。”^④

哈泽·穆拉特的历史属于五十年代初。1852年10月末，其时，托尔斯泰正在高加索，他在给哥哥谢

尔盖的信中提到一个“全高加索的第一条好汉”^⑤，武士哈泽·穆拉特。高加索战争期间，伊马姆（宗教和行政最高长官）沙米里把哈泽·穆拉特的父亲和兄弟杀了，因而他对沙米里怀着深仇大恨，向俄国人投诚。哈泽·穆拉特向高加索总督沃隆卓夫宣称，他准备赤诚为俄国人服务，只有一个条件——俄国人得把他的家属从沙米里那里抢出来。哈泽·穆拉特知道，只要他儿子还在当俘虏，沙米里定会把他儿子杀掉或者挖掉眼睛。

时间过去了。关于他的家属没有任何消息。

于是，哈泽·穆拉特决定脱离俄国人。他打死俄国警卫，带了五个缪里德骑马飞奔进山。上百名民警追上并包围了他们。但是，哈泽·穆拉特和他的缪里德们决不投降。腰部受了致命伤的哈泽·穆拉特还在战斗。“他从壕沟里爬出，一跛一拐，手执短剑正面追击敌人。开了几枪，他晃了晃，倒下了。几个民警发出胜利的欢呼，朝倒下的身子跑去。但是，那个他们以为已经死了的躯体突然又动了起来，首先，一个没戴帽子的、剃得光光、血迹斑斑的头颅抬起来，然后，身子挺起，抓住一棵树，全身站立起来。他样子吓人，追上来的人站住了。但他突然战抖了一下，推开树，于是颓然扑倒在地，好象那斩断的牛蒡花一

样，终于一动也不动了……”

1902年、托尔斯泰收到了一个叫卡尔冈诺夫写来的信，他是当年曾经看守过哈泽·穆拉特的上校的儿子。托尔斯泰立即回他一信，提出一系列问题：（1）哈泽·穆拉特是住在你家的房子里还是远离你家的房子里？（2）他的衣着跟一般山民的衣着有无区别？（3）逃跑那一天，他和他的亲兵是否带了长枪？我很想问你更多的问题，但惟恐无端打搅您……”^⑥

虽然托尔斯泰直至1904年断断续续回头来写《哈泽·穆拉特》，但这部中篇小说他认为还没完成。

除开论文《怎样读福音书》，还在1896年9月末，托尔斯泰又动手写论文《艺术论》了。

夏天在雅斯纳雅·波良纳作客的达涅耶夫常常大弹其钢琴。托尔斯泰喜爱古典音乐，尤其是肖邦、莫扎特、海顿。但每当达涅耶夫弹奏当代作曲家的作品时，托尔斯泰便毫不留情地跟达涅耶夫争论音乐和一般艺术问题。他要证明，只有当艺术为一切人所懂得和了解的时候，它才是真正的艺术。大概，这些争论是促使托尔斯泰写作《艺术论》的部分原因。这年春季他在大剧院听了歌剧《齐格非》，据他写给哥哥谢尔盖的信中所说，听的时候，他跳了起来，“象个疯子一样，从剧院跑开了”。“这简直是个愚蠢的游

艺场，自命不凡，虚伪透顶，而音乐却一点也没有”。^⑦托尔斯泰大笔一挥，《艺术论》便写好草稿，到1897年最终完成。

另外许多要操心的事把托尔斯泰吸引开去，他又中断写作。对弃绝仪式教派的迫害加强了。

10月31日托尔斯泰写信给妻子：“昨日收到契尔特科夫和特列古波夫的信，信中写了弃绝仪式教派所遭受的苦难。他们说，有个教徒在军纪营鞭笞至死，而他们的家庭都破产了，饥寒交迫，无家可归，正在濒于死亡的绝境。契尔特科夫和特列古波夫写了一个向社会求援的启事，我决定从我们的慈善基金中拿出一千卢布寄给他们。”^⑧

在这同一封信的末尾，托尔斯泰附记：“这个消息对我来说是这期间的主要事件。”

И·М·特列古波夫还是在1891年就认识了托尔斯泰，从此就坚信他的学说。这是个身材矮小的人，五官也很小巧，扇形的胡子，戴一副蓝色眼镜，为人谦虚文静，有点神秘主义倾向（为此托尔斯泰常常跟他争论），并且有一颗金子般的心。他积极参加援助弃绝仪式教派的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始终是个坚定的基督徒。革命后，据说他遭到苏联政府的迫害，被流放到俄国北部的一个劳动营里。在那儿

他忍受不了那严酷的生活，默默死去。

契尔特科夫、比留科夫和特列古波夫写了致全社会的启事《请你们伸出助援之手吧！》，托尔斯泰校阅一遍并写了前言。启事被复制了许多份并分送给有影响的政府官员和社会人士，并且在外国印行。

压迫愈甚，弃绝仪式教派中的精神愈旺，残酷的折磨不但不能使他们害怕，相反，他们好象是原始的基督徒，怀着乐观的坚忍的精神为基督的信仰而甘愿受苦受难。契尔特科夫在其文章《你的兄弟在哪里？》里叙述了一件事：一次，长官问他们，什么事情他们服从长官，什么事情不服从？一个弃绝仪式派教徒回答：“如果您给我一个最小的石头，命令我把它扔向一个人，那么，这件事我们做不到；但是，您如果命令我们把一块很大很大的石头从一个地方抬到另一个地方，那我们会很乐意干的。”

契尔特科夫的住处被搜查，警察对托尔斯泰及其追随者们进行监视，《请伸出助援之手吧！》这篇文章引起了对托尔斯泰主义者的一系迫害行动。

1897年1月31日，托尔斯泰带了女儿塔妮娅去奥尔苏费耶夫家的田庄。那儿很安静，又有朋友的关怀和爱护，他心灵能得到休息并且能从事写作。2月

5日，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到了尼科尔斯科耶村，第二天戈尔布诺夫—巴萨多夫给托尔斯泰带来一个不幸的消息：契尔特科夫立刻被驱逐出境，比留科夫被流放到库尔良德省。同一天托尔斯泰和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一道去彼得堡与他的挚友们告别。

倘若他去彼得堡并非为了与友人道别，倘若他并非意识到自己的处境特别困难，那么，他在彼得堡是会很愉快的，他有十五年没有来过此地了。他很有兴致在这个大大扩展了的城市的街道上漫步，某些街道已经认不出来了。

托尔斯泰到来的消息闪电般传遍全城。朋友们争先恐后邀请托尔斯泰到自己家里作客，所有的人都想见到他。柯尼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谈到了托尔斯泰的访问：

“晚上十一点，我开会回到家，坐下来做事……年老的女仆对我说，有个庄稼人要见我。我问：他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么晚要干吗！她出去打听，说那人叫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我怀着由衷尊敬的心情把那位‘庄稼汉’领进书房，交谈整整一小时。对于契尔特科夫发生的事，他抱着崇高的、宽恕一切的态度，这实在令我钦佩。没有一句谴责的话，没有一点愤怒的表示。他给我的印象，有如敢于直面酷刑而毫

无惧色，并以谦和征服整个世界的原始基督徒。”^⑨

托尔斯泰去了公共图书馆，那儿的文艺部属斯塔索夫领导。他拜访了自己的老同行格里戈罗维奇，去了列宾的画室。列宾在他的回忆录里描述了这次访问：

“在我的宽大的画室里集合了一批崇敬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人。大家吵吵嚷嚷跟在导师后面，倾听他在这一幅或那一幅画的前面说了些什么。《决斗》这幅画有幸得到荣誉。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站在它前面，流泪了，关于它说了许多，惊叹不已。大家都看着这张画，记住他说的每一个字。参观完毕，大家又吵吵嚷嚷沿着大楼梯向下走到街上，那儿又有一大群人在等候他。两股人合流，我们站满了人行道，缓缓向大街、向有轨马车走去。有轨马车的司机，一个并不年轻的人，眼睛瞪得大大的，叫了起来：“啊！老天爷！兄弟们！他就是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呀！”说完他毕恭毕敬摘下帽子。”^⑩

圣·彼得堡治安保卫厅日志里记载了托尔斯泰的一举一动，甚至连他的衣着也记录在案^⑪。

第一天：“托尔斯泰伯爵穿着打了几处补丁的短上衣，腰间系一根灰色腰带，着深色的裤子（裤腿不塞进靴筒里），头戴编织的深灰色圆帽，手里拿了根

手杖。”

于某小时，“列夫·托尔斯泰、比留科夫和上面提到的那个农民去安尼奇卡桥，从那儿坐有轨马车去艺术院。托尔斯泰伯爵坐顶座，到了喀山教堂边，他坐进了车厢。车厢内有几个大学生，立刻走上前跟他交谈，央求他参加他们大学举行的典礼，托尔斯泰表示赞同。一个大学生便立刻抓住他的手亲吻。参观艺术院以后，同一批人以及处于退伍骑兵上尉特别监视下的弗拉基米尔·契尔特科夫一同坐车去看望契尔特科夫的母亲……”去冬宫时托尔斯泰换下了打补丁的短皮袄，穿上较好的衣裳。官方报告中这样写道：“去冬宫时，托尔斯泰穿上黑羊皮翻领的厚呢大衣，裤子深灰色，头戴灰色礼帽。”

从警察当局这记述中我们还得知，托尔斯泰跟“处于警察局秘书的特别监视下的比留科夫”一道去了涅瓦大街的糖果店，去了几家书店，在理发店里理发修胡子。

在彼得堡期间托尔斯泰跟“姑奶奶”亚历山德拉·安德列耶夫娜产生分歧。“姑奶奶”不理解自己的老朋友了。

托尔斯泰正处于为信仰基督而受苦受难的弃绝仪式教派的故事所产生的印象的影响之下。他来此

送别为援助弃绝仪式派教徒而受苦的两位好朋友。这一切残酷的行为是政府以沙皇的名义干的，而亚历山德拉·安德列耶夫娜却忠于沙皇。“姑奶奶”所生活于其中的东宫的奢侈、宫廷气氛以及她想“拯救”他的愿望，这一切使得托尔斯泰气愤。跟“姑奶奶”在肖斯塔克见面，托尔斯泰毫不容情地说出了自己的意见。“姑奶奶”失眠了一夜，决心第二天见面时拯救“可怜的列夫”，向他揭示真理之所在，这就更使他气愤了。

“姑奶奶”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道：“说起来都可怕，一方面是对真理的爱、对人的爱、对上帝和对那个其全部伟大之处他不愿也不能理解的导师的爱，另一方面，则是高傲、黑暗、无信仰、深渊……”^②

而托尔斯泰认为“姑奶奶”是个“死气沉沉的、不与人为善的、可怜的人”，他觉得，她被“可怕的骄傲情绪控制了”。

托尔斯泰从彼得堡回到伯爵亚当·华西里耶维奇·奥尔苏费耶夫的田庄里，在此他暂住下来，继续写论文《艺术论》。

虽然奥尔苏费耶夫一家人属于高等贵族，但是，他们朴实、真诚、平易近人，这使得周围的人与他们亲近。各个阶级和各种职业的人都涌到他们家里来，

其中有医师、女教师、女医士。他们家举办音乐晚会、假面舞会、戏剧演出、跳舞会。矮小的伯爵本人，总是满面春风，跟他手下的女职员跳玛祖加舞。而托尔斯泰瞅着这快快活活的场面，也恨不得下池跳舞了。

托尔斯泰在莫斯科又重新陷进了城市忙碌的漩涡之中，要接待无数的人，有无数的事要操心。

从英国来了个名叫阿尔梅勒·莫德的英国人。他是该国农业公社的成员，俄国话说得很好，对托尔斯泰的观点很感兴趣。往后他成了托尔斯泰著作最好的翻译家之一。

恰好这时人们纷纷谈论诺贝尔奖金。传出消息，说是奖金将授于托尔斯泰以表彰他捍卫世界和平之功。在托尔斯泰看来，对于捍卫世界和平的事业，没有人比弃绝仪式派教徒们做得更多了，因为他们拒绝服兵役并为自己的信念惨遭残酷迫害。诺贝尔奖金理应授于他们。托尔斯泰为此写了一篇文章并寄给瑞典报刊。

与此同时，从高加索继续传来激动人心的消息：伊·米·特列古波夫被捕，将流放库尔良德省五年。

春天，雅斯纳雅·波良纳来了一批莫罗勘教徒。他们来自萨马拉省那个托尔斯泰曾经喝马奶酒以治病并陶醉于原始的草原生活的同一县份。当局强行

夺走莫罗勘教徒的孩子（因为孩子们没有受洗），并把他们送到修道院里去教养。莫罗勘教徒们请托尔斯泰出面为孩子们说情。正如在大多数俄国各种教派的农民中间一样，托尔斯泰在这批流浪的莫罗勘教徒身上也深感他们具有强大的精神力量、平静的坚忍不拔的精神以及对自己正义的信念，而他们的故事给人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第二天，1897年5月11日，托尔斯泰写了一封信给沙皇：

“皇上：我请求您在读这封信时忘记您或许听到的有关我的那些话，暂且丢开一切先入之见，愿您在这封信中看到惟有对那些无辜受难者的祝福，以及对您本人更大的祝福，因为您就是自然而然判定他们有罪并使之受苦的那个人。

“一个月以前，于布佐鲁克县之齐姆良卡村，信奉莫罗勘教的农民契别列夫家于深夜两时许来了一名军曹和几名警察，命令将小孩们唤醒，为的是把他们从父母身边带走。什么也弄不明白的小孩子们惊恐万状——一个十三岁，一个十一岁，给他们穿上衣服并带到院子里。但是，当军曹想夺走一名两岁的小女孩的时候，母亲夺过女儿不肯交出来。这时警官便说，如若母亲不肯交出女儿，便将她捆绑。那位父亲

便劝说妻子交出婴儿，他要求警官出示根据何种命令以夺走小孩之文件……

“这事过了几天以后，在另一村庄……又来了一名军曹和警察，命令两个小女孩（一个十二岁，一个十岁）离家上路。

“同一晚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同一村子的另一农民家中，他家一个五岁的独子被抢走。抢走这婴儿时其情形尤其惨不忍睹。这个小孩是全家的欢乐和希望，因为这是夫妇许多年中唯一活下来的儿子。当这孩子被抢走的时候，他正生病发高烧。那时院子里已经蒙蒙亮。母亲请求把他暂时留下，但警官不同意，并根据断言小孩在旅行途中决无危险的医师的意见，命令军曹夺过婴儿并把他带走。母亲仍请求警官允许她自己送儿子到布佐鲁克城。进城后从母亲怀里夺走了婴儿，她就再也见不着儿子了……

“据说，这么做是为了支持正教，但是，正教最大的敌人也不可能想出使人厌恶正教的更可靠的手段，有如这类流放、牢房、从父母怀中夺走婴儿之举了。

“皇上，请您暂时摆脱那些人（我不说他们是恶人，但确系迷途之人）。他们把您引向一个骗局，说什么必须因信仰之罪而迫害人，请您凭自己善良的

心和正直的头脑判断，您应当怎样信奉您认为是真理的宗教，又应当怎样对待那些信奉另一种宗教的人们呢？

“请您借这次机会做件好事，这事唯有您一人可以做到，并且显然命中注定要由您来做。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做了这件事，您不但做了惟有帝王方能完成之诸般善事中之一项，在历史上和人民的记忆中占据崇高的地位，而且，比这一切更加重要的是，您将赢得内心的满足，意识到您在完成上帝的意旨，完成上帝交付您的事情……”^⑬

自告奋勇将这封信呈交彼得堡的是 H A·布朗日。他常常来看望托尔斯泰，近年来对托尔斯泰的学说越来越感兴趣。

据了解，这封信呈交到沙皇本人手里，这是由于朋友们（柯尼、奥尔苏费耶夫和亚·安·托尔斯泰娅）奔走的结果。沙皇读了这封信没有？托尔斯泰没有恶意和愤怒，只希望帮助沙皇睁开眼睛看一看那些以他的名义所做的极其残酷和愚蠢的事情，这一点，沙皇是否了解？不得而知。

四个月过去了，孩子们没有归还给那十六个家庭。托尔斯泰给彼得堡的朋友们写信，请他们帮助，毫无结果。1898年初，在彼得堡朋友家作客的塔妮娅

·托尔斯泰娅收到父亲的一封电报。父亲通知她，莫罗勘派教徒们已经去彼得堡为自己孩子们的事奔走，要塔妮娅帮助他们。

塔妮娅去找了巴别达诺斯采夫。巴别达诺斯采夫是否收到了皇上关于归还小孩的命令？或者，他害怕此事过分声张？不得而知。虽然俄国报刊害怕迫害而不敢声张（只除了一家极端保守的报纸《公民》表示愤怒，反对在与教派斗争中采用那些残酷手段），可是在国外的报刊上却广泛报道了关于从莫罗勘派教徒身边夺走小孩的消息。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巴别达诺斯采夫亲切地接待了塔妮娅，向她保证，小孩子定会回到父母身边。回到家，塔妮娅收到他如下的一封信：

“塔吉雅娜·里沃夫娜女士：

“我建议莫罗勘派教徒们不要在此等待了，要他们回去，于萨马拉找省长办理此事，我今日已写信给该省长，我想，孩子们大概即将交还。您忠驯的仆人K·巴别达诺斯采夫”。^⑭

巴别达诺斯采夫没有失言，小孩子们归还给了他们的父母。

这类不断保卫被压迫者的工作花掉托尔斯泰许许多多的精力。但是，为别人服务，正如他的宗教哲

学文章一样，他认为是自己良心的主要事业。

- ① 《列·尼·托尔斯泰致夫人的书信集》，1913年版，第503页。
- ② 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三卷，第469页。
- ③ 同上，第470页。
- ④ 《哈泽·穆拉特》序。
- ⑤ 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一卷，第199页。
- ⑥ 《文学遗产》第三十七、三十八卷，第633页。
- ⑦ 古谢夫：《托尔斯泰年谱》，第534页。
- ⑧ 《列·尼·托尔斯泰致夫人的书信集》，第514页。
- ⑨ 柯尼：《在生活的道路上》，第二卷，第38页。
- ⑩ 列宾：《又远又近》，艺术出版社1937年版，第494页。
- ⑪ 《生活和创作纪念文献汇编》，治安保卫厅记录，第4号，第192—195页。
- ⑫ 《列·尼·托尔斯泰与亚·安·托尔斯泰娅伯爵小姐通信集》，第33页。
- ⑬ 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三卷，第497页。
- ⑭ 同上，第509页。

第五十二章

“显然应该这样”

谁也不了解，托尔斯泰有怎样的体验，多么悲伤、痛苦，可能还有类似忌妒的感情，这些都折磨他孤独的、高傲的心灵……

失去了亲近的朋友契尔特科夫和比留科夫这件事，还难以跟他目前所体验之事相比。玛莎……每天早上手里拿着刚刚抄好的父亲的手稿无声无息溜进他书房的那个玛莎，捕捉他的每一个思想，以父亲的生命为自己的生命，以他的兴致为依归，这个玛莎，她是多么深深理解为别人服务的快乐，她严格素食，睡的是铺了薄薄一层褥子的木板床，因而损害了她的体质……这个玛莎……多么聪敏，多么精力充沛

啊！……她发生了什么事？那个少爷气派十足、漂漂亮亮、外表很吸引人的生物——尼古拉·列昂尼多维奇·奥波连斯基公爵——为什么跟她坐在一起呢？他两人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

柯利亚是托尔斯泰的亲外甥女莉赞卡·奥波连斯卡娅的儿子，比玛莎小两岁，住在托尔斯泰家，因为莉赞卡家境贫寒，支撑一家有困难，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便建议让柯利亚住在自己的家里。柯利亚在大学法律系毕业，他不听课，功课只做那非做的不可，以便应付考试。这个可爱的、正直的、不蠢的小伙子，不是酒鬼，也不是赌棍。他起床很晚，直到开早饭的时候，他慢吞吞地抽烟，品尝烟味，吐出一个个烟圈，姿态优美地伸出蓄了长而弯曲的小指甲的考究的手，他讲究吃喝，大老爷式的慷慨打发酒钱，虽然他兜里从来缺钱，他贵族老爷式的念出 *p* 这个流音。柯利亚是个具有公爵臭架子的大少爷，一只绣花枕头。可是，对于父亲，对于周围的人来说，玛莎却从此很少露面了。现在，她跟柯利亚坐在一起，一坐就是几小时。他们交谈着，而在她灰色的、沉思般的眼睛里却显露出柔和的、温暖的光芒，还有简直如同自知有罪似的笑意。玛莎爱上了柯利亚·奥波连斯基，爱得狂热，丧失理智，已经无法阻止她嫁给他

了。母亲坚决反对，无济于事，父亲痛心地忧虑，无济于事，但是，父亲没有劝阻她。玛莎是父亲的助手和知心朋友，失去她，对他来说，太伤心了，这一点可能会影响他对她出嫁这件事的态度，而他唯愿她幸福，不考虑自己。

“玛莎！”父亲写信给她，说：“我看到你势不可挡要结婚的意图，我不会说出一句话加以反对……看看你最近的生活比以往懒散和奢侈，再看看柯利亚的生活习惯和观点，可以断定你们不会象玛丽娅·亚历山大洛夫娜*那样过日子了，这样一来，你们需要安家用的一笔数目可观的钱财。对你来说，除了结婚这件事，即夫妇爱情而外，此中还有另一主要原因——还要准备抚养孩子。孩子和衣食。这是非常困难和明显的——将独立平静的生活改换成最复杂沉重的痛苦生活。你们对这点怎样看待？他有什么想法？……你是否打算要求接受你那一份遗产，他是否打算去服公务？在何处？请你抛弃那个念头，以为你丈夫服公务就会改变我对他的态度，以为你不反对接受你那份遗产的意图会改变我对你的评价。我了解你并且继续爱你，比这点要深刻得多。你的任何缺点

* 玛丽娅·亚历山大洛夫娜·施米特——托尔斯泰的追随者，一生过自食其力的清苦生活。

不可能改变我对你的认识以及与此相连的对你的爱。我自己过去和现在都有许多缺点，因此我深知，这些缺点有时往往占了上风。只坚持一点：处于这些缺点之下，处于这敌人及其权力之下，我仍然要大吼一声：决不投降，再来较量一下，我要跟它们斗争到底。我知道，你也会这么做的。那就这样做吧！只是‘应该想一想，再好好想一想’。”^①

玛莎还没来得及出嫁，她就碰到了一堆困难。神父不愿为她举行婚礼，因为要求忏悔和领圣餐的证明书，而玛莎已有多年没有祈祷过。柯利亚打算收买神父，玛莎把这一打算告诉了父亲。五月玛莎结婚的前夕父亲明确说出了关于她的决定的意见：

“结婚而又不相信圣礼仪式，正跟斋戒祈祷而又不相信它一样，是很不好的，且不说为了使自己免于虚伪，反而偏要撒谎，更有甚者，还得收买另一个人——神父；为了收买他，为了摆脱令人不愉快的那一套手续而花费一百五十卢布——这很不好。当必须斋戒祈祷时，你本可以不斋戒祈祷，因为你不能。而倘若你既然可以举行婚礼和收买神父，那么，没有什么理由不斋戒祈祷了。”^②

玛莎便去忏悔。

第二项折衷办法也不见得容易。在分家时玛莎

拒绝接受她那一份财产。而柯利亚·奥波连斯基身无分文，干活又不会也不愿意，因此，这对新婚夫妇简直无以为生了。事情只好按如下的办法处理：谁的财产比较值钱（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和谢辽沙），就从谁的名下拨出一部分钱给玛莎。这个办法很复杂。母亲和兄弟们努力不表露对玛莎原先不要遗产的这种“把戏”（他们如是说）的不满，但是，由于这件事而引起的令人痛苦的不和谐之感在家里却继续存在。

1897年6月2日，玛莎跟柯利亚·奥波连斯基结婚。婚礼上宾相只有两人：米沙·托尔斯泰和柯利亚的兄弟。他们步行去教堂，有什么穿什么，穿的是平素的衣裳。玛莎离家远行了。

塔妮娅又如何呢？托尔斯泰素来具有洞察人类心灵的本领，他感到塔妮娅逐渐离开他了，因为塔妮娅沉于幻想，因为她不断旅行，因为她丧失了对父亲的精神生活、对他的朋友们以及E·H·波波夫的兴趣了。波波夫是个生有一对绵羊似的眼睛的美男子，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他跟她相处多年，所谓 *amitiè amoureuse**。父亲不敢猜测。

M·C·苏霍京身上有什么东西吸引塔妮娅呢：

* 法语；互相爱慕，

大概，这一点她自己也说不清。旁人则简直想象不到，塔妮娅有那么多争先恐后追求她的年轻人可供她选择，她却偏偏如此严肃地、不可救药地爱上了这个老头子。

苏霍京已经结过婚，有六个儿女，大儿子列夫是米沙·托尔斯泰的同庚。谣传苏霍京夫妇不和，双方都不忠。有的人把苏霍京叫做淫棍。而实际上，苏霍京倒也是不知为什么妇女们总爱对他们垂青的那一类人中间的一个。只须看一眼他那双聪明的、灰色的、狡猾地眯起来的眼睛，跟他交谈的人就会明白，此人决不会说出粗鲁庸俗的话，并且立刻变得对他感兴趣了。但是，与此同时，托尔斯泰家里没有一个人不对他反感。

当苏霍京的妻子死了的时候，塔妮娅的良心受到折磨。她痛苦，因为苏霍京的妻子还在世时，塔妮娅就跟苏霍京谈到过他们的爱情，虽然她从不允许他作任何亲近的表示，甚至不允许接吻。塔妮娅对父亲长期隐瞒了她的爱情，而父亲也乐于不去觉察，乐于不去相信他的女儿这个水晶般纯洁，才气横溢、无所不知和聪敏过人的塔妮娅竟然会落进那个百孔千疮、阅历不浅的老光棍的怀抱里。这个思想使父亲遭受尖锐的、几乎是肉体的痛楚。

得知苏霍京的妻子死了，塔妮娅慌乱了。怎么办？她所爱的那个人自由了。建立自己的窝巢，也许，自己生儿育女（她常常幻想生儿育女）……但从另一方面看，上有父亲，还有全家对苏霍京的反感，六个前妻的儿女。

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大发雷霆。1897年5月6日她写信给丈夫：“讨厌的苏霍京，把老婆不当人。干瘪下流的灵魂！只晓得追逐姑娘们！”^③她恨他。

甚至连温驯的玛丽娅·亚历山大洛夫娜·施米特也持异议。她非常喜爱塔妮娅，称之为“温柔的小鸽子塔妮奇卡”，她没有一刻把塔妮娅的钟情认真对待。当塔妮娅告诉她，自己真正爱上了苏霍京时，她说：“你得放弃！我亲爱的！你得放弃！异想天开，这里头有啥爱情？他不配跟你成双结对哩！”

1897年7月10日，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在日记中写道：

“经历了沉重的、非常沉重的考验。那件我生怕塔妮娅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已经确定无疑。她爱上了苏霍京并跟他商谈结婚的事了。我们偶然不露痕迹地跟她谈到这件事。她看起来也觉得应该说出来了。她跟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也谈过话了。当初我首先告知他这事时，他发呆了，似乎突然泄了气，痛心

疾首，简直要绝望了。这几日塔妮娅总是哭，她看来已经意识到，那将是她的不幸并写信拒绝他。”^④

这个夏天过得很沉闷。托尔斯泰很孤独。玛莎不在，惟有她能够带给他心灵以朴实的温暖的爱抚。

他跟妻子的关系同样也很昏暗和不稳定。“我们的生活是病态的，”我们在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1897年6月2日的日记中读到这样的话。“在其直接意义上，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有某种东西使我害怕：他消瘦了，头疼——这是厉害的忌妒情绪！我有错吗？我不知道。每当我跟达涅耶夫接近时，我往往想，到了老年交上这样一个朋友多好啊！他文静善良，才气横溢。我羡慕他跟马斯洛夫一家的关系，但愿对我也同样……这有什么不好？”^⑤

古怪的、极不自然的她跟达涅耶夫的关系在继续。6月3日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在日记中写下了她的感受：“在由于谢尔盖·伊凡诺维奇的到来而引起的不愉快事情之前，我感到折磨人的恐惧。”^⑥

“达涅耶夫弹了两支蒙德尔松的未填词的歌曲，整个灵魂都翻了过来。”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在6号4日的日记中这样写，“唉！这歌曲真美！尤其是其中的一首真是动人心弦。”^⑦

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怀着某种执拗的绝望情

绪练习音阶，弹奏古诺的练习曲，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一心想把指头练得灵巧——这对于一个五十三岁的女人来说倒也不可思议。有着很好的听觉并且也在学音乐的萨莎，“未填词的歌”的曲调她早已背熟，她知道，母亲为了想使音调好听，便在某些地方拖了节拍，结果是磕磕碰碰不成其为音乐了……萨莎憎恶这些曲子。

除此之外，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还得寸进尺，责备丈夫，要求他将自己的全部版权交给她。她明明知道，丈夫真想抛弃一切并且开始过他认为非那样不可的生活，他要言行一致，贯彻到底。但是，她却不厌其烦地老调重谈，说什么她是个纯洁之至的女人，无辜受罪的女人，为了丈夫和全家牺牲了她的美妙青春，牺牲了她在绘画、音乐、甚至文学方面的天才，这天才因为他而不可能得到发展。她不了解，只有当所作出的牺牲是心甘情愿的并且从不开口数说它的时候，这种牺牲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她总是不厌其烦地喋喋不休，数说她一贯有理，作了重大牺牲。而父亲呢？他从没说过他把财产给了家里，他为了这个家继续在跟他的信念相违背的环境中生活，他认为自己在家庭面前有罪，在上帝和世人面前有罪，并且怀着欣慰的心情承认这一点。

这一年，托尔斯泰老了许多，一系列事情的重担压在他肩上：万尼奇卡的死，玛莎出嫁，朋友们被流放，他本想在妻子身上看到精神上的再生，结果变了变了，却采取畸形的不自然的形式。怀疑折磨着他。怎么办？为了妻室儿女继续担起这个在各方面都与他的信念相违背的生活重担，还是离家出走呢？

7月8日，他写了一封信，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收到这封信时已在他死后了。信归玛莎保存，而在玛莎死后，则由她丈夫柯利亚·奥波连斯基保存。

“亲爱的索尼娅！”他这样写道，“我的生活跟我的信仰相违背，这很久以来就使我痛苦。强迫你们改变生活方式，强迫你们改变我让你们养成的习惯，我是做不到的；离家出走，这以前我也办不到，因为考虑到我会失去儿女们，而他们当时年纪尚小（虽然我能给他们的影响不大），我使你们吃了苦头；十六年来，我时而抗争，使你们气恼，时而自己又陷进我已习惯并被包围的诱惑之中，这种生活要再继续下去我也办不到了，因此，我现在已经下定决心做那我早就想做的事——离家出走。因为：第一，随着我年岁日老，这种生活变得越来越沉重，我越来越渴望离群索居；第二，因为儿女们已经长大成人，我对家庭的影响已经不必要了，而你们都有较实际的利益和

兴致，我离开，对你们来说，不大会感觉到的。主要之点在于，好比印度人一过六十岁就进深山老林去修道一样，好比任何一个笃信宗教的老人渴望将生活的暮年奉献给上帝，而不是闲来无事开开玩笑、说说双关话、嚼嚼舌头、打打网球，我已进入七十高龄，灵魂的全部活力都但求安宁、离群索居以及虽不敢企求完全的和谐，至少也该不让自己的生活跟信仰与良心背道而驰吧！倘若我公开这么做，那么，一定会引起你们的劝阻、争吵、埋怨，我也会软下来，决心也可能动摇，而它是必须实现的。因此，我请求你原谅我，如果我这举动使你们痛苦，请你，索菲娅，在内心深处放我自由，请别去寻找我，别埋怨我，别责备我。

“我离家出走，这并不证明我对你不满。我知道，你不能，实实在在不可能改变你的生活，不可能为你尚未觉悟到的事情作出牺牲。因此我决不责备你，相反，我怀着深深的爱与感激之情回忆长达三十五年的我们共同的生活，这一时期的前半部的岁月尤其令我怀念，那时你以天生的母性的自我牺牲精神坚定和热情洋溢地承当着你自己认为是天职的重负。你给了我和这个世界你所能做的一切：许多爱和自我牺牲，不能不为此而珍重你。可是，我们生活的这一

段时期——最近十五年——我跟你意见分歧了。我不能设想我自己错了，因为我知道，我的变化不是为了我自己，也不是为了别人，因此，我没有别的办法。你不跟我走，我也不怪你，只是感谢你并且现在和将来都怀着爱情怀念你所赋予我的一切。

“别了，亲爱的索尼娅！

爱你的列夫·托尔斯泰”^⑧

但是，离家出走没有成功。

8月托尔斯泰写信给在英国的契尔特科夫：

“倘若我能在孤独之中，主要的是在不折磨和违背良心的环境之中度过此生最后的时日，那将是多么幸福啊！很明显，应该这么办。至少我找不到别的出路。”^⑨

初夏良辰，玛莎和她的丈夫是在奥斯西亚尼可沃度过的。8月份，她患了肠伤寒，移居雅斯纳雅·波良纳。秋天奥波连斯基夫妇去克里米亚，塔妮娅也到了那儿，随身带了伊里亚的小儿子安德列·托尔斯泰。他非常憔悴，一直发高烧，看来是早期肺结核。

托尔斯泰10月写信给在雅尔达的女儿玛莎：“爱你和被你爱已经成了我的习惯……你出嫁以后我是否感到别离之苦？对，感觉到了，但不愿感觉到，将不会了”。^⑩

在自己家里一堆一堆外人甚至讨厌的人包围之中，托尔斯泰不可能求得安静以熬过自己的痛苦。一批批客人访问雅斯纳雅·波良纳。

著名的精神病学家罗姆卜罗佐从开了医生大会的莫斯科来到这儿。

“他是个目光短浅、趣味索然、病态的老头儿。”托尔斯泰写信给比留科夫这么说。

8月11日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作了记载：“早晨罗姆卜罗佐来了。他是个矮小的、腿有病的老头……我找他谈话，可他很少说出令人感兴趣的话来。他说，犯罪率，除开英国，在世界各地都在增长，他不相信俄国犯罪率的统计材料，因为俄国没有出版自由。”^①

罗姆卜罗佐后来告诉别人，他打算来找托尔斯泰时，莫斯科“雄赳赳的警察总监”警告他，说是托尔斯泰的头脑有毛病。当罗姆卜罗佐转回程时，他问罗姆卜罗佐：托尔斯泰怎么样？

“我觉得，”罗姆卜罗佐回答，“这是个疯子，他比许多有权势的蠢人要聪明得多。”^②

这个夏季托尔斯泰完成了论文《艺术论》。塔妮娅买了一件新鲜玩意儿——列米格顿牌打字机。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用它来无数次打印文章。6月

19日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在日记中写道：“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不要命地写作《艺术论》，别的事都不干，快写完了。”^⑬

他正在写作《艺术论》的时候，各项艺术在雅斯纳雅·波良纳正大放异彩。在塔妮娅的工作室里——列宾曾经有个时候在此工作，室内还保存了盖“爷爷”的几幅著名的油画——现在，雕塑家金茨贝格正在给托尔斯泰塑像，卡萨特金和佩斯杰尔纳克在作画。塔妮娅这间工作室变成了类似俱乐部的东西，在这儿，白天客人们聚集在一起，有画家、钢琴家、托尔斯泰家里的人。到了晚上，在客厅里则有达涅耶夫和戈里顿维伊则尔弹钢琴，常常两架钢琴同奏。有时，喝过晚茶以后，托尔斯泰朗读自己的论艺术的文章。

这篇论文被颂扬，但颂扬时缺乏热情。音乐、文学、造型艺术中新潮流象瘟疫一样传播开来。来自艺术界的人物怎么会接受托尔斯泰的革命观点呢？他在论文中论证，当艺术并非全民的艺术，而只为少数富人阶级服务的时候，它便变成了一种职业。

“我们这个圈子里的当代艺术已经变成了荡妇。”

“真正的艺术作品在艺术家心中出现得非常稀

少，那是作为他前此生活的结果而出现的，就好象母亲怀胎一样。虚假的艺术作品，只要有人要，可以由工匠和手艺人不断制造出来。”

“真正艺术作品出现的原因是表达积累的感情的内心的需要。虚伪的艺术的起因是自私心，恰好象卖淫一样。”

“可能，在将来科学会给艺术发现新的、高尚的理想，而艺术则使它们得以实现；但现在的艺术的使命是明白和确定的。基督教艺术的任务便是实现人与人之间兄弟般的团结。”^④

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抄写略沃奇卡的这些议论感到枯燥。如果他写的是艺术作品，那倒是另一回事了。9月4日她在日记中写道：“我要寻找一个充实自己心灵的东西，便爱上了音乐，读音乐方面的书，而主要的是猜度音乐中所包藏的复杂的人类感情。但是，我陶醉于音乐之中，在家里不但得不到同情，反而受到厉害的责备。这一来，我又重新感觉到生活没有内容了。我伏在桌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十来遍抄写谈艺术的枯燥论文，力求在此寻找尽自己的职责所带来的欢乐，可是，我活生生的心灵都奋起反抗，渴望个人的生活。”^⑤

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心里对丈夫抱着这种态

度，那就难怪只须一个极小的口实就会大吵大闹了——因为一篇文章（卡尔宾忒尔《当代科学》序言）寄给了《北方导报》，而未经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的允许；因为托尔斯泰在日记中有直言不讳的记载。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气急败坏，责骂丈夫，一气冲走，对谁也没说她上哪里去了。

“今日他在日记中写下了，说我第一次承认自己有罪，”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这真令人高兴！我的上帝！开恩帮助我度过这难关吧！在子孙万代面前，你再次扮演受苦人，而我却变成了罪人！有什么罪？列·尼大发雷霆，因为一个月以前我跟柯斯佳叔叔一道去探访了因脚有病躺在床上的谢尔盖·伊凡诺维奇。由于这个原因，列·尼大发脾气，不去莫斯科并且认为我有罪。”^⑩

10月末托尔斯泰收到一封信，使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惊恐万状。她把此信给所有的人看，请求杜纳耶夫别丢开托尔斯泰不管。

信是一个匿名的记者写的，信中说：“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伯爵！毫无疑问，您的宗派发展了并深深扎下了根子。虽然这个宗派没有群众基础，但由于魔鬼的帮助和世人的愚蠢，您已经完全成功地欺凌了我主耶稣基督，我们要为他报仇。为了反对你们这些

进行地下活动的人，我们得进行地下斗争，为此我们组织了‘第二批背负十字架者’秘密集团，其目的就在于杀死您和您的信徒——您的教派的头头……拈阄决定此任务落在我这个不配之人的头上：我要杀死您！预先告知您日期：1898年4月3日。

“可能，您不难向我提出一个合乎逻辑的问题：为什么矛头只对准您们这一个宗派？不错，所有的宗派都是对我主的亵渎！但它们的坛主都是些无足轻重的小人，跟您是有天渊之别的，伯爵！因为，第一：您是皇上和祖国的敌人！……好！等到10月3日，必见分晓。

“‘第二批背负十字架者’抽签杀人第一条好汉。1897年10月于勇士村”^①

对于这个威胁，托尔斯泰处之泰然。“一切自有上帝安排。”他对妻子这么说。

有时托尔斯泰骑马去奥夫西尼可沃村看望施米特老太太。

抄捷径走林间小道，他骑在马上时不时得弯下腰以避开树枝，经过一条深沟，经过柯兹洛夫卡—扎谢卡车站，想绕过建筑在大道两旁的几栋别墅，再经过奥夫西尼可沃村，走上田野，过了一道不大的池塘的堤坝，托尔斯泰便放马小跑（这是一匹深灰色的卡

尔巴尔达马，名叫小家伙），到了老太太施米特的住处。她远远地看到托尔斯泰飘飘的大胡子，看到他头戴白帽的稳健的身躯安然坐在马上，老太太施米特便迎着他飞跑过来。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我的好人！”……她一双大大的、深深凹进去的灰色眼睛里闪耀着快乐的光芒。她晒黑了，很瘦削，光泽的头发逢中分开，梳理得平平整整，疲惫的瘦脸上肌理分明，穿着麻布衣裳，她这整个人，显得完整、清洁、洋溢着纯洁的心灵的活力。

玛丽娅·亚历山大罗夫娜整天劳动。她收入的主要来源便是一头叫马涅奇卡的奶牛以及草莓子。她有一个小小的菜园，但所种的蔬菜只够自己吃。草莓倒是一笔收入来源。那个种草莓的园子整理得井井有条，杂草拔除干净，铺上一层干草。夏季每日清晨，塔妮娅雇来守护庄园的看门人米隆内奇套好了黑阉马（这马不知为什么叫皮达丘克），玛丽娅·亚历山大罗夫娜往车上整整齐齐搁好一罐罐牛奶、一筐筐草莓，然后乘车前往柯兹诺夫卡别墅去卖掉自己的产品。别墅里的贵人们把她当成了普通的农妇，称她为“你”，有时甚至态度粗鲁。柯兹诺夫卡离奥夫西尼可沃仅仅两俄里半，但玛丽娅·亚历山大罗

夫娜路上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皮达丘克是只萎靡不振的家伙，它全然不顾玛丽娅·亚历山大罗夫娜挥动长鞭和口里吆喝，依然不慌不忙慢慢地走它的路。它早就了解透了，玛丽娅·亚历山大罗夫娜原则上反对使用暴力，决不会打它，因此，它只是摇摇它那沾满飞廉的稀稀拉拉的尾巴，丝毫也不加快步伐。玛丽娅·亚历山大罗夫娜整天干活，晚上就抄写“敬爱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被禁的文章，抄了她就把它们分送亲友。

看来，所有托尔斯泰主义者中间，只有玛丽娅·亚历山大罗夫娜是个唯一的言行一致贯彻始终的分子。虽然她体力疲惫不堪，“纯靠精神维持（相邻的农民如是说），但她是幸福的。她的茅屋，她自己称为“宫殿”，里面干干净净、舒舒服服。沿着墙壁，摆满了一架架的图书，墙上挂了托尔斯泰的几张像，房里一张硬板床，永远清洁的被子叠得方方正正，房间中间摆下一张桌子，屋角里是一只俄罗斯式的火炉，炉子里烤她的酸甜黑面包。

大家都爱玛丽娅·亚历山大罗夫娜。邻近的农民爱她，他们对他们产生过很大的良好的影响。他们的孩子们爱她，找她借书去看。托尔斯泰的朋友们，阴沉的也好，开朗的也好，都爱她。她对待所有的人都

和蔼可亲、温存体贴。

在《施米特老太太》一书中，她描绘自己没有任何说教和假仁假义的成分。她那贵族女子中学的老派装束，她那表示欣喜或厌恶的惊叹声，只令人觉得好笑，一点也不使人反感。她自己往往嘲笑自己的缺点。她虽然是个严格的素食主义者，但她禁不住也非常爱吃的一小块青鱼的诱惑。“亲爱的！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别再约束我吧！”她感叹道，“我又被诱惑了。唉！有罪呀！”或者，她向托尔斯泰忏悔说：“哎哟！亲爱的好人！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我又生气了！我又生气了！小家伙把草莓子扯坏了，这些没良心的坏家伙”……

在这儿，在施米特老太婆的“宫殿”里，托尔斯泰找到了生活的纯朴、精神上的休憩和内心的温暖，这在他自己的家庭的环境中是找不到的。

① 《列·尼·托尔斯泰致玛·里·托尔斯泰娅书信集》，1926年，第242页。

② 同上，第244页。

③ 索·安·托尔斯泰娅：《致列·尼·托尔斯泰书信集》，科学院出版社。

④ 《索·安·托尔斯泰娅日记》，第二卷，第135页。

⑤ 同上，第二卷，第111页。

-
- ⑥ 同上，第二卷，第 111 页。
 - ⑦ 同上，第二卷，第 112、115 页。
 - ⑧ 《列·尼·托尔斯泰伯爵致夫人书信集(1862—1910)》，格鲁津斯基编，1913 年，第 524 页。
 - ⑨ 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三卷，第 517 页。
 - ⑩ 《当代记事》，1926 年，第二十七卷，第 245 页。
 - ⑪ 《索·安·托尔斯泰娅日记》，第二卷，第 157 页。
 - ⑫ 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三卷，第 519 页。
 - ⑬ 《索·安·托尔斯泰日记》，第二卷，第 125 页。
 - ⑭ 《艺术论》，全集第十九卷，瑟京出版社，1913 年。
 - ⑮ 《索·安·托尔斯泰娅日记》，第二卷，第 169 页。
 - ⑯ 同上，第三卷，第 6 页。
 - ⑰ 同上，第三卷，第 11 页。

第五十三章

托尔斯泰的社会活动 《复活》——为弃绝仪式教派而作

倘若有人对托尔斯泰说，他本人是“社会活动家”，那么，他大概会坚决反对这种说法。他不能忍受把人作刻板的界说，诸如“社会活动家”、“进步人士”、“自由主义者”等等。但实际上托尔斯泰总是忙于处理各种“社会问题”：办学校，调解纠纷，赈济灾民，参与弃绝仪式教派运动，组织向他求援的莫罗勘教徒们及其孩子们移居加拿大。

1898年春，俄国许多省份，如图拉省、奥尔洛夫省、萨马拉省、乌菲省和喀山省，都发生了饥荒，向托尔斯泰求援的信函雪片似的飞来。赈救饥民的组

织对于托尔斯泰来说早已不是陌生的了。象往常一样，他想赶快脱离他所讨厌的城市，于是决定跟想去探看孙子们的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一道下乡去儿子伊里亚家里，那儿正好是闹饥荒的地区的中心。

第一件要做的事情便是确定农民急需的程度。正是早春时候，这本是托尔斯泰最喜爱的季节。父子俩精神抖擞、心情舒畅，骑马巡视四近的村庄。不知不觉托尔斯泰被引到了一处熟悉的地方——那是屠格涅夫的田庄斯巴斯柯耶。伊里亚后来说，那时，当父亲看见古老的田庄、花园和他跟屠格涅夫剧烈争论和屠格涅夫向他朗读自己的作品的那栋房子的时候，他心情十分激动。“我非常生动地回忆起屠格涅夫，叹息他已离开人世。”托尔斯泰在写给波隆斯基的信中这么说。

在斯巴斯柯耶没有发现特别的贫困，但在比较偏僻的农村里却非常贫困。用捐款办起了二十个赈济食堂。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在日记中写道：“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立即着手干事情：巡视各村，确定何处发生饥荒。最糟的地方是尼考尔斯柯耶村，还有靠近姆岑斯基县的地方。一天吃一顿并且吃不饱。牲口或者卖掉了，或者吃掉了，或者瘦得皮包骨。疾病尚未流行。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在办赈济食堂。”^①

但托尔斯泰不能满足于对一小部分居民的暂时的援助。一个深且广的问题折磨着他：为什么俄国连年发生饥荒？他关于赈济灾民的号召逐渐变成了一篇文章《论饥荒或者不会发生饥荒？》，在这篇文章中托尔斯泰试图回答上述问题。

“今年会发生饥荒或者不会发生吗？”他设问道，“为什么不断出现人民的贫困？为了这种贫困不再重复，为了不再因救急而采取特殊的措施，该怎么办呢？”

比他那阶层中任何人都深知和热爱人民的托尔斯泰的这种议论是“革命性的”（巴别达诺斯采夫这样说）。巴别达诺斯采夫不理解，托尔斯泰是用他的写作活动企图防止革命的发生，而不是鼓吹革命，那时革命的先兆已在空中显现了。

《论饥荒或者不会发生饥荒？》这篇文章刊登在报纸《罗斯》上面。该报因此收到内务部长的第一次警告。

很遗憾，各种政府一般是瞎了眼的，并且比任何人更不了解他们所领导的人民中间发生了什么。沙皇也不知道，各地官吏以他的名义干了些什么事。

六个中学生来到雅斯纳雅·波良纳，交给托尔斯泰一百个卢布，那是他们募捐得来以救济饥民用

的。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打发这六个中学生去见神父兼本地督学。”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在日记中写道，“神父向他们指出几个最穷苦的人家。中学生买了面粉分发给这几家最穷的。警察局长带一名警察出面了，严厉禁止商人按照我们或中学生写的名单在雅辛卡村给农民分发粮食。简直无耻已极！在俄国谁也不敢向穷人施舍点东西——因为警察不准。我跟塔妮娅非常气愤，我们两人真想直接去见皇上或皇太后，警告人民中间会由于憎恨类似的措施而掀起暴动。”^②

切尔斯基县的情况还要糟糕。托尔斯泰还没来得及开办食堂，警察局长驾到。来帮忙的两位小姐被撤掉工作，局长威胁要关闭食堂。在有的村子里警察禁止农民去食堂吃饭，并且，以防万一，把桌椅板凳全都砸掉，以便农民不受诱惑。伊里亚·托尔斯泰便去找图拉省和奥尔洛夫省的省长，要求作出解释。结果决定已办的食堂可以保留，但坚决禁止再办新的食堂。

“那些认为有必要签署和执行这等命令的人，不知道他们脑袋里和内心里有何感想，他们这么做，实际上就是从饥肠辘辘的老人和小孩的嘴里夺去施舍

的那一块面包！”^③托尔斯泰如此惊叹道。

1898年8月28日，托尔斯泰七十大寿。寿辰庆典时，宾客如云，电报和贺信似雪片纷飞，这都使托尔斯泰感到很大的压力。他要对付越来越多的书信往还，感到非常吃力。书信中也提出一些严肃的问题，不管愿意不愿意，托尔斯泰必须表态。

从高加索继续传来激动人心的消息。那边来信说，托尔斯泰的朋友和信徒、援救弃绝仪式派教徒的英国大尉辛德琼可能被驱逐出境，另一名与弃绝仪式派教徒共事的托尔斯泰的同志纳卡希则已被逮捕。

“我特此通知您，我们已向玛丽娅·费多诺夫娜皇太后陛下呈文，”一个弃绝仪式派教徒写信给托尔斯泰说，“她把呈文转给了枢密院，枢密院决定转交戈里岑公爵处理……2月10日我来到梯弗里斯，见到了辛德琼兄弟，但见面的时间很短。此刻我和他已被捕了。我被关进牢房，他被立刻遣返英国……警察局长说；‘暂时收监，以后交给省长’……省长友好地跟我谈了话，建议我们于短期内出国……”^④

终于，当局决定让弃绝仪式派教徒们出国。应当决定，他们移居哪个国家为好，为此必须筹集一笔路费。

就这个问题托尔斯泰跟许多人写信商量。出现了几种方案：弃绝仪式派教徒可移居塞浦路斯岛，或美国得克萨斯州，或中国新疆，或夏威夷群岛。与弃绝仪式派观点相似的伦敦战栗派教徒对他们的命运很关心，愿意帮助他们移居国外。必须筹集路费，但登报募捐是不可能的。唯一敢于刊登为弃绝仪式派教徒募捐征集路费的报纸《俄罗斯新闻》被当局勒令停刊两个月。

托尔斯泰便以个人名义向一些阔人写信请求捐款，虽然这么做他很反感。有的人捐五百卢布，有的人一千，商人索尔达欣科夫一人给托尔斯泰送来了五千卢布。关于救援弃绝仪式派教徒的倡议书登载在国外的报刊上。战栗派教徒在英国筹募，也有人从美国寄钱来。但这一切加起来数目还不够。这时托尔斯泰决定自己挣钱来填补那不足之数。

“因为现在已经清楚了，”托尔斯泰于7月中旬给契尔特科夫的信中这样写道，“为了弃绝仪式派教徒们的移居，经费还差很多，为此我想了一个办法。我手头存有尚未完成的小说《复活》及其他作品。最近我曾写作过这些东西。我想这么干，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出卖这些作品，卖给英国或美国报刊，所得稿酬用于移居弃绝仪式派教徒……这些小说，倘若其自

身不能满足我艺术上的要求——艺术形式不通俗——那么，内容上倒是无害的，甚至可能于人有益。因此我想，要尽可能卖得贵一些，现在就出版，别等到我死了以后。把钱交给弃绝仪式派教徒移居委员会。”^⑤

托尔斯泰亲自跟田野杂志出版商马克斯谈判出卖《复活》版权的事，甚至跟他讨价还价。马克斯答应给长篇小说《复活》初版每一印张一千卢布，附带一个条件，即小说在田野杂志登载以后，任何出版社都有再版该小说的自由。

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对这一切表示不满。

她在1898年9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我的心和头脑不能容忍这件事：列·尼放弃了这部小说的作者权利以后，已经在报上公开，现在由于某种原因又必须把该书版权高价卖给《田野》出版社的马克斯，这些钱又不付给他的吃不上白面包的孩子们，反倒交给毫不相干的弃绝仪式派教徒，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爱这些人比爱自己的孩子更甚。全世界将因此知道托尔斯泰参与了对弃绝仪式派教徒的援助，而报刊和历史书籍将记载这件事。可孩子们和儿女们只好啃黑面包了！”^⑥

如期写出作品来是够折磨人的。田野杂志必须

每天刊登小说，而托尔斯泰又不能不无止境地修改自己的作品。常有这种情况，每当收到最后的清样以后，他拿了走进书房去“一会儿”（他就这么说的），以便再次浏览一遍，结果是过了几个小时以后他出来了，脸上带着认错的表情。清样上没有一块空白的地方，整行整行被删节掉，各行中间，天地头脚空白处都写满了字，清样的背面出现了全新的文字。

马克斯不禁绝望了，电报飞向国外出版商。往往新的经过修改的文稿迟到了，因而在第一版中国与国外的文字大相径庭，这种情况并不少见。能抄写的都动手抄写：塔妮娅、玛莎和她丈夫、客人们、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伊凡诺夫。

伊凡诺夫是个退伍中尉，做托尔斯泰的抄写人已经多年。托尔斯泰在希特罗夫市场上把他发掘出来，当时他正在莫斯科贫民窟里参加人口登记。伊凡诺夫是个不可救药的酒鬼，间常住在托尔斯泰家里。他来的时候一身脏，满脸胡子拉碴，衣裳褴褛，破鞋穿了洞。给了他衣服鞋袜穿，给了他吃，他便郑重其事地宣布，从此不再喝酒、永远不喝。他把眼镜架到鼻尖上，工工整整地用誊录体的一手好字抄写托尔斯泰的手稿。他一下子扮出一副不可一世的傲慢姿态并且深信，他比世界任何人都更善于辨认托尔斯

泰的潦草的手迹。常有这种情况，每当托尔斯泰小心翼翼地问他：“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请劳驾把我的稿子给我。这儿好象有点不大对头，有错误。”……

他找到手稿，气冲冲地用脏指头戳戳，把眼镜推上去，一双混浊的灰眼睛盯着托尔斯泰说：

“错误……这儿有什么错误？”他用尖细带刺的嗓子叫起来，“这儿不可能有任何错误，您这儿只有上帝才知道写些什么，我不得不一一加以改正。”

但伊凡诺夫不能长久地忍受老实安定的生活。他得到报酬以后，人不见了。有人在村子里看见他喝得烂醉。钱喝光了，新衣和靴子也换酒喝了，这位可怜的退伍中尉重新孑然一身沿着大道游荡乞讨，在下等客店里栖身。

1899年底，《复活》经过书报检查的删节在田野杂志上发表，不加删节的全文由契尔特科夫和比留科夫在国外组织的自由言论出版社出版。

长篇小说《复活》的出现是在很长的间歇之后（前一部小说《安娜·卡列尼娜》是在七十年代写的），引起了巨大的兴趣。

由柯尼告诉托尔斯泰的《复活》的主题，长期放在托尔斯泰的文件包里没有动静，虽然柯尼说的故事给托尔斯泰产生了深刻的印象，虽然答应柯尼把

它写出来。但许多年过去了。现在托尔斯泰决定自己动手利用“柯尼的故事”（一开始这小说就是这么叫的）。

柯尼告诉托尔斯泰什么故事？什么东西如此感动了托尔斯泰呢？

一个年轻人，出身良好，一次在法庭上当陪审员，他认出了被告席上有一名被控谋财害命的妓女却原来是他亲戚家的养女。他曾经诱骗过这个姑娘，她因此而怀孕。得知此事以后，她的养母把她赶出了家门。姑娘生产后，把婴儿送到育婴堂，她自己的处境每况愈下，最后陷身于下等妓院里。

认出妓女却原来是被他毁灭的那位姑娘以后，那个年轻人便去找法庭的检察官柯尼，说他打算要跟这个妓女结婚。柯尼专心听取了年轻人的说话，但劝说他不要走这一步。年轻人坚持自己的主张。婚礼前不久，那个妓女患了斑疹伤寒死了。

这个故事成了《复活》的基本主题。

第一批弃绝仪式派教徒于1898年8月移居塞浦路斯岛。这次移民是不成功的——土地少，水土不服，有人患疟疾，许多人死了。与此同时又得知加拿大政府同意给予土地，地点在阿西那巴省离约克顿四十俄里处。

开往加拿大的第一艘轮船是苏列尔护送的，他作为助手并当翻译。第二艘护送的是谢尔盖·托尔斯泰；第三艘，1899年4月起锚，护送的是弗拉基米尔·朋契—布列维奇。

弃绝仪式派教徒群众性的移民活动中止了。但是他们中间还有人在坐牢、流放、充军，还得关怀他们。英国人辛德琼和苏列尔日茨基还在高加索，他们写信告知托尔斯泰有关弃绝仪式派教徒的消息。但不止是被囚禁的人的命运令托尔斯泰忧虑。

他很不放心，弃绝仪式派教徒在新的国家里能安排自己的生活吗？能不能跟当地人民和让他们移居的政府建立起良好的关系？托尔斯泰给加拿大的弃绝仪式派教徒写信道：“……不要在你们周围的人们之中引起妒忌心和仇恨，要激发他们对你们的尊敬和善意的感情……《圣经》上说：‘去寻找上帝的天国和他的正义吧！一切福祉将百倍报偿你们。’人人都应检验这话的真理。你们知道，这话明明是真理，但是，你们却着手在尘世寻找幸福与乐观：你们会找不到的，反而会丧失天国。”^⑦

* 原注：很遗憾，托尔斯泰的担心在一定程度上不幸而言中。虽然弃绝仪式派教徒对待战争和屠杀的态度一如既往，但在年轻的各代

晚辈之间，弃绝仪式派教徒的古老传统逐渐衰微：他们喝酒、抽烟，不再是素食主义者了。一批“独立的”弃绝仪式派教徒给加拿大政府添了许多麻烦：组织游行，裸体招摇过市，拒绝把小孩送进学校，也发生过火烧学校的事情。

- ① 《索·安·托尔斯泰娅日记》，北方出版社 1932 年版，第三卷，第 51 页。
- ② 同上，第 63 页。
- ③ 《论饥荒或者不会发生饥荒》，《全集》1913 年版，第十八卷，第 88 页。
- ④ 比留科夫·《弃绝仪式派教徒》，媒介出版社 1908 年版，第 79 页。
- ⑤ 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三卷，第 548 页。
- ⑥ 《索·安·托尔斯泰日记》，第三卷，第 550 页。
- ⑦ 比留科夫：《弃绝仪式派教徒》，媒介出版社 1908 年版，第 157 页。

第五十四章

家庭的不幸

托尔斯泰家这个窝巢此时渐渐空了。跟父母在一起的，只剩下塔妮亚和两个小的，即“难对付的米沙”（索菲亚·安德列耶夫娜在日记中这样叫他），和“坏萨莎”。这两个年轻人令母亲痛心。米沙好酒贪杯，不爱学习，他志愿加入了宋姆斯柯依团。而萨莎却跟母亲格格不入，粗暴，不听家庭女教师的话。总是不断更换家庭女教师，其中只有一位英国人威尔斯小姐由于好心肠与温和体贴才对付得了萨莎。但威尔斯小姐只能在夏季来到雅斯纳雅·波良纳，她在莫斯科有个音乐学校。

安德列于 1899 年初跟加丽·契尔特科娃的妹

妹奥尔迦·季忒里赫斯成婚。最近一段时间，在奥尔迦的影响下，他身上发生了向善的转变。他不再狂欢纵饮，不再去找茨冈女人，老老实实在家里。奥尔迦是个有健全原则的姑娘，把改造安德列的重担一肩挑起来，使他跟父亲亲近。她比安德列大四岁，长得出奇地漂亮：一头梳理光亮的乌发，面色出奇的美，一双灰色的眼睛含情脉脉，顾盼有神，脸上有一层茸毛，象水蜜桃一样。看起来，她比安德列更年轻，更鲜活。

按照安德列的请求卖掉了分给三个小儿子的产业萨马拉的田庄，于是安德列买下了图拉附近的一处田庄。那里离雅斯拉雅·波良纳不远。他跟他年轻的妻子便搬到那儿住下。

同年11月14日，塔妮娅嫁给了苏霍京，第二天即跟丈夫出国去了。这次婚礼倒更象葬礼。虽然大家，从父母开始，力图忍住眼泪不流并且把自己的伤感向塔妮娅掩饰，但都偷偷地哭，父母、萨莎、施米特老太太、老媒姆、女管家冬涅奇卡都哭了，塔妮娅自己哭得很伤心。

“这件事在我们做父母的心里引起悲痛，自从万尼奇卡死去以后，还没有经历过。”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在日记中写道，“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外表上

的平静消逝了。告别时，塔妮娅自己痛苦不堪，伤心透顶，穿一身灰色的衣服，戴一顶灰色帽子，去教堂前上了楼，——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痛哭吞声，仿佛跟自己生活中最美好的东西诀别似的。我跟他没去教堂，但又不能两人在一起。送别塔妮娅以后，我到了她住的房间，人去楼空，我又哭了，心里感到绝望，那是万尼奇卡死的时候所没有过的。”^①

托尔斯泰现在更加孤独了。女儿们都不在身边，他感到苦闷。他跟玛莎虽然经常见面，但跟这个心爱的女儿的接触，她每天不断的关怀，对他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柯利亚·奥波良斯基依然啥事也不做，花掉玛莎的钱，但也多少蒙受玛莎的影响，跟父亲较为亲近了。

父亲跟塔妮娅见面的机会要少得多。苏霍京夫妇冬天出国，夏天在苏霍京的田庄柯切塔度过。在维也纳她治疗发钳病。这个病早就折磨她，使她头痛的厉害。但维也纳的医生没治好她的病。春天回到莫斯科，她决心动手术——钻开颅骨。

“今日早晨塔妮娅做了可怕的手术，”父亲写信给玛莎说，“我坐在家里，但不能呆下去……我走进医院，希望走到头。走了一小时、两小时，还是没有尽头……我跟米哈依·谢尔盖耶维奇上了楼，往门

口瞧瞧。外科医生问：“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您想看看做手术吗？”我被请进去。一具黄而无色的尸骨躺在那儿，停止了呼吸，脚比头都垫得高，头往后仰，颅骨上钻了一个大洞，血淋淋，深约三指。围着一群穿白衣的人，一人在挖剔……”^②

当托尔斯泰从手术室走出来的时候，人们一把搀住他，他一脸象麻布般的惨白，腿发软，摇摇晃晃。

玛莎所住的皮罗戈沃离雅斯纳雅·波良纳三十五俄里。这个大村庄座落在陡峭的河岸上——河的一边是玛莎的村子，另一边是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的大田庄，两处相距仅有两俄里。每当托尔斯泰来到皮罗戈沃的时候，他可以同时见到女儿玛莎和哥哥谢尔盖。奥波良斯基夫妇和睦相处，但上帝剥夺了她的孩子。她怀胎七、八个月以后，肚子里便不动了，婴孩在腹中死去。第一次如此，人们使用偶然性来解释，但这种情况出现了第二次、第三次——孩子生下地就是死的。同样的情形，塔妮娅第一次怀孕时也发生了。眼看妹妹怀孕几个月，她们屏息静气地等呀！等呀！又是等到了一个孩子生下来就没有气……这是令人可怕的。

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给外孙们准备了礼物，编织了小人衣、小帽子和小被子。但是，外孙生下来

就是死的。两姊妹想孩子想得要命。看看她们阴沉的脸色和哭肿的眼睛，亲人们就明白什么事情发生了……又怀孕了……又是一场残酷的、毫无生气的、毫无指望的受苦。

1900 年底对于全家是不愉快的。略瓦和多拉失去了长子列乌希卡。托尔斯泰在 1900 年 12 月 29 日的日记中写道：“略瓦死了孩子。我非常可怜他们。痛苦之中永远含有精神上的报应和巨大的益处。痛苦——便是上帝光顾了你，记起了你……塔妮娅生下一个死婴，但她很好，很理智。”^③

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一家更加不幸。年长的独子跟父亲争吵，分了家，违反父亲的意志结了婚。小姑娘们（他们这样称女儿们）过着闭门不出的生活，哪里也不去，很少见人。

二女儿瓦里亚，精细个子，简直象个女侏儒。她爱上了厨子，瞒着父亲跟他结婚后私奔。三女儿玛莎，嫁给一个半文盲的地主兼猎人。

三个女儿中，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最为喜爱大女儿维拉。她是塔妮娅的好朋友，是个迷人的、温柔的姑娘，体贴自己的父亲，非常信奉自己叔叔列夫的见解。她父母总是为她担心。她体魄不强，很脆弱，有肺结核征兆。夏天她父亲雇来几个巴什基尔人给

她做马奶酒。这种酒曾经治好了托尔斯泰的肺病。她父亲火热的性格和她母亲茨冈人滚热的血液终于显露其本性。维拉本人大概也讲不清这事是怎么发生的。几个巴什基尔人中间有个年轻人，漂亮逗人怜爱，他有一双窄狭的、乌黑的眼睛，蒙古型的宽阔的颧骨，略带黄色的皮肤。维拉爱上了他，怀孕了，从父母家中出走，不知去向……

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睡在鼓里。当维拉回家时，手里抱着一个眼眶细窄的、古铜色透黄的皮肤的婴儿。开初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还以为这孩子是维拉收养的义子。当他了解真相，确知那是维拉自己生的儿子的时候，大家担心，这会给他多么沉重的打击呵！老头子伤心透了，一蹶不振。看来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居然妥协，饶恕了维拉，让她带着那个巴什基尔人回到家里。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大声叹息：“天呀！天呀！这是干什么呀？！哦！……哦……”这呼号传了过来，矮小、胆怯、不引人注意的老太太玛丽娅·米哈伊洛夫娜和维拉奇卡害怕得浑身打抖。

但终于发生了奇迹。老头子不但收留了女儿，而且向她倾注了那么多的爱怜，以致维拉更加感激涕零，自知罪孽深重，给父亲造成了很大的痛苦。又过

了很久，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才同意见自己的外孙。他住在宅子单独的一边厢，从不走到维拉和她孩子住的地方去。

托尔斯泰给女儿塔妮娅的信中写道。“亲爱的塔尼奇卡！我寄你玛莎和维拉的信给你看看。为这些信我哭了，并且，当我再读它们的时候，我还会再哭的……除了这点信中写的东西以外，别的我一概不知。说来也真奇怪——我不愿知道。这件可怕的事情引起了许多好的东西。可真是不幸之中也有它的益处。”^①

在给弟弟列夫的回信中，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写道：“这是对我骄傲的惩罚。我原以为，我的孩子决不会做出类似的事情：假如没有这件事，两年前这一切本可以制止，但我的骄傲坏事了，把他们看得太高，因为他们不是我的孩子吗？这便是我的罪过，因此遭到了惩罚。”^⑤

① 《索·安·托尔斯泰娅日记》，北方出版社 1932 年版，第三卷，第 122 页。

② 《全集》，第五十四卷，第 414 页。

③ 同上，第 76 页。

④ 同上，第 437 页。

⑤ 同上，第 411 页。

第五十五章

想写戏剧

英布战争（1899—1900）在俄国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志愿兵参加布尔人的军队，红十字会派遣俄国护士去援助布尔人。在农村和工人中间到处唱着这样一支歌：

特兰士瓦*！特兰士瓦！
我亲爱的故乡，
你燃烧，象在火中一样……
枝叶繁茂的树荫下，
一位布尔人在暗自思量……

* 特兰士瓦——南非联邦的一个省。

我九个儿子都在战火中阵亡……

托尔斯泰内心深处也同情布尔人。当采访记者问他如何看待英布战争时，托尔斯泰回答：“您知道吗？我曾经达到怎样的地步，现在已经不那样了，我控制住了自己……每日早晨，报纸一到手，我真想每次都读到布尔人打败了英国人的消息……您知道，在喧嚣一时的海牙会议以后，一场大屠杀终于发生了。”^①

但是，这次答记者问还没来得及见报，正在此刻，托尔斯泰被一封封信件和一堆堆问题所围攻，其中也有他的志同道合者兼他作品的翻译者毛德的问题：您托尔斯泰怎么能够同情战争的某一方，而不是总体上谴责战争呢？

对于托尔斯泰的“朋友们”的疑惑，我们可以在他致沃尔康斯基的信中找到答复。在这封信里，托尔斯泰发挥了跟《战争与和平》中阐述过的思想相类似的思想。不是拿破仑们、威廉们、张伯伦们有罪。“整个历史便是全体政治人物一系列事件如英布战争这类行为所构成……直到目前，我们还会利用特殊的财富，因为人民群众被劳动压得抬不起头，战争总会发生，为争夺市场，为争夺金矿等等。”^②

这类思想托尔斯泰在意大利国王古姆贝特被刺以后写的文章《不要杀人》中，在《论当代奴隶制度》、以及较晚的《论爱国主义与政府》等文章中，都有所发挥。他描述了工人的状况，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关于只应服从唯一的法律——上帝的法律的思想，并且认为，完成上帝的意志，人民便可能从政府、资本家和地主的奴役下解放出来。

从1900年开始，托尔斯泰又较为按时写日记。他说，每个人都应写日记。日记帮助人进步，发展思想，训练头脑，好比做体操训练肌肉。托尔斯泰的日记厚厚的一本，他在晚上一个人在书房里记下他的思想和所发生的事情。不过，除了日记以外，还有一个记录用的小本本，他总随身带着，甚至夜里也不离左右。骑在马上或半夜醒来，他打开本本，记下或是抽象的思想、或是突然钻进他脑子里的他的文艺作品的细节。这一堆记录，有时他加以发展和加工再写进日记里。日记的主要内容是关于死亡、关于上帝、关于爱以及诸如此类的逐渐发展的深入的哲学思考，还有跟自身的罪孽（虚荣心、不以慈悲为怀）的斗争。日记里也写下了他对读过的书的印象以及读过的书本对他本人的影响。他读了《孔子的生平与学说》、《墨子的生平和创作》（列加著）以后，托尔斯

泰打算给中国人写信。他读了让·列斯金、笛卡儿、艾米尔逊和其他哲学家的著作，得到很大的享受，因为他在那些著作中常常找到跟自己的见解不谋而合的地方。有时，写完之后，托尔斯泰记上下一天的日期并写下几个字母：“e, b, B。”（“倘若上帝知晓”），或者“e. b. ж。”（“倘若活下去”）。这是他提醒自己，他应当完成上帝的意志并且要常常想到死。

虽然托尔斯泰沉溺于自己宗教哲学思考里头，但他不能不关心当前文学。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繁荣时代俄国文坛上老一辈古典大师们，尚在人世的，托尔斯泰一人而已！他常常说，他不愿做一个只认可老传统而反对文学中一切新事物的老古董。他怀着巨大的关切与爱护的心情对待青年作家。

当时在俄国，艺术的地位很高。在彼得堡，在宾诺阿领导下，在《古老的年代》杂志的周围组成了新的艺术中心，歌剧舞台上出现了夏里亚宾以及舞台美术家诸如戈洛文、比利平、杜布仁斯基等人。芭蕾舞被齐亚季列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在莫斯科，跟声名遐迩的小剧院并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涅米洛维奇—丹钦柯的新的艺术剧院完成了自己的革新。在音乐领域里，柴可夫斯基去世后，出现了拉赫马尼诺夫、斯克里亚平、斯特拉文斯基、文学界最负

盛名的有契诃夫、高尔基、库普林、布宁、安德列耶夫、米列日可夫斯基。托尔斯泰跟他们都一一相识了。

高尔基在1900年初第一次访问了托尔斯泰。大概高尔基心怀某种先入之见，走进了托尔斯泰伯爵的“贵族化”的府第，讨厌一群群仆役，光亮的镶木地板以及那一套“资产阶级”的陈设。他自己身穿黑色斜领衬衫，裤脚不塞进靴统里，栗色头发剪得短短的，纷披下来遮住眼睛，他不得不停地抹上去；在高尔基的动作中，在他那有着宽而突出的颧骨的脸上的表情中，在他的姿势中有某种棱角分明的未曾梳理的东西。

谈话一开始，高尔基便产生他在经历一场考试的印象。但托尔斯泰接待他是那么和蔼和诚挚，以致高尔基的印象很快就改变了。托尔斯泰坦率地对高尔基说出了关于他几篇作品的否定的意见，面对另外的几篇却加以赞扬。最后分手时，托尔斯泰说出了一个按他的观点看来是颇大的恭维话：“您是个真正的庄稼人。在作家们中间，您是会感到难以相处的，但您什么也别怕，你感觉到的东西，就永远照直说出来，即使粗鲁，也没关系！明眼人一看便知。”

这次会见以后不久，高尔基写了一封信给托尔

斯泰：“感谢您对我说的一切，一切！感谢您！衷心感谢您！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我很高兴见到了您并为此感到非常骄傲。原来我大体知道，您待人是朴实而亲切的，但是我得承认，我不曾料到您竟然会对我这样好。”

对此，托尔斯泰回信道：

“我非常非常高兴认识了您，并且也高兴爱上了您。阿克萨可夫说过，有的人其人比他写的书好（他说的是更聪明），有的人其人比他写的书坏。您写的书我喜欢，但我发觉您本人比您的书更好。这便是我对您的恭维，它的主要优点就在于它是真诚的。不久托尔斯泰在笔记本里写道：

“高尔基说了点什么并因此有所成就。他言过其实，但他能爱，因此我们在以前看不到亲兄弟的地方发现了他们。”^③

这时在莫斯科的托尔斯泰的家里夏里亚宾来唱过歌。夏里亚宾出身跟高尔基相似，但他那魁梧匀称的身材，亲切、纯朴、典型俄罗斯式的开朗的面孔，他的举止和谈吐都丝毫没有“无产阶级”的样子。他纯朴自然，快快活活，一双天蓝色的眼睛虎虎有神，洋溢着欢乐之情，丝毫没有演员浮夸的派头。相反，他身上倒具有某种令人倾倒的、威严的、真正贵族的

风度：“我来了，看见了，征服了。”

戈尔顿维伊则尔钢琴伴奏，夏里亚宾唱了《跳蚤歌》、《两个掷弹兵前往法兰西》和别的歌子，大家都为之叫绝。但在场的人越是倾倒，托尔斯泰越是矜持。只有当玛莎·托尔斯泰伴奏（戈尔顿维伊则尔不知道这支歌），夏里亚宾唱了《夜晚》这支歌的时候，托尔斯泰才深深被感动。

“真好！再好不过了！”他一再说。

从托尔斯泰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其他作家的作品有时也间接地影响了他自己的作品。1901年5月7日，托尔斯泰写道：

“梦见一个老头的典型，那是契诃夫向我提示的。那个老头特别好，几乎是个圣人，但同时他又喝酒骂人。我平生第一次了解到，勇敢地蒙受阴暗的生活的典型人物竟有如此之力量。这点我要在哈泽·穆拉特这个人物身上做一做。”^①

托尔斯泰确实为契诃夫的才气横溢而欢欣鼓舞。契诃夫的一些小说，如《宝贝儿》，他朗读过好几次。后来他还给这篇小说写了序言，并且把它收进他编的一周间阅读文集《阅读园地》之中。

“契诃夫在《宝贝儿》里塑造了一个自我牺牲、心地慈悲、其主要品德便是爱的妇女的理想的典型。她

自我牺牲地一辈子为她所爱的人服务。”

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气愤地说：“这就是略沃奇卡所喜爱的妇女的典型——一匹母马、一个奴隶，没有任何个人的自主权和兴趣！你去服侍丈夫吧！为他效劳，生育，喂奶。”

托尔斯泰在1900年4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理想的妇女便是那样的女人，她们会生孩子并且按照基督教精神教育孩子，即是说，使他们成为上帝的奴仆和人，而不是生活的寄生虫。”^⑤

妇女问题在托尔斯泰家里是一个经常争论的问题之一。争论的双方，一方是托尔斯泰和热烈地支持他的大儿子谢尔盖，另一方是占全家一半的妇女。托尔斯泰反对妇女的论调有时非常尖刻，他说，淫乱都来自女方，妇女不应担任任何社会的、科学的或其他职务，她们的使命就在家庭之内。

托尔斯泰不认可契诃夫的几个戏剧，虽然契诃夫的戏剧也曾对他写的《活尸》间接产生了影响。

年初他曾去艺术剧院看了《万尼亚舅舅》的演出，正如他在日记中写的，他非常“气愤”。“没有真正的动作和运动，此外，尽是一些神经衰弱的知识分子无休止的谈话。真不懂，契诃夫到底要表现什么？”

但是，当托尔斯泰在艺术剧院看了《万尼亚舅

舅》以后，他在日记中说，他突然“想写剧本《活尸》”。他说干就干，立刻动手写了提纲。“我觉得，”他写道，“《活尸》一剧中有些音调是从契诃夫的作品里吹送过来的。这便是艺术创作神秘莫测之处。”

于是托尔斯泰便着手写戏，那还是早在九十年代中期他就构思过的。

《活尸》的故事是尼·维·达维多夫告诉托尔斯泰的。这个戏的故事梗概由阿·费·柯尼详细地叙述，他曾参与那个案件^⑥。

这个戏的女主角是个正派善良的女人，嫁了一个懦弱的酒徒，此人一步一步堕落。终于他离家出走，成了个不可救药的酒鬼，有家不归的流浪汉。那个不幸的、被丈夫抛弃的女人遇到了一个男人，爱上了他。当时要离婚很困难，事情便拖下去，似乎毫无希望。那女人找到了以前的丈夫，说服他假装自杀。人们在莫斯科河岸上找到了一身男人的衣服并附有她丈夫的证件，但是，正在此时，出于偶然，又从河里捞上来一具尸体，那个惊恐万状的女人认出了是自己的丈夫。她嫁人了。可是，由于怀疑她第一个丈夫生前的证件，假装自杀之事被警察揭发出来。这件事被当局知道了，于是开始起诉。那个女人被控告重婚并判处终身流放西伯利亚。多亏柯尼在高级审判

庭上进行了干预，判决才得以减轻，那女人被判一年监禁。

有关托尔斯泰正在写剧本《活尸》的消息见报了。他的抄写人，那个退伍中尉伊凡诺夫喝得酒醉醺醺，不住地唠叨这件事。许多杂志的出版商纷纷请求托尔斯泰给他们《活尸》的版权。涅米洛维奇——丹钦柯也来了，请求让他在艺术剧院上演这个戏。但托尔斯泰都拒绝了。

“你们无论如何也猜不到，谁来了我这儿？”一次他从书房里走出来说：“‘活尸’过来了！”

却原来有个衣裳褴褛的落魄可怜人来了，他向托尔斯泰说明，他就是已被托尔斯泰写进戏里的那个“活尸”。托尔斯泰接待了他，对他非常同情，物质上帮助他，跟他进行了推心置腹的谈话，因此“活尸”向托尔斯泰保证从此不再喝酒。托尔斯泰委托几个朋友为他安排了一个工作，他在那个岗位上做事直到去世。

另有一次，来了个小伙子，他想跟托尔斯泰单独谈谈。他是他妈妈派来的。他妈妈就是被控犯重婚罪的那个女人。小伙子是她跟第二个丈夫所生。他向托尔斯泰转达他妈妈的一个请求：请别出版这个戏，因为他们生活的整个悲剧，谢天谢地，好歹已经平息

了，现在可能再次掀起风波。

为什么托尔斯泰总是不写完这个剧本，主要原因就在这里。

1900年12月11日托尔斯泰写信给契尔特科夫论及《活尸》：“我写戏是闹着玩，或曰，遣兴而已，草草写就；不仅不想现在就写完它拿去出版，而且很怀疑，我是不是来日或有一时会这么做。在自己的良心面前还有许多更应该做的事情。”^⑦

契尔特科夫对托尔斯泰的论文比对他的文艺创作更为关心，因此每当托尔斯泰被自己心爱的事业（文学创作）所吸引之际，他准定得向契尔特科夫道歉。

有个人被流放了两年半刚回来，他是托尔斯泰的信徒布兰日，一个热情奔放的、被新思潮所吸引的人物。他脑子里产生了一个想法：办一个叫《早晨》的杂志，请托尔斯泰以及所有著名的作家——契诃夫、高尔基等人都来合作撰稿。为了这个出版计划，那个曾经为弃绝仪式派教徒捐献五千卢布的索尔达钦可夫也答应拿出钱来。可是，当契尔特科夫得知此事之后，写了两封措辞严厉的信给托尔斯泰（1901年1月3日，1月5日），信中他谴责托尔斯泰，说他一旦动手办杂志，就必须向政府的书报检查屈膝。

-
- ① 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四卷，第 425 页。
 - ② 同上。
 - ③ 《全集》，第五十四卷，第 249 页
 - ④ 同上，第 97 页。
 - ⑤ 同上，第 22 页。
 - ⑥ 柯尼：《在生活的道路上》，第二卷，第 58 页。
 - ⑦ 《全集》，第五十四卷，第 443 页。

第五十六章

革出教门

还早在 1888 年就提出了关于开除托尔斯泰出教会的问题。1896 年在致 C·A·拉钦斯基的信中，巴别达诺斯采夫就已经证实了他确有此意图。1900 年，“遵照皇帝陛下之圣旨，宗教法庭兹听取神圣之东正教最高会议首席发言人之诉状”……此诉状中列举必须开除托尔斯泰出教门之各种理由。“如若列夫·托尔斯泰伯爵逝世之时不作忏悔，不与教会和解，则其追荐与安魂弥撒之宗教仪式无疑将使神圣教会蒙受极坏之影响，并招致势必事先杜绝之迷惘。因此之故，东正教最高会议决定：列夫·托尔斯泰伯爵去世时如若不作忏悔，不与教会和解，则取缔其追

荐与安魂弥撒之仪式。”^①

东正教最高会议的决定于 1901 年 2 月 22 日公开宣布。

……“当代，上帝降下天灾，出现了一个虚伪的导师列夫·托尔斯泰伯爵。这个全世界著名的作家，出身为俄罗斯人，按其所受教育与受洗方式为东正教徒。列夫·托尔斯泰伯爵受其高傲的智慧之蛊惑，竟胆敢反抗我主耶稣及其神圣教义，公然弃绝哺育与教养其人之母亲，即东正教会，其将文学活动及上帝赐予此人之天才用于在民众中散布反基督与反教会之学说，在世人之头脑与心灵之中破坏对祖国与教会之信仰，而此信仰业已确立全宇宙之和谐，我辈之祖先赖此信仰以为生而得救，神圣的俄罗斯赖此信仰至今仍屹立寰中而坚不可摧……”^②

这个文件由圣彼得堡总主教安东尼所签署，签署者还有两名大主教与四名主教。

革出教门这件事产生的重大反响，政府（尤其是巴别达诺斯采夫）恐怕是未曾逆料的。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写给她的在基辅的姊妹塔妮娅·库兹明斯卡娅的信中说道：“这些日子，这儿体验了许多有趣的事情。继你们基辅的大学生之后，我们莫斯科的大学生也造反了。但是，这一回却完全不象原先的样

子，区别在于：过去卖肉的打大学生却得不到老百姓的同情。而现在却是全体民众：伙计、车夫、工人，更不要说知识分子了——大家全都站在学生一边。”^③

2月24日大游行。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广场和街头。这一天，所有的报纸都登载了开除托尔斯泰出教会的公告。而托尔斯泰象往常一样去散步，到了鲁比广场。有个人认出了他，大声叫道：“看呀！他就是那个人形的魔鬼！”立即围上来一大堆人，大叫万岁，把他团团围紧……只是在骑马的宪兵的帮助下托尔斯泰才突出重围，送他上了马车，然后回家。

与此同时，各地都在酝酿骚动。革命者和造反的大学生利用了开除托尔斯泰出教会这个事件，把他推崇为革命英雄，把他打扮成他们所憎恨的制度的牺牲品，这一来，便弄得托尔斯泰处于困难的境地。他不能不起而保卫那些因闹事而被政府残酷镇压的大学生，但是，他又不能不遣责那些使用暴力和恐怖手段以图夺取政权的革命者。

他在日记中写道：“关心民众及其利益的人们（我也算其中之一）把大学生的骚动看得十分重要了。这不过是压迫者之间的纠纷——已然的压迫者跟只不过想取而代之的人们之间的纠纷。”^④

托尔斯泰的家里全都非常震动——男女老幼，全都为开除一事所激怒。十六岁的萨莎跟她的同庚米沙·苏霍京（塔尼娅的继子，当时住在托尔斯泰家）怒气冲天，充满反抗和革命激情，渴望采取行动，异想天开要做出虚幻的英雄壮举以反抗政府。大伙都焦躁不安和兴高采烈。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在日记中甚至这么写道：“连日来我们家里一直有着某种过节一般的情绪。访问的人络绎不绝，来了一群又一群……”（1901年5月6日）^⑤

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也感染了大家共同的情绪。她两只脚又轻又快，在家里到处跑，心情激动，时而跟丈夫，时而跟来访者不断说话，发泄自己的愤懑，只是在书桌旁她才暂时闭嘴。她写了一封信给东正教最高会议。

“我深感痛苦，愤懑至极，”她写道，“这并非着眼于我丈夫由于这个文件而精神上将濒于死亡：这不关人的事，而是上帝的意旨。人类的内心生活，从宗教观点看来，除开上帝以外，是无人知晓的，并且好在是不受拘束的……”“对我来说，东正教最高会议的决定是不可理解的。这个决定不能赢得人们的同情（只除开《莫斯科新闻》），反而唤起人们的愤怒以及对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同情与爱戴。我们收

到了从全世界各地寄来的声援信——不断收到。此外，我不得不提起另一种忧虑，过去我曾听说过行将采取一种荒谬不义的行为，即：东正教最高会议秘密下令神父们当来日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死后不准给他在教堂作安魂祈祷。想惩罚谁呢？死者吗？他那时已经毫无知觉了。惩罚那些他周围信任他的亲人吗？倘若这是威胁，对谁？所为何来？这么做，难道只是为了使我为难，来日为我丈夫在教堂进行安魂祈祷时，莫非我真的找不到任何一个神父——或者找一个真正的神父，他在真正的爱的上帝面前并不畏惧世人，或者找一个不正直的神父，我为此目的可以用大量金钱收买他，难道只是为了这个吗？”^⑥

总主教安东尼的回信没有使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满意，而托尔斯泰连读也不读。托尔斯泰周围的人依然情绪激动。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的信在许多外国报刊上发表。莫斯科广泛流传着一些嘲讽政府的寓言《七只鸽子》（七个主教）、《巴别达诺斯采夫》和《驴子和狮子》。寓言《驴子和狮子》是这样开头的：“有个国家，那里驴子当权，出现了一斗狮子*……”

如果东正教最高会议的目的是想贬低托尔斯泰

* “狮子”俄语读音为“列夫”，影射托尔斯泰。

的声望和削弱他的影响，那么，他们用开除的办法所得到的结果适得其反。特别失策之处在于这件事跟全俄游行示威正好同时。革命者没有睡觉。3月4日，在彼得堡喀山广场上发生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警察驱赶群众，许多人挨了打，某些著名人士和作家吃了苦头。国务院成员、将军维晋姆斯基公爵站出来捍卫挨了打的人士。为此，皇帝谴责了他，他被驱逐出彼得堡。

为了反对喀山广场上警察的暴行，一百五十五个作家联名向内政部长写了抗议书，结果彼得堡市长下令解散作家协会。这个行动更加激起了公愤，许多人联名写信给作家协会表示声援，签名者当头第一名是：列夫·托尔斯泰。此外，托尔斯泰还写了一封信给维晋姆斯基公爵，向他表示敬意和谢忱，赞扬他挺身而出为在喀山广场惨遭警察毒打的无辜的人而辩护的英勇行为。高尔基也遭到了迫害——他被捕了，投进监狱，托尔斯泰写信给彼得堡当局，要求释放高尔基。

米沙·苏霍京和萨莎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他们利用一切课余时间复写那些寓言、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给东正教最高会议的信以及被禁止出版的托尔斯泰的文章。每一种抄件上用粗体大字写上：“请

散发”。但这项工作是颇费功夫的，效率不高。有一天晚上米沙·苏霍京怀着秘密的神情把一件很重的东西拖回自己的房间——那是一架胶版印刷机，当时政府严禁私人使用。

夜晚干活。这已经象个印刷厂了。印出了成百上千本违禁文件。可是，有天晚上，当几百张紫色歪行的书页摆满了米沙的床铺、椅子和五斗橱的时候，不知怎的，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闯了进来。她大发雷霆，一部分印好的书页被烧毁，印刷机从家里搬掉，对萨莎和米沙进行严密的监视。

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在3月30日的日记中有如下记载：“跟萨莎弄得很不愉快。她不再跟我一道斋戒祈祷：要么借口磨破了脚，要么干脆拒绝。这是走向不和的新的一步。”^⑦

莫斯科的春天令人愉快。小溪潺湲，孩子们蹦蹦跳跳，把纸做的小船放到水里，太阳已经照得人暖烘烘，从莫斯科的四面八方传来钟声，此呼彼应。人们走进有着金色圆顶的白色的教堂，在胸前划着十字，满脸带着严肃专注的神色，其中许多人是来忏悔的。托尔斯泰娅母女两个都怀着忏悔的情绪，两人都想要激起爱和互相亲近的感情。教堂里，神父撇开其他的穷人和老人，领着“伯爵夫人”首先去忏悔。

“甚至在这里，在这个上帝的殿堂之内，一切也都是为着有钱有势的人——没有平等，没有正义。父亲一贯这么说。而正是这个教会开除了他出教门，开除了他这个善良的、正义的、永远捍卫受欺凌的弱者的人。”萨莎心里产生了一个问题：双亲中谁是对的？是反对教会但却毕生宣传基督教义的父亲，还是母亲？父亲与开除他的教会两者之中谁对？这种思想是天真幼稚的，不过是感情用事。但是，萨莎已经不能象以往一样虔诚欢乐地做祷告了——一切都引起她心里批判和不和谐的情绪。每当一群瞎子女孩唱起可爱的天使颂歌时，萨莎跪着，痛苦地流泪，但要祈祷她已经不可能了。心里有点儿不对劲。

从这一天开始，在萨莎（即我本人）身上发生了转折。萨莎——我——已经不是小孩了，我懂事了，应该选择自己的道路了，因此，晚上我便去书房找父亲谈话。当我告诉他，我已经决定今后不再去教堂了的时候，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不但不高兴，反而吓坏了。他懂得我还不懂的东西：我这个决定是感情用事，并非他所希望的那样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他要求我去教堂，他不希望我使母亲难过。而实际上，对我的决定母亲的反应非常强烈，她责备父亲，说他把最小的女儿引入歧途。但她早就明白，萨莎是个深思

的、对任何事情都不轻信的人。当我还没有把我要跟她一道再去教堂的决定告诉她之前，她还说了许多别的话。

父亲的日记中作了简短的记载：“这一段时期，一有机会我就把自己的祈祷运用到生活中。关于这点我跟萨莎谈了。”

围绕着托尔斯泰的名字的骚动没有停息。托尔斯泰从来还没有象现在这样，达到如此家喻户晓的程度，真多亏政府和东正教最高会议帮了大忙。致敬电、致敬信、祝贺词、恐吓辱骂之辞向托尔斯泰雪片似的飞来。在彼得堡巡回展览派的画展上，有一幅列宾在雅斯纳维·波良纳所作的托尔斯泰赤着脚的全身肖像画（顺便说，这幅画托尔斯泰很不喜欢）。观众来此，自发地聚集了許多人，在画前热烈欢呼致敬。有个大学生跳到椅子上即兴发表演讲，高呼万岁，人们采来许多鲜花献在画像前边，有的还做成一个个花环。可是，当这种示威一再出现时，当局便下令把这幅肖像撤走了。有一批人看到展览会上陈列托尔斯泰肖像的地方空了，便给托尔斯泰寄了一个花环并拍了一封电报：“在展览会上不见您的肖像了，特寄来我们对您的无比热爱。”^⑧

这一切骚动使托尔斯泰的健康受损，使他的心

里难过，他瘦了许多，显得更苍老了，常常犯病。人们向他表达的同情越多，写他和谈他的言论越多，他就越发感到在人们面前的责任更重大。

他写了一封信《致皇帝及其左右》，信中他再次请求沙皇减轻镇压并给俄国人更多的自由。

“不论怎样难以令人置信，虽然以您的名义不断进行着可怕的镇压，但愿有一颗善良的心——我信任您。”托尔斯泰写给皇帝的信的第一稿中这样写：“当您生病的时候，我可怜您，我怕您死掉并且您死去以后世道将变得更坏。不知为什么我对您抱有希望。”^⑨

在日记里父亲简短地提到席卷全俄的事态：“这一段时期，发生了奇怪的开除出教会事件以及由此引起的声援的表示，接着发生学生闹事，这具有社会性，迫使我写信给沙皇及其左右，还写了一个提纲。”^⑩

开初托尔斯泰还有点动摇不定，要不要对东正教最高会议的决定进行答辩？3月24日他草拟了答辩的初稿。他写道：

“我信仰我所理解的作为精神、博爱和万物之原的上帝。我相信，上帝在我心中，我在上帝心中。我相信，上帝的意志在基督这个人的学说中表达得最

为明白易懂，而人们把基督当成上帝并向他祈祷——我认为这是最大的亵渎行为。我相信，人的真正幸福就在于履行上帝的意志，上帝的意志就在于使人人相爱，因此，人们对待他人应该象他人希望对待他们的那样，这便是福音书中所说的全部法则和代神的立言。”

信末托尔斯泰表述了柯尔里什的思想。

“谁要是一开始就爱基督教甚于爱真理，那么，他很快就会爱教会和教派甚于爱基督教，最终他将爱自己（自己的安宁）远甚于爱于世上的一切。”^①

“我走着相反的道路。开始时我爱我们的东正教甚于自己的安宁，后来，我爱基督教甚于我国教会，现在我爱真理远甚于世界上的一切。对我来说，直至今日，真理跟我所理解的基督教是相吻合的。因而我信奉这个基督教。在我信奉它的这个范围之内，我平静地、快乐地生活并将平静地、快乐地死去。”^②

自从几个姐姐出嫁以后，便没有一个人能够经常抄写父亲的文稿了。尤丽亚·伊凡诺夫娜·伊古姆诺娃（大家叫她尤丽—穆丽，她是塔妮娅在美术学院的同学）不时来帮帮忙，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偶尔也来过。但他越来越放肆地批评和漫骂托尔斯泰，特别当他喝醉了酒的时候。托尔斯泰甚至在日记中

作了记载：“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来了，我很冷淡地接待了他，因为他骂我。但他走了以后，我感到不安了。我对自己说，我所信奉的那种爱，那种自认为是生活的目的爱的感情在哪里呢？当我改正了，就感到心安了。”^⑬

5月初，托尔斯泰一家永远回到雅斯纳雅·波良纳。没有一个孩子要上学了。米沙在苏姆斯基团服兵役并且跟他童年时即爱上了的姑娘丽娜·格列波娃结了婚。我不想再上学了。家庭女教师的考试我已经准备好了，只有神学课程除外，那是因我对它有反感而故意不学的。父亲的工作比那个英国小姐威尔斯所授课程使我更感兴趣。跟母亲一道阅读拉辛和高乃依的作品以及神学课都使我生厌。考试要拖到秋季去了，但我不用考了。虽说信心不足和做得不好，可我还是渐渐学会了抄写父亲的手稿。

父亲身体虚弱，布兰日便去张罗为他回雅斯纳雅·波良纳弄来一节单独的车厢。许多朋友，还有许多不认识的人参加进来，聚成一大群拥进车站欢送托尔斯泰，高呼乌拉，向他致敬。略瓦和他妻子仍住在雅斯纳雅，他在写他那没有才华的文章并管理雅斯纳雅的田产。还有玛莎和她丈夫也住在这儿。可是，因为拜访的人太多，因为前来致敬致意的人太

多，雅斯纳雅·波良纳不得安宁。契尔特科夫要杜纳耶夫处理所有这些信件和电文，摘录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玛莎、柯利亚和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给他帮忙。绝大部分信件是同情友好的，漫骂的极少。

有封信中写道：“请允许我，虽然我不是您的学生，向您致敬，因为今年2月21—22日东正教最高会议的文告今日已经见报了。您，俄罗斯大地上雄浑博大的作家，做了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把东正教徒从冬眠状态中唤醒并且搅乱了我国宗教界陈年的死水泥潭。当然，首先从这死水泥潭里定会溅出污泥浊水，但是，时间会过去——到那时，污泥沉淀，而被您所激发的生活的活水源头将以奔腾澎湃之势一往无前，因为生活就是运动。”^⑭

一批俄国人从日内瓦写来的信中说：“我们衷心祝愿您获得这种崇高的荣誉，它是东正教最高会议奉献给您的，因为他们把自己蝇营狗苟的生活跟您正直的生活之间划了一条界线，作了尖锐的对比。由于他们高度近视，视而不见，忽略了您的主要“罪恶”，即您探求真理的举动驱散了他们为之效劳的黑暗势力，并且给人类真正的进步事业作了一个强有力的道德上的推动。”^⑮

布里扬斯基玻璃厂的工人们送来了一个吸墨器

和一块巨大的绿玻璃，上有金色的题辞：“您跟那些走在时代前面的伟人有着共同的命运，最尊敬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过去，他们被判火刑，或在牢房和流放中终其一生。让他们把您开除出教会吧！随他们怎么样，由它去！这些法利赛人，这些高级神父们！俄罗斯人将永远为您自豪，因为您是我们自己最亲切的、心爱的、伟大的人。”^⑩

有一个人的信中这样写：“你这只披着人皮的人形动物列夫（狮子），被革出教门，从今以后你将遭到世人的诅咒，你这面目可憎的东西即将一命呜呼，你这只畜生！我是为你曾经是人的灵魂而悲痛的人们中间的一个。”^⑪

托尔斯泰在1900年7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我深信，这个世界完全归一批疯子在统治。没有发疯的人要么放弃职责，要么就不能发挥作用。”^⑫

历史事实表明，这个勇敢的、走极端的论断不但当时有其现实基础，就是对于当代也不幸而言中。

犯了一系列错误以后，政府依旧想知道，公众对开除托尔斯泰出教会这件事到底有什么反应。警察总局接到命令，要他们暗中检查私人信件，而写信的人跟托尔斯泰并无直接的关系。这些信件中有些颇有意思。

沙皇办公厅法律顾问尼·列别杰夫2月26日的信中有如下的话：

“我刚读了东正教最高会议关于托尔斯泰的指令。多么愚蠢！这简直是公报私仇！很明显，这是出自巴别达诺斯采夫的手笔，他用这个来报复托尔斯泰……很可能，过去读托尔斯泰所写的禁书的有几万人，可现在将有几十上百万的人了。过去，人们不理解他的虚伪的学说，而东正教最高会议却强调了这学说的意义。托尔斯泰去世以后，将会举行极隆重的葬礼，把他作殉道者加以纪念。人们会到他墓前顶礼膜拜。主教们身上完全缺乏爱的精神和履行基督教真理的意愿，这才是令我痛心之处……他们穿着华丽的衣服，踌躇满志，大吃大喝，身为出家人却积钱发财，从不想想饥寒交迫的人。他们是邪教徒，事实上没有维护基督教的学说，从而有罪。相反，托尔斯泰在行为上却是纯洁的。他在实际行动上维护了基督的学说，他帮助了他周围的人。而他们却远离人民，给自己盖起宫殿，忘记了修行的斗室……”

2月26日从彼得堡寄给梯弗里斯的阿加彼耶娃的信中有如下的话：

“谁也想象不到竟然发生了开除托尔斯泰出教会这样的一幕喜剧。这真使俄罗斯在全世界面前丢

脸！把个人恩怨引进政治是多么失策啊！这是巴别达诺斯采夫的个人报复，因为托尔斯泰在《复活》中嘲弄了他（多波洛夫）。”

巴甫洛夫（斯拉夫派作家）于2月26日写信给莫斯科的霍穆托夫殿下，信中说：

“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俄国历史上，自从东正教最高会议设立之日以来，没有一件事情如此重要，会引起如此严重的恶果，象这次胆怯地开除托尔斯泰出教会的决定那样。似乎是故意巧合：在海滨大街的绘画展览会上，列宾画的列夫·托尔斯泰的肖像成了观众注意力的中心；这是一幅全身像，托尔斯泰身穿农民的衬衫，赤着脚——而画的下首有一行字：“此画为亚历山大三世皇帝博物馆收藏”。观众拥挤在这幅画的前面，并且忍不住地发笑，（当然，不是笑托尔斯泰伯爵）——你看，正是他，被开除出教会了哩！”……

军法上校日尔凯维奇从德国疗养地写信给索·安·托尔斯泰娅。信中说：

“倘若您得知列夫·托尔斯泰在国外的声望有多高，那就好了！到处一样，在各城市的商店的橱窗里都陈列了托尔斯泰的著作和肖像。全都在谈论他。报刊报导他的病情和他活动的细节。我心花怒放，怀

着为这个俄国人的名字而感到的自豪，目睹各文明民族对俄国伟大作家这种由衷景仰的表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波兰人、俄国人，毫无例外，都在阅读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所写的书，高度评价他，热爱他。上帝呀！保佑他吧！为了俄罗斯，为了全人类，保佑他长寿！请转告这位亲爱的病人，整个文明世界一如既往都跟他站在一起，作他的后盾；地球上各个角落都在倾听他的声音并努力按照他的指示生活。而他的英名跟整个宇宙中最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并列以至永远。”^⑬

- ① 《托尔斯泰年鉴》，1812 托尔斯泰博物馆出版社，莫斯科，第 158 页。
- ② 《索·安·托尔斯泰娅日记》，北方出版社，第三卷，第 143 页。
- ③ 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四卷，第 22 页。
- ④ 同上，第 25 页。
- ⑤ 《索·安·托尔斯泰娅日记》，北方出版社，第三卷，第 145 页。
- ⑥ 同上，第三卷，第 146 页。
- ⑦ 同上，第 148 页。
- ⑧ 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四卷，第 148 页。
- ⑨ 《全集》，第五十四卷，第 20 页。
- ⑩ 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四卷，第 30 页。
- ⑪ 《全集》，第五十四卷，第 90 页。
- ⑫ 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四卷，第 26 页。
- ⑬ 《全集》，第五十四卷，第 91 页。
- ⑭ 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四卷，第 28 页。

-
- ⑮ 同上，第 29 页。
 - ⑯ 同上，集 32 页。
 - ⑰ 同上，第 32 页。
 - ⑱ 《全集》，第五十四卷，第 31 页，1900 年 6 月 12 日日记。
 - ⑲ 《托尔斯泰创作和生活纪念文献汇编》，莫斯科，1917—1923，第三版第 131 页。

第五十七章

“老头子开始呻吟了”

《大多数劳动人民首先希望什么?》这篇文章逐渐扩大,脱稿时定名为《唯一的办法》。除此之外,托尔斯泰还写了一系列小文章:《官兵须知》——反战和反兵役的文章,还有给波连茨的长篇小说《农民》写的序言(这部小说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印象),还有致比留科夫论自由教育的一封长信,并且他还动手写一篇论宗教及其实质的论文。写回信占住了他许多时间。他给罗马尼亚王后卡尔曼·西尔娃的深表同情的来信写了一封回信,给法国记者彼得罗·玛蒂尼写了一封长长的回信,信中讨论了法俄联盟的问题,对这种联盟他表示冷淡。

他在给玛蒂尼的信中写道：“您提出一个问题：俄国人民对法俄联盟是怎样想的？对这个问题我的回答如下：“俄国人民——真正的人民——对这个联盟的存在一无所知；但是，退一步说，倘若他们知道缔结了这个盟约，那么，我坚信，因为所有各民族都是完全对等的，故而健全的思想以及人类的感情会提示俄国人民：突出在其他民族之间的这个跟某个民族的特殊的联盟不可能有别的目的，只能引起敌对状态甚至可能引起跟其他民族的战争，因此，这个联盟对于俄国人民必然在最高程度上产生反感。”

1901年春，列宾用水彩给父亲画像，画家佩斯杰尔纳克给我们全家作速写，雕塑家阿隆松给托尔斯泰造半身像。对父亲来说，给画家和雕塑家当模特儿这个任务变成了沉重的负担。还在这以前，一个在意大利受教育的俄国雕塑家巴阿罗·特鲁别茨柯依曾在莫斯科给托尔斯泰雕塑过一些出色的小塑像，其中的一个是托尔斯泰在马上。1899年夏天，他再次来到雅斯纳雅·波良纳。父亲喜爱巴阿罗。在这个魁梧的、才气横溢的人身上有某种天真无邪的东西。他几乎什么书也不读，很少开口，全身心倾注于雕塑艺术之中。巴阿罗是个坚定的素食主义者。每当劝他吃肉的时候，他便叫道：“我不吃死尸！”他的彼得堡的工

作室旁边有个动物园，其中饲养了一头熊、一只狐狸、一匹马和一只吃素的狼。

可是，有的来访者远远不是那么令人愉快的。比方说，图拉的监狱神父特罗伊拜基老是来到雅斯纳雅·波良纳，而他来的时候总是碰到父亲生病。当他于6月末来访时，父亲自我感觉不妙。父亲接待了他，直言不讳对他说：倘若他是按上司的旨意来此打探，那就很不好，请他别再费心尽力了。

父亲患了恶性疟疾，有十六天在死亡线上挣扎：脉搏一百五十次，心律不齐，气喘。请了几位大夫。儿女们都到齐了，姑姑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也来了。体温降了，但父亲感到气闷，心力衰竭。医生们确诊为心绞痛，建议去气候温和的地方疗养，提出去克里米亚。

全家便忙碌起来，拟好方案又推翻，大家只晓得哭；母亲带去的厨子谢苗和侍从伊利亚终于跟家人告别了。

父亲置身于这一切忙乱之中。6月16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生病简直是灵魂的过节，是精神之活跃，是濒临死亡时的心神的休憩，以及从四面八方送来的爱情的表示。”^②

我们在一个潮湿黑暗的深夜里离开雅斯纳雅·波良纳，乘坐两部马车：父亲和母亲，玛莎和柯利亚，布兰日和我。马匹一步一步地走，小心翼翼地沿着辙迹纵横的乡间小路走了一俄里半才上了公路。马夫费列奇卡点上煤油马灯，黄色的光照亮了前头的路。大家心里是不平静的。父亲身体虚弱得很，两只脚几乎站不稳了。唯有布兰日精神抖擞并且给大家鼓气。他在他做事的机关即莫斯科—图拉铁路局里弄到了单独的车箱，可以送我们从图拉直达塞瓦斯托波尔。车箱很大很考究，设有厨房、餐室以及隔开的卧室。但是，父亲的神色把我们吓坏了。他显得疲惫不堪、病体恹恹。给他量了体温一发高烧。怎么办？怎能继续旅行呢？可是，布兰日再次进行说服工作。他说，如果转回程去雅斯纳雅·波良纳，那么，那十五俄里路程要比去塞瓦斯托波尔的一千俄里还要困难得多，并且，车厢里设备俱全，方便舒适，而到了那边……则是太阳和温暖宜人的气候……夜里三点列车开动了。到了早晨，体温下降，父亲满意了，便给玛莎口授文章……

将近黄昏时车窗外闪过一栋栋土坯房、一座座花园，空气更暖和了——列车快到哈尔可夫了。我们打算去车站食堂吃饭，但没有去成。那是什么？月台

上，人群象海潮一样汹涌，向列车挤过来，人们都摘下帽子……我跳到了车厢的出口处。

“托尔斯泰！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在这儿吗？我们是群众代表！放我们进去！乌拉！托尔斯泰万岁！”群众高呼。我吓得要死，拔腿就往车厢里跑。“一激动，父亲就会死掉，他心脏会受不了……怎么办？”我脑子闪过这个念头。

“托尔斯泰！乌拉！托尔斯泰万岁！”人群呼啸。布兰日领着一个代表团去见父亲，接着又是一个……托尔斯泰跟他们亲切交谈，他的嘴唇发紫，手发抖，气喘吁吁。我跟玛莎交换眼色。终于，显得无穷无尽的停车二十分钟快过去了。群众高呼：“请托尔斯泰出来见面！请站到窗口来！”父亲由母亲和布兰日搀扶着站到了窗口，频频挥手。他脸上直冒汗……列车缓缓开动了。“乌拉！万岁！”人群呼啸，沿着月台跟随车厢向前跑，挥动着帽子。父亲揩着眼泪。当最后安顿他躺下时，他的心脏病发作了，他气喘，体温升高。这次哈尔可夫群众自发的欢迎差点要了他的命！

第二天早晨我们到达塞瓦斯托波尔。车站上的人不多。警察在维持秩序，我们立即扶着父亲走出车站，扶他上了马车。四个座位的、编织而成的马车套

了两匹骏马，把我们送到了塞瓦斯托波尔一家名叫契斯特的最好的旅馆。阳光灿烂，南国惠风和畅，海湾里有许许多多舰船，汽艇和渔舟穿梭来往。父亲精神恢复过来了，兴致勃勃地观赏这座城市。“第四棱堡在哪儿？”他问车夫。这座第四棱堡，想当年炮兵少尉托尔斯泰曾在此保卫这座城市，那是1855年英军围困该城的时候。我们在塞瓦斯托波尔逗留的几天里，父亲在城内漫步，想要找寻他的第四棱堡，甚至会见了他的塞瓦斯托波尔的老朋友的儿子，还参观了军事博物馆。

去卡斯普拉是坐两部邮车。一部车里坐着父母亲、布兰日和我，另一部车里坐奥波连斯基夫妇以及在哈尔可夫加入我们一伙的钢琴家戈里顿维伊则尔。路程的前一半很平坦——全是村庄、田野、草原。可是，眼看走上坡路了——上升，爬高，于是我们便朝巴伊达尔斯基门前进，再驶过平缓的山坡我们便置身于山毛榉森林中间了。风景如画，但无甚特殊。可是，当母亲在张罗早餐的时候，我便朝前跑去，进了巴伊达尔斯基门，突然我愣住了——平生第一回我实实在在感受到海洋的浩瀚，那海就在我眼前，无涯无际，水天一色，就在我脚下！惨绿的海岸，花园，左面是雅伊拉河，壮丽而庄严，俨然就是海洋。玛莎，

还有父亲，还有象小孩似的兴致勃勃的布兰日对我几乎象小孩似的欢欣都非常理解。恨不得赶快奔过去，奔过去，奔向这神奇的国土，奔向花园和峰岭，奔向海洋……

当我们到达巴宁的府第时，天已擦黑了。车轮滚在铺沙的道上发出沙沙声。喷泉潺潺，昏暗中但见两座宝塔、发黑的花岗石高墙和家用教堂的园顶……大门口站着一个人老的、满脸堆笑的人，手里端着面包和盐，他是巴宁娜伯爵夫人的德国管家卡尔·赫里斯齐昂诺维奇·克拉辛。

虽然父亲身体开始康复，但他还是想到死并对死作了精神上的准备。我家一位老朋友亚当·华西里耶维奇伯爵去世了。父亲于1901年11月6日给兄弟谢尔盖的信中说：“很快就轮到我了，早上去散步，说了十分钟的话，心里明白，我正在死去，跟大家告别，给儿女们留下遗言并且不断重复一句话：‘我怎么也没料到，死竟然是这么容易’。”^③

父亲有两周左右出外散步，我们则骑马跟他一道到阿鲁普卡去看海。克拉辛给我找来一个鞑靼人，从此人那里可以弄到马匹。我们租了一辆马车，在那个鞑靼人那里为我自己和父亲租了两匹高头大马。

奥波连斯基夫妇去了雅尔达，我则动手抄写父

亲的手稿。一开始，我怎么也弄不清，字迹歪歪斜斜，字行混淆不清。照文义猜度我又办不到，因为没有全懂（当时父亲在写《什么是宗教以及其实质何在》）。不论我怎样努力，结果很坏：漏抄了，字行歪斜，有的地方溅了墨水或浸透眼泪。把这种抄件交给父亲我实在于心有愧，我便痛骂自己蠢笨和幼稚。

渐渐地我便学会了，很快就能用“列米格顿”牌打字机打印手稿了。这真使我开心。这时，我还能抽空骑马去雅尔达看海，还能采摘那美妙的“伊斯贝拉”葡萄（那是在云石凉台上爬满了的），还能跟高尔基和他的儿子马克辛姆卡一同玩耍。高尔基父子当时住在海边，常常来这小镇上拜访我家。

父亲住在楼下客厅旁的一间房里。家具、哥特式的窗户、宽大的云石窗台、地毯、从凉台和窗口放眼望去的海景、透过浓郁的绿荫显现的银柏、希腊胡桃、夹竹桃和玉兰……我们中间谁也没享受过这般奢侈，雅斯雅纳跟这儿卡斯普拉一比，显得多么寒伧和灰色啊！

父亲在1901年10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我此刻住在豪华已极的意大利式的府邸里，平生从没这么奢侈过：喷泉跳珠倒溅，花园内草地修剪得整整齐齐，阶梯全都是云石砌成，等等。此外，群山与大海

的景色令人神往。四周都是大阔佬与亲王，他们豪华的程度比这儿还要高出一十八倍。”在写信给契尔特科夫的信中说：“我们五个人在此：我和老伴，玛莎和柯利亚，还有萨沙。美景令人神往，我感觉非常好，只是感到内疚。”^①

卡斯普拉周围有许多壮丽的宫殿和花园，如尤素波夫亲王的柯列伊斯宫，舒瓦洛夫伯爵的庄园米斯霍尔，尼古拉和彼得·尼古拉耶维奇、亚历山大和格奥尔基·米哈伊洛维奇四位亲王的四座庄园。卡斯普拉跟艾伊—托多尔毗邻，那是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亲王的庄园，其时他弟弟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住在那儿。得知托尔斯泰有心脏病以后，亲王建议他利用所谓“地平线小道”去漫步，那条小道上没有上坡下坡，直达利瓦吉亚的沙皇的行宫。

亲王本人来看望托尔斯泰，当他第二次来时，托尔斯泰对他说：“见到您我非常高兴，我正等您，我良心不安，想问您：当您第一次来看我的时候，您想过没有：您在做什么？要知道，我患了猩红热，即被开除出教会了，别人都怕我，可您却来看我；我再说一遍，我患了猩红热，会传染的，而您可能因为我的关系而惹麻烦，别人会斜着眼睛瞧您，您怎么能访问一个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呢？”

他们两人作了长谈，很投机。

看来，亲王不可能承认托尔斯泰反国家反教会的观点，但他也不赞成他堂侄沙皇尼古拉二世周围的人的做法。父亲喜欢亲王为人纯朴以及活跃的、求知欲很强的头脑。

12月末，托尔斯泰再次写了一封信给沙皇并请亲王把信转交给沙皇本人。

“附上一封给皇上的信，很可惜此信并非我亲手所写。我本来自己动手写了，但感到身体非常虚弱，这信不能写完。我请求皇上原谅我这一点。信没有封口，目的在于：如果您觉得适宜的话也请您过目并决定：您面交皇上是否便当，这封信在某几处地方言辞可能显得尖刻——真理或者自认为的真理，一吐为快，不能吞吞吐吐只说一半——因此，您可能不愿在这件令皇上不快的事情上做个中介人。即使如此，也不妨碍我感激您的效劳。在那种情况下我将另找门路。请您暂时把信保存在您那儿。”^⑤

在给皇上的信中，托尔斯泰警告他：如果不给俄国人民自由，那么，将会出现“同胞互相屠杀而血流成河。”“专制独裁是一种过时的统治形式，可能适应中部非洲某个地方的人民的要求，但决不适应俄国人民的要求，在全世界共同的启蒙过程中俄国人民

越来越觉醒；因此，要支撑专制独裁这种统治形式以及与之相关联的正教教会，就只能采用各种各样的暴力，强化军警，实行流放和死刑，加强宗教压迫，禁止书报出版，糟踏教育事业以及总的说来干出各种各样的坏事情和残忍的事情……采取暴力的措施只能压迫人民，决不能指导他们。”^⑥

托尔斯泰把这封信寄给彼得堡的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亲王。亲王答应他将信转交沙皇本人。为此亲王给托尔斯泰写了如下一信：

“1月22日回彼得堡之后，我第二天即收到了您的来信，当然我读了，给自己抄了一个副本，觉得我敢于将此信面呈您信封上写明的那个人。当我问他我可不可以面呈他这封信时，皇上回答：“当然可以。”过了三天，我亲手将此信面呈他本人。但是，面呈信件的时候，我自作主张，对他说：‘我请您为了尊敬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起见，答应我一个要求——这封信别让您的大臣中的任何人过目。’皇上答应不给别的任何人看，并且说，他很有兴趣读这封信……要知道，我们的皇上是个善良而富有同情心的人，而糟糕的事全出在他的左右。”^⑦

契诃夫也住在雅尔达，他来拜访过托尔斯泰。还在莫斯科时，托尔斯泰去医院探望过他，因为契诃夫

患了肺结核。虽然两人观点不一致，但他们之间互相同情，那次在莫斯科会面时，他们畅谈了一个重大的题目——关于灵魂不朽的问题。正因为托尔斯泰热爱契诃夫，所以有个念头使他很难过：契诃夫不信上帝，因而他有意把谈话引向这个题目。这同一个问题跟高尔基交往时他也常常向自己提出过。他感到两人都很有才华。契诃夫写了许多美妙的、感人的、天才的短篇小说，就其才能来说，托尔斯泰把他比做莫泊桑。高尔基写了较为有意义的东西，他发现了整整一个世界和直到如今还没人注意的人的生活——流浪汉、无产者、受压迫者的生活。

“很高兴，我喜欢高尔基和契诃夫，特别是前者。”托尔斯泰在11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他还写信给契尔特科夫：“这儿我见到了契诃夫，他是个完全不信神的人，但为人善良。也见过高尔基，他身上有更多 fond*)^⑧。”“但对高尔基他很快就失望了，主要是因为《在底层》的关系。这个剧本在艺术剧院的帮助下给他带来那么大的荣誉。托尔斯泰在日记中写道：“高尔基——这真是一场误会。德国人知道有个高尔基，却不知道有个波连茨。”^⑨

* 法语：内容。

文艺创作中的虚伪、言过其实和装腔作势是托尔斯泰所不能容忍的。这种不真诚的调子托尔斯泰在高尔基作品里感觉到了。他说过，那种奉献给高尔基的光荣把他糟蹋了。

相反，托尔斯泰评价契诃夫要高得多，虽然有一次在谈论文学以后，不知怎么地托尔斯泰突然慈爱地拥抱了契诃夫并对他说：“亲爱的！请您别再写戏了。”而契诃夫也并没有觉得受了委屈。从另一方面说，托尔斯泰“透彻了解到：契诃夫正如普希金一样，发展了艺术形式。这是了不起的功劳。”有次谈话时托尔斯泰大声说道：“契诃夫——这是散文中的普希金。在普希金的诗中每个人都可以找到他自己所亲身体验过的某种东西，在契诃夫的小说中情况也一样，甚至在他的某些篇小说里读者一定会看到自己和自己的思想。”

这种真实的、艺术的忠诚，托尔斯泰在库普林身上也发现了，对他评价很高，认为他颇有才华。至于我上面提到的艺术上的虚伪，父亲尤其在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身上觉察到了，那时他刚刚走红。读了他那轰动一时的《无底深渊》之后，父亲气愤起来，说：“捏造、言过其实，他简直一心想吓唬大家，使他们吃惊。可我却没有被他吓倒，只是感到有点不舒

服，因为他有虚伪的音调。”

在克里米亚的生活终于走上了轨道。父亲写作，母亲费劲学摄影，大家散步和骑马，每天傍晚厨师谢苗·尼古拉耶维奇手拿小小的一本菜谱走进来，大家想了想便订下了明日的菜。有件事令我们大家很失望，女裁缝奥尔加跟厨师发生了爱情关系，而厨师家里有老婆，是我们都喜爱的一个名叫玛莎的女人，他们已有几个孩子了。仆人伊利亚·华西里耶维奇同样准时地、机械地上菜和收拾父亲的房间。他也感到苦闷，有时他跟厨师谢苗借酒浇愁，互相发牢骚：“把咱们送到哪儿去呢？一面是大海，另一面是高山，无路可走啊！”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讨厌克里米亚，心里犯愁，只想回家，而仆人们都同情她。

晚上都来玩文特牌：有父亲，有德国人克拉辛，有适来探望的布兰日，还有柯利亚·奥波连斯基。如果四缺一，便把我也拖上桌。克拉辛牌技到家。布兰日活泼而狡猾，父亲狂热，但牌技糟糕，下注大并是总是输。克拉辛赌牌很认真，每当跟父亲赌牌时他便生气，口里叫：“要命呀！要命！”——这位心肠慈悲的德国佬直叹气，蓝色的、善良的眼睛转动着，只好

望着天花板。“又是您大获全胜！要命！”全都笑起来。

我母亲生气了。“我讨厌打牌！”她说，“教萨莎打牌，把这丫头教坏了！”

但是，我们平静的生活没有继续多久。父亲又重病了。

我兄弟姊妹都到卡斯普拉来了。谢尔盖几乎总跟我们住在一起，奥波连斯基夫妇常常从雅尔达来，安德列和奥尔迦以及他们的小女儿索尼奇卡住在一间厢房里。

新的一年 1902 年没有给我们带来欢乐。开初，父亲又犯了他的时常犯的胃病，这病还没好又突然发冷发热，腰痛，体温升高，他便开始咳嗽。请来了本地医生，从莫斯科来了著名的大夫舒洛夫斯基，从彼得堡来了御医别尔岑逊。体温升高，咳嗽更厉害了。医生会诊，诊断为卡他性肺炎。病情几乎毫无希望了。体温高达 $C40^{\circ}$ ，不均匀的、间歇性的脉搏每分钟 150 次，呼吸短促。大家的思虑集中到一点：这个因疾病折磨而虚弱、因情绪激动而消瘦的老年人的身体能否受得住这一场新的可怕的疾病呢？

除此以外进行的任何事情，谁也不感兴趣。谁也没有留意一件事：塔夫里省省长收到从彼得堡来的一项命令，要他在托尔斯泰去世后，禁止安魂祈祷；而省长方面也下令莫斯科—库尔斯克铁路局，命令在来日运送托尔斯泰灵柩时，列车不得在各站停留。

谁也没有重视大主教安东尼甚至给我母亲写了一封信，信中他请求她劝导丈夫跟教会和解。而当父亲知道这点后，只是说：“‘我从你* 那儿来，到你那儿去’——这便是我最终祈祷：‘这是你的意旨’。”东正教最高会议感到不安了。

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在日记中写道：“这批精神界的权势者把列·尼赶出教会，现在又请我把他领回来。真是轻举妄动！”^⑩

在父亲身边值班的每班两个人，一名医生和我们中间的一个：我母亲、玛莎、谢辽沙、布兰日或柯利卡·盖（当他们来探望的时候），还有尤丽，也让我参加。我午夜四点钟换母亲的班直到早晨。医生们不断会诊，他们是在莫斯科有大名气的舒洛夫斯基、御医别尔岑逊、地方自治会医生沃尔可夫。每天从雅尔达来探望的有阿尔特肖列尔医生，他本人也患肺

* 指上帝。

痨病。我们把这些医生当成救星，等候他们，提出无穷无尽的问题弄得他们讨厌。而母亲很为难：“可我们为他们做什么好呢？真伤脑筋！都不要出诊费！”

病在拖延——确定病灶在某个地方，马上又在另一个地方发现了杂音。父亲已经准备去死，因此，围绕他的这一切忙乱他认为是不必要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值班的时候我跟布兰日坐在房间里，父亲脸冲着他说道：

“有什么东西能比民间语言更美呢？请听：

老头儿开始呻吟，
老头儿咳嗽一声，
该是老头儿麻布裹尸的时候了，
麻布裹尸，该进坟墓的时候了。

“这难道不美？”他问，同时笑一笑，吞声地哭。“我也到了这步田地：‘该是老头儿麻布裹尸的时候了’。这在老百姓中间是非常容易和自然的，哪来这么多医生，哪来这一切 *fuss'a* *”^①

我可不明白，这几句诗怎么能引得父亲如此动情和狂喜，关于死的念头对于一个十七岁的人说来

* 法语：忙乱。

引起的不是赞叹，而是眼泪。

那个病危的夜晚是终生难忘的。塔妮亚和她丈夫、谢辽沙、玛莎、脸色阴沉的伊里亚、列夫、米沙和安德列进进出出，一个个好似阴影。母亲不曾离开父亲。医生明明白白在避开我们。他们觉得已经毫无希望了。唯有地方自治会医生沃尔可夫看到我脸上完全绝望的神色才安慰我说还有希望。谁也不去睡。舒洛夫斯基、阿尔特肖列尔没离开父亲一步，观察他的心脏。快天亮时他们说，危险过去了。

后来，当父亲开始康复的时候，越来越让我更多地去服侍他。每天早上我用梳子给他梳理柔软的头发，给他洗脸，擦他的瘦腿。父亲不能站起身，非常虚弱和瘦削，看他一眼都令人寒心。已是春日阳光和煦的时候了。我们让父亲坐在轮椅里，把轮椅推到窗前，以便让他看看海，看看绿油油的花园。

即使在这克里米亚我们也难以摆脱掉讨厌的访问者。作家谢尔盖因柯开一辆汽车来了，让父亲坐上兜风。汽车在当时的俄国还很少，因此，这件事令大家都激动起来，尤其当父亲决定也坐上去的时候。

有一回，从雅尔达来了一大群人要“看看”托尔斯泰。我们告诉他们，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有病，谁也不接见。但是，他们苦苦哀求，终于母亲心软了，

便让父亲坐在皮靠背的轮椅上，把他推到窗前。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一个来访者高声叫道。“我们感到幸福，我们早就想见识您这个俄罗斯大地上的伟大作家了……谁没有读过您的不朽巨著《战争与和平》呢？……”

此人还没来得及说完，从后排有个人向前猛挤，两肘使劲拐，终于挤到了前头，这是个矮小的、胖胖的太太。她奔到托尔斯泰跟前，抓住他的手使劲摇晃。“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敬爱的作家，我们热爱您。哎呀！我是多么激动啊！我读了您的不朽著作《父与子》*……”

“是《童年与幼年》，《童年与幼年》”后面几个人用很大的低声提醒她。

“哎哟！别打岔！”胖太太挥一挥手。“我当然也读了《童年与幼年》，但是，《父与子》嘛，”她把一双胖呼呼的手搁在前胸，眼珠子转动着。“《父与子》给人的印象却是震撼人心，永世难忘……”

我们全都哈哈大笑。父亲好不容易才忍住了笑。这批来访者弄得很狼狈。

2月2日，父亲请玛莎在日记中代他记录如下的思想：“火能烧毁东西也能给人温暖。疾病也一样。当

* 《父与子》是屠格涅夫的代表作之一。

一个健康的人力求生活得好，力求从罪恶和诱惑中求解放的时候，那么，你要做到这一点就很费劲并且你仿佛抬高一个受压制的方面，其余的一切方面则继续受压。疾病则立即揭去这腌脏的鳞片并且这一点很容易马上做到，根据经验知道，只要疾病一过去，那肮脏的鳞片又会紧紧贴上身来，想到这点，多么令人可怕啊！”^⑫

可是，甚至当他逐渐康复的时候，关于死的念头也没有离开他。3月21日，他在日记里写道：“遵照赋予我生命的上帝的意志，我正在走出这个生命，我心平气和地把自己交还给这生命，心里明白它只能是最高幸福即生活之源。”^⑬

2月中旬，我患了一场奇怪而严重的胃病，发高烧，身体很虚弱。父亲这时住在一个上有凉台的大房间里，我睡在他隔壁。母亲心里烦闷。她想回莫斯科去听音乐会。虽然她忘我地照顾父亲，做了她能做的一切看护他，但两人的精神生活却是不协调的。

父亲开始了少量的口授，由别人笔录。3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面前的工作：1. 关于基督教真正意义的文章，2. 致宗教界的信，3. 致青年们的信。”^⑭他口授一封致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讨论亨利·乔治的方案的书信，他也构思了关于哈尔可夫省和波尔

达瓦省农民运动惨遭镇压的文章，他还写了好些封信。

亲人们开始离去——塔妮娅和她丈夫走了，安德列和他一家也走了。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高兴了，因为我们很快就将摆脱她所憎恶的克里米亚。我能起床了，重新开始帮助父亲做点儿事情。户外是明媚的春光，扁桃花谢了，玫瑰盛开，还有玉兰。心里很快乐，但这快乐为时不久。父亲又觉得身体不适，发高烧，肚子痛。医生会诊，确诊为腹伤寒。塔妮娅、伊里亚和布兰日又来了。原来的希望又被失望所替代。看来，父亲大伤元气的机体再经不住一场新的重病了。

哥哥谢尔盖没有离开父亲一步。父亲对母亲说：“真怪，从来没有料到谢辽沙竟是这么体贴，这么关心人。”^⑥说这话时，他要哭了，嗓门发抖。

第二个星期末，危险过去了，父亲开始康复，有了食欲，他想到户外呼吸新鲜空气，晒晒太阳。姊妹们、伊里亚、布兰日都不在，剩下谢辽沙，这时期我跟他关系非常友好。父亲逐渐返回到生活中来，开始读书，读报刊杂志，接见来访者。我们又开始带他坐马车在四近兜兜风，有时我还跟谢辽沙以及仆人伊里亚一道，推着父亲坐在上头的皮靠背轮椅沿着“地

平线”小道去艾伊—托多尔亲王的庄园。

有一回，我跟布兰日带着父亲坐马车去海滨，去奥列伊兹。大海波平如镜，一条细小的拍岸海潮象洁白的绸带亲吻着海滩。几条土耳其小渔舟抛锚停在岸边。布兰日走过去跟土耳其人交谈了一阵。“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您想不想泛舟去海上游一游？”他问父亲。我表示反对，因为父亲刚刚能走路，而现在突然让他到宽阔的海面上去，更何况又跟这些只会说几句俄语的头戴圆锥形带穗的帽子的、身穿古怪服装的土耳其人在一起哩！可是，父亲心花怒放了——他爱的是难得的冒险！

于是，便把他安顿在甲板上的土耳其毯子上面，给他垫上五颜六色的东方靠枕，一眨眼，一派壮丽的南国海岸便展现在我们面前，壮丽的艾伊—别特里山君临在雪青色的雅伊纳河上空。卡斯普拉的许多高塔，雪白的摩尔式玖尔贝宫以及尤素波夫的庄园柯列伊兹，在我们眼里不过是星星点点。我们快活异常，但有点儿害怕。当我们回家以后，真好比犯了过失的小孩，怕向母亲报告此一番经历。

6月25日，我们从卡斯普拉回到雅斯纳雅·波良纳。我又犯重病，发高烧，身子瘦削虚弱，不能走路了。但母亲无论如何不想再呆在克里米亚了。谢辽

沙扶我下楼梯，一路上照顾父亲和我，温柔体贴。

这一次，去塞瓦斯托波尔我们是坐轮船。母亲、谢辽沙、布兰日费尽心机防止那些吵吵闹闹的好奇者打扰父亲。许名稚尔达人，其中有阿尔特肖列尔医生和叶尔巴季耶夫斯基医生，前来欢迎父亲。还在此时此地，父亲结识了作家库普林。在塞瓦斯托波尔有一节莫斯科—库尔斯克铁路局局长的专用车厢在等候我们。

在这次回程的沿线各车站上也聚集不少的人群，献花，喊乌拉。库尔斯克那里正在开教师代表大会，以地方自治会活动家、彼·季·道尔戈鲁可夫公爵为首的一批教师前来欢迎托尔斯泰。父亲以及所有我们这些人都因为会见客人和忙碌而深感疲倦，乐得赶快回家。在克里米亚我们度过了沉重的时刻。看来，在祖居的雅斯纳雅·波良纳父亲将很快康复并且过他正常的安定的生活。

回家后父亲写信给他兄弟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

“我们回来已经三天了。一路上很好。我的状况如下：在平地上走二百步腰便弯了。膝盖和手关节痛，睡得很少，但还能工作，一切都能理解和感觉，可以说还满意……病后我开始接近死亡，我得感谢

上帝让我患病，生病期间我理解了许多东西。”^⑩

1902年7月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最近一次生病是生命一次有力的挣扎，但现在得到了休息，以便聚集力量对付下一次生病，那一次将是名符其实的了。”^⑪

① 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四卷，第46页。

② 同上，第41页。

③ 《全集》，第五十四卷，第477页。

④ 同上，第476页。

⑤ 《文学遗产》第三十七、三十八卷，第300页。

⑥ 同^①，第56页。

⑦ 《文学遗产》，第三十七、三十八卷，第303页。《全集》，第五十四卷，第606页。

⑧ 《全集》，第五十四卷，第479页。

⑨ 同上，第191页。

⑩ 《索·安·托尔斯泰娅日记》，第185页。

⑪ 《全集》，第五十四卷，第119页。

⑫ 同上，第123页。

⑬ 同上，第127页，128页。

⑭ 同上，第126页。

⑮ 《文学遗产》，第三十七，三十八卷，第300—302页

⑯ 《索·安·托尔斯泰娅日记》，第186页。

⑰ 《全集》，第五十四卷，第491页。

第五十八章

“只应当逢迎上帝”

父亲常说，为了写得好，就得学习写作。“您写点什么吗？”——“不能，我还没试过呢。”听到这类谈话，他就生气。父亲说：“这就象回答对方问题：‘您会拉小提琴？’——‘不会，我还没试过呢’，听来同样荒唐。”

“仅有天才是不够的，还要忠于生活，需要语言和风格的锤炼，需要了解环境，需要作深入的研究。怎能够相信一位作家，他描写复活节时，天上竟然有一轮明月。或者，怎么能够相信另一位作家，他着手描写农村，却不知道庄稼汉是不会砍伐橡树做车辕和车轭的。要知道，只有榆树才宜作辕轭啊！”

父亲从克里米亚一回来，就重新开始创作中篇小说《哈泽·穆拉特》来。“我在写哈泽·穆拉特，”他在1902年8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有时颇有兴致，有时索然寡味，深感内疚。”^①

尽管这么说，父亲还是详尽地研究了当时的各种资料：契钦人的风俗习惯、衣着、宗教；沃隆佐夫总督的个性及其扈从。父亲对尼古拉一世陛下尤为注意。

斯塔索夫给他寄来了彼得堡公共图书馆的资料，父亲曾请尼古拉·米哈洛维奇亲王从高加索军事委员会文件第十卷中找出尼古拉一世跟高加索总督沃隆佐夫公爵的往来信札；他还找过亚历山德拉·安德列耶夫娜，从她那儿收到了皇上童年的历史资料，以及他的外祖母和女皇叶卡特琳娜二世跟他的关系的记载。1902年底与整个1903年，尽管也停停写写，托尔斯泰一直是以青年人的热情致力于《哈泽·穆拉特》的创作。

他同时还修改了中篇小说《假票据》、文章《告神职人员》、供比留科夫作传记用的个人童年回忆录和神话《地狱的毁灭和复兴》。这个神话故事使母亲愤怒，她不理解这部作品的深意。

“这篇文章，”她在日记中写道，“首先对准教会，

充满了否定、仇视和嘲弄人世的真正恶魔精神”……“而孩子们——萨莎还不懂事，玛莎跟我格格不入——在他们的父亲念完魔鬼神话之后，用骇人听闻的笑声来附和他那幸灾乐祸的笑，我却只想号啕痛哭一场。为这等著作可真值得活下去呀！上帝保佑，但愿它不是最坏的；上帝保佑他的心会软下来吧！”^②

1902年秋，我母亲准备再版父亲的全部著作（为此她得投资五万卢布），曾要求父亲把玛莎所抄写并经父亲签名的遗嘱交给她。一场激烈的争吵过后，父亲心律不齐的毛病又发作了，父亲亦如往常，屈从了母亲的要求。

柯利亚·奥波连斯基给比留科夫的信中写道：

“……这份遗嘱及其签名的存在，迫使那些想利用他著作的继承人煞费苦心……在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去世之后，可以停止对他追忆的责难了，不会再责怪他说的是一套，而做的又是另一套了。就是说，可以表明他渴望干什么，他的继承人干了什么，虽然——‘出售他的作品，对他说来，乃是他近十年来感到的平生最沉痛的事情’。我说的‘继承人’，其实是仅指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而言，她既不识羞耻，又全无良心；其他的人，我都无权列入，因为除了谢辽

沙、塔妮娅、萨沙和玛莎之外，我并不了解他们的意见。前几天，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到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这儿来说，请他把这一纸文件从玛莎手里取来再交给她，因为她很痛恨玛莎，那样，事情才算完结。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不敢违抗，便取来这一纸文件，交给她了。我曾试着跟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谈起这事，那当然是谈不出什么名堂来的……只有一点，她对我讲得一清二楚：‘我眼下支付了五万卢布的出版费，要是爸爸死了，这文件就会当众宣读，我就拿不回自己的本钱了。所以，我才要来了这个文件，谁也不给’。当我试着告诉她，反正是不能将它从地球表面上抹去的，因为日记中都有记载。她却恬不知耻地回答说，‘日记都进了博物馆’，而钥匙在她手里，她会将它们连同自己的日记一起，封存博物馆五十年的。”^③

玛莎和柯利亚当时都住在库兹明斯基家里。

“她会逼死父亲的……萨莎！”玛莎在房间里急得踱来踱去，说，“倘若我死了，你就得将全部真象公开，你应该知道，父亲是根据母亲的要求，而把他在日记中写到她的事全都一笔勾销的，你应当记住他遗嘱的内容”……她突然停了一下，那双父亲般的灰色、深邃的眼睛直勾勾地盯住我——我不禁毛骨

悚然。“你还很年轻……但我还是要把秘密告诉你听……你应当知道这件事……母亲针对父亲的日记写下了辩驳书式的日记，为的是洗刷自己啊……”

大夫们坚持要父亲住到楼上去——“阳光充足，干燥适宜”。他们没有深察家庭的现状，这是他们的失策。他们没有估计到，父亲搬进去的卧室，只跟母亲的卧室隔一道阳台。父亲在克里米亚害过那场病后，就离开了“拱形”的宁静书房，搬进了楼上靠西南的两间房子里。我母亲时常去打扰他，使他无法安宁。

推开一扇意大利式的玻璃门，可以通到阳台，公园、旷野、铁路，景物尽收眼底。他书房里的全套家具，都被搬了上去，包括家用沙发、细木工制作的木格靠背椅、全家人的生活照片。从前，这里是幼儿室，不知为什么却没有取下墙上两张不适宜书房特点的拉斐尔画的天使。书房的一扇门通卧室，卧室里放有一张单人床、小床头柜、配上面盆和水罐的木洗脸架、盛污水的木桶。他有力气时，常常是亲自把这木桶提到院子里去的。另一扇门通会客室和大厅。

有一次，是1902年9月11日的晚间，我们大家都坐在大厅里。桌上的茶炊已经冷却，听不见沸腾声了，大家也就纷纷离席安歇。但不知从哪儿送来一股

焦味儿。谁都没有介意——不管它哪儿发出烟味。可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总安不下心来。紧靠着大厅的楼梯口，有一扇小门通向顶楼。我母亲常在这儿的楼梯底下洗照片。当她一打开房门，一股弥漫各间房子的浓烟，朝她迎面袭来。

我一口气飞奔到了牲口棚，喊醒了管家和长工们。庄园里既没有消防水龙带，又没有自来水设备。水从井里打上来，由排成一长列的人梯将水桶传上顶楼。火被扑灭了。

原来是暖气锅炉烟囱上的瓦片坠落下来，碰巧又掉在父亲的卧室上方，厚实的橡木梁几乎阴燃透了。要不是我母亲对火警发现得早，否则大梁就会烧断，天棚就会坍塌的啊！

父亲在1902年11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这一期间的大事是阿法纳西受审，诺维科夫被捕。”

阿法纳西·阿格耶夫是以嘲弄圣像和东正教信仰罪而被捕的。他的妻子，一个从雅斯纳雅·波良纳娶过来的、不识字的纯朴女人，对自己丈夫的思想不感兴趣，只晓得一点：丈夫被流放了，并剥夺了他的一切财产。她用包头的一角黑头巾擦拭眼泪，恳求父亲帮助他们度过灾难。父亲通过彼得堡的友人斡旋了一阵，可是也没有什么结果。阿法纳西被判处永久

流放，妻子也跟着他去。

另一名因自己的信仰而遭难的托尔斯泰主义的农民诺维科夫，是一个自学成材的聪明人，他会写作，读了不少书，是个有头脑的人。诺维科夫在自己的乡里才华出众，而当根据财政大臣维捷的建议组织“关于农民困苦的特别会议”时，地方长官建议诺维科夫参加会议。诺维科夫同意了，并就农民的困苦和人民教育的必要性等问题，写了一份简明大胆的呈文。根据内务部的命令，诺维科夫以自由思想罪被捕。父亲写信给维捷，请他协助释放诺维科夫，维捷找到普列维，后者便下令将诺维科夫释放出狱，流放至图拉省，置于警察当局的秘密监视下。

诺维科夫在精神力量方面（主要是同情心），跟父亲非常相近，而那位刚从流放所回来就准备去加拿大联合志同道合者的弃绝仪式派教徒的领袖彼得·维里金，在精神方面可就太蒙昧无知了。这个心身健康的结结实实的大块头，总有点狭隘，缺乏远见。老太太施米特写到维里金时说：“一个很讨人喜欢的富有同情心的人……而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却说什么：他为人很好，很能影响人，但却是个精神上尚未成长的人。”

12月7日，父亲又卧病在床。专门为他治病的家

庭医生尼基京大夫初步诊断为疟疾复发。但我的母亲却把这解释成另一码事：“这是因为他写了那篇关于魔鬼的神话，上帝不让他长寿，想到这点，我心里就揪心地难过。”^④

我们大家又开始了日夜轮班守护，叫人心惊肉跳，全家人都集中观察父亲的体温、脉搏和其他情况。

“今天，由于把精力徒然用到护理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身上，我又产生了不好的抱屈的心情，”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于12月8日写道，“今天，在莫斯科有尼基什的第二场音乐会。参加这两场音乐会，本是我幸福的宿愿，象往常一样，我照例被剥夺了这一无可非议的享受，我真为自己的命运感到郁伤和懊丧。”^⑤

可幸运的是，这场病并没有拖很久，父亲迅速康复，又继续干自己的工作了。

1903年4月初，关于在基希涅夫发生的蹂躏犹太人的暴行的消息，以闪电般的速度传播开了，知识界和优秀的贵族代表人物中间引起了前所未有的愤慨。千百封信件和电报纷纷送到托尔斯泰手里。斯托罗仁科教授代表一批作家和学者（其中有特鲁别茨柯伊公爵、苏姆巴托夫—尤任公爵、尼·弗·达维多

夫等等)，请托尔斯泰签名向基希涅夫市行政长官发个电报。托尔斯泰很乐意照办。许多犹太人纷纷给父亲写信，请他就犹太人问题说出自己的意见。

“我和犹太人的关系不可能是别的，而是骨肉关系；我之所以喜爱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而是因为我和他们，正如我和一切人一样，都是同一天父之子，这种爱并不需要我作任何努力，因为我接触过犹太人，知道他们都是些很好的人”，托尔斯泰给一名犹太人的信中写道。^⑥

同时，托尔斯泰还回信给作家肖罗姆·阿列伊赫伊姆（拉比诺维奇），说他愿意写点东西，以资助基希涅夫的受难者。

1903年6月18日，他写道：

“我打算做三件新事：现时误入歧途的三种人——唯物主义者、实证主义者、虚无主义者——的叫嚣，他们喊叫道：‘得了！你跟我们有什么关系，禁欲的耶稣！你是来毁灭我们的。我知道你这个人是什么人’（那就好极了）。犹太人文集中收进下述故事：在喀山举行的一次愉快的舞会上，一个美男子，年老的神父爱上了一位波兰军官的女儿，科列伊莎美女；他亲昵地拉着她的手，跟她跳马祖加舞。清晨，在两人情意缠绵的不眠之夜以后，响起了鼓声，一个鞞鞞

人被判处笞刑，他被拖着通过队列，每人狠抽一鞭，军官命令用劲狠狠地打（能写出就好了）。三、写出我自己，道出全部真相，其中也写出我毕生中的重要和善良的方面（能写出那就好了）。”^⑦

父亲决定将这篇《舞会以后》的故事转让给肖罗姆·阿列伊赫伊姆。他不等写完《舞会以后》，另外写了一篇童话《沙皇阿萨尔哈顿》和《三个问题》，均收进文集本，以资助罹难的犹太人。

8月28日，父亲七十五寿辰。父亲讨厌的是过生日。如果不是收到艺术团体的成员——契诃夫、高尔基等——的贺电，那他本人无论如何也记不起自己从事文艺活动已满五十周年了（1902年9月3日）。8月28日，他满七十五岁的这一天，从俄国各个角落纷纷寄来贺词、贺信、贺电、贺礼，这使他极不愉快。儿孙们几乎济济一堂。我们本来是想一家人聚会一下的，可来了许多客人，“欢庆托尔斯泰诞辰”，办了盛大的宴席，人群吵吵闹闹，挤挤搽搽，摄取“伟大的人”、“俄罗斯大地的作家”的只言片语。“俄国大地”的这一说法，在我们家常常被用来讥讽某些作家，他们对待托尔斯泰恰恰只看作“俄国大地”的作家、仅仅仰慕他的大名而已。我们把 П. А. 谢尔盖因柯列入这一类人。

常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不管你愿意与否，往往异常机灵地钻到我们家里来。他们往往奉送某种不寻常的有用的礼物，善于适时巴结女主人。瞧，这个人就变成经常光顾的座上客了。这号人真不少，父亲的精力和时间被他们夺去了多少啊！谢尔盖因柯就是这么一个人。他老是送些罕见之物给父亲：配备有座凳的拐杖啦，父亲在散步时就可以安坐其上，便于录下自己构思所得；还有手电筒啦，留声机啦，等等。谢尔盖因柯曾经是他内心斗争的一个因素，对于托尔斯泰来说，谢尔盖因柯那善于曲意奉承的柔和嗓音、伛偻的高大身躯、长长的恰如触须似的手指，主要是在他那媚态之中，总有点儿令人反感的味道。“谢尔盖因柯多么令人讨厌啊！”你要是给父亲这么一说。“比你还要讨厌吗？”他就会反问一句。“对，对，比我可讨厌多了！就算我很笨很坏吧，……可他却叫人反感！”我知道，父亲在内心深处是同意我的看法的。

但也有一些讨人喜爱的客人：施米特老太太和喜气洋洋、容光焕发的伊凡·伊凡诺维奇·戈尔布诺夫，此人在寿辰前夕给父亲送来了一件对他来说算是最珍贵的礼物：《圣贤思想集》，即由父亲编纂而成、再由媒介出版社赶在生日前问世的一个集子。

1903年9月3日，父亲在日记中写道：“28号过得昏昏沉沉。各方来的祝贺真令人不安，心里不愉快——虚伪啊，‘俄罗斯大地的伟大作家’，还有各式各样的蠢话……”^⑧

了解托尔斯泰的人多么少啊！一些人把他称为革命派，另一些人则称之为保守派、贵族，责怪他“奢侈”，虽然是极其有限的奢侈。归根到底，托尔斯泰究竟跟谁在一起呢？

他既不跟政府同道，也不跟革命派一起，革命派的那套做法，他是常常指责的。人们不了解他对革命派持否定态度，尽管他在自己的一些文章中已阐述得十分明确了。要一劳永逸地了解他对社会主义的态度，只须读一读他在1902年9月21日日记中的思想也就够了。

“社会主义者都认定托拉斯和辛迪加乃是实现社会主义理想或推动其实现的一项社会组织，也就是说，人们需要协同地、而不是分散地工作。但是，他们只是在暴力的强制下，才协同工作的。有何证据能证明，当他们自由时，他们还也会这么工作吗？；又有何证据能证明，托拉斯和辛迪加将会转移到工人手里？托拉斯很有可能会制造出奴隶制度来，而奴隶们要争取自身解放，必得摧毁这个并非由他们创建

的托拉斯的。”^⑨

“社会主义的拥护者，主要是城市居民。他们既不懂农村生活的美妙和诗意，也不了解他们的疾苦”，——父亲在1902年2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⑩

虽然父亲曾多次以个人身份向沙皇呼吁，但他充分理解沙皇的弱点。他在1903年7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大家都向沙皇呼吁，请他为公共福利做这做那。我也在做这事。人们都期待着他援助、有所作为，而他自个儿却勉强才挺得住呢。这真好比一个人，用双手死死抓住、用牙齿死死咬住一根树枝，一闪失就会掉进深潭里去；而旁人却请他帮忙把一根圆木抬上墙头”。^⑪

左派、右派，甚至跟他志同道合的人都指责过父亲。著名的颓废派诗人多勃罗柳鲍夫，一度过着简朴的生活，并身无分文地漫游全俄，就曾给他的老师写道：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为了向你表示敬爱，我想直言不讳谈谈你本人。你行将就木，你奋斗一生，为了实现某一部分信仰也从事体力劳动，把它作为不可避免的、上帝的戒律一样，——此刻，就在这现世的土地上，你不妨再一次地举起你的宝剑，不给那

些寻找口实者以口实吧！把你财产移交中那不可纠正的错误解释清楚，但莫使别人垂涎；把你自己早就承认的你未能走出贵族之家的错误再解释一下，（说是病魔缠身，这说法同样也难以自圆其说），这种辩解最好印出来示众（因为你的全部著作过去和现在都在印刷发行），此外，你放弃体力劳动，自己也承认错了，也请解释一下（你现在有病，那是做不到的）。这种辩解定将捍卫你毕生为之奋斗的体力劳动和安贫的生活原则，定将使各方指责不攻自破。请你，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心平气和地接受一个友人的这句忠告吧。”^⑫

“我们的一切愿望、奋斗、内心的激情、我们的大声疾呼和与人为善的举动——一切都是枉然……我们始终是孤独的”，莫泊桑在父亲如此推崇的《孤独》中这样写道。

不过，托尔斯泰却具有巨大的、他人看不见的精神力量，这就使得他能爱一切人，包括那些使他伤心的亲属、不幸的沙皇、迷途的革命者、揭露他的“托尔斯泰主人者”，以及谢尔盖因柯之流，因而托尔斯泰并不“孤独”。

“在这心灰意懒和疑虑重重的时刻，我越来越感到，我只应逢迎我即将朝觐的上帝，而不是芸芸众

生。这样，心情就好过多了，轻松多了，”他在1903年3月21日写道。^⑬

- ① 《全集》，第五十四卷，第134页
- ② 《索·安·托尔斯泰娅日记》，1932年《北方》出版社，第206页。
- ③ 《全集》，第五十四卷，第645页
- ④ 《索·安·托尔斯泰娅日记》，第208页、1902年12月7日
- ⑤ 同上，第209页。1902年12月8日
- ⑥ 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四卷，第81页
- ⑦ 《全集》，第五十四卷，第178页
- ⑧ 同上，第190页
- ⑨ 同上，第137页
- ⑩ 同上，第157页
- ⑪ 同上，第188页
- ⑫ 同上，第532页
- ⑬ 同上，第160页

第五十九章

日 俄 战 争

跟其他领域一样，在文学这个领域里，父亲对这个或那个作家，对这部或那部作品，时常会发表一些跟公认的定论大相径庭的见解。他不喜欢歌德。歌德的四十二卷著作他都通读过了，他从不苟同屠格涅夫对歌德的赞颂之辞，可是对席勒，他倒是十分接近。

“我读着歌德的作品，就看到这个渺小的、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才子对我所相逢的这一代人的有害的影响，屠格涅夫那样倾倒在《浮士德》（一部十分拙劣的作品）和莎士比亚之前；而更有甚者，他们硬要把拉奥孔和阿波罗等诸种雕像，以及各式各样的

文章、剧作等看得特别重要。因为我喜欢屠格涅夫，因而也力图喜欢他如此推崇的人物，为此我受过多少折磨啊！不管我多么卖力，总不能办到。这些权威真害人不浅，这些素负盛名的伟人却原来是些伪君子！”他在1906年9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①

在他的眼里，莎士比亚的名望是人为的，矫揉造作的，他曾写信给斯塔索夫，说他老早就想谈谈莎士比亚，说出自己半个世纪以来憋在心头的见解。他还给哥哥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写信，说他想论证莎士比亚“不仅不是作家，还简直是个可怕的骗子和下流坯”。

托尔斯泰在论述莎士比亚文章中，论证了莎士比亚的世界观“是卑劣的，庸俗的……否定一切，不光否定宗教的追求，而且还否定人文主义的追求”。他说莎士比亚缺乏能使艺术获得外表美的技巧，“情境很不自然”，没有角色的语言，“没有分寸感”，还缺乏艺术作品的第三个必要条件——“完全缺乏真诚”。^②

除这篇论文外，在父亲的写字台上还放着两份手稿：《神性的与人性的》——一个曾经是革命者生活中的故事。1904年2月23日，父亲在日记中写道：

“我想把《神性的与人性的》继续写下去，我很喜欢它”。^③

1904 年底，比留科夫从流放地回来。他开始写父亲的传记，并请父亲描写自己的童年。但很遗憾，父亲抽不出很多的时间来写《童年回忆》。他一心扑到编选《阅读园地》这一工作中去了，那是一部较《圣贤思想集》更为翔实的书。在这本书中，每天按爱情、节欲、死亡等题目分类编写。从 1884 年起，父亲便在日记中写道必须编写《阅读园地》，跟埃皮克捷特*、马丁·奥勒留斯**、老子等圣人的思想和《福音书》中的思想有紧密的关系”。

父亲念念不忘此事。1902 年，父亲在克里米亚卧病时，即着手实现编写此书理想。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此书逐渐扩展成为附有每周读物的《阅读园地》。这一工作，父亲直到生命终结时都不曾稍停，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精神乐趣。

1903 年底和 1904 年初，父亲写了中篇小说《假票据》。这部作品，父亲采用了完全新颖的形式，书

* 埃皮克捷特（约 50—约 138），古罗马哲学家，是后期斯多葛主义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 马可·奥勒留斯（121—180），古罗马皇帝（161—180），新斯多葛派哲学的主要代表之一。

中没有中心角色，读者所看到的，尽是一些死于身外之物的诱惑的、通过复杂的道路皈依上帝的一群走马灯式的人物。遗憾的是，父亲终于未能写完这部中篇小说。

在雅斯纳雅·波良纳我们安静度日。偶尔有些客人来我们家走走。美国人威廉·杰宁格斯·布朗携带儿子专程来过雅斯纳雅·波良纳。父亲很喜欢他。为了他，父亲破天荒第一遭取消了自己早晨要干的事，布朗也对谈话着了迷，以至取消了觐见沙皇的约会。原定翌日沙皇于皇村接见他的，他必须在当天十二时离开雅斯纳雅·波良纳，但他发出一封电报，表示他不能前去。在各种名目的话题中，还谈到了勿用暴力抗恶一事，布朗援引了常用来反对托尔斯泰的习见例子。要是恶棍当着您的面折磨孩子，您应该怎么办？

“我在世上活了七十五年了，”托尔斯泰说，“还不曾见到过这样的恶棍。但我倒是目睹千百万生灵由于各国政府的残暴不仁而纷纷倒毙、屈死了”。布朗报以一笑——他理解托尔斯泰的意思。^①

尤丽·伊古姆诺娃和顶替尼基京大夫的别尔肯格伊姆大夫，都跟我们住一起。父亲完全康复，每早坚持散步，工作颇多，有时骑骑马。我母亲常去莫斯

科听音乐，张罗出书事宜。她现在正操心为后代保存父亲的手稿，并开始写起自己的生活史。母亲的意图是将父亲日记和自己日记交莫斯科历史博物馆保存，以便在五十年期内谁也接触不了它们。

谁都不曾想到日俄战争会爆发。父亲为此震动最大。有几天，他什么也不想，沉默寡言，直到写了一篇反战的文章《回心转意吧！》，方才吐出胸中愤懑。这篇文章，是在国外发表的，引起了各方的注意。伦敦《泰晤士报》用了九个半栏的版面的篇幅，写道：“这同时是一种信仰，一份政治宣言，一幅一个庄稼汉受苦的图画，一件在许多同样的士兵的头脑中萦回的思想的标本，此外，还是一篇令人感兴趣的和可资借鉴的侧重心理描写的短文。文中鲜明地显露出一个鸿沟：欧洲人的整个精神体系跟对欧洲人思想中某些片言只语掌握得还不够充分的伟大而权威性的斯拉夫作家的智力状况之间出现的鸿沟”……^⑤

《每日新闻》则恰恰相反，热情洋溢地赞许了那篇文章。报纸写道：“当卡莱尔*将贫穷的、无声的俄国说成是一个永远不能产生举世闻名的呼声之国时，他还不知道，恰恰在当时的青年军官中，喊出了正是大家侧耳倾听的呼声。昨天，托尔斯泰发表了一

* 卡莱尔，英国反动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

份伟大的告全人类书，它们我们返回到那语言异常朴实、令人叹为观止的首要的基本真理中去”。^⑥

托尔斯泰在回答美国费城《北美日报》的电询——他支持哪一方，是俄国，还是日本时，他表示：

“我既不支持俄国，也不支持日本，我支持的是两国的劳动人民，他们深受各自政府的欺骗，被迫违背本身的利益、自己的良心和宗教而打仗”。^⑦

尽管如此回答，托尔斯泰无论多么想保持不偏不倚，还是病态式地忍受俄军败北的每一条消息。他等不到莫斯科的报纸，从邮局收到的要隔一天，有时便骑马去图拉打听有关战局的新消息。

6月2日，父亲写道：“战争和征兵使我很痛苦”。6月6日又写道：“被丢下的不幸的士兵妻子四处流离。我读着报纸，觉得仿佛这一切战斗和举行军旗命名式都是这样坚决，以致起来抵制也是徒劳无益的，有时我又想，我写那篇文章是没有必要的，只能引起敌意，而你一看到人民，看到士兵的妻子们，你就会懊悔，我写得太少了，写得太软弱无力了”。^⑧

5月，父亲给塔妮娅写道：“战争压抑着的国家蒙受熬煎。征集后备兵正在产生恐怖的印象”。^⑨

6月1日，他给尼古拉·米海依洛维奇亲王写道：“我怎么也不曾想到，这一骇人听闻的战争竟会

对我产生了如此的影响，我不能不发表意见，寄了一篇文章去国外，日内想必就要登出来了，最高当局可能会极不赞同的”。^⑩

7月10日，托尔斯泰给沃尔科夫写道：“战争以其物质轮子碾上了你们家，我则是精神上受压抑。只要人还是个有理智的动物，那么，当他看到人们拚命地、高度紧张地完成不应当做、也不可能做的事情的时候，他准会毛骨悚然的”。^⑪

与此同时，我母亲却在日记中对战争作了另一番描绘：“这场战争，打破了我们乡下宁静气氛，使大伙儿激动不安而又大感兴趣。情绪普遍高涨，同情皇上，确是令人惊叹。这说明，日本人的进攻是无耻的，突然的，而俄国无论是皇上也好，其他任何个人也好，都无意打仗。战争是被迫的”。^⑫

我们家去打仗的有兄弟安德列。可怜的奥尔迦无法使自己的丈夫收心。安德列钟情于另一有夫之妇，扔下妻子和两个小孩：索涅奇卡和小伊利亚，他最后终于鬼迷心窍，去远东参加了作战部队。我母亲、伊里亚偕同妻子索尼娅、略瓦和米沙一起乘车送安德列去唐波夫，骑兵团再从那儿将他接走。

父母双双为他的弱点而感到痛苦，但还是喜爱安德列的。母亲在1904年8月8日的日记中满怀豪

情地将儿子描绘了一通：

“勤务兵也乘着马出发了，我的安德留沙身穿淡茶色的衬衣，头戴同样颜色的制帽，骑着他那匹迷人的牝马，走在众人之前。这一切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中：马腿都缠上个白晃晃的什么，安德留沙在坐骑上的优美姿势，逗得一个老婆婆失声喊叫：“马上端坐着令郎啦！——好一似坐在自己的书房里，太美了！”^⑬

父亲也将这一大事记录在自己的日记中：“6月13日，我送别了安德留沙，真奇怪，我干吗喜欢他呢？说是因为他诚实、真挚吧！不对呀……可我跟他在一起却感到轻松和友好。为什么？”^⑭

这一年内，托尔斯泰失去了两位从小跟他亲近的人。3月份，我的教母亚历山德拉·安德列耶夫娜·托尔斯泰娅姑祖母溘然长逝。姑祖母在去世之前不久，曾同心爱的，但却离得那么远的列夫通了几封亲切的信。当时姑祖母的病势已趋沉重。她感谢我父亲的挚爱，她感到幸福，因为她感觉到他信中“那老是萦回在耳边的最真挚的语调”又在他们之间响起。^⑮

“亲爱的朋友亚历山德拉，”父亲于1903年1月26日写道，“随着年岁的变老，我越来越想跟您说些

贴心的话儿……我想说的是，我非常非常爱您。诚然，我们今生今世也可能再也见不着了；天意如此，这也好。我也不想我们将要象我们所理解的会晤那样，在彼岸见面，但我认为，而且完全确信，就是在彼岸生活里，所有您在这一生中所惠赐我的善良，厚爱 and 美好的东西，也定会长留在我身上的，也可能，从我这儿得到的一点点东西，也长留在您身上。总而言之，我在一步步地接近那不可避免的美妙境地，总觉得我对人要去的那个归宿的概念，原以为越明显就越不相信，其实不然，越是不明确，则对于生命不会就此终止，而会在那边开始新的更好的生命的信念，便更强烈、更坚定。因此，一切均归结于对上帝慈悲的信念——来自上帝与复归于上帝，这便是一切幸福之所在。生，从他那儿来，死，朝他那儿去，因而，除了美好，还能有别的什么东西呢？‘我将我的灵魂交给你（上帝）！’别了，亲爱的朋友，兄弟般地、柔情地吻你，并感谢您的厚爱”。^{①6}

1903年2月19日，父亲在复信中写道：“感谢您，亲爱的朋友，给我的复信。您的整个心灵，您悲天悯人的心灵，感觉到了我对您的感情的真挚与温存，于是立刻回报了，这真叫人高兴。——这封信将由我的萨莎转交给您。她是个好人，或者说，是个真

心实意想做好人的人。在她同您会晤时，不信正教一事正在使她发窘，也使我有点不安。对她对我，都别为这事而严加指斥。我故意不施加影响于她，但她表面上却被迫服从我。可一如您所知道的那样，宗教在她这般年纪，并非是必不可少的。她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哩！一旦到了真正需要宗教信仰的时候，她是会根据需要进行选择的。其实，我给您写这个，感到很不好意思，好象我不了解您那颗敏感的心似的……”^⑦

父亲在其生命的晚年重读自己同姑祖母的通信集时，曾经说过：“就象在阴暗的走廊里，从某扇门缝里总会漏进一丝光线似的，比如说，当我回顾自己那漫长的、阴暗的生活时，对亚历山德拉的回忆，就是一线明亮的光”。^⑧

8月底，谢辽沙·托尔斯泰伯伯逝世了。他患的是舌癌，痛苦极了。病中父亲常去看望他；弥留之际，父亲在场。去世之前，谢辽沙伯伯作了忏悔，接受了圣餐。父亲对此是高兴的。

8月26日，父亲在日记中写道：“谢辽沙死了，静悄悄地，对行将谢世显得不介意。这是个秘密。说不出是坏是好。他理解不了有积极作用的宗教感情，可能我还在欺骗自己；好象又没有。他倒好了，发现了他身上新的、好的方面，我也同样如此。神志清醒度

是珍贵的，重要的，而至于它在茫茫的苦海中处于何种水平，却是无关紧要的”。^⑩

这一年的夏天，我满二十岁。象一块海绵，我不断吸取父亲的思想，但总不及姐姐玛莎那样深入。我缺乏她出嫁前所特具的那种献身精神和禁欲主义。我也缺乏塔妮娅的严整性——我不想成家，尽管爱情和在月光下关于某个非凡英雄人物的幻想仍在我的脑海中转悠。

父亲对我的长相丑陋感到很忧伤，但对我的运动灵活、性情愉快和乐观情绪，却又十分欣慰。我想，我要遵循父亲的观点，因为我是个素食主义者，穿着朴素，把钱都花在农民诊疗所里，而这恰恰是他认为是虚伪之举的行善，冬天，我在塔妮娅原先的工作室里教孩子们，帮助尼基京大夫接诊病号。但父亲很快就制止了这一工作。“我请求你不要再去诊疗所了”，他对我说。我提出了异议，我想知道，干嘛他要固执己见的。“我请求你这么办”，他说。我也就这样一直没有弄明白，干嘛他不要我帮助大夫：是怕我感染上某一讨厌的病症呢，还是怕我同大夫调情？……

1904年底，来了个斯洛伐克大夫杜尚·彼得罗维奇·马科维茨基。此人是父亲的朋友和追随者，并从此在雅斯纳雅·波良纳呆了多年。我又开始同杜

尚往来于诊疗所了，只是他的治病方法稀奇古怪，使我对医学的兴趣竟一落千丈。他在同农民交谈时，俄语讲得很蹩脚，我站在药房里称药粉或配制药膏时，常常笑出眼泪来。

杜尚几乎是个圣人。他从早到晚都在巡查病号，帮助父亲，并且不断写作。他口袋里有许多的铅笔头和硬纸片。当父亲说话时，杜尚便将右手插进口袋掏出纸笔，把他的话照录下来。他那双鼓起的灰色眼睛盯住一点，他那光秃的脑袋，夹杂着几根淡黄色的白发和斑白中稍带棕黄的胡须——在紧张的呆板表情中都僵直了……杜尚的速记也好，他的虔诚也好，实在惹我生气，我刻薄地逗恼他，妨碍他作笔记，现在想起这事来，我深感内疚。

在那些岁月，我甚至没有意识到，我距离父亲的学说多么遥远。当真要把家财散去时，我却舍不得。我如此喜爱和熟悉的马匹、由英国女马服裁缝精制的马鞍、网球拍、冰鞋、滑雪板——所有这一切，都得花钱去买，我也完全不准备放弃这一切。

父亲在1904年6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关于自己，我想，我老是赞扬贫困，是不是在自我欺骗？……我从萨莎身上看到了这一点。可怜她们，我怕她们没有四轮马车，怕她们不清洁，怕她们没有骑马

服。起因和辩解之辞只有一个：我不爱贫困，不可能爱它，尤其对于他人，但是，我不爱、我憎恨、不可能不憎恨那产生土地私有制、财富、银行、利息的东西。魔鬼如此狡猾地接近了我，以至贫困带来的灾难都清清楚楚呈现在我眼前，而对免于贫困的那些不公正的行为却视而不见。这一切都藏而不露，这一切又都为大多数人所赞许”。^{②0}

冬天，父亲不时去滑冰场，我同一大群农民孩子——部分是我的学生——在那儿滑冰。我知道父亲是在观赏我，他见我笑逐颜开，心里就高兴。他在1905年1月21日的日记中所作的记事就颇有意思：“我听了政治议论、争辩、谴责，便走进另一间有吉它伴奏和笑声鼎沸的房子。我鲜明地感觉到娱乐的神圣不可侵犯。娱乐，快快活活，这便是执行上帝的意志的一种办法”。^{②1}

但是，我时常因对母亲任性、愚笨，不喜欢“阴沉的人”（指托尔斯泰主义者），而使他伤心。但我最叫他伤心的是，我由于一时心血来潮，想有自己的一小块土地，便买下了邻近的杰里亚坚基庄园——一百三十俄亩土地。我想，通过农民银行将大部分土对转让给农民，从中花掉巨额钞票之后，我这个做法是好的。这又是一桩“慈善事业”。

父亲在 1905 年 4 月 21 日的日记中写道：

“昨天，我同布图尔林去过彼得·奥西波夫处，他责备了我，说我一面说反对土地私有，一面却在购买土地。虽然痛心，但却很好。我觉得，指责于人有益，特别是过头的指责，而赞扬则极为有害，会使人精神涣散，尤其是过头的赞扬（而赞扬总是过头的）”。^②

彼得·奥西波夫指的是我购买的土地。在农民中不能想象，未经家长——父亲——的同意，儿女竟能为所欲为。

“人的肉体变得愈差，那他的精神就会显得愈好，”父亲在日记中写道。“所以人就不可能不好。我长期都在寻找表达这一点的比喻。比喻是最简单的：就好比秤杆。肉体这一端的重量愈大，肉体方面以及人的名声方面（也属肉体范围）愈不好，则精神这一端就会翘得愈高，心灵就会愈加好受”。^③

① 《全集》，第五十五卷，第 248 页。1906 年 9 月 30 日日记。

② 《全集》，1913 年版，第十九卷，第 177 页，《论莎士比亚》。

③ 《全集》，第五十五卷，第 14 页。1904 年 2 月 23 日日记。

④ 马科维茨基。《雅斯纳雅·波良纳记事》，第 49 页。

⑤ 《全集》，第五十五卷，第 467 页。

⑥ 同上

-
- ⑦ 古谢夫：《托尔斯泰年谱》，第 650 页。
- ⑧ 《全集》，第五十五卷，第 44 页。1904 年 6 月 2 日至 6 日日记。
- ⑨ 同上，第 457 页。
- ⑩ 同上，第 457 页；以及《文学遗产》，第三十七—三十八卷合集，第 319 页。
- ⑪ 《全集》，第五十五卷，第 457 页。
- ⑫ 《索·安·托尔斯泰娅日记》，1932 年《北方》出版社，第 226 页。
- ⑬ 同上，第 229 页。
- ⑭ 《全集》，第五十五卷，第 50 页，1904 年 6 月 13 日日记。
- ⑮ 古谢夫：《托尔斯泰年谱》，第 648 页。
- ⑯ 《列·尼·托尔斯泰与亚·安·托尔斯泰娅伯爵小姐通讯集》托尔斯泰纪念馆出版，第一卷，第 379 页。
- ⑰ 同上，第 379 页。
- ⑱ 引自亚·列·托尔斯泰的私人回忆录。
- ⑲ 《全集》，第五十五卷，第 83 页。1904 年 8 月 26 日日记。
- ⑳ 同上，第 53 页。1904 年 6 月 18 日日记。
- ㉑ 同上，第 119 页。1905 年 1 月 21 日日记。
- ㉒ 同上，第 135 页。1905 年 4 月 21 日日记。
- ㉓ 同上，第 135 页。1905 年 4 月 21 日日记。

第 六 十 章

1905 年革命

法国大革命宣告了无可置疑的真理，但真理一旦被诉诸暴力，便都成为谎言。

列夫·托尔斯泰

(1904 年 12 月 22 日日记)

1904 年 12 月 20 日，报纸报道，斯捷谢利将军把旅顺口拱手让与日本人，连同一万五千名卫戍部队和全部武器。

这条消息不管多么叫人纳闷，我家成员之中，父亲要算是最受震动的了。他好长时间都不能平静。他这位俄国爱国者，原先的军官故态复萌了。他自己在

日记中承认了这一点：“旅顺口失守使我伤心，我很难过。这便是爱国主义。我接受了爱国主义教育，老是摆脱不了它，就象摆脱不了个人利己主义、家庭利己主义、甚至贵族利己主义一样，我也摆脱不了爱国主义。所有这些利己主义都存乎我一人之身，但是，我还具有上帝法则的意识，这种意识约束这些利己主义，所以我就不能为它们服务了。于是这些利己主义便慢慢衰退了”。^①

远东传来的消息变得越来越险恶。日本人击沉了俄国舰队。姨母塔季娅娜·安德列耶夫娜·库兹明斯卡娅的第三个儿子，海军军官瓦夏失踪。后来我们才听到说，他在海上飘泊了一昼夜后，被日本人救起，成为他们的俘虏。

“昨天，收到了关于俄国舰队全军覆没的消息”，父亲在1905年5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这条消息不知怎的，使我深为震惊。我开始明白，从过去到现在，这都不可能换个模式：尽管我们都是些不高明的基督教徒，但要把基督教的信仰同战争的不相容这一事实掩盖起来，那是不可能的……信奉基督教的各民族在同以祖国和英勇作为最高理想的、不信奉基督教的各民族打仗时，定然败北。如果说，迄今信奉基督教的各民族战胜了野蛮民族中国、印度、非洲

各民族、希瓦人和中亚细亚人的话，那这只不过是信奉基督教的民族在军事技术装备上具有优势而已；而在技术力量势均力敌的情况下，信奉基督教的民族不可避免地会被不信奉基督教的民族所击败，俄日战争就是如此。几十年来，日本不仅同欧洲人和美国人并驾齐驱，而且在技术改良方面超越了他们。日本人不仅在战争技术上，而且在改善一切物质的技术方面的这一成就即显著地表明，技术改良是不值钱的，这就叫做文化。不值得去效法他们，甚至想入非非，也是毫无必要的。过仁慈的生活，心地纯洁、兄弟情谊和博爱，这才是基督的教导，这才是珍贵的，重要的和难以做到的，却往往为我们所鄙视，这对我们是个教训。

我说这个，并不是因为日本人打败了我们而自宽自解。耻辱和羞愧依然存在。这并非仅仅因为我们被日本人打败，而是因为我们竟然承担了去做那些我们不善于做好和其本身就很坏的事情。”^②

父亲怎么也不能平静下来。俄军的失败，对他具有深刻的意义——他眼前，已经露出了一个深渊，不仅是俄国，而且整个醉心于唯物主义好处的人类全都向那个深渊滑下去。

“这一次所毁灭的，不只是俄军和俄国舰队，不

只是俄国一国而已，”他在1905年6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而是毁灭了基督教的虚假文明。我十分清楚地感到这点，意识到这点，理解到这点，能够明确而有力地表达这一点，该是何等地好啊！——这种毁灭早就开始了：在金钱斗争中，在犹太人打败了各国的基督教督的所谓科学艺术成就的斗争中，（这引起了对犹太人的普遍忌妒和仇恨）。如今，日本人又通过战争，以暴力形式干下了同样的事情……”^③

革命派时刻都在准备着。革命分子的土壤是非常肥沃的：俄军失败，工人不满，政府压迫、农民缺乏土地。1月份，谣传在主显节向约旦河十字架进军期间，在冬宫前面发生了刺杀沙皇事件，而且一名警士被炮弹击毙。

1905年1月9日，一万五千名工人群众在加班牧师的率领下，带着请愿书向冬宫前进。警察和近卫军团不准请愿者去那儿，并把他们驱散。死伤多人。

1月，我哥哥列夫觐见了皇上，同他谈了一个半小时。我这时正在彼得堡列夫那儿。我很喜欢他那可爱的瑞典妻子和他们的儿女。略瓦把他觐见皇上的事告诉了我。关于这事，我从彼得堡给父亲写了信：

“沙皇对列夫说，他感到满意，说他接见了工人代表团，同工人们一道哭了，说应当召开地方自治大

会，但眼下战争还在进行，暂时不宜召开……略瓦给他谈了素食主义，谈了烟酒的危害，还答应将自己论述卫生生活方式的文章寄给皇上”。^④

“略瓦·斯塔霍维奇总是好为人师”，父亲对马科维茨基说，“可他们却不会为自己做一星半点事情，连茶炊都不会生哩！”^⑤

1905年2月1日，我母亲从莫斯科来，她说有人告诉她，沙皇在接见列夫·列沃维奇时似乎曾对他说过：“令尊是一位伟大人物，但同时却又是个幻想家，比如论土地问题”。^⑥她又通知说，有人从彼得堡给总督打电报，在市内各条大街上，军队打死了三千名工人和六万五千名罢工者。^⑦这些消息被革命派传播开来，并加以夸大，实际上，在彼得堡看来有几百人吃了苦头。

2月，谢尔盖·亚历山大洛维奇亲王在莫斯科被炸弹炸死。我当时在莫斯科，一回家，便把这一消息通知了父亲。父亲大为震怒，喟然长叹，并严厉地谴责了革命刺客。

“当今的革命怎么也不能重演一百多年以前的事了，”他写道。“1830年和1848年的革命都没有成功，因为他们没有理想，他们当时是被大革命的残余势力所鼓动起来的。如今，那些搞俄国革命的人都没

有任何理想：各种经济理想可不是理想”。

父亲不相信随着宪法的实施，俄国会有多大变化。温和的自由党人——斯塔霍维奇夫妇、瓦西里·马克拉科夫、多尔戈鲁科夫公爵兄弟——一到托尔斯泰这儿，就成了他的负担，因为他们不理解他们对他们为在俄国实施宪法的一切努力所持的冷漠态度。

“人类无容置疑的进步只有一个，”他说道，“那就是在精神领域，即在每个人的自我完善之中。人只能个人进行修养，而不能依靠国家的改革对别人求全责备……影响人类运动的因素很多，而且这些因素又十分复杂，所以不能够作任何预言，同时，把对人类运动的重要影响都归功于某个外在的改革，那是可笑的”。

跟谢尔盖的争吵特别叫父亲不愉快。他们互不了解。谢尔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立宪民主党人。他对宗教问题不感兴趣，认为在俄国实施宪法和自由，乃是最重要的。父亲则认为，只有真正的基督教和每人的自我完善，才可能改善人的生活。

“立宪的臣民自以为他是自由的，”托尔斯泰写道，“就象囚犯认为自己是自由的一样，因为可以选择狱卒嘛。立宪的国家的人们丧失了自由的概念。生活在君主专制国家——土耳其，俄国——的人，多少

还有点自由，尽管他也要遭受并非由他所建立的政权的迫害，但一向认定其所处的政权是合理的立宪国家的成员，却始终是奴隶”。^⑧

从年轻时起，托尔斯泰就不喜欢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根据他的看法，这些人一方面对俄国的核心成员——农民大众和组成这一大众实质的宗教基础——一无所知，一方面却自信到了极点。他对自由主义者所持的态度，在其1905年12月23日的日记中，明显地表现出来：

“在当今的革命时期，显示出各有其优点和缺点的有三种人。第一种人是保守分子，即希望安宁及其所喜爱的生活能继续下去而不希望任何变革的人。这些人的缺点是利己主义，优点是谦恭、温顺。第二种人是革命派，立志变革，并敢于决定所需变革，不怕为实施一己变革所招致的迫害，同样地不怕贫困和苦难。这类人的缺点是粗鲁和残忍，优点是有毅力，甘愿为达到其想象中的崇高目的而牺牲。第三种人是自由主义者，他们既不具备保守分子的温顺，又没有革命者的勇于牺牲，只有利己主义，象第一种人那样，希望平安无事，象第二种人那样自以为

是”。^⑨

父亲认为，老百姓比知识分子要高大得多，聪明得多，而知识分子却教导他们，安排他们的生活。1905年7月30日，父亲写道：“知识分子给人民生活所带来的祸害，要比所做的好事大一百倍”。^⑩

父亲焦急不安地注视着人民中日益增长的革命情绪。父亲越来越频繁地接触到否定上帝的人、唯物主义者、革命志士，同这些人的谈话，总使得他苦恼已极，

“今天来了个犹太人，”他在1905年9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他是《罗斯报》的记者。在谈话未了，由于我不同意他的观点，他便说：‘象这么说，您就连杀掉普列维*也会认为不好的了’。我就对他说：‘跟您谈话，我感到遗憾’。他便气忿地走开了，就是说，他行为不好”。^⑪

形势变得越来越令人惊慌不安……罢工、学潮，此起彼伏。父亲收到了大批大批的揭露函件，要求将他并未占有的土地分配给农民。

* 维·康·普列维（1846—1904）反动分子，内务大臣兼宪兵头子。普列维对待革命运动的参加者极其残暴。1904年7月15日，这个刽子手终于被社会革命党人叶·萨佐诺夫所击毙。

“听说你有土地，甚至还有很多土地；那就将这批土地都还给那些用自己的汗水浇灌它的人吧，”一个农民给他写信，“开始做你所鼓吹的事吧！伟大的长者！他人定将仿效你的榜样。请接受一个农民格里戈里·切丘基的尊敬和爱戴”。^⑫

1905年9月23日——“‘时代的末日’完结了。现在是早晨，一封农民的知识分子儿子的信里这么说，信里充满了恶毒的责难，它假借赞扬‘伟大的罪人’为口实，说我自己就不想交出我的土地。叫人难受极了。结果倒是有好处。我明白，我忘了我活着不是为了这位记者的善意评价，而是要对上帝负责。想到这里，心情就好受些，甚至好多了。对，永远都别忘记生命的整个严肃性”。^⑬

1905年9月14日，父亲写了一封信给偶尔通通信的尼古拉·米海依洛维奇亲王：

……“在我们的关系中，存在着某种不自然的东西，我们断绝交往，不更好些么？您是一位亲王、财主、皇亲国戚；而我则是一个否定并谴责整个现存制度和当今政权的人，对此我直言不讳。就我来说，在同您的关系中，由于这个矛盾而不自在，这点似乎我们都有意回避。我想赶紧补充一句，您一直对我特别友好，对此我只能感谢您。但是，总感到有点不自在，

而我老了，做个不纯朴的人是心里难过的。那么让我感谢您对我的好意并友好地握别您的手吧！”^⑭

亲王于10月1日从彼得堡函复父亲：

……“我完全服从您的决定，但内心深感隐痛，因为我整个心灵都是热爱您的，我将请求您在我们凄苦的时刻，哪怕间或赐予点精神援助也好。您说的完全正确，我们之间确实存在某种保留成分，但我敢叫您确信，尽管存在着跟他们的血缘关系，我对您比他们可要亲近得多。正是由于我那亲属关系的微妙感情，迫使我就有关‘现存制度和当今政权’保持缄默，这种缄默还使我更加苦恼，因为这制度的弊病，我看得一清二楚，要治好这些弊病，我认为全在于对整个现存制度的根本转折。我高龄的父亲还健在，出于对他个人的尊敬，我理应谨小慎微，不致因为自己的行为 and 见解而使老人伤心。我毫不怀疑您理解儿子对老父的这些感情。那么再见吧！最亲爱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我说的是再见，而不是别了，因为后一种说法对我委实过于痛苦。我依然紧握您的手，并请求不要改变您对我那特别令我珍视的感情。我在想象中最诚挚地拥抱您。愿上帝保佑您！——衷心热爱您的尼古拉·米海依洛维奇”。^⑮

1905年10月23日，整整一个月之后，父亲写

道：

“革命正在蓬勃高涨。双方都在厮杀。以前欧洲革命所未曾见过的、意外的新人士登台了——‘黑帮分子’*，‘爱国主义者’，实质上全是些粗野地、错误地、互相矛盾地代表人民并要求不使用暴力的分子。矛盾一如既往，在于人们想用暴力征服暴力，想用暴力抑制暴力。——一般地说，搞革命这一行当的人，其轻率是惊人的，令人厌恶的：一种毫不天真的幼稚行为”。^{①7}

沙皇于10月17日颁布的上谕，应许给人民以宪法和言论、出版、集会等的自由，起初曾一度在大城市中激发起极为热烈的欢呼游行，但骚动却平息不下来。传说在莫斯科曾演变成警察与革命派之间的全武行，街上都筑起了街垒，相互厮杀。

邮件和报纸都没有送来。铁路在罢工。在科兹洛

* 原注：两年以后，父亲给亲王写信：“1908年2月28日。……如今我一回想起1905年我写的那封信，就感到内疚……此刻，我才不写那样的信了，您不能想象生命在接近暮年，亦即走向死亡时，是在如何变化着……我如今珍视同一切人——不管他们是什么人，是沙皇、还是乞丐，——的一切友好交往……”^{①8}

黑帮分子，一译黑色百人团，特指俄国“黑帮”的参加者。有时亦泛指1905—1917年俄国极右集团的最反动分子。

夫车站，列车阻塞，惊慌失措和饥饿的旅客，在附近的村庄奔波，寻找粮食。

我们靠传闻度日，各种传闻，口口相传，经常过头。在必须与之打交道的工人中，甚至在某些农民中，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尊敬老人的风气几乎消失，出现了一些放肆、自信的腔调。

“革命派定将把我们吊死在第一棵白桦树上”，我想。正在等12月生第三个孩子的哥哥米沙，怎么也不能到达他家所在地的莫斯科。终于，他雇到了马匹。他走到半路上，便打电话问一位朋友，向他探询妻子的健康情况。

“平安无事，连发两响哩！”朋友回答说，“在枪炮的噼啪声中，在革命热火朝天的时刻，生下了一对双胞胎：一男孩和一女孩。”

1906年4月27日，第一届国家杜马*开幕了，谢·安·穆罗姆采夫**被选为议会主席。跟我们接近的

* 杜马：俄语 Дума 的音译，系沙皇俄国的议会。国家杜马，指的是沙皇俄国的国家代议机构，先后共召开四次（1906、1907、1907—1912、1912—1917）。它是沙皇俄国的主要统治机构之一。十月革命前解散。

** 谢·安·穆罗姆采夫（1850—1910），立宪民主党魁之一，莫斯科大学教授。

人中，有苏霍京和斯塔霍维奇两人被选为国家杜马成员。

但是，全俄都感觉到令人焦灼的情绪。来自政府方面的镇压连续不断，人们都在等待杜马的解散（1906年7月9日，它就被解散了）。各个城市都在罢工，农民畅所欲言，议论战时所出现的种种不成体统的事实，痛骂将军们，农民需要的唯一之物——更多的土地；一些人信赖沙皇，另一些人则寄希望于杜马。

父亲寄给契尔特科夫一份小册子《政府、革命派与人民》，供在英国刊登，但是契尔特科夫却将它扣压了，同时要父亲缓和对革命派的激烈抨击。这篇文章稍后略经修改，即在托尔斯泰主义者费利丁的秘密出版社“苏生”内发表。

父亲这时恰好正处于斯拉夫主义者霍米亚科夫小册子的影响下，他曾把这本小册子称为“杰作”。俄国理应走自己的路。西方各国人民的道路对斯拉夫人民来说，便是毁灭。1906年7月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如果俄国人是未开化的野蛮人，那我们就会有前途。西方人呢，是开化的野蛮人，他们没有什么指望了。我们以西方民族为榜样，那就跟一个健康、勤

勉、道德纯正的小伙子羡慕一个安居在自己公馆里的巴黎秃头阔少一样。哎呀！我该是何等寂寞啊！不必羡慕，不必模仿，倒是该怜惜他们。”^⑧

托尔斯泰在其于1906年3月9日的日记中所表达的思想，不仅补充着这一观点，即人类的内在精神不断提高，则所建立的外表自由机构便徒具形式，而且听来简直是预言。

“当革命者开始夺取政权时，在他们身上，一般使政权蜕化的作用表现得非常清楚：自命不凡、骄傲自大、虚荣心重，而主要则是对人的不尊重（着重点是我加的。安、托·）比以往政权还要坏，因为是新手。”^⑨

① 《全集》，第五十五卷，第111页，1904年12月31日日记。

② 同上，第139页，1905年5月19日日记。

③ 同上，第147页，1905年6月18日日记。

④ 马科维茨基，《雅斯纳雅·波良纳笔记》，第二部，第20页。

⑤ 同上，第26页。

⑥ 同上，第20页。

⑦ 《全集》，第五十五卷，第153页，1905年7月31日日记。

⑧ 同上，第317页，1905年9月。

⑨ 同上，第175页，1905年12月23日日记。

⑩ 同上，第153页，1905年7月30日日记。

⑪ 同上，第160页，1905年9月9日日记。

⑫ 同上，第515页。

-
- ⑬ 同上。第 163 页，1905 年 9 月 23 日日记。
- ⑭ 《文学遗产》，第三十七——三十八卷合集，第 321 页。
- ⑮ 同上，第 321 页。
- ⑯ 同上，第 323 页。
- ⑰ 《全集》，第五十五卷，第 167 页，1905 年 10 月 23 日日记。
- ⑱ 同上，第 233 页，1906 年 7 月 3 日日记。
- ⑲ 同上，206 页，1906 年 3 月 9 日日记。

第六十一章

解 脱

有些日子，父亲除了埋头于《阅读园地》的事情以外，无暇顾及别的事。他系统地按宗教与哲学划分为学习日、学习周和学习月，这是一项巨大的劳作。父亲无休止地修改、精选法、德、英、美等国思想家的格言，翻译他们的某些复杂思想，用较为通俗的语言加以阐明。工作是细致的。在列米格顿式打字机房的大桌子上，有时则在大厅里，把所有这些材料一叠一叠地摆着，整天进行分类。玛莎、尤丽和常来雅斯纳雅·波良纳作客长住的托尔斯泰主义者赫里桑弗·阿勃里科索夫都来帮忙。

与此同时，父亲还产生了写一本《儿童阅读园

地》的念头，好使下一代有一定的宗教道德基础。

有一回，玛丽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她有一次问一位牧人的男孩：“上帝在哪儿？”“在天上。”男孩回答说。“不，在我们的心里”施米特老太太纠正他说。“他太需要我们了”，男孩反驳说。^①父亲听了大笑，这一席对话更加使他相信，必须为儿童们编辑一部《阅读园地》。

当塔妮娅同丈夫出国时，苏霍京的女儿即比我大两岁的娜塔莎携带一个九岁的弟弟多里克来雅斯纳雅·波良纳作客，住了很久。父亲每天都给多里克上课。他们一道读福音书，父亲给这个孩子讲解福音书的内容，他们常以宗教和道德为题，进行交谈。稍后，几个雅斯纳雅·波良纳的农家孩子也跟多里克在一起。为儿童们编辑一本逐日分类的神学教材，越来越引起父亲的极大兴趣，他逐渐产生了编写一部新的《儿童阅读园地》的念头。

由于有了一部成年人《阅读园地》，再加上父亲又决定编入一些每周星期日的读物，所以早在1905年和1906年初，父亲就写下了几篇文艺小说：《柯尔涅伊·华西里耶夫》和《阿廖沙·戈尔肖克》，艺术性很强，取自农民生活；《为了什么？》，以波兰起义的史实为题材，以及短篇小说《浆果》。

除了这些短篇小说外，父亲突然全神贯注于费多尔·库兹米奇长老的身世，根据口头传说和某些史学家（其中包括尼古拉·米海洛维奇亲王）的见解，这位老人就是当年逊位的皇帝亚历山大一世。

“费多尔·库兹米奇越来越使人心神向往，”^②父亲在1905年10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遗憾的是，父亲没有写完这个短篇小说。1907年秋，他给亲王的信中说：

“让历史去证明亚历山大同库兹米奇不可能是一个人吧，可是，这个传说却依然显得非常美和真实。我本来要动手写这个题材的，但恐怕难以完工，而且也没有闲暇。要转手做这件工作，必须事先安排一下，可又没有时间。我十分遗憾。真是个迷人的形象。”^③

抄写父亲的手稿，是我所喜爱的事，特别是当他写文艺作品的时候。一旦他有急急忙忙赶写的劲头时，我便会坐上几个通宵。假如父亲要我去睡，我便和衣躺在床上，待他进来检查时，我就假装睡觉，一当他走向自己的书房，我就又坐到我的列米顿打字机后面，彻夜不停地打字。有谁想来替换我，我就嫉妒谁。我嫉妒阿勃里科索夫、柯利亚·奥波连斯基和尤丽，嫉妒帮助父亲的一切人，只有玛莎一个人例

外。我学会了辨认他的笔迹，有时我能念出他自己也分辨不清的字体来，我（象伊凡诺夫中尉一样）非常自信地认为，谁也不能比我更好地满足父亲的意愿。一大早，当我把誊写清楚，里面满是双行和留有很宽的天头地脚的（便于他能再次修改自己的作品）的清本送给父亲时，父亲总是亲切地微笑着，向我道谢，这时我常常会按捺不住满心的喜悦。我特别嫉妒尤丽。她比我年长得多，她跟我说话的口气，总带有自然而然的庇护和嘲弄的意味。这时，不光是她那轻言细语，就连她那剪得短短的、梳得光光的头发，她那平庸的笑话以及她同柯利亚·奥波连斯基关于政治的高谈阔论（尤丽经常伸直身子，躺在大厅的躺椅上跟他谈个没完没了），全都使我很恼火。我甚至嫉妒起父亲那条乖巧的白毛狗别尔卡，因为尤丽将它训练得只跟着她转，而不再陪伴父亲散步了……

但是，尤丽却是我们家的一个讨人喜欢又挺有用的人，哪里需要，她便前去哪里帮忙。尤丽有一个习惯——爱给每个词头安上一个前缀音“嘞”，如狗——嘞狗、猫——嘞猫，等等。因此，我们称她为尤丽—穆丽。有时尤丽—穆丽克服了自己的惰性，我记得她是个女画家，画了几张很不错的父亲骑马速写。

在父亲那小小的笔记本里，写有对其亲属挚友

的评述，顺便也对尤丽—穆丽作了鉴定。

“每人都有对他本人来说最高的人生观，他为此而活着。他记得的，只是与这人生观相吻合，并为这人生观所需要的事物，其余一切则一闪而过，不会遗下痕迹。例如，索妮娅的人生观，是过有恋爱纠纷的上流社会生活。谢辽沙的人生观是过欧化的生活。安德留沙想做个大老爷。列夫想成为天才的著作家。此外，还有混合型的。

库兹明斯基想当上流社会中的国家要人。

达维陀夫想做官，同时想寻快活。

塔妮娅想做个基督徒和典雅的伊壁鸠鲁派。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想做个正直的贵族和机智的聪明汉。

尤丽亚·伊凡诺夫娜想当伊壁鸠鲁派，既正直，又诚实。

伊里亚想当个胆大妄为的伊壁鸠鲁派。”^①

两个姐姐塔妮娅和玛莎都很喜欢并器重尤丽。

1905年秋，塔妮娅曾住在我们这儿。经过几次流产之后，塔妮娅便在一位瑞士教授处接受治疗，那位教授正如我们开玩笑说的那样，给她规定了“通心粉”饮食疗法，只用面食和乳制品两种。其婴儿最易于夭折的决定性的第七个月，她已经度过了，终于足

月分娩。我们全家都激动地等待着这件大事。11月22日，塔妮娅却轻松而快速地生下了一个女婴，真是出乎意料之外。“一件大事，”父亲在日记中写道，“塔妮娅生产了”。

可这是怎样的一个婴儿啊！小不点儿，满脸皱纹，红得发青……外祖父要给婴儿取名塔季娅娜，不知怎的，她就被自然而然地按母亲名字叫塔季娅娜·塔季娅诺夫娜，而不是照她父亲名字叫米海依洛夫娜了。

冬天，塔妮娅带着婴儿留在雅斯纳雅·波良纳，而由于心脏有病熬不过俄国严寒的苏霍京和奥波连斯基，便决定到国外去。在家庭会议上作出决定：为了扩大我的眼界，加强教育，我应当跟他们一道去。

但是，国外并没有给我以原先所期望的东西。虽然，我曾极为认真地跟美国和英国旅游者一道，手里捧着旅行指南，跑遍了巴黎和意大利的所有博物馆，参观了所有名胜古迹，但我却仍然茕茕孑立。玛莎自我感觉不好，柯利亚懒得同我走，而苏霍京前后参观过十次之多，他对“扩大我的视野”不感兴趣。

回到父亲身边，回到自己的工作和犬马的身边，我高兴极了。

1906年夏，一位著名的日本作家德富芦花*从日本来访问父亲，他是《独立》杂志的编辑，一位醉心于父亲各种观点的自由主义者。他偕同自己那忘我的、聪慧而忠实的妻子定居在东京近郊，在那儿他亲自耕种菜园。**

我曾亲眼看到，德富芦花并不同于那些手不会握大叉、对黑麦和小麦分辨不清的托尔斯泰主义者。他会干活。

有一次，正当一场网球赛热火朝天地进行的时候，父亲走到我跟前，对我说，我家厨子的妻子玛莎怀孕即将分娩，可是她还在一个人干活，正收拾喂母牛的草料哩！

我毫不犹豫，一如既往，乐于执行父亲的嘱咐，随即扔下网球拍子，奔了过去。其余的人都跟着我，其中还包括那位日本人。德富芦花戴一顶宽边白草帽，穿一身白色和服，非常好看。他动手就干，我们

* 德富芦花（1868—1927）日本明治时代的小说家，曾经当过记者。原名健次郎，笔名德富芦花。他信奉基督教，受托尔斯泰的影响很深。他于1906年赴俄国访问托尔斯泰，回国后隐居乡间。其代表作有《不如归》和《黑潮》等长篇小说。

** 原注：1930年，当我旅美之前侨居日本时认识了德富芦花君的孀妻，访问过她的农舍。她住在丈夫的坟旁，过着极为简朴的生活。

勉勉强强才赶得上他，他的动作又迅速，又灵活，又熟练。不一会儿，草料就收拾好了。

除了塔季娅娜·塔季娅诺夫娜出生这件事以外，近来还发生了许多家庭大事。谢尔盖的第一个妻子玛妮娅离开了他，几年后死于肺结核。他们婚后的惟一儿子谢辽沙是在外祖父拉钦斯基处受的教育。我们大家全都出乎意外的是，谢辽沙第二次竟娶了奥尔苏菲耶夫伯爵的外甥女，一个不漂亮，但却讨人喜欢的玛丽娅·祖波娃伯爵小姐为妻。她比塔妮娅小得多，我们早就认识她了。谢辽沙和玛莎年龄、兴趣都很接近，我们都希望这一次他将得到幸福，后来果然如此。

这年夏天，政府批准契尔特科夫短期回俄国探望老母。

父亲在1906年7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契尔特科夫来了，我很高兴。决定把经过修改的《政府、革命者和人民》交给他。”^⑤我似乎从来也不曾见过有谁象契尔特科夫那样面目能迅速变化的人。有时，他俨然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上流社会人士，笑容可掬，极富魅力，兴致勃勃而又和蔼可亲。这时，就连我那很少发笑的母亲，也会因听了他的笑话和戏谑而笑得不出声地浑身打颤。但要是有人同他争辩，不同意他

的观点，那么，深深的皱纹便会布满他的额头，端庄的鹰钩鼻会不愉快地呈现皱蹙，愤怒使得他那双灰色大眼冒火，整个脸庞露出凶神恶煞的表情。他容不得反对意见。上流社会的风度和幽默，固执和专横，观点大胆和胸襟狭窄，以及宗派主义者的偏执狂，——这一切，在此人身上兼而有之。

契尔特科夫这次来，显得异乎寻常的快活，与人友善，父亲对他的居留也表示极大的高兴。

“契尔特科夫来此期间，”父亲在1906年8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我陪他去看玛莎。契尔特科夫很高兴，但我恐怕他由于对我评价过高而乐得过分……我想写我是喜欢玛莎的，可大家都读我的日记……”^⑥

这年夏天，父母的关系由于下述原因而重新尖锐化起来：几个农民由于私砍树木，被我母亲告发，行将坐牢。我们大家都央求母亲宽恕他们。父亲为此事而心力交瘁，他深感痛苦，不断呻吟。离家出走的问题在这一紧要关头又提到了他的面前。他觉得自己没有在雅斯纳雅·波良纳住下去的道义上的权利，因为母亲的这类行径，正是以他的名义做出来的。

“因为自己的生活可耻而深深内疚。怎么办？不

知道。”1906年5月29日他写道。

……“有一天早饭后，我和施米特在两排浓密的百年老椴树的小道上散步。旁边有一大群人在打网球。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突然从灌木丛走到我们身边。他脸上的表情非常痛苦，好象患了重病，我大吃一惊。‘可怕，真受不了！’他凑到我们跟前，轻声说道。‘以前，当老百姓还没有察觉到的时候，还可以忍耐。可现在，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了，这种生活就令人难以忍受了！应当离开；我没有别的办法……’他的声音打颤，迅即转过脸去，继续一个人散步去了。

“当天晚间，当我走进书房时，看到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一个人在昏暗中坐在远离桌子的墙边，神不守舍。我本想从一旁绕过去，把最近的信件拿过来进行登记，但是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却猛然间一挥手，似乎要赶走那挥之不去的念头，忿忿然说：‘我看得一清二楚：不管我去了哪里，只要过上两天，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准会带上仆人和医生，又会出现我的身边，一切全都照旧！’^⑦

父亲当时很可能离家出走，但是到了夏末，母亲害了一场大病。她诉说下腹疼痛。妇科医生斯涅基列夫教授诊断为子宫纤维瘤，建议母亲立即动手术。但

我母亲害怕，一拖再拖，直拖到腹部发生剧烈的疼痛。不能想象还能将她送进医院。决定就在雅斯纳雅·波良纳动手术。但是，当斯涅基列夫带上助手们和手术台、外科医疗器械等赶到时，母亲却又好些了。手术推迟。但后来腹疼又复发，来势凶猛，体温高达四十度，还有局部腹膜炎并发症，必须毫不迟延地立即动手术。

在死神面前，有时一个人身上能发生多么神奇的变化啊！母亲的痛苦愈甚，她离死神愈近，她那精神境界便愈高。父亲走进房间，她努力抑制呻吟，拉住他的手，边吻边说：“略沃奇卡，请原谅，”她又重说一遍。“请原谅我吧！”

我没有料到我竟然这么爱她。“萨申卡，亲爱的，谢谢！”你只要帮她做了点事，她准会这样说。为了帮助她和拯救她，我准备什么事都干。我望着她那双大而无神的痛苦的眼睛，我心头往日的厌恶之情（有时甚至是憎恨），似乎都成为遥远的恶梦了……过去我怎么能那样对待她呢？……

我母亲要求请神父，父亲对此表示宽慰。“索尼娅要请牧师，”他在1906年9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不仅表示赞同，而且高兴这么做。有一些人，对人生的根本意义达不到抽象的、纯精神的理解。他们

只需要粗笨的形式。但这种形式后面也具有同样的精神内容。有了这精神，即使形式粗笨，也是好的。”^⑧

信仰方面，父亲变得越来越宽容了，他要祈祷，尽管与母亲的祈祷形式不一样。“我有时祈祷……”他在1906年8月24日写道，“没有定时，方式也最简单，我说：上帝，饶恕我吧！我用手划着十字，不是用思想、而是以一种从属于上帝的意识去祷告。我不会给任何人建议这样做，但这对我却是好的。眼下我通过祈祷，感到轻松些了。”^⑨

做手术时，父亲到恰佩日去了。当我和伊里亚找到他并告知他手术结果顺利时，他没有喜形于色，相反地，他脸上现出深深痛苦的表情。他没有跟我们一道走——他要一个人留下来。

他有什么感受？在日记中他简要地写了：

“今天给索妮娅动了手术。据说很成功。但我心情沉重。早晨她灵魂方面很好。死神是多么会安抚人啊！”“索妮娅以为会死，向我们袒露了心迹。”他写道。^⑩

对他说来，正是这种“袒露心迹”，比她的肉体生命更为珍贵。让医生动手术，干扰疾病的正常进程，违背上帝的意愿，这样做好吗？……

母亲的康复得很快。她的体力慢慢儿复原了，曾经如此灿烂地照耀着我们生活的那一线光明，又渐渐被日常生活所遮掩。

一切又恢复常态。大家都为《阅读园地》而操劳，人来客往，书信从世界各地寄来。有的信很有趣，思想深刻。有的信，父亲把它们叫做愚蠢的，或者乞求什么，或者带有革命派维里康诺夫的口气（此人脑瓜上没有一根头发，甚至连眉毛和睫毛也没有，因此叫做秃头维里康诺夫）。这些信件使父亲极不痛快。维里康诺夫在信中写道：“您蛰伏在您那蜗庐里，是很难受得住黑帮的烟尘熏染的，您女儿亚历山德拉·里沃夫娜和您女婿对斯皮里多诺娃*的嘲弄是何等卑鄙、何等无耻啊！……不过，您的理想是契诃夫笔下的‘宝贝儿’。而这些‘宝贝儿’却充当鹰犬式强盗们的妻室……可您还想让孩子们通过这些‘宝贝儿’以身作则的教育来接受您的宗教哩！结果是您对自己儿女的卑鄙言行负有罪责，尽管他们受过高等教育，但没有变成‘傻瓜’，他们在您身边二十五年，通过深入研究乞丐的福音书，掌握了‘当代的高级世

* 原注：玛丽娅·斯皮里多诺娃是一位社会革命党人，由于刺杀疯狂镇压 1906 年农民土地骚乱的暗探卢任斯基，而被判处死刑。

界观’……”^⑪

有个庸俗的大学生下乡，住在茅屋里，此人是个酒鬼，是那种专爱收集各种卑劣谣言的小人中间一个。他一走，哈尔科夫的报纸上就刊出了对托尔斯泰全家人极其恶劣的毁谤文章。那文章的作者把雅斯纳雅·波良纳的主人描写成典型的农奴主；“只有老头子用某种关于摒弃物质享受和拯救灵魂的蒙昧的哲学伪装起来。”“照农民的话说，伯爵是只‘披着羊皮的狼’。附近农民偷砍了他的树，伯爵就请来哥萨克进驻自己的庄园。”^⑫

有个瞎子农民，是个顽固守旧的人，外号叫“烟草大王”，他认为政府征收烟草税所以才叫做政府。此人时常辱骂我父亲。他凑近我父亲面前，山羊胡子抖动着，口水四溅，骂父亲撒谎，是伪君子和吸血鬼。这一切，父亲都忍了，认为是对自己的一场考验，是对自己罪孽的惩罚。

“最近一次我记录如下的思想：我继续为意识到活着而高兴，但眼下恰好相反，应该写下：精神力量衰弱了，主要的一点，是我在寻求别人（无分亲疏）对我的爱，想的就是这个。今日我去了雅辛基，带回来一批信件，这些信件全都令我不快。为什么这些信件使我这样讨厌呢？这就说明我自己堕落了……夏

天在这儿住过的那个年轻的大学生在哈尔可夫报纸上发表了讽刺文章……我读着他写的愚蠢而恶毒的谎言心里深感痛苦，这‘深感痛苦’便是我堕落的无疑的标志，是我跟‘永恒’丧失联系的无疑的标志……此外，肉体上我也处于糟糕的状态，情绪阴沉，迟迟不能恢复跟上帝的联系……这一切，全都是由于我只乐意别人（外人、亲人和契尔特科夫）爱我之故。收到契尔特科夫一封谈论生命和上帝的出色的信。”^⑬

11月是最恼人的月份，特别是在农村，这时道路难行，泥泞、潮湿、朔风、流行病，人们通常都以急不可耐的心情盼望下雪，期待着封冻的能驶雪撬的路面。

这年秋天，奥波连斯基夫妇跟我们住在一起。气候很坏。玛莎或许患了感冒，或许正如农民所说的：“她大限已到”。11月底，她病倒了，医生诊断为肺炎。打从第二天起，大家都看到了她病得不轻。不退烧，她一个劲儿地猛咳，诉说腰痛。她卧病在“圆拱形屋顶”的房子里。柯利亚、尤丽和我服侍她。“玛莎使我很不安，”父亲在给契尔特科夫的信中写道。“我很喜欢她。”几天工夫，玛莎就变得认不出来了。她那瘦削的脸瘦得更加利害，由于发高烧，面颊通红，眼

睛里流露出专注的神色，那是跟亲人和生命已经失去联系的表情。

父亲写道：“虽然她是我的亲人中我最亲近的朋友，但是，从我一己的观点看来，她的死并不可怕，也不可惜，因为在她死之后我也不会活多久了，我只是单纯地，不加思索地可怜她，为她感到痛苦。很可能，由于她年轻，她还想活下去，我可怜她和亲人们所受的痛苦。用医疗的办法企图延长她的生命的这一切枉费心机的努力，我觉得实在是可怜的，令人不愉快的。近来，对我来说，死亡变得越来越亲近了，不可怕了，自然而然的了。死亡是必需的，跟生命并不敌对，而是跟生命紧密相联，是生命的继续，因此，跟死亡作斗争只是动物的本能，而决不是理智的行动。由此观之，任何向死亡所作的斗争（如医学），看起来是理智的，其实是不理智的，只能说是聪明的，医学是令人不愉快的，不好的。”^①

玛莎死得安详，神志完全清醒。父亲和柯利亚坐在她的病床边。玛莎呼吸困难，便用枕头给她垫高了些。临死前一个小时，她睁大眼睛，看到父亲，便抓住他的一只手按到自己的胸前。父亲弯下身去，抓过她的瘦弱的、毫无血色的手凑近自己的嘴唇。“我要死了。”她轻轻地说，别人几乎听不见。

父亲走回到自己的房间。“现在是午夜一时，”他在日记中写道，“玛莎去世了。真奇怪，我没有体验到恐惧和惶惑，也不觉得发生了某种特殊的事情，甚至也不怜悯和悲恸。我似乎觉得，必须在自己心里激起悲恸的感情并且招呼着它，但是，内心深处我却感到比较平静，较之看到陌生人（且不说自己人）的不好、不应有的行为时更为心平气和。不错，这是肉体方面发生的一个事件，因而可以淡然处之。我一直注视着她，看着她怎样死去：死得非常安详。对我来说，她是在我的解脱之前的一个正在解脱的实体。我跟踪观察她的解脱过程，这过程我觉得是快乐的。不过，这只是我所能观察到的范围内（生命的范围内）的解脱，它在此终止了，即是说，往后的解脱过程我就看不见了。但是，那个已经解脱了的东西‘在哪里？什么时候？’——这类问题只跟尘世的解脱过程有关，而与那超越时间空间的真实生命无关。”^⑮

葬礼后，父亲写道：“刚才把她抬出去埋了。感谢上帝，我依旧心境平和。”^⑯

“不错，生命就是生长，或者叫做精神实体的解脱。这个解脱过程直到死亡。在死亡中，这一解脱过程对于如我此刻所自我感知的个体来说，是彻底完成了。”^⑰父亲于1906年1月4日在日记中作了上述

记载。

玛莎被运往村里的教堂公墓，那儿安葬了托尔斯泰家的祖父母，还有我家的小弟弟尼古连卡、佩佳和妹妹瓦里亚。送葬的人在村里走了很久。男男女女都从家里跑了出来，大家都想到教堂去为她作安魂祈祷。全村人都认识玛莎，都爱她。为了治疗患了猩红热的病孩，为了护理产妇，她曾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啊！为了帮助穷人、鳏夫和寡妇，她同农民一道干活，倾注了多少精力啊！她的善良的感人肺腑的言语拭去了别人多少眼泪啊！很多人都为她哭泣。

我跟父亲没有谈起过玛莎，也不能谈，但我们始终想念她。

“抑制不住，又想念玛莎，流下了美好而深情的泪水。并非为自己失去她而悲痛，而只是想起了爱她跟她在一起的那庄严的时刻。”^⑧父亲写道。

“我活着，”在她逝世一个月以后，他写道，“就会时常想起玛莎弥留之际（我不想称她为玛莎，因为那个离开了我们的实体跟这个平凡名字是不相称的）。她坐着，背后垫了枕头，我拉住她可爱的瘦弱的手，感到她的生命慢慢死去，她在渐渐离开我们。这一秒钟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最意味深长的时刻之一。”^⑨

当时我不理解，为什么死去的都是好人：万尼奇卡、玛莎。他们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为的是给人们带来光明、爱情和欢乐。两人对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敞开胸怀，对所有求助的人都说话温柔体贴。他们很象父亲，也彼此相似。

在“解脱”之前，他们迹近无形体的虚弱躯体就已经衰微了，而父亲用平凡的、尘世的“玛莎”的称谓难以表述的那个精神实体也随之远逝。这一点，我当时是不大明白的。当时我也没有意识到，这个损失是不可弥补的，没有料到父亲在四年之后所发生的悲剧中极需玛莎，而我却不得不把力不胜任的重担挑在自己幼弱的肩上。

- ① 马科维茨基：《雅斯纳雅·波良纳笔记》，1904年10月31日，第一部，第35页。
- ② 《全集》，第五十五卷，第165页，1905年10月12日日记。
- ③ 《文学遗产》，第三十七、三十八卷合集，第323页。
- ④ 《全集》，第五十六卷，第239页。
- ⑤ 同上，第五十五卷，第235页，1906年7月20日日记。
- ⑥ 同上，第236页，1906年3月24日日记。
- ⑦ 同上，第550页，1906年5月29日日记。
- ⑧ 同上，第243页，1906年9月2日日记。
- ⑨ 同上，第238页，1906年8月24日日记。
- ⑩ 同上，第241、243页，1906年9月2日日记。
- ⑪ 同上，第569页，第616条注。

-
- ⑫ 同上，第 567 页，第 613 条注。
 - ⑬ 同上，第 264 页，1906 年 10 月 23 日日记。
 - ⑭ 同上，第 577 页，第 644 条注。
 - ⑮ 同上，第 277 页，1906 年 11 月 27 日日记。
 - ⑯ 同上，第 279 页，1906 年 11 月 29 日日记。
 - ⑰ 同上，第 279 页，1906 年 1 月 4 日日记。
 - ⑱ 同上，第 282 页，1906 年 12 月 1 日日记
 - ⑲ 同上，第 284 页，1906 年 10 月 28 日日记。

第六十二章

托尔斯泰主义和……村警

1907年4月，父亲给修道院中的姑妈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玛申卡！我时常怀着深情想念你，近几天来，仿佛有一个声音在我耳边谈论你，很想跟你见一面，见到你，深知你，跟你交往，该是多么好啊！你身体好吗？你的精神状态，我是无须问的。你在生之日，精神状态必然是好的。愿上帝帮助你，亲近他。

“……塔妮娅带了她的可爱的小女儿住在我们这儿，我们很高兴。她丈夫暂时出国探望生病的儿子去了。玛莎去世，我深感悲痛。不过，正如大家所说的，这是上帝的意志，我也真心诚意这么说。至于我

自己，除开我不应得的好处以外，别的无话可谈。我老了，越老心境越安详和快乐。死亡几乎经常变成向往的事了。心境很好，深信生死均在其怀中的上帝日益临近。

“……请代我向你的修女们致意。愿上帝拯救她们。现今尘世的生活是如此可怕，如此恶劣，她们倒是选择了一条很好的路，好在你也跟她们在一起。我非常爱你。请给我写信，多谈谈你自己。吻你。

“别拒绝我。你的精神和血统两方面的同胞兄弟
列夫·托尔斯泰”^①

姑姑这时成了父亲能与之倾诉（虽然一如既往相当克制地）纯朴的人与人之间的爱的唯一的人了。

在农家小孩身上，父亲也找到了巨大的安慰和欢乐。有几个男孩每天晚上都来找他。他就跟他们在楼下原先是他书房的图书室里学习。选拔出一批对宗教和道德问题感兴趣的优秀的孩子，而轻浮的、比较差的孩子则很快落伍了。父亲特别喜欢一个聪明善良的孩子，他叫尼柯尔卡。这个心地坦然、脸上有一对酒涡的可爱的孩子，朗读的时候，一本正经，蓝色的眼睛全神贯注地瞪着老师，他能很快理解我父亲的话，并且提出相反的看法跟我父亲讨论，俨然象个成年人。后来同学们就给他取了个外号：“托尔斯

泰主义者。”

这年夏天，契尔特科夫带着一家人从英国回来。他的流放期已经结束。他在雅斯纳雅·波良纳停留几天，便携带一家老小定居在离我们五俄里的一座古老的、荒芜的雅辛卡庄园里。

契尔特科夫身边有一堆人：几个抄写员、几个秘书、一个从英国带来准备给父亲拍摄各种照片的摄影师、还有几个职责不明被称为助理的人。除开契尔特科夫的妻子加丽娅之外，全体人员都围坐一桌吃素食。

加丽娅·契尔特科娃使我感到惊讶。她具有独特的病态美。她有一双乌黑的大眼睛、一头漆黑美丽的卷发、纤细而端正的鼻子、上翘的小嘴唇，脸蛋和手臂的皮肤白得异样，一件灰色轻盈的衣裳（搞不清是连裙衫还是长袍）里包裹着一个弱不禁风的躯体。她随身总带个女医士。

加丽娅·契尔特科娃完全赞同我父亲的和她丈夫的观点，只要自己的健康情况允许，她便帮助契尔特科夫在国外出版父亲的著作。当我跟加丽娅在一起时，我总为自己的精力和健康而不好意思。每当加丽娅苍白的脸蛋突然发青，变得毫无血色的时候，眼泪即夺眶而出，她便喃喃地说：“我头晕，我饿了。”

这种时候，我特别难受。女助手立即奔向厨房，从厨房里立即走出来一位文静的、身材魁梧的女厨师安努什卡，手里端着托盘，上面摆了几个只象玩具的小碗盅，里头盛着拌好了的流质食物。当她用低沉的胸音哼着弃绝仪式教派的圣歌并选择凄楚动人的女低音曲子的时候，听的人真会起鸡皮疙瘩，浑身不自在。

这年夏天，附近住了很多想跟我父亲接近的人。在奥夫西尼可沃，除开施米特老太太之外，还住着戈尔布诺夫一家。我住的杰里亚坚基村里，住着钢琴家戈里顿维伊则尔及其妻子。戈里顿维伊则尔给我上音乐课，作为对其所使用的小房和马匹的报酬。父亲坚决主张这样。村里还住着画家奥尔洛夫，他作了很多表现农民生活的画，描绘他们的贫困生活和所受的压迫，如《烟酒专卖权的发现》、《鞭笞农民》等。奥尔洛夫是个小个子，心地善良，他的妻子和母亲的身材也都矮小，还有一群身材矮小、笑嘻嘻的孩子们——一窝矮子种。他们全都挤在一间农村小木房里和一间干草棚里，并且宣称十分舒适，还打算接待客人。同时村里还住着尼古拉耶夫一家，他是亨利·乔治坚定的信徒和其著作的翻译者，是一位和蔼可亲的人，父亲一如既往，对亨利·乔治的土地统一税的

理论仍然很感兴趣，甚至曾经为此给内务部长斯托雷平写过一封信，请他研究乔治的理论，以便将这种土地改革应用于俄国。斯托雷平和我父亲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正好相反。父亲重视村社占有土地原则，不让土地私有权固定下来，而斯托雷平却于这时在俄国实施了农庄个体经济，认为村社占有制、耕地交错现象、暂时使用的小块土地的经常重新分配和土地分散的情况，都会从经济上削弱农民。他认为，农民的土地应当以农庄的小块土地的形式长期占有，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农民才会关心提高生产水平。斯托雷平认为亨利·乔治的理论在俄国是行不通的，他在给父亲的信中谈到了这一点。

1907年7月26日，父亲第一次给斯托雷平写了一封信：

“……彼得·阿尔卡季耶维奇！我给您的这封信，是在最善意和友好的感情影响之下写的，您是我朋友的儿子，现在走上了错误的道路。您面前有两条路可供选择：或者，把您已经开始干了的事情继续干下去，即不但参与而且领导流放、苦役和屠杀的事业，您达不到目的，反而给人留下关于您的恶劣的记忆，更重要的是，您毒害了自己的灵魂；或者，率先站在欧州各民族的前列，促进人们消灭由来已久的、

各民族共同的土地私有制的不公平现象，那您就真的做了一件好事，用最现实的手段满足人民合理的愿望，安抚人民，用此办法中止那些从革命派和政府两个方面都正在进行的可怕的暴行。

列夫·托尔斯泰”

1907年10月20日至23日，斯托雷平给我父亲回了一封信：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请您别以为我对您的来信不重视。我不能及时复信，因为您的信伤透了我的心。您认为是罪恶的东西，而我却认为是俄国幸福之所系。我觉得，农民的土地私有权的缺乏，是造成我国秩序混乱的根源。造化赋予人以某些天生的本能……这个秩序中最强大的感情之一便是私有财产的感情。不可能象爱自己的东西那样去爱别人的东西，不可能象对待自己的土地那样去经营和改善仅具暂时使用权的土地。这方面，勉强阉割我国农民，即消灭他们天生的私有财产的感情，其结果必然导致诸多弊端，主要的是导致贫困，而贫困，我以为是奴隶状态中最糟糕的事。现在，农奴制依然如故——可以用金钱来压迫人，跟农奴解放前一模一样。跟这些人谈论自由或各种自由权是很可笑的。首先请把他们的福利提高到最低限度的水平，以便最小

限度的满足能使他们变成自由人。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在土地耕耘的自由状态下才有可能，即具有土地私有权。我并不反对乔治的理论，但我以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统一土地税将促进跟大土地所有制的斗争，但目前我看不出在俄国有去除土地占有者的较为发展的成分的目的，恰恰相反，我以为，必须毫不犹豫地为农民获得小块土地的完全所有权而使之多少满足这一合理的要求……此外，无须要我来说服您，可是，现在由于偶然的机，我不妨试着向您解释一下：为什么您想说服我的那个道理我以为是行不通的。在我看来，您永远是个伟大的人，至于我自己，是不足道的。时势的浪潮把我推举上来——大概只有一瞬！可我还是要利用这一瞬间，竭尽自己的能力、知识和感情为人们和祖国服务。我爱祖国，象古人那样爱她。我怎么会不做那种我认为是善的事情呢？您信中说，我走上了暴行、虚荣和犯罪的道路。请您相信，我常常感到大去之期不远，不能不考虑这些问题了，我以为我走的路是一条直道。我知道，向您说的这些话是枉费心机的——这也是我没有及时给您回信的原因。请您原谅。

您的斯托雷平”

1908年1月28日，父亲给斯托雷平回了一封

信：

“彼得·阿尔卡季耶维奇……您为什么要继续您所倡导的、除了恶化社会以及您本人处境外不会有任何其他结果的错误活动，从而毁灭自己呢？不坚持所犯错误，而是在认识到以后，就全力以赴消除其后果，这才是我想象中的您这个勇敢、正直、高尚的人所应有的特色。您犯了两大错误：一是开始以暴力对付暴力，并继续蛮干下去，弄得局势愈来愈糟；二是您想在俄国平息骚动的居民，他们期待和希望的只有一点：消灭土地私有制（这在当代就跟半个世纪前的农奴制一样使人愤慨），而您却想以消灭村社、形成少量土地私有制的办法来安抚居民。这个错误是很大的。您不去利用还流行于人民中的认为土地私有制是不合法的这种看法，不去利用跟全世界最先进的人士关于人与土地的依赖关系的学说相一致的观点，您没有将这一原则提到人民面前，而是想使人民相信现在流行于欧洲的、并且不幸还是欧洲全体思想家的最低级、最陈旧过时的关于人与土地依赖关系的观点，以此来安抚人民。亲爱的彼得·阿尔卡季耶维奇……生活可不是一场儿戏。我们活在世上只有一次。不能因偏见而愚蠢地毁掉自己的一生……您的两大错误，一是使用暴力对付暴力，二是不

去阻止以暴力占有土地，反而加以肯定。这两个错误只有一个办法可以纠正，那办法是最简单明了、最便于实施的（您可能觉得很奇怪），那就是承认全体人民都具有平等的土地所有权并且确立与土地收益相适应的土地税，以代替贡赋和一部分贡赋。只有这个办法，才能安抚人民，才能使当前依靠人民的革命派的一切努力变得无能为力，并且使现在以暴力抵抗暴力的骇人听闻的镇压措施变得毫无必要……我再重复一遍我在这封信开头所说过的话：我是怀着善意和热爱您的赤忱给您写这封信的……热爱您的列夫·托尔斯泰。”^②

客人们和来访者没有忘却我们。这年夏天，画家涅斯杰罗夫前来作客，给父亲画了好几张素描和一大幅出色的肖像画。

有一天，八百五十名学生从图拉来到雅斯纳雅·波良纳。他们在我家度过了一整天，游泳，散步，玩了我们为他们在恰佩日组织的各种游戏。

邻居中一批“阴沉的人”每晚都来找父亲。他们围着他成半圆形坐下，等着他给大伙儿讲话。杜尚作了记录，放进口袋，当父亲朗读时，杜尚大致准确地计算出要读多久，便跑回自己的房间，上好闹钟，躺下便睡着了。出诊、门诊弄得他疲惫不堪。过了几分

钟，闹钟一响，杜尚一跃而起，正好准时赶上就读过的文章所进行的讨论会。有时，契尔特科夫在自己的村子里举办青年农民“座谈会”，还经常设法拉父亲去参加。但他并没有如愿以偿，可能因为父亲觉得参加这种座谈会有些不自在，就不再去了。

我得坦白承认，我觉得这一切非常无聊，他们一个个身穿农民短衫、长统靴子，蓄着长胡子，头发不梳，一张张老脸一本正经，好象人人都发誓决不再闹着玩儿、不再发笑、不再寻开心似的。只有父亲，偶尔还有契尔特科夫才使这伙人活跃一下，跟他们开开玩笑，说说话带双关的俏皮话。我明白所有这些托尔斯泰主义者都是出色的人物，知道父亲器重他们，但我还是抑制不了压在心头的烦闷。我常跟比我仅小四岁的外甥女安诺奇卡钻进我那拐角上的房间，在吉他或钢琴的伴奏下，唱起茨冈人的抒情歌曲。有时门被悄然推开，父亲踱了进来。我们感到不好意思，便停下不唱。“继续唱下去，唱下去吧！”他笑着说，“你们唱得不错。”他于是站在门边，两手插进腰带，听我们唱……

但是，并非所有的托尔斯泰主义者都使我产生这种厌烦感。可能，象青年时代常有的那样，我本能地感觉到他们中间某些人的做作的冲动，那是很可

怕的。确实，很多人熬不了他们自己选定的禁欲生活。父亲预先即告诫过他们：没有作好充分准备，就别妄想舍己忘身。

布兰日挺不住了，他赌博输了公款，心慌意乱，留下个纸条，宣布他要以自杀了此残生，接着杳无音信。一些托尔斯泰主义者成了革命者，另一些人进了修道院，还有一些人变成顽固的保皇党，剩下的寥寥无几了。一些人变为宗教狂，而追随父亲学说的多数人则在革命期间牺牲在流放地和监狱里。

布雷金两兄弟谢略沙和万尼亚是两位地道诚实的人，是青年人的两种不同的类型。谢略沙是美男子，有一双又大又黑的眼睛和鬃发，身强力壮，双颊泛出少女的红晕；他弟弟不如乃兄漂亮，有一双蓝色的眼睛。两兄弟一贯待人宽厚，性情愉快，乐于助人，以耕种土地为生，坚持素食。

谢略沙·布雷金有一位朋友叫谢略沙·波波夫，在信念方面更走极端。波波夫绝对不承认任何私有财产。如果有人向他索取他仅有的一件衬衣，他也会拿出来。他没有身份证，却走村串乡，无偿地帮助需要他干活的人。他经常被当作无业游民被捕。审讯时问他是什么人，他愉快地笑着回答：“我是上帝的儿子。”他把狱吏和警察叫做兄弟。官府拿了他没办

法，最后只得听其流浪四方。有时他来找父亲，满身尘土、拖双破鞋、胡子拉碴，但你不会觉察这些小节，因为这位青年身上有的是光和热，你看到的，只有他那双流露出善良、友爱和愉快的蓝色眼睛。

父亲在写完《不要杀人》这篇文章以后，便向集合在他周围的志同道合者朗读。他写过关于爱的号召书……而周围的邪恶、仇恨、斗争的气氛却更浓了……我母亲精神又不正常了。她兄弟、维亚契斯拉夫舅舅是彼得堡近郊加万的土方工程组织委员会总工程师，竟惨遭杀害，估计可能是因为没有得到工作而怨恨上司的失业者干的。而维亚契斯拉夫舅舅正好在前一天曾在市杜马捍卫过工人们的利益，并且为了使他们能找到工作而四出奔走。^③

在雅斯纳雅·波良纳，农民砍倒并运走了一百二十九株橡树；米沙的庄园里的庄稼汉烧光了里面放有各种贵重农具的工具棚；苏霍京的庄园的家用建筑被烧毁，令人怀疑有人纵火。我们的一位女邻居兹维金采娃也遭到不幸。娘儿们跑来说，林子里发现两个形迹可疑的人。兹维金采娃当即派车夫和猎人去追赶。他们在公路上碰到了那两人，要求出示身份证。那两人二话没说，拔出手枪，当场将兹维金采娃的那两名家丁击毙，自己则藏进了森林。

有人溜进雅斯纳雅·波良纳偷白菜，朝更夫开枪。我母亲和安德列便吁请省长保护。省长派来了一名警官、一名县警和几名村警，全村进行了搜查，有三个农民因发现私藏武器而被逮捕。

“近两三天来，由于偷白菜的小偷夜间开枪，索妮娅告了状，当局派来了人，抓走了四个农民，于是父老村妇都来向我求情，这使我心情异常沉重，到今天还不能恢复。他们不可能设想，我竟然不是一家之主（尤其我还住在这儿），因此把一切都归咎到我头上。这使我非常难过。不过也有好处，那就是家里人把人们对我善意的看法弄成不可能的了，这一来，就迫使我认识到人们对我的看法无足轻重。近两天来，我抑制不了恶劣的情绪。”^④父亲在1907年9月7日这样记载。

省长曾亲临雅斯纳雅·波良纳视察。

“既可怜又可嫌。”父亲在日记中谈到这次来访这样写道。

他心情非常沉重，以至想离开去塔妮娅那儿，但那边的生活也不称心，因为那边也是大地主庄户、游手好闲……

前厅弥漫着男人的汗臭和马合烟味。隔壁住着村警。契尔特科夫跟他们谈心，给他们散发反对兵役

的《士兵须知》和《军官须知》。

我恳求母亲把村警打发回去，跟她和哥哥安德列吵了一架，气得哭了一场。我看到父亲受苦就心疼。无论哪一个庄园里，米沙的也好，苏霍京的也好，邻居的也好，都没有警察……只有雅斯纳雅·波良纳例外。

我带了父亲写的信去找省长，请他尊重父亲的要求，释放被捕农民，但他却干巴巴地回答我：“令堂伯爵夫人请我保护雅斯纳雅·波良纳和您一家的安全，我不过是执行她的旨意罢了。”谈话毫无结果。

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家。那时从车站送来一份电文：“请等我。冈察洛夫。”这使我们都吓坏了。过了几天，又是一封电报：“请等我。冈察洛夫。”我神经过敏，审视着每一个新到的来访者：是不是冈察洛夫？我跟踪着父亲。他不赞同我的惊恐不安，常常拿我取笑。

秋天，契尔特科夫到英国去了几个月，安排私人事务。行前，张罗着要给父亲物色个道地的“秘书”，为此，把托尔斯泰主义者古谢夫请了来。戈里顿维伊则尔在莫斯科音乐学院教书，戈里顿维伊则尔夫妇便到莫斯科过冬去了。古谢夫便搬到杰里亚坚基我的小屋里去住。

古谢夫主管父亲的书信往来。他负责回信。通常当我做这个工作时，我是不敢轻易教训别人的，而仅仅回信说，在父亲的某本书中或某篇文章里可以找到所提问题的答案。古谢夫则不然，他能阐发我父亲的观点，对来信作详尽的答复。誉写手稿的工作就留给我做了。

但古谢夫还没来得及深入工作，就被逮捕，被囚禁在克拉皮文县监狱。

11月8日，父亲在日记中写道：“三天前，我到克拉皮文县古谢夫那儿去过。印象十分恶劣和深刻。”父亲在去克拉皮文的途中，有时骑马，有时坐雪橇，顺路曾去了布雷金家。“他们的生活给我留下的印象十分愉快，”他写道。

这一年是令人痛苦的。我家痛苦地经历了安德列跟妻子离婚，接着他又跟阿尔齐莫维奇结婚。卡佳·阿尔齐莫维奇原是省长之妻，安德列是省长属下的一名特别事务员。卡佳跟安德列互相爱上了，她便丢下六个孩子，跟丈夫离了婚，嫁给了安德列。

我们全家都很喜爱他原来的妻子奥尔迦以及她的两个孩子：索妮奇卡和伊留什卡。尽管卡佳已经被接受为家庭成员，但我们觉得奥尔迦和她的孩子们更加亲近。父亲希望安德列这次能同妻子白头偕老。

他曾开玩笑似的对施米特老太太说：“我怕就怕两件事：一件是安德列又同妻子离婚，另一件是萨莎停止发笑。”^⑥

12月底，古谢夫被释放。

“我很羡慕您，”父亲对他说，“我真想把我也抓去坐牢，蹲一蹲那臭气熏天的、地道的牢房……看来，这个荣誉我是挣不到了。”^⑦

① 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四卷，第133页。

② 诞生百周年纪念文集《列·尼·托尔斯泰》，1929年，第84至88页。

③ 《全集》，第五十六卷，第438页。

④ 同上，第56、57页，1907年9月7日日记。

⑤ 同上，第76页，1907年11月8日日记。

⑥ 摘引自亚·托的个人回忆录。

⑦ 同上。

第六十三章

《我不能沉默》

寿 辰

雅斯纳雅·波良纳欢天喜地，吵吵嚷嚷。人们在准备迎接圣诞节。

著名的女钢琴家万达·兰多夫斯卡娅携同丈夫来了，随身还带来一架古钢琴。她老是没完没了地给我们弹奏，她演奏的拉摩、莫扎特、海顿等人的古乐曲纯正、明晰，常使我们心旷神怡，父亲更是乐不可支。

他喜笑颜开，精神振奋。古谢夫被释放出狱后，

就定居在雅斯纳雅·波良纳，住房与列米格顿打字机房并排，就在父亲的卧室隔壁，那从前住过尤丽—穆丽。我母亲这时也有了一个女秘书，她是个愉快而和善的城市妇女，名叫费奥克里托娃。我们管她叫瓦丽娅。她担任速记并誊写母亲的著作《我的一生》。

1月，父亲收到了美国托马斯·爱迪生寄赠的一件我们从未见过的东西——录音机。等机器组装调整就绪，父亲就试着录话了。但未能成功……他激动得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来，连原先打算说的也给搞忘了：“关了，关了机子，”他冲我喊道：“我忘了！”“过于激动，”他叹息一声，又补充说。“这台机子大概只适用于沉着的美国佬，而不适用于我们俄国人。”

但有时他仍然使用这台机子。他给爱迪生写了一封感谢信，以后还有过几次书信来往。

“我尊敬爱迪生，”他说道，“他没有提供任何用于军事目的的发明。”

父亲继续致力于《阅读园地》的第二版工作，古谢夫协助他。我抄写他的文章：《暴力的法律与爱的法律》和另一篇新论文《万物有终》。

1908年1月初，提出了关于庆祝父亲寿辰的问题，彼得堡成立了庆典组织委员会。委员会中有许多

教授、社会活动家、作家，如布宁、波波雷金、安德列耶夫和穆罗姆采夫（第一届国家杜马主席）。当选为委员会主席的，是马克西姆·科瓦列夫斯基，副主席是柯罗连科和列宾，秘书则是米哈伊尔·斯塔霍维奇。委员会着手开展工作。

有四十位出版界的代表接受了邀请，还决定召开全俄代表会议，制定有关庆祝计划。莫斯科和彼得堡市杜马还打算分别通过一系列人文性和教育性决议，以祝贺托尔斯泰诞辰。许多省会纷纷响应中央委员会的号召。

政府（内务部）并没有睡大觉，他们经由各省省长和宪兵机关下达命令：“必须严密注意，防止居民中的可疑分子利用此事以达到其旨在反政府宣传的任何目的，由于列·尼·托尔斯泰伯爵所宣扬的思想为这一宣传提供了广泛的机会，因此，类似企图就显得益发可能了。”^①

庆祝托尔斯泰诞辰的设想，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响应：英国举办了托尔斯泰专门基金认购活动，法国和德国反应热烈，印度、日本、加拿大、新西兰也纷纷发表声明。

这一番热闹场面、报刊上的大块文章、大量的准备工作都使父亲颇为不快，因为它们都妨碍了他专

注的宗教情绪：对死亡作精神准备以及同个人罪孽和周围的丑恶现象作斗争。但是，促使父亲断然作出决定的最后推动力，是他的一位多年的女友玛丽娅·米海伊洛夫娜·顿杜科瓦娅—科尔萨克娃老公爵小姐写给我母亲的一封信，信中说，为破坏东正教信仰的那个人举行庆祝会，必将侮辱东正教人士。父亲被这封信感动了。

……“正在筹办的对我歌功颂德的庆典，在很大程度上是令人不快的，（且不说令人心情沉重）”父亲开动爱迪生的录音机，录下给公爵小姐的回信，“我老了，大去之期不远，我真想离开这个尘世，我从上帝那儿来，将往上帝那儿去，这是我的夙愿。因此，尘世浮名，于我毫无价值，这类庆典徒增痛苦。但是，这话是就我个人而言，且不去想它吧……吹捧我这个人，将对众人产生何等影响？要知道，我这个人却正是破坏信仰的人。我将尽力摆脱掉这一坏事，回避参加进去，避免侮辱象您这样的人，因为您对我更亲近，大大超过了那些不信神的人，他们只一味地（天晓得为什么，追求什么目的）对我颂扬备至，尽说些庸俗的、谁也不需要捧场话。的确，亲爱的玛丽娅·米海伊洛夫娜，我越老越坚信：我们这些信仰上帝的人，只要虔诚信笃，那我们就能团结在一起，我们

大家就都是一个天父之子，彼此都是兄弟姐妹……现在再见吧！感谢您的友爱，并请您莫放弃对我的友爱。”^②父亲的嗓门由于激动和憋住的泪水而发抖。

父亲在获悉停止寿辰庆典的全部筹备事宜后，喜笑颜开，毫不延迟地以口授的方式给委员会秘书斯塔霍维奇写了一封信。

……“昨天，我收到了顿杜科瓦娅—科尔萨科娃公爵小姐的一封信，”父亲写道，“她告诉我，东正教人士都将为生日庆典而受辱。我从未想到过这一情况，但是她所写的却又完全属实。生日庆典不仅会引起这些东正教信徒的不满，而且还将招致其他许多人对我的恶感。而这，将是我所害怕的……因此，我对您有一个最大的请求：务请尽力取消这个生日庆典，让我解放出来。我将永远万分感激您。热爱您的列夫·托尔斯泰。”^③

除此之外，父亲还向报社写过信，虽然没有刊登，但父亲却请尼·弗·达维多夫在委员会会议上宣读。

托尔斯泰主义者赞同父亲的意见。鲍吉昂斯基给古谢夫写了一封信，其中说：

“我曾就如何庆祝列夫·尼古拉维奇的寿辰一事，陈述了自己的看法。但报章不予刊登。我认为，

如果依据法律因而也依据公认的真理，那么，就得在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寿辰前一天把他抓去坐牢，那样做，就会使他在道义上得到极大的满足。我这个想法多次为事实所证实，我深信不疑。”^④

“鲍吉昂斯基把我吹捧得多么好啊！”父亲在进早餐时说道，“的确，如果那么办，我倒真会心满意足。最近几天我一直在想，我需要什么呢？回答便是：除了蹲班房以外，我别无所求。我通过录音机给他作了答复……的确，如果抓我蹲牢房——臭气熏天，寒冷饥饿的牢房，那么，我真会求之不得，心满意足了。”^⑤

寿辰纪念筹备委员会终止了它的活动，报刊曾就此作过报道。左翼分子大为扫兴。他们无疑想利用托尔斯泰的寿辰纪念来作为反政府的一次抗议活动。

与此同时，对日益增多的拒绝服兵役的人的镇压在继续，不仅因为托尔斯泰主义者散发托尔斯泰的被禁止的著作要遭逮捕，即令在他们那里发现了这类书籍，也要逮捕。每次捕人，都使父亲极其痛苦。

死刑更多了。1905年革命之前，在俄国死刑是罕

见的现象。^{*}但近年来，由于恐怖行为和农民骚乱激增，被判处死刑的人数增多了。有关死刑的种种报道，引起了父亲阵阵剧烈的、几乎是肉体上的痛楚。他为被处决者和处决者同样感到痛苦。他必须声明，他不能沉默。朋友们（达维陀夫、比留科夫）纷纷给他寻来有关死刑的材料。

有一天早晨，父亲坐下喝咖啡和翻阅邮件，打开《罗斯》报，便读到了一条消息：在赫尔松，“由于对地主庄园的强盗式的袭击，”三十名农民被判处死刑。

“不，这不可能！不能这样活下去！……不能这样活下去！……决不能！……。”他用录音机录下这段话，嗓音中交织着痛苦与泪水。5月11日，父亲动手写一篇题为《我不能沉默》的文章，31日写完。

“如今写到和谈起杀人、绞刑、谋害、炸弹这一类事，就好象过去议论天气似的。孩子们也玩起绞刑游戏来了。孩子们和中学生几乎都作好了精神准备，一旦大难临头就去死，就象以前去打猎一样。”他这样写。接着又写道：“不能这样生活。至少我是不能这样生活的，不能够，决不会。因此，我才写这篇文章，并将竭尽全力把我写的文章在国内外加以散发。

* 原注：过去，刑事犯不被处决，而是监禁在牢房和流放原苦役。

二者必居其一；要么结束这类反人性的事业，要么掐断我跟这种事业的联系，那就是把我抓进牢房，在那儿我会看得一清二楚，原来这一切可怕的事不是为我一个人而设；或者，最好的办法（好得很，那种幸福我还不肯奢想）就是把我处决，好象对待那二十或十二个农民一样，给我也裹上殓衣，一脚蹬开板凳，于是，我全身重量便把那根套住我老朽的脖子的涂满肥皂沫的绞索拉紧。”^⑧

《我不能沉默》这篇文章曾经摘要刊登在俄国的几家报纸上，这几家报纸都被判处罚款。文章象是长了翅膀，飞遍全俄。文章在秘密印刷所里印制，人们用油印机印刷，手手传抄。就在同一天，《我不能沉默》在欧洲各国大量刊印，仅德国就有二百家刊物发表过。

文章在俄国引起了异乎寻常的波动。革命派决不会忘记利用它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他们故意避而不谈托尔斯泰谴责任何暴力和凶杀的基督教世界观。许多社会活动家、艺术家、作家都纷纷写文章评论托尔斯泰这篇文章。四面八方都给父亲写信，一些人对该文备加赞扬，另一些人则对它横加指责和百般诋毁。

约莫在这一期间，发表了列昂尼德·安德列耶

夫的短篇小说《七个绞刑犯》。父亲不喜欢这篇小说，“通篇虚假，”他说道，“写这类事情应该符合事实、满腔热情、寓意深刻，要么就切莫动笔。”父亲力图从所谓的“进步”人士身上找到某种宗教世界观，但终究是枉然，正如他自己所形容的那样，这些“接触点”是不存在的。

父亲对3月份来走访过他的格里戈里·彼得罗夫神父大失所望。这人是个在当时社会活动方面举足轻重的人，但正如父亲所说，他是个连最起码的生活真谛都一窍不通的角色……使父亲尤为惊讶的是，彼得罗夫竟武断地说，福音书无须诵读。彼得罗夫实际上是个革命派。

托尔斯泰在1908年7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应当对革命者说：朋友们！用没有洗干净的这双手是不能建筑殿堂的。”^⑦

父亲5月28日的日记中所写下的话更有特色：

“唉！你们这些迷途的、轻率的、丧失宗教信仰、亦即丧失生活目的的人，但愿你们中的一些人停止毫无意义的、残酷的革命游戏，但愿你们中的另一些人停止更为愚蠢和更为残酷的对大俄罗斯主义的扶植，但愿你们中的第三类人停止玩弄那种愚蠢到滑稽可笑的程度的宪法游戏：什么议会会外交易、政党

首领、过渡程式等等把戏，你们玩弄这一套，就好比小孩子盲目地、津津有味地模仿大人一样。你们大家，当代的俄罗斯人，都能理解，我们是独特的民族（并非优等、而是独具一格之意），是生活在我们这一独特时代的，因此我们不必模仿生活在别的时代的别的民族，而应当过自己的生活和自己时代的生活，我们今天所需要的，不是无产阶级反对资本的斗争，不需要形号各别、数量不等的战斗舰，不需要杜马式的政党和激昂慷慨的演说，而只需要全体人民所渴望的一件事：将土地从私有制中解放出来；在国际交往方面（同样也是全体人民所渴望的）：中止对别的民族的一切敌视；在国内，各族人民所需要的只有一个东西，它既跟革命格格不入，也同大俄罗斯主义相抵触，尤其同宪法水火不相容，那就是自由。这自由，并非沙皇尼古拉、斯托雷平之流以及大多数普里什克维奇* 或米留科夫** 之流所能随便赏赐或剥夺的，那是谁也不能剥夺的自由，因为它是以执行全体人民的最高法则为基础的……而这种自由的获得，只有一个途径：宗教，即承认生活的法律并遵循它。”

* 弗·米·普里什克维奇（1870—1920），1905年至1907年间组建了极端反动的宣传民族仇杀的黑帮组织。

** 巴·尼·米留科夫（1859—1943），立宪民主党魁，历史学家。

这种“游戏”，这种对待理应成为人们生活基础的事物所采取的极不严肃的态度，使父亲忍无可忍。他在读罢萧伯纳的《人与超人》之后，深有感触地说：“俏皮极了，但格调不高……他谈论的是一些严肃的问题，却不料开了个玩笑便转变了方向——你就对他失去尊重了。”^⑨

“亲爱的萧伯纳先生！生活，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一般说来，我们大家都应该在这上帝所赐予的短促的一生中努力去寻求自己的使命，并尽可能使它完成得好些。这跟所有的人都有关系，跟您的关系尤其大，您有巨大的才华，有独特的思维方式，有洞察一切问题的本质的能力……因此，我谈论您这本书的缺点，斗胆希望不至于侮辱了您。

“您的书的第一个缺点，就在于您不够严肃。不能把关于人生的使命、关于曲解这一使命以及充斥我们人生的丑恶现象的种种原因当成儿戏似地谈论。”^⑩

5月初，父亲可把我们大伙儿都吓坏了。他似乎很健康，但住在隔壁的古谢夫却突然看到父亲慢慢倒在地板上。古谢夫跑将过去，想把他抱起来，但体力不足，没能将父亲扶起。我们大家（母亲、尤丽—穆丽、伊利亚·瓦西里耶维奇）应声赶了来。我们把

父亲扶起来，放到沙发上。父亲说话了，但……啥也记不得了，甚至忘记了自己的名字，忘记了他在哪儿。

早晨，父亲苏醒过来后，含笑对契尔特科夫说，他原以为自己老“糊涂”了。请来的两位医生尼基京和别尔肯格伊姆把这一病态说成是脑血衰竭。

由于剧烈的精神震荡而引起的这一病症不时重发，但父亲的健忘症的延续时间不长，过了几小时，记忆力和思维的清晰度又全部恢复了。

尽管已是八十高龄，父亲却始终不曾改变他的生活方式：每天早晨散步，在恰佩日，在松林里，在桦树板凳上坐下休息，记录自己的思想。每天清晨，他多半从事《阅读园地》的选编工作，吃罢早餐，便骑上自己心爱的马代利尔出去。我们不让他一个人出去。有时，杜尚骑着那匹灰色杂种牝马卡清卡摇摇晃晃地远远跟随着他，有时犹骑上那匹阳光下金色闪烁的枣红马和他并辔而行。

谁也比不上我父亲熟悉森林中的道路和林间小径。我有时似乎觉得我们在茂密的国有森林中迷了路。我们钻进幽深的峡谷，桤杈扑打着脸，眼镜随时都会被打落坠地。我们穿过沼泽，越过溪涧。“靠右边走，这儿水面窄些，”他冲着我喊道。代利尔向后

急退几步，便矫健地一蹦便跃过山溪，接着，我的那匹名叫“鹰”的坐骑也跳过去。“你还活着吗？”父亲扭过头来问我。他顺着羊肠小道，策马冲上小山。“瞧，我们总算跑出来了！”他朝我大喊，纵马疾驰，放开缰绳，让代利尔沿着林间大道飞奔。^①

有一次，当父亲顺着一条通往沃隆卡小河的所谓“游泳”之路回家的时候，路过他同他的哥哥尼古拉一同埋藏“绿棍子”的地方，他勒住代利尔，坐在马鞍上扭过头来说：“就这儿，等我死后，就在这峡谷的两株橡树之间埋葬我吧！”

这年的7月2日，父亲开始写不让任何人看的日记，不让契尔特科夫看，不让我看，更不让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看。偷看他的日记，是会使他难过的。我知道，如果我年纪还大一些，父亲在许多方面是会跟我谈心的。但我无须交谈，也能理解他。一次，我送给他抄好了的手稿，他用专注的、深沉的目光凝视着我说：“我全都能理解，为什么一个人聪明，另一个人愚笨，一个人能干，另一个人平庸，一个人黑头发，另一个人红头发，可是，为什么一些人生下来就懂得精神生活的本质，而另一些人生来就不懂呢？我不能理解。”听了这话，我什么也没问，我知道他是说谁。

他有时大声呻吟。“爸爸！你怎么啦？”我问。“村警……又在林子里把农妇抓起来了。”我可怜他，又恨自身无能为力，心里深感痛苦。我设法跟母亲谈论这件事，恳求她开恩，对她发脾气，但都毫无结果。

我知道父亲在写不愿示人的日记，为他保守秘密，不叫母亲知道，也不让契尔特科夫知道。直到他逝世以后，我才了解日记的内容。当年父亲能与之推心置腹地谈论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的唯一知己，大概要推契尔特科夫了。这一点，由于母亲神经过敏，达到病态的程度，猜到了，这就等于火上加油，弄得她不能控制自己了。

“要是我听到外边议论我，”父亲在自己的“私人”日记中写道，“认定我是个跟村警串通、尽量搜刮农民、抓他们坐牢的人，认定我是个花天酒地、宣扬基督教、尽搞小恩小惠、把自己的无耻勾当一股脑儿都伪装在娇妻身后的人——这种人我无疑得称之为下流坯！我现在需要的，正是这一个，为的是我能从尘事浮名中解放出来，为灵魂而生活。”^①

父亲的这一段话，真是他在上帝面前赤裸裸地袒露心迹，而且是对所有那些指责他言行不一、假仁假义、甚至撒谎成性的人的最好回答。

离家出走，他会感到轻松得多，那样做，会把他

推举得更高，增加他的声望……而现在他呆在家里所承担的苦难要重千百倍。

“主啊！请帮助我。又想离家出走。总拿不定主意。又放弃不了。主要的一点是：如果离家出走，我这么做是为了自己。我不为自己，就得留下，这点我明白。得跟上帝一道考虑。就这么办。”

“心里非常难过，”他在同一则日记中写道。“我知道，这是灵魂向善，但却难过。反躬自问：我究竟需要什么，需要离开大家出走。上哪儿？去见上帝，去死。我想死的念头发展到了有罪的地步。”^⑫

契尔特科夫这时带上加丽娅、儿子季马和一大帮随从，住在柯兹洛夫卡—扎谢卡的一处别墅中。我知道契尔特科夫在父亲身旁的重要性，就同意将我留存在杰利亚坚基的一小块地方分一半卖给契尔特科夫。他迅即在那里兴建一座两层楼房，还外带一系列院内建筑物：各种作坊、马厩、棚子。

在我母亲和契尔特科夫之间，尽管当时还没有公开争吵，但已经感觉到潜在的敌意来，母亲感到恼怒，因为契尔特科夫竟敢对待父亲放肆任性。有时当父亲正在做事的时候，他竟敢擅自闯进父亲的书房，我们谁都不敢这样干的。从英国带来的那位彬彬有礼的职业摄影师，一个沉默寡言、蓄了浓密的栗色唇

须的英国人塔普谢尔，曾经给父亲拍摄了各种姿势的像，我母亲由于知道父亲不爱摆姿势让人拍照，大为恼火，而父亲却又不忍拒绝契尔特科夫。

“因契尔特科夫拍照所引起的愚蠢的、可怕的争吵是难以理解的，”父亲在同一处写道。“我怀疑，我不吭声是否就好，要是学布朗热*，一走了事，隐藏起来岂不更好？我之所以不那样做，主要是因为那样做只是为了我自己，只是为了摆脱周围已经毒化了的生活，我坚信，忍受这种生活，正是我所需要的。

“主啊！帮助我，拯救我！拯救我吧!!! 要解脱，惟有一死。”^⑬

他在这一则日记中写道：“我曾跟萨莎谈得好，多么奇怪的遗传——儿子继承了父亲的智力、母亲的性格，女儿则相反。”

因为声望高，父亲不得不付出许多痛苦的代价，而一般人为了追求声望都不惜牺牲荣誉、良心甚至生命，而结果往往徒劳，父亲离死亡越近，他对待尘事浮名就越冷淡。

* 布朗热（1837—1891），法国将军，政治冒险家。1889年逃亡比利时。

“大家都在写我的传记，而所有的传记都不涉及到我对圣经第七戒*的态度，不会写任何可怕的肮脏事……不会写，传记里没有，这一点倒很重要，我充分意识到这起码是个罪孽，比起其他罪孽来更能迫使人醒悟的罪孽。”^①

由于名望高，他不可能离家出走，父亲周围的人，包括亲人，全都沐浴在他的荣誉之中，一刻也不曾忘记这一点。连圣洁的杜尚也包括在内的所有人，都作记录，拍照，为后代留下了资料。

我应当承认，后代倒很少使我担心，令我惴惴不安的只有一点：如何爱护、捍卫这个世界上我最敬爱的、年迈体衰、后脑上长了雪白的鬃发的父亲；怎样做才能使得这位精瘦、缺少护卫而又日见衰弱的老人身心安逸和老境幸福呢？

7月间，他又病了，腿上的静脉出现血栓——血栓性静脉炎，从莫斯科请来的两名医生尼基京和别尔肯格伊姆要求让病人绝对安静。

起初，将父亲安置在宽大的“克里米亚安乐椅”里，但过了几天，体温升高，又把他安放到床上。

8月11日的日记中他写道：“虽则是小事一桩，

* 根据犹太教的“十戒”，第七戒是“不许奸淫。”基督教亦袭用这“十戒”。

但总要作点交代，以便身后好作安排。第一：如果继承人能将我写的东西都交给大家公用，那就好了；要是办不到，那就应该把所有为人民所写的东西让大家公用，这类作品如《识字课本》和《阅读园地》等。第二：希望把我埋进土里的时候，不要举行任何仪式。这虽然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也在此交代一下。木头棺材，谁抬谁运都行，抬往峡谷对面禁伐林区那个绿棍子埋藏的地方。至少我有理由选择一个地方。”^⑤

8月中旬，父亲的健康情况好转，体温降下来了。禁止他步行，让他坐在圈椅里由别人推着。8月28日，父亲八十大寿。不管托尔斯泰本人、当局和宗教界怎样努力制止寿辰的庆祝活动，但终于没有成功。东正教最高会议把托尔斯泰伯爵说成是“东正教信仰的顽敌，”^⑥号召信徒不要参加他的寿辰庆典。“他是个鄙视俄罗斯的犹太，是个扼杀了自己精神中全部神圣的品格和道德上纯洁、崇高素质的叛徒，他将自己吊死在自夸的智慧与堕落的才华的枯枝上，是个凶残的自杀罪犯。”^⑦大主教格尔摩根·萨拉托夫斯基这样写。

“亲爱的兄弟格尔摩根！”父亲回答他说。读了你在报章上对我的评论，我为你和公认你为自己领袖

的你的教友们而十分难过。就算我是个误入歧途的人，是个有害的人吧，但要知道，我也是个人，是你的兄长啊！如果你对那些因受我伪善的学说的影响而毁灭的人们大动恻隐之心，那么，你为什么怜悯那个毁灭他自己也会毁灭人的罪魁祸首呢？我就是那个罪魁祸首，而且是你的兄弟。显而易见，你作为一个掌握着真理的基督徒，是能够而且应当向我进行规劝、责备和善意的教导的，你这位基督徒对我具有的惟一感情理应是怜惜的感情，可无论如何决不是你的揭发文章中所流露的感情……对耶稣学说我有不同的理解，究竟谁是谁非，只有上帝知道。但有一点倒是毫无疑问的，对此，你这位可爱的兄弟在平心静气时也是不能不同意的，那就是：耶稣和上帝的基本法则是爱的法则……

“亲爱的兄弟，你听任自己被非善意的气愤的感情所支配，这可不好。这样干，对任何一个基督徒和任何一个人来说，都不好，而对宣扬基督教义的领导人来说，更加不好。给你写这封信，意在请你平息你对我的恶感，除了对误入歧途的兄弟的爱和怜悯的感情以外，我对你是不会怀有其他感情的。”^⑧

父亲没有将这一封信寄给大主教，而将它寄给了自己的妹妹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

父亲的《我不能沉默》一文，不由得引起了各方面对寿辰庆典的更大兴趣，贺电贺信雪片似的飞来，总共收到五百封电报，无数的贺信、祝词和礼物。

除了去瑞典的列夫一人而外，全家人都团聚一堂。前来祝寿的还有亲朋戚友和契尔特科夫的朋友莱特先生。这位先生还从英国带来一封有几百位景仰托尔斯泰的英国名流所签署的贺词其中有托马斯·哈代、梅瑞狄斯、威尔斯、诗人社阿尔德·卡尔宾捷尔、马肯齐·乌奥列斯、萧伯纳、哲学家弗列杰里克·加尔逊、肯南，以及其他的人等。还收到亨利·乔治在美国、澳大利亚和德国人民中的追随者以及犹太青年所发来的贺电。还收到下列组织发来的许多祝词，它们是：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协会、定期刊物活动家协会等等，美术爱好者协会还敬赠许多俄国画家专为托尔斯泰所作的画幅合集。

令人万分感动的一件礼物，是一家俱乐部的侍者们给父亲送来的白铜茶炊，上面刻有这样的一些铭文：“上帝在您心中，”“上帝不在权力之中，而在真理之内，”“生活切莫随心所欲，要遵循上帝意旨。”茶炊上盖了一条俄国绣花手巾并随有一份许多签名的感人贺词。

某公司寄来满装烟卷的烟盆，每包都绘有父亲

的画像。我们将它们全都退了回去，附上一函，说父亲不能吸用这些烟卷，因为他向来是反对吸烟的。鲍尔曼糖果点心店送来很多糖果，我把它们一一散发给村里的孩子们，同时散发父亲所著的民间故事的廉价版本。某公司送来好些大镰刀以供雅斯纳雅·波良纳农民使用，另一公司则送来一种酒，名叫“肚皮的好朋友”，这名称使得年轻人笑痛了肚皮。

向父亲祝寿的各种不同的社会阶层，一时难以数计。这里有学者、教师、大学生、中学生、工人、小饭馆伙计、教授、小铺老板、工程师、技术员、商人、农民、俄罗斯各民族——鞑靼人、拉脱维亚人、芬兰人，还有形形色色的教派分子、高层贵族代表……以及东正教神父。

“俄罗斯大地的伟大作家！向你致敬。在你寿辰这一意义重大的日子里，全世界都将跟你在一起。愿上帝宽恕你有意或无意的罪孽；愿上帝保佑你，在你暮年，上帝会饶恕你的，亲爱的伯爵！”签名：“一神父”。^⑭

另一份贺词是：“一个波兰天主教士向寻神者致敬。”

某些农民的贺词是十分感动人的：

“我深深感激您，感谢您的劳动和对人民的爱。

金币，我没有，可是，要是为建造您的丰碑而募捐，那我坚信：整个地球上的资金也买不下您为自己的活的丰碑所炼成的活的砖石，因为这些砖石是铭刻在人们心灵中的活的语言。您说的话必将永世长存，万古不朽。始终尊敬您的一名女基督徒（就信仰而论）和农妇（按成分来说）谨启。”²⁰

“亲爱的爷爷！祝您健康。”一个工人这样写。“亲爱的爷爷！对于各民族的幸福来说，对于我和其他许多人来说，您已经变成永垂不朽的了。”

“感知上帝的老人，不要沉默，再多活许多年吧！”另一个农民这样写。

也有的信中破口大骂，其中有一封署名为“俄罗斯之母”的9月3日来信。

“伯爵。回您的信。别麻烦政府，您可以自己动手，简便易行。您那样做，就是为祖国和我国的青年做了一件好事。”²¹

“俄罗斯之母”给父亲寄来了一只匣子，里面有一根绳子。

父亲按平常一样度过了自己的生日。他早上工作，早餐时接受朋友们的祝贺，下午两点钟我领他去大厅见客。晚上，戈里顿维伊则尔演奏他心爱的肖邦的曲子。

莫说回信，父亲甚至要把那许许多多的贺信通读一遍，也是不可能的。母亲和我家的友人希里亚科夫便把所有的贺信都整理好，选择其中最有趣、最感人的给父亲看一看。

“最近几天，”父亲在寄给报社的一封信中写道。“8月28日前后，我收到了数量惊人的向我祝愿的各种各样的表示，这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我再重复一遍，我十分真诚地相信，我是受之有愧的。这些感情的表示，给我带来了我毕生所经历的最大欢乐之一。因此，我认为道义上必须尽我所能，哪怕在极小的程度上向一切带给我欢乐的人表示衷心的感谢。这些贺信真是五花八门，来自俄罗斯各个角落，它们的目的显然只有一个，即表示赞许——并非赞许我，而是赞许我好歹总算描绘过和表现过的真理。对我来说，这是很大的快乐，为此我表示感谢——并非类似的情况下出于礼貌和客套所表示的感谢，而是由于近几天来我所感受到的意外与问心有愧的欢乐而不能不油然而起的那种真诚的谢意。我感谢所有给我写信的人，感谢那些慨然馈赠的可亲可爱的人，如彼得堡的侍者就惠赠一只上有铭文的精美的茶炊，又如工人们和其他一些使我深受感动的人。请原谅我心有余而力不足，对祝贺我的许许多多的人，不能一

一作答，在此请接受我诚挚的谢忱。”^⑳

- ① 《托尔斯泰与托尔斯泰论》，新资料，托尔斯泰纪念馆出版，1924年，莫斯科第一卷，第81—83页。
- ② 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四卷，第144页。
- ③ 同上，第145页。
- ④ 同上，第146页。
- ⑤ 同上，第146页。
- ⑥ 《我不能沉默》，罗德日尼可夫出版社，第18页和第39页。
- ⑦ 《全集》，第五十六卷，1908年7月28日记。
- ⑧ 同上，第340页、341页，1908年5月28日日记。
- ⑨ 马科维茨基：《雅斯纳雅·波良纳笔记》，1908年1月12日。
- ⑩ 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四卷，第152页。
- ⑪ 《全集》，第五十六卷，第171页。
- ⑫ 同上，第172页。
- ⑬⑭ 同上，第171页。
- ⑮ 《全集》，第五十六卷，第144页，1908年8月11日日记。
- ⑯ 古谢夫：《托尔斯泰年谱》，第718页，1908年8月22日。
- ⑰ 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四卷，第167页。
- ⑱ 同上，第167页。
- ⑲ 同上，第165页。
- ⑳ 同上，第164页。
- ㉑ 同上。
- ㉒ 同上。
- ㉓ 古谢夫：《跟随托尔斯泰的两年》，第193页，媒介出版社。

第六十四章

“心情愈来愈沉重……”

我尽管也同这一感情作斗争，但我总嫉妒父亲对古谢夫好。

我明白，他对父亲的帮助比我要好一些。他懂速记术，而我却一窍不通。他懂得辜鸿铭和孔夫子，我却不懂。古谢夫对波斯尼亚和盖尔塞哥维纳合并的事全都了如指掌，我呢，虽也抄录过父亲《致塞尔维亚一女性》的信，对塞尔维亚政局的了解却十分模糊。我喜欢在吉它伴奏下，同安诺奇卡一道唱茨冈人的抒情歌曲；古谢夫呢，在极力压制其内心种种邪念——他喜欢我们唱歌——的同时，“牢记”抒情歌曲中那充满炽热爱情的歌词，以便向“子孙后代”表明，

托尔斯泰是在何等罪恶的环境中生活的。

我十分喜爱动物。我有一条很通人性的又大又黑的鬃毛狮子狗马尔基兹和一只能吐人言，尾巴粉红的灰色鹦鹉。它们都深得我的喜爱。鹦鹉还曾替我报复过古谢夫呢。

当古谢夫带着人常有的一副笑脸，乐滋滋地坐下给口授时，我打开笼子，把鹦鹉放了出来。古谢夫不知是由于专心致志于那篇论述波斯尼亚和盖尔塞哥维纳一文，还是因为全神贯注与个人邪念作斗争，竟对鹦鹉悄悄地走近他并越来越高地爬上他的腿部毫未察觉，古谢夫不敢摸它，又不敢挪动位置：“把您该死的鸟赶走！他冲着我喊。可鹦鹉却雄踞在古谢夫的膝盖上，高呼：哎呀，哎呀，哎呀！它拼死地啄古谢夫膝盖。“真痛！”古谢夫嚷了起来。“痛呀！把它赶走！”

但鹦鹉在啄过一阵后，已跳到地板上。“傻瓜！”它随后冲着古谢夫喊道。“傻瓜！”它已经爬到我身上，蹲在肩头，用小脑袋紧偎着我的面颊。“伸出小爪子，”它亲昵地学着舌说。“伸出小脑袋亲一亲”。“可恶的刁鸟”，古谢夫一面轻轻地揉着膝盖，一面埋怨着。

大家都喜欢我的鬃毛狮子狗马尔基兹，甚至连

一般不爱狗的我母亲也不例外，我跟马尔基兹所爱玩的游戏之一，就是捉迷藏。我将眼镜盒子藏在橱子顶上，藏进沙发，藏到父亲的口袋里。鬃毛狮子狗满屋子跑着，一边嗅着空气，跳上桌椅，使大伙儿逗乐的是，它竟爬上父亲的口袋边，小心翼翼地 from 里边衔出盒子来……托尔斯泰主义者可能瞧不起我，为托尔斯泰有这样一个轻佻的女儿而感到遗憾吧！可父亲喜欢马尔基兹，对它的伶俐深表惊讶。但是，我又是打哪儿学得这样喜欢运动，喜欢狗马，这么乐观，甚至这么好斗的呢？他们是否在自己的导师身上也看到了这么些“阴暗的”特点呢？他们是否感觉到他对生活的无限热爱与对生活透彻了解的全部威力呢？父亲谅解我年幼无知。他本人就常为自己那忠实坐骑代利尔的伶俐、热心、灵敏而喜不自胜哩。冬天，代利尔迈开忠实的蹄子，踏着雪路或滑溜溜的泥路，小心谨慎地驮着自己的主人；夏天，它则小心翼翼地踩着泥泞的沼泽，穿过灌木丛林。父亲喜欢抄近道走，驱使坐骑钻生荒地，闯雪径，而当代利尔陷入齐肚深的雪堆时，父亲便爬下马来，将笼头往马蹄后面一扔，驱着马儿在前面赶路，代利尔在登上大路之后，停了下来，掉转它那良种阿拉伯马头，也斜着鼓凸的眼睛，等候自己的主人。

生活难道不可能有欢乐，而应永无休止地忏悔，苦恼吗？有时我还渴望过：我同父亲在村里有一栋小屋。我幻想父亲每天早上工作，我收拾房屋，刷呀，洗呀，做饭呀，我们有一座菜园、一头母牛、几只母鸡，晚上，我就给他抄抄写写……嗯！，母亲将如何是好？她不会赞成这种生活的。她准会同医生、仆役、女清扫工等住在一排。另一边住着契尔特科夫，还有“助手们”、摄影师们……又将开始抄录，复制，拍照……父亲走不脱身……他被荣誉捆住了手脚，人们永远不会让他安静下来，他们需要他，没有他——他们准得一事无成。在这样的时刻，我的乐观也就消失了——我知道出路是没有的。

1908年12月底，列宾带着诺尔德曼—谢维罗娃来到雅斯纳雅·波良纳。他们俩都是一丝不苟的素食主义者。对诺尔德曼来说，素食乃是一种祭仪——她什么蔬菜都吃，尽想出一些稀奇古怪的菜肴和满是素菜的旋转席，便于不用仆人也行。父亲觉得这未免太复杂，太造作了。对诺尔德曼的境遇，他也讨厌。“我如何称呼她呢？”他说道，“列宾之妻吗？否，他的妻子是另一个人。姘妇吗？太粗鲁了”。蓦地，他又怡然大笑起来。“我知道了，知道了，好象民间说的：权当列宾的主妇吧！”。

圣诞节，我为农村儿童布置了一株枞树，我们闹了个通宵，父亲拉着孩子们的手，围着枞树跳起环舞来，唱歌跳舞，给大伙散发礼物。父亲间或俯身，凑到孩子们跟前。“你是谁家的？”他问道，“是列祖诺夫吗？”“列祖诺家的巴维尔”，一个孩子答道。“谢苗的孙子吗？”父亲在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满意地笑了。“一家人好象一个模子做出来的，他的祖父曾在我的学校里上过学。瞧，这个黑眼珠，翘嘴巴的女孩子大概是玛卡罗娃”。他又猜对了。

1909年1月底，雅斯纳雅·波良纳来了图拉的会督*弗拉迪卡·帕尔费尼，随员有两名神父和警察。当父亲跨进大厅时，会督本人不等父亲行祝福仪式，就先向父亲伸出一只手来。父亲准备盛情接待主教。

“在略事寒暄之后”，父亲写道，“我邀请他去我书房，并告诉他说，我收到很多宗教界人士的来信和来访，我也经常为他们所表达的良好祝愿以及他的来访所感动，但我始终感到很遗憾的是，我不可能执行他们的意愿，象是不可能跳到半空中去一样。

“我随后对他说：我引为不快的一点是，这些宗教界人士都责怪我破坏了人们的信仰，这是个极大的误会，因为我没有在这一方面的活动，目的无非是

想把人们从缺乏某种（不管是什么样的）信仰的反常而有害的状态中拯救出来。为了证实这一点，我就便给他宣读了我在1月20日（这一天我们正好相逢）编纂的《阅读园地》。这一天的读物有从昌宁格、爱默生、托罗和另外从康德引来的精采片断。

“念罢《阅读园地》，谈话又继续进行。

“我看到这部书给他的印象很好，这使我十分高兴。但是，尽管如此，他还是说出了责怪我的话，说我的活动败坏了人们的信仰。我于是给他谈了很久以前的一件表面微不足道，实际于我十分重要的事。

“在寒冬的一个深夜，我曾出去走动走动，乡里各家的灯火这时都已熄灭。正当我路过还亮着灯的一户农家时，但见一个妙龄时我就认得的、毛病最多而且最淫荡的村妇玛特莲娜老婆子正在跪着祷告哩。我为她那虔诚的祈祷所震惊。我向前边走边看，但等我转身来，朝窗里望去，碰见玛特莲娜还在那纹丝不动。她又是祈祷，又是连连叩头，还不住地仰面望着圣像。

“请看这一起祈祷吧。愿上帝保佑我们大家也这样祈祷，就是说，也同样意识到自己对上帝的从属地位，——而败坏激起这种祈祷的信仰，我认为是最大的犯罪……而且这是不能得逞的。任何圣贤都做

不到这点。可我们那些有学问的人，又当别论——他们没有任何信仰，或者更坏，佯装有信仰，这种信仰仅是装点门面而已。

“因此，过去和现在我都一直认为必须给所有缺乏信仰的人指出，一个人要是没有信仰，是活不下去的，而对于信仰虚伪、装点门面的人，则必须使他们从不明真正信仰的蒙昧状态中解放出来。

会督对此毫无异议，只反复絮叨，败坏信仰是不好的。”^①

2月份，来父亲处走访的，还有从喀山鞑靼人那儿来的一位伊斯兰教徒、巴加伊教派的追随者瓦伊索夫。父亲对他很感兴趣，同他作了长时间的交谈。瓦伊索夫的基本想法是，承认有必要信奉一种宗教。

“实质上，当你好好儿一想，”父亲说道，“那你就常会惊奇，如此简单的道理竟会想不起来：存在着东正教徒、天主教徒、佛教徒，人们相信自己的宗教，认为它就是真理，而超越它的界限，就会是谬误，而它才是真理。这怎么不令人怀疑呢？这怎能不促使人们寻求一种为大家所共有的宗教呢？”

如果深思这些话的含义，那就不难明白，为什么父亲晚年致力于将其自认为是人生的基本准则汇集在一起：编纂各种集子——《圣贤思想集》，还有

《阅读园地》、《每日读物》，以及《生活之路》。这无疑是在筛选世上所有宗教和最伟大思想家的精髓，以开创统一宗教的尝试。

3月初，父亲又害起左腿静脉炎。我和杜尚敦促他躺着，一只脚微微翘起，身子不挪动。有时，他的情绪很低沉。

抗拒兵役的现象多起来了。政府在迫害他的朋友们，父亲深为苦恼。他又请求将他本人即文章的作者加以逮捕，他那些志同道合者正因传播它们而惨遭迫害。可是，政府的策略不变。契尔特科夫以“有害活动罪”限三日内逐出图拉省。比留科夫在科斯特罗马省的住处横遭搜查，并借口收藏与扩散违禁书籍，对他提起了公诉。

我母亲尽管可能不太喜欢契尔特科夫，嫉妒父亲对他好，也可能正因为如此，她便象歉收那年东正教最高会议将父亲革除教籍时一样，以她特有的急躁性情和缺乏冷静，突然向报社写了一篇文章，抗议对契尔特科夫的放逐。这封信不仅在俄国各报发表了，而且还曾刊登在国外，包括伦敦的《泰晤士报》。她出言恶毒，说什么安德列兄弟和我们的女邻居兹维金采娃在放逐契尔特科夫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因而请求图拉地方当局捅掉“革命派”（她常这样称呼

托尔斯泰主义者，说他们在紧挨杰里亚坚基地的住所构筑了一个蛇窝）的有害老窝。

5月底，一位知名学者伊·伊·麦奇尼科夫*携带妻子来拜访父亲。自然又少不了一帮记者，他们总是贪婪地注视着雅斯纳雅·波良纳发生的一切。

“麦奇尼科夫和一帮记者来了，”父亲在5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麦奇尼科夫很愉快，好象心胸还挺开朗似的。我还没来得及跟他谈话。”^②

父亲的情绪极佳，彬彬有礼地接待了客人。麦奇尼科夫立刻感到轻松自如。父亲亲自驾着双座敞篷马车，领客人去找契尔特科夫。一路上谈话接触到父亲的文艺创作。麦奇尼科夫深为惊讶的是，当自己正津津乐道《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时，不意父亲竟回答说，他不仅对这两部书不感兴趣，而且连它们的内容也忘记了。当麦奇尼科夫谈起饮酒和吸烟的害处时，父亲深表同意，但他们对这问题的态度也象对待素食一样，是大相径庭的。麦奇尼科夫对此仅持科学与卫生观点，而非道德观点，他并且断言，一个人能够延年益寿，他本人即准备活上一百多岁呢。这在父亲看来是不知羞的和不严肃的。

父亲在5月31日的日记中，对麦奇尼科夫作了

* 伊·伊·麦奇尼科夫（1845—1916），俄国生物学家

如下的评语：

“麦奇尼科夫看起来很轻浮——一个不信教的人。我特意抽出时间，想跟他促膝交谈有关科学与宗教问题。谈到科学，除了相信我所要求证实的科学情况外，倒没有什么。关于宗教避而不谈。显然是否定宗教信仰，不理解或不愿理解宗教是什么。”^③

6月初，父亲收到了亨利·乔治之子请准予来雅斯纳雅·波良纳一行的电报。正如父亲所写的，“想到跟十九世纪最卓越人物之一的儿子晤面”，是如此地使他感奋，使他受到鼓舞，以致当天他就写了一篇短文，论述统一税乃是解决土地问题的唯一手段。

这次晤面，令人极为感动。正如亨利·乔治之子给记者们所宣布的，他曾为我父亲那惊人的记忆力、充沛的精力、对乔治的书籍的通晓、他的魅力、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对死亡无所畏惧而不胜惊讶。

父亲在跟小乔治告别时说：“我行将就木。您要我给您在阴曹的父亲转达什么吗？”“请转告他，”小乔治答道，“我正在继承他的事业”。^④

父亲在雅斯纳雅·波良纳并不轻松，我兄弟列夫虽然住在我们这儿，但并没有好转。他神经质，经常忙得团团转，时而醉心音乐，时而迷恋文学，杜撰自己的卫生理论。他谈论正经事往往武断自信，对问

题思考欠周，常常自相矛盾。得具备父亲那样的温和与耐心，才能忍受得了列夫的再三声明，诸如农民不需要土地，没有死刑就不可能建立秩序，等等。父亲听腻了，决定到苏霍京家去休息一下。略瓦正在塑父亲的半身像，见父亲不让他塑完便离了十分生气。殊不知父亲的想法是，除了休息外，还要跟契尔特科夫见面，契尔特科夫虽然向皇上呈文，但还是被完全禁止进入图拉省。

苏霍京的庄园恰好位于奥尔洛夫省的边界上。塔妮娅在奥尔洛夫省的一处农村为契尔特科夫租的一间小房，离开苏霍京的庄园四俄里，以便父亲去看望他。要不是我母亲坚持要父亲回去，他在塔妮娅那儿本来还会待得久一些的。

村警在继续维持秩序。一次，我路过大塘，听到阵阵吆喝，但见岸上围着一大堆男女村民。走近一看，我才认出是个熟悉的农民。村警将他抓住，因为他用拖网在塘里捕鱼。那个农民周身水淋淋的，冻得发青，裤腿卷起，在极力争辩，说他是在农民这一岸边，而不是在“贵族”那一岸边捕鱼。但是，村警不由分说，从他手里一把夺过拖网，还用短皮鞭抽了他几下。热血涌上我心头。“坏蛋！您怎么敢打打他？”我气得忘乎所以，怒吼起来。村警出言不逊地回了句

什么。但我挺身于他和那个农民之间，他只好退缩了。可我一走，他又将那个农民抓将起来，还湿淋淋地拘留他两小时，而我母亲获悉这一情况后，没有吩咐将他释放。

这事过后不久，我收到了一张传票——我由于侮辱执勤的村警而被追究责任，同时雅斯纳雅·波良纳来了一位区警察局长。我没有跟他谈什么，只请他转达一下：如果警方认为我有罪，那就审讯我吧。作了违警记录。翌日，我就到省长那儿去，没有碰见他，副省长洛普欣接待了我。案子被压了下来，此后不久，村警便从雅斯纳雅·波良纳撤走了。

接替村警的，又来了个巡逻骑兵——一个剽悍的人，身穿一件束腰无领的契尔克斯大衣，一顶羊羔皮帽歪戴到后脑壳上，手提一条马鞭……

要了解在父亲最后一年里所发生的变化和多年来的积重难返的情况，应当追溯到八十年代，那时我们家的生活即开始沿着两条轨迹运行了。

下面就是父亲于 1885 年就此给母亲写的话：

“因为不能剥夺我赖以生活的观点，从而使我返回到原先老样子上去，那么，我俩由于我那无法医治的癫狂所造成的苦恼该如何消除呢？为此，就得承认我的观点是真理抑是发癫，办法只有一个：深入研究

这一观点，分析它，了解它。不幸我已言中，这一办法不仅是你从未试行过，而由你带头就连孩子们也从未试行过，只不过这一点大家都习惯于回避罢了。大家心里都有个谱：忘却这一观点，不去正视它，不去理解它，不承认它的存在，象对待有趣的思想一样去对待它，而不是当作了解人的一把钥匙。

“结果就是这样，当我正在实现精神上的转变，我的内在生活业已变化了时，你却不去重视它的意义和重要性，不去仔细研究我身上所发生的变化，由于不幸的偶然机会，你屈服于大多数的见解，认为作为艺术家的作家比方说果戈理，只应写些文艺作品就行了，不用考虑自己的生活，不得改造它，否则就有点儿类似于胡闹或精神病了；你由于深受这一心绪的影响，就对我要求摆脱绝望、重返生活的一切作为，统统持以敌视态度。

“我写的作品就是我的整个人。在生活中，我不曾充分表达过自己的观点；在生活中，我为求得跟一家人共同生活而一再作出让步；我过这种生活，内心却否定这整个生活，可你们却把并非为我所恋的生活误当成是我的生活，而我在作品中所表露的生活，你们却视为不切实际的空话。造成我们一切纠纷的严重错误是，你八年前承认我发生了转变，但你却把

这一从空想和幻想的领域将我引进现实生活的转变，认为是反常的、偶然的、暂时的、离奇的、片面的，不仅无须研究，无须分析，反而要竭尽全力与之斗争。你斗争了八年之久，其结果是：我比以前更加苦恼，但我不仅没有放弃老观点，反而愈走愈远，斗得喘不上气来，并以自身的苦恼使得你们也苦恼……

“你们找遍原因，寻觅妙药。孩子们不再大吃大喝（吃素）。我感到幸福和愉快（尽管遭到攻击和恶毒的非难）。一旦孩子们开始收拾房间，不上剧院，怜惜男女村民，拿起正经书来读——我就感到幸福和愉快，我一身的病一下子都好了。但是，要知道没有这回事，根本没有，存心跟我作对。我们之间正在进行一场致命的斗争——所谓生死搏斗啊……”^⑤

分歧逐年增大，斗争愈益尖锐，相互理解更加渺茫。“见到替我们家干活的奴隶们，心情便愈来愈沉重了。”举目尽是贫困，我们的生活却豪华奢侈，无谓奔忙，空虚无聊，游手好闲，在在都使父亲抑郁寡欢。“我过得不好，是因为生活就不好。生活不好，是因为我们这些人过得不好”，他说道。出路是没有的……

-
- ① 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四卷，第 174—175 页。
 - ② 同上，第 186 页。
 - ③ 同上，第 187 页。
 - ④ 同上，第 189 页。
 - ⑤ 《全集》，第八十三卷，第 539 页

第六十五章

新的考验

要相信自己的亲人患了精神病，这通常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对这位亲人的权威的认可已经养成了多年的习惯之后。

当时如果我明白母亲患了病，那么，我跟她的关系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那也会轻松些。但是，许多比我聪明和有经验的人当时也不明白……

母亲一天天变得越发神经质。她动不动就生气，时时流泪，歇斯底里大发作，动辄勃然大怒。发作的起因各式各样，没头没脑，解释不清。她的兴趣依旧从事物的表面滑过去。她时而摘花，时而画画，时而不知为了什么又动手去裱糊过冬用的窗框，时而又

去写她的回忆录。大伙儿在那儿谈话，一看到她走进房来，全都心中忐忑，生怕她出语伤人。凡事都令她病态地神经过敏。她的性格，还在青年时代就被她姊妹塔妮娅嘲笑过的性格——顾影自怜以及坚信自己是个不幸的牺牲品——这个性格已经发展到了极限了。

7月初，父亲收到去斯德哥尔摩参加第十八届和平大会的请柬。他知道，只有他一人能够说出赤裸裸的真理，议论战争之不能容忍和号召全面裁军，只有他一人话才会被人们听取，而他认为去参加大会是自己的责任。可是，当父亲说出自己的打算的时候，母亲斩钉截铁地说，她不准他去。为了制止他这次旅行，她使出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她大吵大闹，大哭大叫，恫吓讹诈，扬言要自杀。

“我不能入睡，直到深夜两点多，”父亲在日记中写道，“后来将我叫醒，我感到浑身无力。索·安一夜没睡。我便去看她。这真有点愚蠢……我疲倦了，不能再这样下去，我感到自己完全病倒了。我感到不可能理智地、友爱地对待她，完全不可能。现在我只想离得远远的，什么事也不过问。别的都无能为力，我已经认真思考过了，要逃跑。唉！表现出基督精神吧！。c' est le moment ou jamais（现在或者永

不!) 万分想一走了之。我在这儿对任何人未必有任何好处。这是沉重的负担,对大家只有害处。上帝呀! 帮助我,开导我。我只希望一点:完成你的意旨,而不是自己的意旨。”^①

过了几天他又写道:“饭后,我谈起了去瑞典的事,这可引起了一场可怕的歇斯底里大发作。她想服吗啡自杀,我从她手中夺过吗啡,扔到楼梯底下。不过,当我躺下经过静心思考之后,决定不走了。我当即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她。她很可怜,我真诚地怜悯她。不过,多么有教益啊!我除了自我修养,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一旦自我抑制,一切便迎刃而解了。”^②

母亲因父亲想去斯德哥尔摩而激动,这件事正巧跟另一件事同时发生:母亲打算向父亲著作的出版商提出诉讼,不过她对自己是否有这种权利并没有把握。

这年夏天,姑妈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的女儿莲娜和她的丈夫带着两个非常可爱的孩子在我们家作客。莲娜的丈夫杰尼先科是诺沃契尔卡斯克高等法院的院长。

我母亲请杰尼先科向她提供法律咨询:父亲那份授权出版和销售他的著作的旧委托书是否仍然有

效。杰尼先科作了否定的答复，母亲便又失去了镇静。“家里人去讨饭，你也无所谓。”她朝着父亲大喊，“你想把一切版权都交给契尔特科夫，却让子孙挨饿！”

安德列和伊里亚都负了债，他们不断请求母亲帮助，这也使母亲神经受影响。安德列把自己的庄园给了第一个妻子奥尔迦。奥尔迦带着孩子索尼奇卡和伊留沙就住在那里。安德列缺钱，他虽然在供职，但薪俸从不够花。伊里亚家大，又不善于经营，田产没给他提供什么收入。正因为这样，母亲一再要父亲把他著作的所有版权交给她，但父亲断然拒绝了。父亲把日记的副本和手稿都交给了契尔特科夫，这使母亲很生气。母亲担心得不到父亲 1881 年以后写成而未发表的著作的版权。家庭中精神上的紧张气氛已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父亲日夜不得安宁。母亲的所作所为已超出正常人的界限。她哭哭啼啼，半夜三更闯入父亲的房间大喊大叫，说他正在害死她。她鬼迷心窍，并没有意识到她这样做不仅正在扯断联系她和父亲的最后一根细线，而且在不断缩短父亲的寿命。

契尔特科夫没来雅斯纳雅·波良纳。父亲看到契尔特科夫每次来都要引起母亲大怒一场，便索性

请他别来。7月14日，他给契尔特科夫写道：“亲爱的朋友，我作出牺牲，不和你来往——但愿这是暂时的——你会明白我为此多么难过。不过我知道，你爱的不是我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是我的心，而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有着同样的需求……”

7月16日父亲写信给他：“今天早起我就盼望，如果人家让我走，也就是说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同意我走，我就到你那里去。但她很匆忙，离开时什么也没说，因此今天我不去了，*ce qu’ est retardé n’est pas perdu*（推迟不等于失去）。等到下次吧……我意识到，今天不让我去见你的是上帝，而不是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不然，这对我来说就是莫大的耻辱……”^③

7月12日父亲在日记中写道：“但愿她（妻子）明白她是在毒化我生命中最后的时日……”^④

她不愿意，也不可能明白这一点。她没想到父亲已临近离家出走，父亲即将把他著作的版权交给公众——这后一步是母亲最害怕的。

法院院长杰尼先科是位心肠非常好的人，可怜他左右为难。父亲请他造一份正式的遗嘱，表明父亲已放弃自己著作的版权。

我看到，父亲内心一直在斗争。他希望我也有宽

恕和仁爱之心，而这是我完全不具备的。他老对我说：“受益多，施益也要多。”我对他说：“爸爸，我并没受益，我不能……”“那你就想办法去克服这个‘不能’吧。”……可是连他自己也不总是都能做到这点。

“这些日子过得很糟糕，心绪不好，”8月2日他又给契尔特科夫写信。“一旦失去爱，便没有欢乐，没有生活，没有上帝。桶底只要出现一个小洞，水就会流尽……是啊，上帝是仁爱的化身，这对于我已是不容置疑的明显真理，但近来我不仅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而且彻底感到，我们这些不中用且具有丑恶历史的人要在生活中表现出爱是不容易的，何况处处都要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当你为了爱而去满足爱的某种要求时，你却破坏了爱的另一种要求。唯一的办法是只顾今日。每天、每时、每刻忍受着苦难。而我心情很沉重，越来越想死。以往只是晚上才这样想，现在连早晨也这样想。这倒使我高兴。别以为我在向你诉苦，我既没有这种权利，也没有这样的愿望。我主要是感激你，特别是当我孤独的时候。”^⑤

虽然父亲向母亲作了让步，决定不到斯德哥尔摩去，但他仍急于写完准备在世界大会上作的报告。不过，由于瑞典工人罢工，大会延期了。后来大会召

开时，父亲的报告并没有被宣读。他很失望，他说：“到处都是谎言，人们害怕真理，忘却了真理。一方面，人们为争取和平而聚会……另一方面，却又在高谈加强军备。”

姑母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来到雅斯纳雅·波良纳之后，气氛变得轻松些了。姑母不干预我们家庭的事，但她的到来就使母亲有所收敛。我们都松了口气。

有一天晚上，戈里顿维伊则尔来了，父亲同他坐下来下棋。突然，我的狮子狗马尔基兹狂吠了起来，大门口响起了辘辘的车轮声，县、区警察局局长和村里的小警官来到了我们家门前。我们全家都惊动了。原来他们是来逮捕古谢夫的。父亲要区警察局局长出示证件，逮捕证上写明，由于古谢夫参与“革命”活动，要将他流放到佩尔姆省的切尔登，时间为两年。家人和仆人都跑来了，父亲陪同古谢夫来到书房。警察给古谢夫半个钟头的时间准备行装。古谢夫匆匆忙忙地一面移交文书，一面收拾东西。父亲沉默不语，只是脸色异乎寻常地苍白。我将《战争与和平》塞进古谢夫的皮箱里——在古谢夫看来，这是部没有宗教和哲学意义的作品，他从来没读过。我轻声对他说：“这本书会减轻你旅途的不快。”父亲拥抱着古

谢夫，吻了吻他，然后噙着眼泪默默地上了楼。马车离开了。

“呸！”修女姑母朝离去的警察背后啐了一口。“凭什么抓这么个好人！呸！”

父亲在日记中写道：

“昨晚来了几个匪徒找古谢夫并把他带走了。送古谢夫的场面很好，这说明大家对他和他对我们都不错。那情景令人欣慰。今天，我为此事写了个声明。”

“昨晚十时，我们家来了几个穿制服的人，要带走我工作上的助手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古谢夫，”声明中写道，“其中的县警察局局长在我提出问题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张不大的文件，毕恭毕敬地自我宣读了文件上内政部长的决定，说是为了受其保护的俄罗斯人民的利益，根据第三百八十四条或者还有其它某条（虽然他们采取这样的行动似乎并不须要依据任何条文），尼·尼·古谢夫因传播革命书刊应受到拘捕，并出于内政部长所深知的某些考虑应流放到佩尔姆省的切尔登县，出于同样的考虑，流放期应为两年……”

“只有引起这场风波的尼·尼·本人显得高兴和镇静，并以他那特有的善良和对人而不是对己的

关心，匆忙地整理我的文书，因为给他收拾行装的时间不超过半小时……

“应该亲眼看看，我们全家人以及当晚偶然聚集在我家面又认识古谢夫的熟人是如何给他送行的。从老人到小孩乃至佣人，无一例外地都怀有一种对古谢夫的崇敬和爱戴之情，都不同程度地抑制着对迫害古谢夫的罪魁祸首的义愤……

“古谢夫为人善良、温和、诚实，他反对一切暴力，乐于为大家服务，对自己毫无所求——就是这样一个人深更半夜被抓走，被投入伤寒病蔓延的监狱并被流放到某个地方；这地方为流放古谢夫的人所熟悉，就因为他们认为这地方是最不宜于生活的……”^⑥

这份声明在几乎所有的俄罗斯报纸上都刊登了。

父亲身体很弱，但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来找他的人仍然络绎不绝，而且他和每个访问者都能谈得来。他同给他画过像的画家帕尔霍缅科谈艺术，同来访的杜马成员瓦西里·马克拉科夫等人畅谈土地改革、谈向杜马提出亨利·乔治的单一税草案。

父亲疲于应付不愉快的事情和来访者，他很想见到契尔特科夫。他乐于离开雅斯纳雅·波良纳去

莫斯科郊外的克列克申诺庄园。契尔特科夫一家住在那里。父亲想在这宁静的环境中休息休息，摆脱不断听到的责难和不断看到的歇斯底里……

随父亲一起去的有杜尚、伊利亚·瓦西里耶维奇和我。然而，事情并不如想象的那样好……父亲还是得不到安宁。

电影公司询问能否拍摄父亲离家的情形，父亲回电表示不同意。尽管这样，帕泰杂志社还是派来了摄影师。他们躲在树丛里拍镜头，尾随我们到火车站……在火车上戈尔顿维伊则尔和我们会合了。我们原想在莫斯科，在织匠街能见到哥哥谢尔盖和他的妻子，但他们不在那里。我们给父亲端来素食，我们希望父亲稍事休息。但这时瑟京办的《俄国言论报》的记者斯皮罗来了。这个记者还没来得及开口提问题，父亲突然严肃起来，向他开了一炮。

“请告诉你那坏透了的瑟京，我很生气，”父亲说，“为什么他拖延发表《每日读物》？要是媒介出版社，那早就发表了……”

也许斯皮罗根本不知道父亲编的最后一集《每日读物》。不知为什么契尔特科夫违背父亲的意思不将集子送给媒介出版社，却送给了瑟京，而瑟京从商人的眼光出发，觉得出版这本集子不合算，一拖再

拖。

戈里顿维伊则尔告诉父亲，新近造出了一种很小的、依靠机械作用能自动演奏名曲的钢琴。于是一清早，父亲、戈里顿维伊则尔、我以及和我们会碰到一起的契尔特科夫一块儿来到了齐梅尔曼的乐器店，父亲在这里受到了隆重的欢迎。

商店经理非常殷勤，他把钢琴送到乡间契尔特科夫家，父亲在那里欣赏了世界最优秀的钢琴家演奏的肖邦、施特劳斯等作曲家的作品。此外，提琴手西博尔和莫吉列夫斯基也到克列克申诺来了，最后还来了个四人提琴组，他们为父亲演奏了他喜爱的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的作品。

这都是些非常可亲的人，他们给父亲带来了莫大的愉快。父亲处于志同道合的朋友之中，但并没有得到真正的休息。邻近学校来了一群教师，他们和父亲谈论了父亲对学校教育的看法；农民从附近的村子来了，人们从莫斯科来了……

过了几天，我母亲来了。契尔特科夫这里的一切她都不喜欢：她不喜欢父亲周围这些“阴沉的人”，不喜欢伊利亚·瓦西利耶维奇和她同桌吃饭。她的神经处于可怕的状态。

假如母亲得知写遗嘱这件事父亲正是在克列克

申诺这个地方决定的，很难设想会出现什么情况。在这份遗嘱里，父亲放弃了他 1881 年以后所写作品的版权，允许一切愿意出版这些书的人自由出版，并将审订权交给了契尔特科夫。我将遗嘱誊写了一份，父亲和三位证人在上面签了字。我把副本交给了契尔特科夫，自己留下了原本。契尔特科夫要我到莫斯科去找一找穆拉维耶夫律师，问清楚这样的遗嘱有没有法律效力。

父亲想从契尔特科夫处直接回雅斯纳雅·波良纳，不到莫斯科。但他这个想法也使母亲流泪，受到了她的反对和责难。不知为什么，她坚持要父亲在莫斯科停留一天。

我害怕在莫斯科停留。托尔斯泰在莫斯科郊外契尔特科夫庄园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莫斯科。记者和摄影师简直使父亲不得安宁。在沿途各个车站照相机和电影摄影机的噼啪声又是响个不停。在勃良斯克的火车站有一群人在欢迎我们，一批记者尾随着父亲，极力想听清他的每一句话。警察加强了值勤，一些警官恭恭敬敬地向父亲行礼。

到了织匠街，哥哥谢尔盖同他的妻子在家中迎接了我们。马克拉科夫、杜纳耶夫、戈尔顿维伊则夫等友人也来了。谢尔盖和他的妻子请我们吃饭，用

茶。当谈到电影院时，父亲说：“我们为什么不去看一场电影呢？”我们非常高兴，尤其是我。不过，好象故意和我们作对似的，上映的是一部非常拙劣的片子。我还记得，父亲走出电影院时说：“对于学校教育、对于学习地理和研究各民族的生活，电影是多么强有力的工具啊！可惜……它也象其它一切东西一样，被庸俗化了。”

第二天，我带着父亲签署的遗嘱去找律师穆拉维耶夫。穆拉维耶夫仔细读完遗嘱之后说，这份遗嘱没有任何效力——不能将著作的版权授与所有的人……他答应考虑并拟定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遗嘱。

与此同时，一件我非常担心的事眼看就要发生——有人为父亲举行示威游行。电话铃声不断，问的都是同一个问题：托尔斯泰乘哪趟火车去雅斯纳雅·波良纳？我不作明确的答复，母亲对我很生气，并一一告诉人家火车开车的准确时间。她没有我的那种不安。我回想起哈尔科夫的游行情况，还心有余悸。

第二天，父亲、母亲和我乘坐由两匹马拉的双篷四轮车离开织匠街。

大门附近已经站着为数不多的一群人。一位老军人看见父亲后便脱下帽子，深深地向父亲鞠躬。

我们无法靠近库尔斯克火车站，车站广场被成千上万迎候父亲的人挤得水泄不通。人数可能有好几万。马车停了下来。人们没戴帽子，但见黑压压的人头在晃动。马克拉科夫在那里等候父亲，我们一起向车站大门走去，但无法通行……大学生们组成一条保护线，但被人群冲开了。在车站门口，我们被挤得喘不过气。我极力挡住父亲，但我觉得我的肩膀虽宽，也难以顶住人群的冲击。马克拉科夫和一个身材魁梧的宪兵在费劲地制止群众。进月台时出现了同样可怕的情景，我们被挤进门里。人们在挤压，有一阵子看来我们要被压扁了，不过人群挤呀挤呀，倒把我们拥进了月台。电线杆上，车厢顶上全是人。

我们好容易把父亲领到车厢里，他面色苍白，下颌颤抖。火车开动了，人群跟在后面喊着，挥舞着手帕。父亲站在窗前不住地点头致意。^⑦

契尔特科夫陪送我们到谢尔普霍夫。父亲躺下休息，但我们很快发现，他睡着睡着便昏厥过去。他面无血色，脉搏微弱。我们想，他不行了。

四轮轻便马车已在车站上等候我们。大家挽着父亲的手臂把他扶上车……但到了家，他还是不省人事，坐在安乐椅上口中说些含混不清的话。我和杜尚劝他躺下，但他要我们别打搅他。

“略沃奇卡!”妈妈又来纠缠他,“略沃奇卡!钥匙在什么地方?”

“真不明白……你要钥匙做什么?”

“钥匙,箱子的钥匙,手稿在哪儿?”

“妈妈,请你做做好事,别这样,请不要逼他费神回忆!”

“可我需要钥匙,”她激动地说:“他快死了,而人家还要陆续拿走手稿……”

“没有谁会拿走的,你别那样,我求求你!”

我和杜尚继续给他脱衣,几乎把他抱上了床。我们把他的头放下,搁上热水袋,杜尚给他打了针。

直到深夜他才清醒过来。

※ ※ ※

1909年11月,父亲在穆拉维耶夫为他写的一份遗嘱上签了字。

起初,父亲想把全部著作的版权留给谢辽沙、塔妮娅和我三个对他最亲近的人,好让我们日后把这种权利转交给公众。然而,有一天早晨当我来到他的书房时,他突然说:“萨莎,我决定在遗嘱中指定把版权留给你一个人。”说罢,用探询的目光看了我一眼。

我沉默不语。我深感责任重大,还想到家庭的非

难，哥哥姐姐的抱怨，与此同时我内心也为父亲以如此重大的事情委托我而感到骄傲和幸福。

“你怎么不作声？”父亲说。

我向他讲了自己的疑虑。

“不，我就这样决定了，”父亲断然地说，“你现在是我身边唯一的一个人，我将此事委托给你便是非常自然的了。如果你离开人世”，父亲说着温柔地笑了起来，“版权便转给塔妮娅。”

7月22日，在离家数俄里的林子里签署了这份遗嘱。父亲坐在小木墩上，将遗嘱从头至尾亲手抄了一遍。当时在场的人有拉登斯基、阿廖沙的儿子、谢尔盖因柯科和戈尔顿维伊则尔，他们亲眼看见父亲签字。

父亲走这一步不容易，他把这个决定瞒着家人也不容易。但他决心纠正想在他去世后卖他的著作的罪孽——按他的话说。

有一次，他正要躺下睡觉，我在隔壁的书房里，他隔着闭上的门喊我：

“萨莎！”

“爸爸，我在这儿。”

“我想谈谈遗嘱的事……如果将来我著作的第一版还能剩下点钱，最好从你妈妈和哥哥手中将雅

斯纳雅·波良纳买下来分给农民……”

“好的，爸爸。”

此后他再没和我谈起这件事。*

- ① 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四卷，第 190 页。
- ② 穆拉托夫：《书信往来中的托尔斯泰和契尔特科夫》，第 387 页。
- ③ 《全集》，第五十八卷，第 586 页。
- ④ 古谢夫：《托尔斯泰生活与创作年谱》，第 746 页。
- ⑤ 穆拉托夫：《书信往来中的托尔斯泰和契尔特科夫》，第 388 页。
- ⑥ 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四卷，第 192—193 页。

*（原注）我实现了父亲的遗愿。和托尔斯泰家族有关联的雅斯纳雅·波良纳、格鲁蒙特、格列卓夫卡和杰里亚坚基等四个村社的农民共获得了将近一千俄亩土地。

第六十六章

离 别

塔妮娅和小塔尼奇卡住在雅斯纳雅·波良纳。我母亲平静了下来。她很宠爱自己的外孙女，整天都在为她操劳——小女孩鼻子有点翘，挺逗人，很聪明。1月底，契尔特科夫派来一个新秘书代替古谢夫。新秘书是个大学生，名叫布尔加科夫，父亲以前就教育问题和他通过信。这是个活泼、乐观、有点自负的青年人。

父亲和人们探讨他感兴趣的问题的书信往还一直没有中断。早在1909年9月底，父亲就收到年轻的印度“圣雄”——甘地从伦敦寄来的一封信。甘地向父亲谈到了在南非实施的《黑法律》，这种法律是专

门对付印度人的，把印度人当成奴隶。

“我和我的一些朋友早就坚信不以暴力抵抗邪恶的学说，”甘地写道，“我们现在还坚持这一信念。此外，我有幸研究了您的著作，这些著作给予我的人生观以深刻的影响。英属印度人听了我们讲解的事实真相以后，同意不服从这种法律，他们宁愿坐牢或承受由于破坏法律而可能遭到的其他惩罚。结果，有几乎一半印度居民由于无法忍受斗争的紧张和监狱的痛苦宁可迁离脱兰士瓦*，也不肯屈从这种被他们认为是侮辱人的法律。另一半的将近二千五百人凭着自己的良心甘愿去坐牢，其中有的人坐牢达五次之多。坐牢的时间从四天到六个月不等，在大多数情况下要服苦役。许多印度人物质生活极度贫困。目前在脱兰士瓦监狱有近百名这样的消极抵抗主义者……”^①

在信的末尾，甘地请父亲把关于“不以暴力抵抗邪恶”的那封“致一个印度人的信”寄给他。甘地的朋友决定将此信在印度散发两万份。

“愿上帝保佑我们那些居住于脱兰士瓦的亲爱的朋友和兄弟，”父亲给甘地的信中写道。“以温和反对残暴，以和睦相爱反对骄横暴戾的斗争在我们这

* 南非联邦的一个省。

里也同样日益开展起来了，特别是在宗教教义和尘世法律冲突得最为厉害的一个方面——在服兵役这个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拒绝服役的事件越来越经常发生”。^②

过了不久，甘地给父亲寄来他写的《Indian Home Rule》（《印度国内法》）一书。父亲在4月22日给契尔特科夫的信中写道：

“今日和昨晚我读了 Gandhi 寄来并附有一封信的书，Gandhi 是一位思想家及用 Passive Resistance（消极反抗）来反对英国统治的斗士。他对我们和我说的是非常亲切的。他读过我的作品，将我致印度人那封信译成印地文，他那本用印地文写的《Indian Home Rule》遭到英国政府的查禁。他请我谈谈我对那本书的意见，我想详细地给他写一写。”^③

马科维茨基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举了父亲对甘地的看法：“甘地是《Indian Home Rule》一书的作者。他是一个反对英国的政党的领袖。他在监狱里呆过。早先我得到过一本关于他的书。这本书极为有趣。它从一个信奉宗教的印度人的观点来对整个欧洲文明进行了深刻的谴责。书中谈到甘地如何来到伦敦，开始吃肉，学习跳舞，并顺从于文明社会，后来，南非的战争开始了。书中还谈到他鄙视白人对有

色人的态度。此外，甘地还宣传最有效的抵抗就是消极抵抗。

各种各样的人来拜访父亲，什么样的人都有。

有日本人，有欧洲和美国的新闻记者，有农民，有黑帮上校，有神经病患者，有天真地指望父亲赞成其枪杀革命者的特务，还有许多其他的人物。

这年冬天，马萨里克又来拜访父亲，他跟父亲多次讨论宗教问题。父亲在日记中提到：“马萨里克到底是个教授，他相信每人有个上帝和个人的永生。”^⑤

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也来过。他是位受人宠爱并赫赫有名的作家。也许，在莫斯科的文学艺术界以及上演他的戏的艺术剧院的活动家们中间见过他的人，看到他在雅斯纳雅·波良纳的样子会感到奇怪。当他和父亲交谈时，他平日那种自以为是和刚愎自用的态度全然消失了。他显得胆怯、腼腆，一双大而漂亮的眼睛流露出尊敬和关注的神情。虽然他对父亲关切的问题实际上并不感兴趣，但却很快被父亲吸引住了。他寻找话题，他是那么拘谨、胆小，这使他博得了父亲的好感。父亲喜欢安德列耶夫，不过很快就觉得他“对待生活缺乏严肃的态度”，对这些问题（即人的精神生活和宗教的问题）看法肤

浅。”^⑥

元月，塔妮娅丈夫的前妻的儿子多里克·苏霍京得了麻疹，小塔尼奇卡和我先后都染上了，小孩得病容易好，我的麻疹却转成了严重的肺炎。

我病情很重——呼吸困难，胸部和腰部酸痛，发高烧。体温一直降不下来，我连咳嗽和翻身的力气都没有了。瓦丽娅日夜看护我。

父亲有时单独陪着我，给我递水，帮我把枕头弄好，每当我清醒时便在昏暗中看见父亲那年老驼背的身影。“爸爸！”他应声走过来。“要喝水！”老人的手总是在颤抖，水洒到地上，我吻着他的手说：“谢谢”。他呜咽着，拿我的手贴到嘴边。我的手沾满了泪水。“爸爸，你哭什么？我不是挺好吗！”但他抑制不住哭了起来，大声擤着鼻涕向房间的黑暗处走去……我弄不明白他这是怎么回事。

“2月16日。萨莎不见好转，我勉强支持着。”他在日记中写道。

“2月16日。萨莎叫人怜悯，也使人不安。我为疼爱她而感到高兴，也为疼得太过分而自责。我写着写着，连自己也觉得可怕。好吧，随上帝安排吧！”^⑦

3月初，我病愈了，在原来古谢夫的座位上，现

在坐着快快活活的布尔加科夫。他不象古谢夫那么严肃，但却比他自负。

他负责回答那些内容丰富的来信，帮助父亲编辑《生活之路》的小册子。这套小丛书在父亲的坚持下已经不是被父亲称为“可怕的”瑟京所出版，而是由“可爱的”伊万·伊万诺维奇·戈尔布诺夫出版。在这套小丛书中集中了人类精神原则的精华。父亲在日记中写道：“上帝——万物精神的源泉；上帝的概念，乃是极其伟大和必不可少的概念，如果不是世界上伟大的圣贤共同作出努力逐渐发现了它，我们自己是永远体察不到的。”父亲在日记中写道，“这是人类迈出的巨大的一步，而我们却以为只要有了镭、飞机和电力，没有这种概念也可以过下去。当然可以，不过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动物，就象我们现在生活在拥有三十层高楼的纽约、伦敦和巴黎一样。”^⑧

为了证实这个思想，引用父亲写下的这样一段话是很有意思的，他谈到了文明腐蚀了印度人、中国人和黑人等等民族。他问道：“造机器做什么用？发明电报、电话要传递什么？创办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机关，要传授和研究什么？开会讨论什么？出版书报传播什么？铺设铁路运送什么人，将他们运往何

处？听命于一个权力而聚集在一起的千百万人干的是什么呢？医院、医生、药房是为了延续人的生命，而延续生命又是为了什么？

“千百万人遭受精神和肉体的痛苦，仅仅是为了使夺得权力的人不受阻碍地腐化堕落。为此便产生了宗教的谎言和科学的谎言，用麻醉和灌输的方法使人麻木，如果还不凑效——则采用赤裸裸的暴力、监狱和死刑。”^⑨

除了《生活之路》，父亲还想为住在杰里亚坚基的契尔特科夫家中的青年写一个短剧，名为《一切罪恶的根源》。我病愈之后便着手做日常的事情。不过体力不支，咳嗽很厉害，夜里盗汗，身体很虚弱。这样的虚弱我以往是不曾经历过的，我竭力去克服它，但毫无结果……

3月21日，父亲在日记中写道：“现在是九点多钟，我感觉好些。萨莎又病了，但样子还好。我心情很不错，思想清晰，很想把这种思想表达出来，但表达不出——这样也好。我觉得塔妮娅非常亲切可爱。”^⑩

生病可以亲近父亲，所以我乐意生病，但是，痰里发现了结核杆菌时，我又觉得非常可怕了。医生确诊两叶肺的上端都有结核病，并且要我立刻避开雅

斯纳雅·波良纳潮湿的春天到克里米亚去。要离开父亲了。是长期吗？我不在他身边，万一他病了呢？他还能活多长时间？也许就只有几个月……我却要错过这段时间远离他，假如我不去，不遵照医生的嘱咐又将如何呢？如果我往后还这样虚弱，象半个残废，无力帮助他，又将如何呢？

离别给我和父亲都带来很大的痛苦。

“很难过，”父亲在日记中写道，“而我却不知怎么办好。萨莎走了。我爱她，我需要她，她也需要我——并非事务上的需要，而是内心的需要。戈里顿维伊则尔一家来送她。戈里顿维伊则尔在弹琴，我由于脆弱而闷闷不乐（哭了）。”“傍晚，我理了理自己关于生活的想法。现在是十二点，我躺下睡觉。心情很不好。当心啊，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要坚持住。”^①

我们约好每天互相写信，父亲每天临睡前总要给我写信。下面让我摘引他的一些信。

1910年4月15日：

“亲爱的好萨莎，我想给你写信，但不知写什么好。我知道你最想了解我的情况，可我讨厌写自己。你是我的宝贝，我特别疼爱你，为此感到是一种过失——这些似乎也不该写。不过我还是要写，因为我现

在就是这样想的。”

“近日来，特别是你离开的那一天，我的精神状态倒是一直在跟肉体上的肝火旺盛作斗争。这种情绪有好处，好就好在促使干了许多工作。坏处是妨碍清晰地思考和表达自己的思想，这种情况我已习惯了。最近只有今天我才觉得好些，但除了写信没有做别的事。我给萧伯纳写了，还写了封谈和平协会的信，但给某些人的信我还没有写。戈尔布诺夫忙于丛书出版事宜。丛书已排版，这使我高兴。今天萨拉马欣来了，现在还在这里，他对宗教非常虔诚，这也使我高兴。为什么人要生下来，有的还在孩提时就死去？为什么有的人学问渊博却穷困潦倒，另一些人生活奢侈却毫无教养，还有许许多多表面的不平等现象——这一切我都能解释。但是，为什么有的人，比如萨拉马欣，满怀激情，也就是说宗教指导了他的整个生活，而有的人却犹如一把勺子，泡在食物里头却不知道食物的滋味？

“昨天和布尔加科夫、今天和杜尚骑马出去遛了一趟，代利尔很温顺。天气好极了。莲卡的紫罗兰就在我跟前，香气扑鼻。你们那儿怎样？有人写信说，那里很冷。希望你或瓦丽娅每天都给我写信。

“有些事——你知道什么事？——我早就不想

去做了，而现在却很想在《世上无罪人》的标题下将我们这疯狂的生活体现在形象之中。很想写，但还没动手。我担心，这只不过一个虚幻的欲望而已。的确，每天上午这种想法都在引诱着我，真想试一试。不过，这并不十分重要。再见。我们刚用完饭。在杜尚的房间里有一个过路人在等着我，想和我谈一谈。我去见他。亲你，顺便也亲瓦丽娅。

列夫。”

1910年4月21日。

“今天收到瓦丽娅的一封关于你的不详的信。亲爱的，不要气馁，只要你感觉得好。那一切都会好的，你知道而且也能够好起来，你希望而且也善于使自己好起来。常给我写信。别相信医生的话。要多注意卫生……”

“有时我很难过，原因你知道，但我尽量不变得那么忧郁。在你房间旁边走过我就心酸。今天是星期二，已是深夜十一点多，我要躺下睡觉了。明天等你的信。问瓦丽娅好。我疼你，也许过分了。

列·托”

杜尚总是那样令人高兴。”

1910年4月22日

“我亲爱的好女儿，今天收到了你的信。我掉泪

了，不是由于害怕，也不是由于对你或对我自己的怜悯，而是因为你想得真不错，我深受感动。管它出现什么情况吧，不过一切迹象表明是向好的方面转化，一切都会顺利的。请你多写信，不必考虑我，你就象写日记那样，谈自己的感受和思想，主要是谈有些什么思想感情，不然就谈谈人，谈谈饭菜，总之，碰到什么就写什么，怎么写都行。我对你的文学水平要求最为随便。当你心绪不好的时候，你就想怎样能尽量生活得好，也就是说怎样能在言行和思想上充满着爱，爱所有的人，一切听其自然，一切都会很好的。

“我们这里客人不断。今天戈里顿维伊则尔一家来了，明天西博尔要来。我身体很好。我想写很多东西，但事情很多，使我惘然不知所措。我平安无事，谢天谢地！我本来就喜欢瓦丽娅，因为她爱你我就更喜欢她。再见吧，我的宝贝。

列·托”

1910年4月23日

“亲爱的萨莎，今天收到你给妈妈的信。请你和瓦丽娅每天都写封简短的信，报告你的健康状况，如：体温是否正常，咳不咳嗽等等。如果你觉得没意思就别写。奥利娅写信向你如实谈到我们的情况，谈到了音乐。我们这里一切都好。我不骑马了，把代利

尔放回了马群。我散步时带上你那几只狗，我心神很好。你要想办法让自己精神好，我亲爱的好女儿，你能做到这点。谢谢瓦丽娅。

列·托”

1910年4月24日

“亲爱的萨莎，我觉得你那么亲，所以无法不每天给你写信。我们这里没有什么特别的新鲜事。昨天欣赏了美妙的音乐，这种音乐我总是强烈地感受着，我总是责备自己不该有这么多奢侈的享受。今天我觉得身体不适，这种情况经常短暂地发生，就是精神不振，肚子胀疼，食欲不佳。现在已是深夜十一点多，我在写好的一些信上署了名，就躺下睡觉。还要给媒介出版社拟封电报，它成立二十五周年了。”

1910年4月25日

“今天没接到你的信，不过我还是给你写信，我亲爱的好萨莎。昨天我感觉四肢无力，但今天好了，主要是心情非常好。我多么希望你也能象我这个八十二岁的人一样心情愉快——这种心情完全不依赖于我的身体和我周围的事物，虽然这种希望对二十五岁的你来说是不现实的。这两天我几乎不能工作，脑子里没有好的想法，但心里高兴，安宁，舒坦。尽管对你一个人说出来很难为情——今天没收到你的

信——但我还是照说不误。我已经习惯晚上躺下睡觉前记日记并给你写信。今天接到契尔特科夫的信，他希望人家允许他到苏霍京那里，这很合我的心意。虽然我们不会很快见面，但终究是要见面的。亲你。向瓦丽娅问候。

列·托。

“注意，要尽可能常来信让我们了解你的情况，并尽可能写得真实些，详细些。我盼望你一切都好，不管看来多么奇怪，我主要是盼望你在精神上一切都好，在我们、在你力所能及的范围一切都好。而肉体上是不可能有什么好坏之分的。亲你。感谢瓦丽娅对你的照顾。

列·托。”

未注明日期的一封信。

“我亲爱的好萨莎，我给你写了信了，哪怕三言两语也好。

“今天是星期，五现在已是深夜十一点多。我准备睡觉了。心情不好。不过，除了你的病情和你不在这里以外，其他一切都非常好，连火气最大的人也不会不高兴。布尔加科夫是一位得力和热忱的助手，所以我很容易和他相处，而且每天来访者不断，还收到尽管不相识，但却非常亲切的人们的大量来信，这怎

能使人不高兴？你生活得怎么样，我很希望你在那里也能修身养性，这比什么都重要。尽管你还年轻，但是也能够并应该进行自我修养。

“刚才小季马* 来过。老季马** 在谢尔普霍夫郊外租了一栋别墅。我希望能到他那儿看一看。塔妮娅总是那么讨人喜爱。吻你，向瓦丽娅问好。

列·托。”

1910年5月2日

“亲爱的萨莎，我在科切特给你写信，现在是2号晚上。我是和杜尚、布尔加科夫一起到这里来的。天气好极了，苏霍京一家讨人喜欢，一切都那么愉快。连想起你也不觉得难过，但……可怕。我正写得痛快，突然得到你的坏消息。你妈妈因为我没有延迟一天启程而有点不满意，但总算心平气和地把我放走了。如果没有什么事情耽误她的话，她将于后天——4号来。我由于许许多多的原因想离开雅斯纳雅·波良纳，我为此感到内疚，成天忙忙碌碌，来访者络绎不绝，还有许多其他原因。今天正好又来了位客人，我真舍不得他这么快就离去。我只和他谈了一刻钟。这人是什尼亚金。开始他拒绝服监狱苦役，后来

* 小季马即契尔特科夫的儿子。

** 老季马即契尔特科夫本人。

不得不服了四年，是自觉自愿的。他很安静，坚定，乐观，是个刚毅沉着，热爱劳动的人。他没有废话，说的都是些重要的、必需的、善良的话。他总是满脸笑容。在路上，我不高兴人家看着我，但在这里，人家看着我，我心里却很痛快。我在等契尔特科夫。大塔妮娅和小塔妮娅很讨人喜爱，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也很叫人喜欢，再好也没有了！糟糕的是，你给我寄信和我给你寄信要经过更长的路程，Rasion de plus（有更多的理由）要更加经常写信，我就这么做，……”

1910年5月7日

“亲爱的萨莎，昨天我身体不适，浑身没劲儿，因此没有给你写信。昨天终于接到你的两封信，今天又接到一封，谢谢。今天我感觉好些，并且非常高兴：契尔特科夫来了，要在这里待一个星期，你妈妈本来打算星期五来，因为天气不好延期了。你的消息很好，不过，担心你听信医生和亲爱的瓦丽娅的劝说。亲爱的，要提防上当。遗憾的是，你不得不吃肉了。和契尔特科夫在一起很愉快。多么好的一位朋友。唯一的缺点——和你的一样，就是你们都过于爱我。我不能为此责怪你，因为我自己也有同样的毛病。

列·托。”^⑫

父亲在塔妮娅那里作客，在那儿他心情非常舒畅，我为此感到幸福。然而，5月20日父亲同塔妮娅及契尔特科夫一起回到了雅斯纳雅·波良纳，于是不愉快的事又开始出现了。村妇们埋怨说，那位契尔克斯人使她们不得安宁；又来了许许多多父亲难于拒绝接见的客人；每天晚上还聚集了一堆人，盯住父亲的嘴巴，听他吐出预言。

“预言真难讲呵！”父亲在日记中写道，“不停地讲呀讲呀，真难受……但又不得不讲。”

与此同时，我在克里米亚逗留的时间快结束了。我们的朋友阿利特舒列尔大夫曾在克里米亚给父亲治过病，现在又在给我治疗，我恳求他放我回家。体温正常了，体力正在逐渐恢复，只是还稍有点咳嗽。

我终于又跑进父亲的书房了，我们俩都高兴得又哭又笑。

我给父亲带来了一件礼物：我住院疗养期间瓦丽娅教会我速记，我已经能一分钟记八十五个词。

唯一使我难堪的是我不得不把头发剪掉，因为麻疹过后头发一团团地脱落，而父亲是不喜欢剃光头的女人的。他用手抚摸着我那山羊毛似的发黑的卷发，说：“不管是剪光还是剃光，我都无所谓，我高兴极了。”

-
- ① 《文学遗产》，第三十七——三十八卷，第 342 页。
 - ② 同上，第 343 页。
 - ③ 同上，第 346 页。
 - ④ 马卡维茨基：《雅斯纳雅·波良纳笔记》。
 - ⑤ 《全集》，第五十八卷，第 31 页
 - ⑥ 同上，第 41 页。
 - ⑦ 同上，第 18 页。
 - ⑧ 同上，第 27 页。
 - ⑨ 同上，第 48 页。
 - ⑩ 同上，第 28 页。
 - ⑪ 同上，第 38 页。
 - ⑫ 《列·尼·托尔斯泰致亚·里·托尔斯泰娅的信》（手稿）。

第六十七章

极 乐 境 界

“当我们来到波尔齐翁科洛时，”弗兰西斯克说道，“我们又脏又饿，衣衫褴褛，冻得发僵，我们请求放我们过去，但守门人会对我们说：‘你们这些流浪汉，到处游逛，诱惑别人，偷窃穷人要来的施舍，快滚开！’他不给我们开门。倘若那时我们不见怪，怀着谦恭和仁爱之心思忖，守门人是对的，上帝本身就教导他这样对待我们，我们本当对守门人毫无怨言，又湿又冷、饥肠辘辘地在雪地里和冰水中等待到天明。这样，列夫兄弟，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极乐境界。”

《弗兰西斯克·阿西斯基的一生》^①

家里还是那样使人难受。

那个契尔克斯人不断抓住路过“伯爵”领地的村妇和农民，他斗殴，逮住父亲过去的学生普罗科菲老

头，此人正好从“伯爵的”林子里扛方木出来。他用马鞭子把普罗科菲老头捆住，拖回庄园。父亲碰到了这个场面。

田产经营得不怎么样，老亏本，管家们手脚不干净。这一切都叫父亲忧郁。他身体日见衰弱，又晕倒过一次。

“如果不关心父亲的精神生活，那又何必为吃穿等物质条件操心，”姐姐塔妮娅给妈妈写信。塔妮娅劝母亲放弃没有任何收入的田产。^②

谢尔盖的妻子玛莎劝母亲把雅斯纳雅·波良纳的管理权全部交给儿子，自己摆脱一切事务的纠缠，并劝父亲、母亲和我一起移居到克里米亚。

有一次，当我拿着手稿从父亲的书房出来时，父亲叫住了我。

“萨莎！”

“什么事，爸爸？”

“我想跟你说件事，只是你不要生气……”父亲深深地叹了口气，“我要死了……”

“……哦，天哪！”

当父亲打算到莫斯科找契尔特科夫，到他一家现在居住的莫斯科省的梅谢尔庄园时，我感到很满意。杜尚、伊利亚·瓦西利耶维奇和我同父亲一道

去。

和往常一样，父亲到了一个新环境马上就活跃、高兴起来，又动笔写作了。他起草了一篇名为《无意中》的故事。

 编者在编造，
 箱子搁屋角，
 编者没瞧见，
 碰上摔一跤。^③

父亲一面高兴地挥舞着手稿，一面朗诵着，然后把故事交给我誊写。

他对一切都感兴趣。莫斯科省梅谢尔庄园周围那些设备完善的地方自治学校和医院，以及那些设备优良的精神病院使他深为惊讶。他不止一次访问医院，和病人、医生交谈。显然，精神失常的问题使他感到不安。在日记以及在一篇题为《关于精神错乱》的文章里，他试图寻找对精神病的答案。

“精神病总是由不理智，因而也是不道德的生活造成的。”他在日记中写道，“这种说法看来是对的，不过还须检验和思考。”他接着写道：“疯子总是比健康人更易于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是因为疯子没有任何精神上的障碍：羞耻、是非观念、良心乃至惧怕对他们都是不存在的。”^④

我们的平静生活很快受到了破坏。我接到瓦丽娅的电报：“神经功能严重失常，失眠，哭泣，脉搏一百次，她要你们来电。瓦丽娅。”接到第二封电报后父亲决定返回雅斯纳雅·波良纳。

我们见到母亲时，她正处于神经紊乱之中，其可怕的程度难以形容。她指责别人，大喊大哭，指桑骂槐，威胁说要自杀。大家都没睡。我想进父亲的卧室给他解解烦，但他轻声对我说：“你走开。”

这种情景日以继夜地持续着……契尔特科夫的母亲叶莉扎韦塔·伊万诺夫娜到儿子处作客，因此，契尔特科夫被允许住在杰里亚坚基，这件事使母亲的病情更为恶化。

我们回来的第二天，母亲的神经继续处于紊乱之中。她大喊大叫：“谁在那里？谁在那里？”从客厅出来往楼下跑，就象后面有人追赶她似的。要不是父亲，我会继续做我的事。“她到哪儿去？到哪儿去？”父亲用束手无策的声音喊道。我和杜尚在她后面赶，在贮藏室的石板地上找到她，她躺在那里。她拿着一小玻璃瓶鸦片在嘴唇边来回移动，一面说：“只要一小口，只要一小口……”

母亲要父亲把所有的日记交给她，要他不再和契尔特科夫见面。父亲的日记里有两句话：“索尼娅

又激动起来，歇斯底里又发作了，我决定用爱来同她斗争。”看了这话，她又横加指责。

由于身体虚弱，由于极度生母亲的气，由于无限怜悯父亲，我生病了。

母亲决定把父亲送到尼科尔斯科耶的谢尔盖哥哥那里，让他离契尔特科夫远一些。父亲勉强同意了。塔妮娅也到了那里。家庭成员之间又开始了磋商……不过实际上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我恳求要么让父母暂时分居，要么让哪一个哥哥或姐姐搬到雅斯纳雅·波良纳来住，但大家对我的恳求不予理睬。

我们一回到家，母亲的歇斯底里又发作了，我惊恐地发现父亲一天比一天变得虚弱……连圣徒杜尚也愤然地说：“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根本不考虑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已经难以支持，心脏已逐渐衰竭……”

只有施米特老太太认为母亲有病和不幸，并真心实意地怜悯她。老太太在精神上支持父亲，她认为父亲命中注定要经受考验，他以教徒的温顺忍受这种考验，是应该的。

有一次，正当施米特老太太在雅斯纳雅·波良纳的时候，有人从奥夫西亚尼科夫来报告，说她的小木屋和戈尔布诺夫一家夏天住过的那间房子被烧毁

了。所有东西都化为灰烬，包括多年来她誊写过的父亲的手稿，父亲的一些画像、父亲给她的亲笔信。歪脚爪的小狗沙沃奇卡也烧死了，这只狗是她在严寒的一天捡回来的，当时狗的四肢都冻僵了。

玛丽娅·亚历山大罗夫娜伤心地哭了，但她忍受了这不幸，把它看作是命中注定的，她一次也没有责怪过那被怀疑是纵火者的疯疯颠颠的青年人。塔妮娅马上吩咐给施米特老太太盖一所新木房，并且用她的话说，给老太太买一套“新嫁妆”。不过，谁也无法弥补她的损失。“天哪，天哪！”她不断喃喃地说。“我的沙沃奇卡……亲爱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信……手稿全都烧掉了……”

父亲有时候来看我。他躺在沙发上，我继续打字，我们俩都默不作声。“我们不说话也能互相了解，”父亲说，“如果我们说话，那是多余的。”

哥哥列夫来了，不过遗憾的是，他并没有给家里带来安宁。

7月11日父亲在日记中写道：

“勉强活着。可怕的夜晚，直到四点还不能入眠。而最为可怕的是列夫·里沃维奇，他象骂小孩那样骂我，并命令我到花园找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我看到列夫就无法安静。我心情还很不好。可怜

的索尼娅倒平静下来了。病情很沉重。主啊！帮助我，让我以仁爱之心忍受……”^⑤

晚上，在哥哥列夫责骂父亲不怜惜母亲之后，父亲对我说：“我甚至觉得他把我叫作坏蛋。”父亲的眼里噙满了泪水。他让我把笔记本中的如下想法记到日记本里：“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当别人打你左脸时，你把右脸让他打，打人者会醒悟过来，不再打，并明白你这样做的意思。不，与此相反，他会觉得并且会说：‘我打了他，这就好。从他忍气吞声挨打可以看出，他意识到自己错了，意识到我比他强。’但我知道，尽管如此，当别人打你左脸时，对我和对所有的人来说，最好的办法是伸出右脸让他打。‘极乐’便在于斯。只要你照此去做。这时，即便看起来是痛苦的东西，你只应该表示感谢。”^⑥

每当哥哥姐姐来时，父亲就要好受一些，于是，我再次把塔妮娅叫来。我和她谈了许多。

“父亲现在所做的，是为了爱而舍己的行为，这种行为胜于他全部三十卷著作。”塔妮娅说，“即使他为忍受正在忍受的一切，为做正在做的一切而死去，我要说他也不会作另外的选择。”当我把塔妮娅说的这些话告诉父亲时，他说：“塔尼奇卡真聪明！”便失声哭了。

有一天晚上，父亲坐在一张大的靠椅上。当我从旁边走过时，他笑了笑，并轻声说了些什么。我没听清，便问道：“爸爸，你怎么啦？”“我的姑娘都是好样的。他喃喃地说^⑦。

不过连塔妮娅的到来也不再起作用了。母亲提出了坚决的要求：要么父亲从契尔特科夫那里要回日记本，要么她就继续折磨别人和自己，继续“生病”。

她带着这些要求又每天晚上来到父亲跟前……他样子疲惫、憔悴、两腮塌陷，在深凹的双眼里流露出痛苦的神情，看来，他只是勉强支撑着。他整夜没合眼，黎明前给母亲写了封信：

“一、现在写的日记我谁也不给，自己掌握。

“二、过去写的日记我将从契尔特科夫那里取回，并将自己保存，也许存放在银行里。

“三、如果你担心在我的日记中有些地方因一时的印象而记下了我们之间的分歧和冲突，担心这些地方将来可能会被对你不怀好意的传记家所利用，那我要说，其实在我和你的日记中，这类由于一时感情冲动而留下的记述根本不可能提供对我们现时关系的真实了解。不过，如果你对此担心，我将乐意利用适当机会在日记中或者用书信的形式，表明我对

你的态度和我对你生活的评价。我对你的态度和我对你的评价是这样的：尽管有过各种促使关系冷淡的原因，我仍然象年轻时一样爱你。我们停止了夫妻生活，这只能揭去真正爱情的伪装，这一点我就不谈了；使我们关系冷淡的原因是，第一，我对尘世生活越来越失去兴趣，越来越感到厌烦，而你不愿意，也不能抛弃这一切，因为你内心没有使我产生这些信念的基础。这是很自然的，我不为此怪罪于你。

“……如果我说的使你感到不愉快，那就请你原谅。不过，我们之间现在发生的事极其重要，所以必须不惧怕讲出全部事实，听完全部事实。第二，近年来你的性格变得越来越易于激动，越来越霸道和放肆。你性格的这些表现虽然不能使感情本身变得冷淡，但却使感情的表达变得冷酷。这是其二。

“第三，主要的原因是命运注定的，你我同样都无罪，这就是我们对生活的意义和目的的认识完全不同。在对我们生活的认识方面，一切都是直接对立的：包括生活方式，对人、对生活资料和对私有财产的态度。我认为私有财产是万恶之源，而你却认为是生活的必需条件。我为了不离弃你，在生活方式上只好屈从对我说来是非常难以忍受的生活条件，你却把这当作我对你的观点的让步，于是我们之间的争

执便愈演愈烈。还有另外一些使我们关系疏远的原因，这里面我们两人都有责任，不过我不想谈它们，因为这于事无补。重要的是，尽管过去存在一切争吵，我仍然爱你，珍惜你。我对你和我共同生活作如下的评价：

“我是一个放荡的、在性生活方面非常堕落的人，我娶你这个纯洁、美丽、聪慧的十八岁姑娘时已经不年轻了。尽管我的过去肮脏，堕落，但几乎五十年来你爱我，和我在一起过着操劳、艰苦的生活，生育抚养子女。你没有被某些诱惑所俘虏，这些诱惑本可轻而易举地征服任何一个象你那样健壮、美丽的女人，但你所度过的生活却是我无可指责的。我精神上发生了独特的演变，你不跟随我，我也不能指责你，我不指责你是因为每个人的精神生活是这个人于上帝之间的秘密，别人对他不该有任何要求。因此，如果我要求于你，我就错了，就是我的过失。

“这就是我对你的态度，我对你的评价的忠实记述。至于日记中可能出现的東西，我只知道，那里不可能找到任何刻薄的、与我现在所写的相违背的东西。这就是我要说的关于在日记中有的地方可能使你不安，但你不该为之感到不安的第三点。

“第四，假如现时我和契尔特科夫的关系使你感

到难过，那么我准备不和他见面。我知道，这对他来说是多么难过。我要讲，这样做会使我不愉快，但主要是使他不愉快，不过，如果你需要我这样做，我就照办。

“现在讲第五点，如果你不接受我这些为建立良好安宁生活所必需的条件，那我就收回我不离开你的诺言。我要离开这儿，但肯定不到契尔特科夫那里去，我甚至于把契尔特科夫不来住在我身旁作为一个既定的条件，不过我必定要离开，因为无法再这样生活下去。如果我能安然地忍受你造成的痛苦，我本可继续这样生活下去，但我不能。

“昨天你离开时很激动，很痛苦。我想睡，我躺下了，但这时我与其说想到你，不如说感觉到你，于是我没睡，我在静心地听，一直到一点，两点，睡醒又听，甚至在睡梦中，或在朦胧中我都看见你。

“我亲爱的索妮娅，请你心平气和地想一想，请你扪心自问，你就会正确地决定一切。至于我，我要说，我已作出决定，我别无选择。亲爱的，不要继续折磨自己了，你折磨的不是别人，因为你远比别人痛苦。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列夫·托尔斯泰[®]

七月十四日晨。”

塔妮娅和她的丈夫努力促成将日记从契尔特科夫那里收回并存放到银行里。但母亲并未镇静下来。我们决定和医生商量，于是请来了著名的精神病学家罗索利莫以及我们的朋友尼基京大夫。

“应该医治的不是母亲，”对此，哥哥列夫说道，“而是父亲，他昏聩了。”7月20日，父亲在日记中写道：

“对于列夫，我内心不断进行着斗争：是原谅他，还是反唇相讥。我越来越清晰地听到主张以和善相待的声音。要象弗兰西斯克那样，承认守门人的指责是正当的，从而体会到极乐的滋味。是的，应该如此。”^⑨

然而，医生也无济于事。罗索利莫的诊断母亲是恶化的双重症体质：偏执狂和歇斯底里，偏重于前者——这些字眼我们听起来很费解。接下去怎么办呢？医生嘱咐说，要将父母隔离，母亲进行浴疗，多散步，要服镇静剂……可是，难以做到。母亲断然声称她很健康，医生的任何嘱咐她都不执行。

亲爱的尼基京对这一切了如指掌，很替我们难过。他听了听父亲的心脏，认为它严重扩大和衰竭。

“亚历山德拉·里沃夫娜，我私下告诉你，”他提醒我说，“你还要遇到许多困难。”

怎么办呢？找谁商量呢？找塔妮娅，谢辽沙……但不管怎么说他们是脱离我们生活的，他们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志趣，杜尚呢？他虽然很虔诚，道德品质高尚，但威望不高。玛丽娅·亚历山大罗夫娜呢？她崇拜父亲……父亲决定的一切对她来说都是法律，她不太可能帮助父亲作出决策。契尔特科夫呢？我和他商量过……但他和我一样，无法消除对母亲的恶感。

父亲坐在“纵树林”中用桦木做的小板凳上，从笔记本里撕下一张纸，给契尔特科夫写信：

“亲爱的朋友，我无时不在想念你。谢谢你一直在帮助我更好地经受考验——这考验是我应得的，也是我内心所需要的——尽管这考验对你也同样沉重。请帮助我们俩都坚持住，都不做任何后悔的事。我很高兴，因为了解你的处境，这处境可能比我的还困难。我有把握地说，人们怀恨我是因为我具有善良的东西，敢于揭露他们，不过，碍于我的年纪和地位，他们所有的人——这些人不可胜数——都感到必须对我有所尊重，必须有所约束。我也有把握地说，人们怀恨你是因为你高尚，虔诚，但他们无所顾忌，所以他们不掩饰对你的善良的仇恨，或者以各种莫须有的对你的指责来掩饰这种仇恨。我了解这点并为

你感到痛心。但是，让我们坚持吧。请你帮助我，我也帮助你。我不会自我吹嘘。我无法抑制心中的恶感，但愿它会消失。”^⑩

7月21日，父亲在日记中写道：“我还是那样虚弱，对列夫仍然怀着那种恶感……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又发作了。很难受。不过我既不埋怨，也不怜悯自己……收到塔妮娅一封谈弗兰西斯克的很亲切的信。”^⑪

7月24日：“健康方面，和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的关系方面依然如旧。身体稍微好点，但和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的关系却更坏了。昨晚，她寸步不离我和契尔特科夫，为的是不让我们有机会单独谈话……我毫无办法。我自己就痛苦得难以忍受……”^⑫

两个哥哥安德列和米沙来了，米沙是带着爱人和孩子们来的。丽娜——米沙的爱人——是一个非常漂亮和富有同情心的女人。我和她谈了许多，她要我相信米沙一切都明白，他爱父亲，不过他受到母亲的影响。我和安德列发生过几次冲突，我为父亲而责怪他。然而他们不能理解。

7月27日父亲写道：“一切依然如故。不过象是暴风雨前的沉寂。安德列来问有没有遗嘱，我告诉他我不愿作答。很难过。我不相信他们只想要钱。这太

可怕了。不过对我倒是好事。我正要躺下睡觉，谢辽沙来了。塔妮娅来信——叫我去。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也邀请我。明天再看吧。”^⑬

得不到父亲的答复，先是安德列，然后是母亲都来折磨我，盘问我父亲是否有遗嘱。我拒绝回答。

正在这时，比留科夫到雅斯纳雅·波良纳来了。父亲向他谈了遗嘱的事。比留科夫的意见是应该把全家召集起来，向他们宣布自己的意愿，然后才立遗嘱。

1910年8月2日，父亲在不对外人公开的日记中写道：“如果愿意，我是非常了解自己的错误的。本该将所有的继承人召集在一起，向他们宣布自己的打算，而不是秘密行事。我写信把这意思告诉了契尔特科夫，他感到很不痛快。”^⑭

契尔特科夫给父亲写了一封长信，提请父亲注意在父亲决定立遗嘱之前发生的所有情况。

“巴维尔·伊万诺维奇（比留科夫）不对，”父亲给契尔特科夫回信时写道，“我同意了他的意见也不对……我完全赞同你的活动，但对自己的活动我仍旧不满意：我觉得我本可以做得更好些，虽然我并不知道该怎么做。现在我并不后悔我已做的事。即写了我写过的那份遗嘱。对你参与此事我只能表示感谢。

今天，我将把这一切告诉塔妮娅，这将使我感到非常愉快。”^⑤

柯罗连科的到来使气氛稍微缓和了一些。大家都聚集在客厅里，柯罗连科整个晚上都在给我们讲他周游俄国和美国的事。大家都听得出神。原来他是个非常善于讲故事的人。当他知道白天我和奥尔迦的孩子到过“陷坑”时，便问起这些“陷坑”。我向他解释说，离雅斯纳雅·波良纳七俄里的地方有一些湖，父亲还记得一位农民老大爷，还是在这位农民在世时便形成了这些陷坑。有一天清早这个农民到了那里一看，树林塌陷了，树木倾倒，树根朝上，在原来是林子的地方出现了一个个圆湖。这样的陷坑有好些个，其中有些深不见底。柯罗连科也讲起了下哥罗德省类似的一个大陷坑，那里的民间传说认为陷坑处原来是一座城市。每年6月21日这一夜，信奉各种宗教的人来到这里，点蜡烛，祈祷，跪着绕湖走。这些分成小群的人都在祷告，有的人笑脸上挂着泪珠，他们仿佛看见了这座已经毁灭了的的城市，听到了钟声。

柯罗连科谈到了沃恰克人，描述了他们的生活习惯。大家还议论了11月9日斯托雷平法。柯罗连科和父亲一样是不赞成这个法律的，因为它破坏农

民“村社”的基本原则。还谈到了亨利·乔治。原来柯罗连科到美国时曾出席了一个会议，亨利·乔治在会上发了言。

上午，我领柯罗连科到契尔特科夫那里。路上我从柯罗连科的言谈中得知，母亲和他讲了自己的不幸，指责了父亲和契尔特科夫。尽管和一个陌生人谈这些事对我来说是痛苦的，但我还是应该将实情告诉他。契尔特科夫也给他讲了一些。

“嗯！我现在更坚信列夫·托尔斯泰是一棵橡树，他能经受一切考验而不被折倒。我原以为他生活在非常幸福的环境里哩！原以为人们怕惊扰他，甚至不敢对他稍有顶撞。我老听说列夫·托尔斯泰容不得别人反驳他，并且害怕发表自己的看法——现在我看到，他是很能宽容人的。”

8月7日，父亲在他不公开的日记中写道：

“和柯罗连科交谈。他是个聪明的好人，但迷信科学太深。”^⑩

回顾过去，我深知，尽管我每时每刻都在父亲身上看到了温顺和宽厚的榜样，但在许多方面我并没有相称地承受落在我身上的重负。

当塔妮娅根据医生要使父亲和母亲分离的嘱咐来带父亲时，母亲声称，她要和我们一起走，我生气

了。“妈妈有病，”父亲对我说，“应该怜悯她，我觉得自己已准备好满足她的一切愿望，不到塔妮娅那儿去，在她有生之年做她的护士。”我不愿听，我说我不感到自己有可能成为护士。说罢便出去了。“何必要医生的嘱咐、家人的磋商和到塔妮娅那里去呢？”我想道，“不会有任何变化，父亲就要被毁了。”……由于我不耐烦而伤了父亲的心，我为此极为难过，于是晚上便来到父亲的书房。他躺在沙发上看书，没发觉谁进来。我走上前，吻了吻他的头，说了声“原谅我”……我们俩都哭了，他一再重复说：“我太高兴了，我太高兴了，我原来很难过。”

8月8日，父亲在不公开的日记中写道：“我起得很早。想法很多，但杂乱无章。算了吧。我祈祷啊祈祷：保佑我吧，上帝！我不能，不能不以愉快的心情盼望和迎候死神的降临。与契尔特科夫隔离越来越令人感到可耻。我显然有过错……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依然如故。她希望契尔特科夫走。她直到早晨七点还没睡。”^①

结果是我们都到苏霍京家去了，他们住在科切特。

我喜欢科切特这个地方。占地很多的一栋平房，古色古香的家具，墙上挂满祖先的画像。房屋的周围

是一座绿树成荫的古老花园。花园占地一百俄亩，父亲曾经不止一次地迷了路。花园里有果树，有一些水塘，花园后面是一片经过机器耕作的很好的黑土田地，几处小树林，牧场，还养着西明塔尔种牛和善跑的母马。苏霍京被认为是一名好当家人。

在科切特，气氛轻松多了。午饭后，大家玩各种游戏。塔妮娅的公公、婆婆也笑了。塔尼奇卡以及和她同岁的列夫·苏霍京的小儿子令人发笑地跳着、唱着。大家的心情都很愉快，很安宁。母亲为小孩感到高兴，她和往常一样笑得前仰后合，但笑声很轻……看了她这个模样叫人不能不爱怜她。

然而……得到消息说政府允许契尔特科夫住在图拉省，这一来安宁的气氛又被破坏了。

母亲又是哭，又是威胁。“我要毒死契尔特科夫，杀死他！”母亲嚷道，不管是苏霍京还是塔妮娅，谁也没能使她安静下来。塔妮娅和她丈夫竭尽一切努力来缓和父亲的处境——父亲多么需要塔妮娅的抚爱啊。不过，他因对塔妮娅作了隐瞒而感到难过，于是决定将遗嘱的事告诉她。我很高兴，特别是和塔妮娅谈话之后，通过这次谈话，我了解塔妮娅是赞同父亲的决定的。

不过，连塔妮娅在场对母亲也很快不起作用了。

8月16日，父亲在不公开的日记中写道：

“今天早晨她又没睡。她给我带来一张字条，说萨莎在我为契尔特科夫写的日记中抄下一段我指责她的话。饭前我极力安抚她，并将实情告诉她，说萨莎只抄了个别的想法，而不是我对生活的看法。她想安静下来，样子很可怜。现在是三点多钟，象要有什么事似的。我无法工作。看来也不必工作。心情并不坏。”^⑱

“8月21日。起得很晚。觉得精神充沛了一些。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还是老样子。她告诉塔妮娅，因为看到契尔特科夫的画像，她一夜没睡。情况可怕。很想说一说，也就是写一写。”^⑲

“8月24日。精神有所恢复。可怜的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仍很难过，我觉得自己无能为力。我特别眷恋女儿，为此感到内疚。”^⑳

“8月28日。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不是爱，而是一种近乎恨、正在转变成恨的对爱的要求。——是的，利己主义就是疯狂。是孩子们拯救她——这是一种动物的爱，但不管怎么说却是富于自我牺牲的爱。而当这一切完结时，剩下的只有可怕的利己主义。利己主义是一种最不正常的状态——疯狂症。刚才和萨莎及米哈伊尔·谢尔盖耶

维奇谈过，杜尚和萨莎都不承认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有病。他们不对。”^{②1}

“8月25日。又是无聊的一天。散步，收信，写信。思考倒是思考了，而且思考得不错，但思想不能集中。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非常激动，一到花园，便不往回走，十二点多才回来。她又想要我作解释。我很难过，但我抑制住自己，她也就平息下来了。她决定今天走。多亏萨莎决定和她一起走。她告别时情景感人，一再请求大家原谅，我又心疼她又可怜她。收到一些写得很好的信。躺下睡觉。给她写了封短信。”^{②2}

9月1日列夫来电说他因某些诉讼案件3日要去彼得堡。母亲则打算回雅斯纳雅·波良纳。父亲害怕让母亲在情绪如此激动的情况下一人走，所以我便陪她一起回去。

休息了一两天，父亲马上便产生了写作的愿望。9月3日他写道：“我怀着很久不曾有过的兴致开始写起来（也许是指写《去当工人的年轻国王的故事》，草稿在父亲的笔记本里）”^{②3}

把母亲送走并将她交给瓦丽娅照顾之后，我回到科切特。过了几天母亲又来了。她列举了许多理由，说明为什么我们不该在塔妮娅这里留下，并坚持

要回雅斯纳雅·波良纳。她说，根据医生们的嘱咐，我应该秋天就到克里米亚，说着，又是哭又是威胁。父亲在日记中写道：“关于我动身的谈话令人难过。我坚持自己的自由，什么时候想走就走。自然，她很伤心，因为我态度不好。”²¹

“9月9日。我活着，但心情不好。她早起就开始生气，而且是病态的。我身体不适，四肢无力。我讲得很诚恳，不过看来她什么也没听进去。很难过。”²²

“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已经有两天不吃东西了，”9月10日父亲写道，“现在开饭，我去叫她吃饭。整晚都在闹，可怕。”²³

“9月11日。傍晚便开始闹着往花园跑，又哭又叫。甚至到了这样的地步，当我走到花园找她时，她叫喊起来：这是头野兽！杀人犯！我不能见到他，所以跑去租了辆大车，现在就离开这儿。整晚就是这样。当我抑制不住将 *son fait*（她的所作所为）告诉她时，她突然变得健康了，一直好到今天。无法和她交谈，因为第一，对她来说逻辑和事实都不是必需的，也无须忠实地转述别人对她讲的话或她自己讲的话。我越来越倾向于出走。身体变得很糟。”²⁴

9月12日的日记里有一段简短的记述：

“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含泪离开了。她多次叫我去谈话，我回避了。她没带任何人一起走。我累极了。晚上看书。我为她担心。”^②

9月11日母亲给父亲写了封信：

“亲爱的略沃奇卡，我本想在我们分别前对你说几句话，但我和你谈话时好生气，使你不痛快我会感到伤心。

“我请你明白，我的一切愿望——不象你说的是什么要求——都出自于我对你的爱，出自于我希望尽可能少地跟你分离，出自于因旁人对我们长期的、无疑也是亲密的夫妻生活的干扰而使我感到的伤心，这个旁人对我是不怀好意的。

“这种情况已经消除，虽然，很遗憾，你为此感到后悔，而我却为你作出的巨大牺牲无限感激你，这种牺牲将使我重新获得幸福和新生——既然这种情况已经消除，那么我向你起誓，我将竭尽全力使你的精神生活以及其他方面的生活过得安宁、愉快、温暖。

“确有不少这样的妻子，她们确实对丈夫有许多要求：‘让我们到巴黎去买服装吧，或者去赌钱吧，你得接待我的情夫，不准你到俱乐部去，你要给我买钻石，你必须承认天知道是哪个男人的孩子是合法

的，’等等，等等。

“上帝使我摆脱了各种诱惑和需求。我很幸福，所以什么我也不需要。我只有感激上帝。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不是提出要求，而是为你态度上的冷淡以及契尔特科夫对我们生活的干扰而深感痛心，并怀着一颗受折磨的心希望回复到我们过去的那种生活——也许这已不可能。

“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当然是最令人不快、最笨拙、最不好、对你特别是对我最难受的，我为此非常悲伤。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自主，我想是不由自主。我的一切都衰竭了，包括意志、精神、心脏，甚至身躯。你偶尔流露的往日的爱情，一直使我感到无比幸福，我对你的爱情却从未减弱过，而我的一切行为——哪怕是嫉妒的，失去理智的——都是建立在这种爱情之上的。我也将怀着爱情结束自己的生命。亲爱的，别了！请不要为这封信生气。

“你的妻子对于你永远都是当年的索尼娅。”²⁹

9月24日，父亲写道：

“她有病，我从心底怜悯她。”³⁰

我的不幸在于，我不是怜悯，而是生气……假如我们这些他亲近的人能怜悯母亲，能以“宽恕仁爱”之心对待她，父亲就会好受得多。

“只有这样，列夫兄弟，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极乐境界。”

我过于年轻，难以理解这点。

- ① 《全集》，第五十八卷，第 460 页。
- ② 同上，第 404 页。
- ③ 同上，第 423 页。
- ④ 同上，第 71 页。
- ⑤ 同上，第 78 页。
- ⑥ 同上，第 78 页。
- ⑦ 《索·安·托尔斯泰娅日记》。
- ⑧ 戈里顿维伊则尔：《在托尔斯泰身旁》，第二卷，第 117—119 页。
- ⑨ 《全集》，第五十八卷，第 81 页。
- ⑩ 同上，第 459 页。
- ⑪ 同上，第 82 页。
- ⑫ 同上，第 83 页。
- ⑬ 同上，第 84 页。
戈里顿维伊则尔：《在托尔斯泰身旁》，第二卷，第 172 页。
- ⑭ 《全集》，第五十八卷，第 130 页。
- ⑮ 比留科夫：《托尔斯泰传》，第四卷，第 229 页，（国家出版社，1923 年）。
- ⑯ 《全集》，第五十八卷，第 131 页。
- ⑰ 同上，第 132 页。
- ⑱ 同上，第 133 页。
- ⑲ 同上，第 134 页。
- ⑳ 同上，第 134 页。
- ㉑ 同上，第 135 页。
- ㉒ 同上，第 135 页。
- ㉓ 同上，第 99 页。

-
- ②④ 同上，第 101 页。
- ②⑤ 同上，第 101 页。
- ②⑥ 同上，第 101 页。
- ②⑦ 同上，第 136 页。
- ②⑧ 同上，102 页。
- ②⑨ 《索·安·托尔斯泰娅致列·尼·托尔斯泰书信集》，Accademia, 1936 年，第 793 页。
- ③⑩ 《全集》，第五十八卷，第 106 页。

第六十八章

雅斯纳雅·波良纳的最后一月

9月23日是父母的结婚纪念日。母亲想拍一张她和父亲的照片。天气寒冷，刮着北风。父亲将双手掖在腰里，光着头站在那里，忧郁地朝前看……我情绪很不好。我从科切特回来后发现，书房墙壁上契尔特科夫和我的相片都不见了。是母亲将它们取了下来。于是……我忍不住了。我气愤地对父亲说：

“又不是我将自己的相片挂在你靠椅的上头的，这张像是你挂的，现在母亲把它挪到别处，你却不敢将它挂回来。”

父亲摇了摇头，转身往外走。

“你很象她。”他边走边说。

我怎么能……

吃饭时大家都不说话。和往常一样，我吃过饭便坐在办公室里抄写。铃响了。我叫布尔加科夫去，自己没有动。过了一会儿铃又响了。我还是没去。这回布尔加科夫回来说父亲要我去。

“萨莎，我想向你口授一封信。”

“好啊。”

我拿起铅笔和纸张准备记，可心里却想扑向前吻他的手并请他原谅。泪水噎在喉咙里，我说不出一句话。

“我不需要你的速记，不需要。”突然父亲含泪啞哑地说，他倒在沙发椅的扶手上哭了起来。

“原谅我吧，请原谅我！”我扑过去亲他的手、额头和肩膀。“原谅我！”

我们俩哭了好长时间。他开始口授，我眼睛叫泪水蒙住了，看不清自己写的笔划……写完以后，我再次请求父亲原谅。

“我已经全忘了。”父亲说。

第二天，契尔特科夫和我的相片又挂在原处了。施米特老太太在雅斯纳雅·波良纳，瓦丽娅和我到奥尔迦的庄园去了。我们走后闹了一场风波。

母亲看见契尔特科夫和我的相片又挂在原处，

便跑回自己的房间里拿来玩具枪，开始向契尔特科夫的相片射击，然后从墙上将它取下并撕成碎片。

我和瓦丽娅陪孩子们及奥尔迦在塔普特科沃村痛痛快快地度过了一天，当我们准备去睡觉时，突然车夫从雅斯纳雅·波良纳来了，并捎来施米特老太太的一封信，她让我们立刻回去。我吩咐备马车。夜漆黑，伸手不见五指。道路很糟糕，泥泞不堪，车夫害怕往前赶。走了约三个钟头。我屏息静气走进屋子。母亲怒不可遏，朝我们发作。她叫瓦丽娅滚蛋，至于我——几乎也要把我赶走。

父亲没有睡。我告诉他说，我以为自己最好是走开。我希望他和我一道走，或者晚些时候和我会合。

“总的说，我不赞成你忍不住就想走，正如你知道的，我在信中总是回答说，根据我的意见，不必改变外部的生活条件，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由于我软弱，我高兴你离开。快到结局了，不能再长此以往了。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把契尔特科夫打发走了，呵斥了玛丽娅·亚历山大罗夫娜，将瓦丽娅赶跑了，也几乎把你赶跑了。别伤心，要坚持住，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从杰里亚坚基到雅斯纳雅·波良纳坐马车要走二十分钟。如果我离开，塔妮娅或谢辽沙就应搬来这

里陪父母亲。“快到结局了，”我想到。

果然不错，我走后家里变得安宁了，母亲似乎明白过来，她做得太过分。

我每天从杰里亚坚基回到雅斯纳雅·波良纳，照常替父亲抄写，但一到夜里就心神不安：万一父亲病了怎么办……或许他现在，他此刻就需要我，而我却不在他身边……

过了几天我才意识到，我的离开并不象我所期望的那样能促使父亲也离开，他决定忍受到底。他在日记中写道：“只要在上帝面前是清白的就行。你马上就能感到生活的乐趣……我认真地祈祷过：主啊，我生活的主宰，我的上帝！”^①

我的离开使母亲深感不快，她想跟我和解，想把瓦丽娅叫回来。

“她对我的态度令人感动，”父亲在9月29日写道，“她感激我对她的温存。想起来挺可怕，但却愿意想，甚至对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也能以好心取胜。”^②

10月2日父亲在不公开的日记中写道：

“早起第一句话就问我的身体怎么样，接着便是没完没了地指责人，说人是非，还在别人谈话时插嘴。我心情也不好。无法抑制厌恶的感觉。现在，我

很想写文艺作品，但由于她，由于老想着她，由于内心的斗争，我知道无法全力以赴地从事这项工作。不言而喻，这场斗争，以及在这场斗争中可能取得的胜利，比任何文艺作品都更为重要。”

在这栋实际上非常舒适的小房子里，我却找不到一个安静的角落。我的全部心思都留在雅斯纳雅·波良纳。

“你怎么闷闷不乐，总是六神无主的样子？”我的教母安努什卡不止一次地问我。她是雅斯纳雅·波良纳的农妇，宽颧骨、翘鼻子，老是高高兴兴的。她帮我做家务活儿。“我从不发愁，不管是我那尼基塔喝醉酒，还是我的哪个孩子病了，我照样坐在那里谈马鲁克·阿夫列利的书……”“什么？马鲁克·阿夫列利的书？”我惊讶地问道。“是啊，是马鲁克·阿夫列利的书，有那么一本小书，是伯爵送给我的。我只要一发愁，便叫来大儿子佩季卡：‘佩季卡！念马鲁克·阿夫列利的书给我听！’”她这么一说，我心里便轻快多了……“还有，”她继续谈自己的人生哲学：“我经常琢磨怎样才能活得更好。左想右想不管用。只有一个办法行：想着死。一想到死，想到今天你还活着，明天你只需要有两米长的一块地——这么一想，一切操心事便忘得一干二净，你什么也不需要

了。你就只会想，我现在可别作孽啊。”

我给父亲讲了教母的这些话。

“这才是真正的智慧，”他边笑边说，竭力掩饰感动的泪水，“就该向这样的人学习。”

谢辽沙和塔妮娅来到了雅斯纳雅·波良纳。我的离开对他们起了作用，他们断然向母亲声明，如若她不停止折磨父亲，他们就要把她监护起来并将她送到疗养院。“早该如此，”我想到。

10月3日晚，车夫从雅斯纳雅·波良纳带来布尔加科夫的一张字条：“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情况很不好，速来。”父亲昏厥过去了，双腿抽搐，造成全身剧烈颤动。全家都在奔忙。母亲跪在地上使劲掰手指，一面哭着说：“主啊，但愿这一次不会……主啊，你保佑保佑吧……”

被母亲赶走的契尔特科夫坐在楼下杜尚的房间里。接近十一点的时候，父亲有所好转。我蹑着脚轻轻地走到他跟前，吻了吻他的手。快到午夜时，他入睡了，第二天早晨全好了，完全恢复了知觉，不过还很虚弱。

塔妮娅和谢辽沙来了，他们在和母亲谈话。我也参加了，并第一次当着兄姐的面直截了当地把父亲感受的一切痛苦告诉了母亲。我说得很尖锐，毫不粉

饰。我警告说，如果母亲不离开或不有所改变。父亲就会忍受不住而死去……到那时——谁的罪过？……

谢辽沙想阻止我说下去，但这不可能。我要将我几个月来承受的一切痛苦都倾诉出来。“这样的痛苦你们连三天也受不了，你们现在觉得不好受……而我呢？”最后我放声哭起来并跑开了。

我回去吃早饭，傍晚再次来到父亲跟前。已经很晚了，我正准备回去，这时伊利亚·瓦西利耶维奇告诉我说伯爵夫人要见我。

“她在哪儿？”

“在门廊里。”

母亲穿着一身单衣站在门边。头部无力地颤动着。我突然感到非常可怜她，很想上前搂住她的脖子拥抱她，但我忍住了。

“你想和我谈是吗？”我问道。

“是的，我想为我们的和解再作点努力。你原谅我吧。”她吻起我来，一再重复说：“原谅我吧！原谅我吧！”我也吻起她来，并请她安静。

“原谅我吧！原谅吧！我向你保证，今后再不欺辱你了，”她一边画十字、亲我，一边重复说，“告诉瓦丽娅，我对不起她，告诉她，我们和她一起生活了

四年，愿上帝保佑我们再一起生活这么长时间。我不知道，我们究竟怎么啦？不知道究竟对他们做了什么事情。”

“你不要欺辱我，不过也不要欺辱父亲，”我说着，自己也泪如泉涌，“不要欺侮他，我不忍心看他受折磨。”

“我再不了，我再不了，我向你保证，”她仍旧一边划十字，一边重复着说。“我不再折磨他了，你不会相信，今晚我是多么难过啊。因为我知道他是由于我才得病的，要是他不幸去世，我将负疚终生。……你不会相信，我是多么嫉妒，”她说道，“我一辈子，哪怕是在年轻时，也从来没有产生过象对契尔特科夫那样的嫉妒心。”

由于怜悯母亲，我心都酸了。

又产生了一线希望，我和瓦丽娅立刻回到了雅斯纳雅·波良纳。一连几天都过得很平静。我竭力保持这次谈话后我心中产生的这种良好、松弛的情绪。

“昨天，10月6日，”父亲写道，“身体虚弱，情绪不佳。一切都令人难受和不快。收到契尔特科夫的信……她尽力请他来。今天塔妮娅到契尔特科夫那里去了一趟。加莉亚很生气。契尔特科夫决定八点来，现在还差十分钟。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要我别

和他接吻。真反感！又是歇斯底里大发作。”“今天是8号。我把我认为必须讲的话都向她讲了。她表示反对，我生气了。这样不好。不过，也许并不是一切都完了。说真的，问题就在于既要自己做得好，又要对她——即便不能一贯，但至少大部分时间——真心怜悯。今天过得比较好，现在躺下睡觉。”^③

10月12日又谈起了遗嘱的事。母亲常向周围的人谈父亲昏厥的事，这简直叫人可怕，所以我不想详细地说。她讲，如果父亲立下遗嘱，可以（用证实当时父亲神智不清的办法）对遗嘱提出异议。她不时跑进他房间，跪在地上，指责他，威胁他，央求他把遗嘱销毁，吻他的手。

10月13日父亲写道：

“原来，她找到并拿走了我的小日记本。她知道有个遗嘱，知道是为谁立的，写了些什么，也知道这份遗嘱显然与我的著作有关。因为这些著作是值钱的，所以引起了莫大的痛苦。她害怕我妨碍她出版这些著作。她什么都怕，可怜的人呀。”^④

10月14日母亲给父亲写了封信：

“你每天似乎都体贴入微地询问我的健康情况，询问我睡得怎么样，可每天都给我以新的打击，这些打击使我心都碎了，使我活在人世的日子越来越短，

折磨得我无法忍受，使我继续受苦。又是一个新的打击——你剥夺了你那为数众多的后代的版权，你这狠毒的行为命运注定让我发现了，虽然你的同谋者嘱咐你不要将此事告诉家人。他威胁要加害于我以及我们的家庭，而且做得十分顺利，从你那里骗取了这张同意放弃版权的文件。你和他在所有的小册子里竭尽全力否定和谩骂的这个政府，将根据法律夺走你的继承人最后的一块面包并将它转交给瑟京和形形色色的富有的出版人与奸商，与此同时，根据托尔斯泰那狠毒和好虚荣的意志，他的儿孙们将要饿死，而这个政府，政府银行将撇开托尔斯泰的妻子将他的日记存放起来。你那基督徒的爱通过各种行径一直在杀害你最亲密（“亲密”不是你的意思，是我的意思）的人——妻子，而你妻子从来没有，现在（除了忍受最剧烈的痛苦之外）也没有任何恶毒的行为。今后，我仍将受到各种威胁。好吧，略沃奇卡，你经常散步时作祈祷，请你祈祷时好好想一想，在这个恶棍的压力之下你干了些什么。请你铲除恶念，把你的心引向爱和仁慈而不是引向仇恨和恶行，忘掉虚荣和傲慢（指版权问题而言），消除对我——把整个一生和爱都献给了你的人——的仇恨吧。如果有人要你相信我是受到贪财之心的支配，那么我个人

准备和女儿塔妮娅一样，放弃丈夫财产的继承权。我要这个干什么。我显然好好歹歹很快就要离开人世，不过我极为害怕，一旦我活得比你长，儿子们和孙子们对死去的你将会产生多大的怨恨。

略沃奇卡，趁你还健在，将这怨恨消除掉吧！唤醒你那颗骄傲的心并让它发点慈悲吧。你向人们高谈虔诚和仁爱，将它们在你心中唤起吧。

索菲娅·托尔斯泰娅”^⑤

“今天一切都解决了，”10月16日父亲写道，“我原想到塔妮娅那里去，但犹豫不决。又是歇斯底里大发作，厉害得很。事情的经过是：她提议我到契尔特科夫那里，请求我去，而今天当我说我要去时，她又发起狂来。太难了。上帝保佑。我说，我现在和将来都不会许下什么诺言，不过我将尽一切努力不去伤她的心。明天未必成行，但应该走。是啊，这是个考验，而我的责任在于不做不好的事，上帝保佑。”^⑥

父亲屈服于母亲的愿望，没到杰里亚坚基，同时也请契尔特科夫不要到我们这里来。但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不相信他的话，她沿着去杰里亚坚基的路来回走，想监视他。

10月11日父亲在日记中写道：

“无所事事，日子一天天流逝。今天起得很晚。散

了步。在家里，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猜想我和契尔特科夫秘密约会，又激动起来。我很可怜她，她有病。”^⑦

“身体不很好，精神不振，”同一天他写道，“来回踱着，脑子空空的。写信，修改《论社会主义》，但很快便觉得四肢无力，把工作停了下来。吃早饭时我说我要去契尔特科夫那里。又是一场大吵大闹，她冲出家门，往杰里亚坚基跑。我骑马去了，并打发杜尚告诉她，说我不在契尔特科夫那里，但杜尚没找到她。我回来时，她还不知去向。终于在六点多钟时找到了她。她回来后和衣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什么也不吃。晚上，她解释得牛头不对马嘴。深夜互道再见时很感动人，她承认是在折磨我，并答应不再这么做了。难道会出现新的情况？”

10月17日父亲给契尔特科夫写道：

“亲爱的，很想和你谈谈心。除了你，我不能向任何人如此轻松地谈出自己的思想。我知道，不管我想说的东西说得多么不清楚，多么不完全，你都能明白。昨天是严峻的一天。事实的细节别人会告诉你，我只想谈自己的内心活动。我怜悯她，并很高兴有时毫不勉强地爱她。昨天夜里就是这样。当时她怀着忏悔的心情来了，为暖我的房间操起心来，尽管又疲惫

又虚弱，她还是推下百叶窗板把窗子闭死，总之，为使我的身躯舒适一点而忙碌。如果有的人感觉不到（即便是这样，我认为也是暂时的）精神生活的现实性，那又有什么办法呢？昨天从傍晚开始我就准备去科切特，不过，现在我为没有去成而感到高兴。今天，我在肉体上感到虚弱，但心情很好。正因为这样，我愿意把我想的，而主要是把我感觉的东西告诉你。

“直到昨天，我很少考虑我那经常突然发作的病，甚至根本不考虑，但今天我脑海里清楚地浮现出我在一次疾病发作时死去的情景。尽管这种完全没有肉体痛苦的肉体上的死亡是愉快的，但我知道就精神而言它将使我失去可能是非常美妙的临终前的珍贵瞬间。这使我联想到，既然这一瞬间我可以失去感觉，那么，我就可以把这一瞬间扩展为离开人世前的几小时，几天，甚至几个月，几年（未必做得到），我就能象对待可以意识到的死亡来临前的那一瞬间那样，认真庄重地（不是表面，而是内心）对待这些离开人世前的日月。正是这种我昨天和今天感受到并将保留至死的思想或感情使我特别高兴，我也想把这种感受告诉你。其实，这感受很古老，但是，对我来说，却发现了新的方面。”^⑧

这一阵子父亲什么也写不下去。他只是回答信

件，写了点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东西。“我不能写，但谢天谢地，我可以作些自我修养，我还是在前进。”第二天，即10月18日，他用下面的文字来解释自己的话：“谢天谢地，我毫不惋惜地感到我已作好准备去迎接死亡。”^⑨

10月19日。“夜里，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来了，她说：‘又在对我搞阴谋诡计。’‘怎么回事，什么阴谋诡计？’‘你把日记交给了契尔特科夫，日记不见了。’‘在萨莎手里。’非常难过，久久不能入睡，因为抑制不住恶感。”

当天，父亲写道：“除了写信，又是什么事也没做。身体很不好。末日不远了，但愿能更好地度过这风烛残年。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说她为昨天的事感到懊悔。我也说了几句，特别讲到，如果你哪怕是怀恨一个人，你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仁爱之心。”^⑩

父亲明显地显得虚弱了。他的乐观和朝气已不复存在。

10月21日，有三个农民来找父亲。一个是米哈伊尔·诺维科夫，父亲以前也见过他并和他通过信。他是个聪明、有修养的人，赞同父亲的观点。另外两个是本地人。我很长时间没见过父亲这么兴高采烈。当我来父亲处取信时，他在餐室见到我，把我领到书

房，从书房又领到卧室。“走吧，走吧，”他狡诘地微笑着说，“我告诉你一个大秘密，大秘密。”我跟在他后面，看到他的样子，我也乐了。父亲在书房停了下来，说：“你知道我想出什么主意了吗？我向诺维科夫稍微谈了谈我们的处境以及我在这里多么难受。我要到他那里去，在那里谁也找不到我。诺维科夫告诉我，他兄弟有一个酒鬼老婆，只要她一胡闹，兄弟在她背上揍一顿，她便老实一点，真管用。”父亲和善地笑开了。“说也奇怪，世界上就是一物治一物。”

我告诉父亲，有一次车夫伊万赶车带着奥尔迦。奥尔迦问他雅斯纳雅·波良纳的情况。伊万回答说很糟。然后转过身来对奥尔迦说：“嘿，夫人，我们是按庄稼人的规矩办事，如果娘们胡闹，丈夫就用马车上的缰绳抽，她们马上就变得老实听话了。”

父亲笑得更欢了。“是啊，是啊，说也奇怪，世上什么人都有……”“据我看，这并不是什么一物治一物，”我打断他的话说，“不过他们的缰绳是真的，是用绳子编的，而我们应该用精神上的缰绳。”“是啊，是啊，可我也许还是离开好，”他再次说。

10月21日，他在不公开的日记中写道：“我非常艰难地忍受着考验。诺维科夫说‘抽一顿鞭子，情况就好多了’，伊万说‘我们的规矩是用缰绳’。我老想

起这些话，对自己很不满意。夜里想到离开的事。萨莎和她谈了很多，我在勉强地抑制着恶感。”^①

10月24日，父亲向我口授了给米哈伊尔·诺维科夫的一封信。

1910年10月24日。

“寄自雅斯纳雅·波良纳。

“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

“关于你离开前我对你谈的那件事，我还想向你提一个请求：假如我真的到你那里去，你能否在你们村子里为我找一间房子，哪怕是很小的，但要暖和的、单独的，这样我便能尽快不打搅你和你的家人。再者，如果我必须给你打电报，我将不用自己的真名，而用季·尼古拉耶夫。

“等候回音。诚挚地握你的手。

“请注意，这一切只应你一人知道。”^②

父亲无法工作，无法聚精会神，思路老被打断，不断地谈话使他不得安宁，白天，黑夜，连工作时间都是如此。

1910年10月25日。我走进父亲的房间。他闲坐在桌旁的靠椅上。他不看书，不写东西，也不摆他思考问题时爱摆的牌阵，看到他这种情形，使人觉得奇怪和不寻常。“我坐在这里遐想，”他对我说，“想我

走的事。你不是想一定要和我一起走吗？”父亲问道。“但是我不想拖累你，也许在开始的时候我最好不和你一起走，好让你能比较顺利地离开。不过我终归是不能离开你生活的。”“是啊！是啊！不过你知道，我总是想，没有我跟你一起走不行，你身体不好，你伤风，眼看就要咳嗽了……”“不，不，这不要紧。在简朴的环境里我会好一些。”“要是这样更好，有你作为助手在我身边，我会感到非常舒服，非常愉快。我想这样，买票到莫斯科，先派一个人，比如契尔特科夫，把行李带到拉普捷沃，我自己在那里下车。如果我在那里被发现了，就再到另外一个地方。不过，这也许全是幻想，如果我扔下她，我会难受，她的健康状况会使我非常苦恼……从另一方面说，目前的环境变得如此沉重，而且一天比一天沉重。对你说实话，我只是在寻找出走的口实。”^⑬

10月25日，谢辽沙来了。

关于这次到来，哥哥谢尔盖是这样写的：

“10月25日晚，我从图拉回到雅斯纳雅·波良纳。一个旁人也没有，只有我母亲、妹妹萨莎、杜尚·彼特罗维奇和瓦尔瓦拉·米哈伊洛夫娜。我到书房父亲那里，心想他会和我谈谈母亲的事，也许还要谈谈我的情况。可是母亲老在跟前喋喋不休。父亲一

张嘴她就打断他，扯别的事。他默默地等着她给他说话的机会，一有机会他就插进去说，并且，开了头就一直说下去，就象他的话是被不相干的吵声打断了似的。”^④

这天晚上，谢辽沙和父亲谈到了文学，和他下了象棋，还应父亲的请求弹了钢琴。

“当我弹格里克的《Ich liebe dich》（《我爱你》）时，”谢辽沙写道，“他呜咽了。回自己的房间睡觉前，我到书房祝他晚安。除了我们俩，房间里没有任何人。他问我：‘为什么你这么快就要走？’我打算第二天一早就走。我说我要办自己的事。我很想在雅斯纳雅·波良纳多住些时日，很想多少弄清楚这里发生的情况，也许还想有所帮助，不过我想首先处理好自己的事……这些事现在我觉得是多么微不足道。对此，父亲当时说：‘你最好别走。’我回答说我会很快会再来。后来我回想起，他是带着一种特殊的表情说这些话的。显然他想到自己要出走并希望我在他走后留在母亲身边：他总觉得我能够对母亲起一点作用。我要离开书房时，他慌忙而又特别温柔地把我搂到身上，和我相吻。要是在别的时候，他只会简单地向我伸出一只手。”^⑤

同是 25 日这一天，父亲给契尔特科夫写信：

“今天我第一次特别清楚地——乃至忧伤地——感到我多么需要你……我思绪万端，百感交集，除了你——我深知，你完全理解我——我不能向任何人这样无拘束地交谈。今天我脑子里就闪过一些念头，其中之一（今天我在睡梦中感到心脏突然剧烈跳动了一下，这使我醒了过来。醒后回想起刚才做的梦，梦见我往山下走，我用手抓住树枝，但还是滑倒了——也就是说我惊醒了。这个梦境是在一瞬间出现的。）人在临终前会出现类似睡眠状态中的心脏剧烈一跳，会出现超越时间的一瞬，整个一生便成了回溯过去的梦幻。现在我就正好处在这种追溯过去的梦幻中。我有时候觉得这是真实的，有时候又觉得这很荒唐。我今天出现的第二个感觉式的念头则是近两个月来第三次美妙的、富于艺术色彩的梦幻。我将把这一梦境以及过去产生过的梦境记下来，哪怕是简要地记一记。第三个念头已经不是什么思想，而是一种感觉，而且是一种不好的感觉——感觉到希望改变自己的处境。我感到在自己的生活中有一种不应该的、令人觉得内疚的东西，有时我把它看作——似乎应该如此——福分，而有时我却气愤，加以抗拒。萨莎已把我的计划告诉了你，往往心境不佳时我便考虑这个计划。请你把萨莎关于此事所说的话以

及我现在提起的话都当作 *Comme non avenue*（不曾有过的事）吧！我非常需要你，在纸上难以什么都写，那就随便谈点什么吧。我给你写我的情况。也请你谈谈自己的情况或随便谈点别的什么事。你很容易理解我，我也很容易理解你。好吧，再见。一旦我采取什么行动，自然会告诉你。甚至还可能要求你给予帮助。列·托。”^{①⑥}

10月26日父亲到施米特老太太那里去了一趟，也许是去告别。

父亲告诉杜尚说：“我到塔妮娅那里去，我将写信告诉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说我到塔妮娅那里，然后从那里到奥普京隐修院随便找一个长老请求允许我住在那里。他们肯定会接收我的，他们会希望能使我改变信仰。”^{①⑦}

10月26日他写道：

“一切如常。只是愈来愈感到内疚和需要采取行动。”^{①⑧}

① 《全集》，第五十八卷，第108页。

② 同上，第109页。

③ 同上，第140页。

④ 同上，第141页。

-
- ⑤ 《索·安·托尔斯泰娅致列·尼·托尔斯泰书信集》，Academia出版社，第794页。
- ⑥ 《全集》，第五十八卷，第141页。
- ⑦ 同上，第117页。
- ⑧ 戈里顿维伊则尔：《在托尔斯泰身旁》，第二卷，第316页。
- ⑨ 《全集》，第五十八卷，第119页。
- ⑩ 同上。
- ⑪ 同上，第142页。
- ⑫ 《索·安·托尔斯泰娅日记》。
- ⑬ 同上。
- ⑭ 《全集》，第五十八卷，第558页。
- ⑮ 同上，第559页。
- ⑯ 同上，第559页。
- ⑰ 《亚·里·托尔斯泰娅日记》（手稿）。
- ⑱ 《全集》：第58卷，第143页。

第六十九章

“世上还有许多人……”

活着是做梦，
死去才如梦方醒。

列夫·托尔斯泰

《阅读园地》，11月7日

朦胧中我什么也没弄明白。有人不停地敲门，我跳了起来。“是谁？”父亲手里拿着蜡烛站在门边，上身穿着短衫，脚蹬长统靴。他对我说：“我马上就要走……再不回来了……帮我收拾吧……”

杜尚、瓦丽娅和我——我们在昏暗中轻轻地移动，压低嗓门说话，尽量不弄出响声，尽可能收拾一

切必需的东西。我收拾文稿，杜尚收拾药品，瓦丽娅收拾衣物，父亲把东西装到许多盒子里，然后把盒子整整齐齐地捆好。一部分手稿他已经捆好。“保留好这些手稿，”他对我说。“日记？”我问道。“我自己带着。”父亲的动作很安详自信，只有从若断若续的声音中才能觉察他内心的激动。经过走廊通向母亲卧室的门闭着，而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母亲是老让它敞开的。

“萨莎！你留在这里。”父亲对我说，“过几天，等我最终决定到哪里去以后再写信叫你。我最大的可能是到沙莫尔金诺修道院你姑姑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那里。”

我们在急忙收拾。父亲愈来愈焦躁不安，老催促我们。我们的手发抖了，行李带也系不紧了，皮箱盖也盖不严了……

“我到马厩去，”他说，“让他们把马车套好。”过了大约五分钟他回来了。天太黑，父亲走错了路，碰上洋槐丛摔了一跤，把帽子丢了，回来拿手电筒。

终于一切收拾停当了。杜尚、瓦丽娅和我沿着泥泞小路费力地把东西往马厩搬。走到厢房时，我们看见前面有小灯光，父亲迎面走来。他从我手里接过一只箱子，走在前面给我们照路。车夫亚德里安已经把

套索套到第二匹马身上。

终于一切都准备就绪，马夫菲列奇卡拿着烧得通亮的火把跳上了一匹马。

“上路！”我连跑带跳地跳上了马车的踏板，吻了吻父亲。

“亲爱的，再见！”父亲说，“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

马车从屋旁经过，穿过了池塘边的苹果园。在光秃秃的树干中间闪烁着火把的亮光……火光越来越远，最后消失在通往村子的拐角处。

当我回到屋里时，一阵揪心的空虚感顿时涌上心头。这时是五点多钟。火车八点离站。我坐到靠椅上，用被子围住身体。我象得了热病似的浑身发抖。我一分钟、一分钟，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地数着。八点钟的时候，我开始到各个房间转一转。伊利亚·瓦西利耶维奇已经知道。“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给我讲过，他打算离开这里。”他说，“今天我从你的衣着上看出他已经走了……”

父亲出走的消息逐渐传遍了全家。佣人们交头接耳，交换各自的猜测。我母亲几乎整夜没睡，她起得很晚，大约是在十一点时，她快步跑进餐室。

“爸爸在哪儿？”她问我。

“走了。”

“去哪儿？”

“我不知道。”说着便递给她父亲的一封信。

她迅速地把信扫了一遍，头发抖，双手发颤，脸上顿时覆盖上密密麻麻的红点。

“我的出走会使你伤心，”父亲写道，“我为此感到遗憾，不过请你理解我、相信我、我没有其它办法。我的处境正变得，而且已经变得令人无法忍受。除了其他原因，我无法继续生活在曾经生活过的奢侈的环境里，我所采取的是象我这样年纪的人通常都会采取的行动——离开尘世生活，在孤寂中度过余生。

“请你理解这一点。即使你得知我在哪里也别来找我。你的到来只能恶化你和我的处境，但不会改变我的决定。

“感谢你在我身边度过了四十八年忠诚的生活，并请原谅我所做的一切对不起你的事情，就象我真心实意原谅你可能有对不起我的地方一样。我的出走改变了你的处境，我劝你安于这种处境，劝你不要对我怀有恶感。如果你有什么事想通知我，就让萨莎转告吧，她会知道我的住处并把该转寄的东西转寄给我的。她不能告诉你我在哪里，因为她已经向我许下诺言不将我的住址告诉任何人。

列夫·托尔斯泰

我已委托萨莎收拾我的衣物和手稿并转寄给我。”^①

不过母亲并没有把信读完。她将信扔到地上，边喊着“走了，彻底走了，永别了！萨莎！我投水去。”边往外跑。

我喊了一声布尔加科夫，让他留神母亲。母亲只穿了一身单衣。她奔到外面，沿着花园往下冲，朝当中那个水塘跑去。我一见布尔加科夫落在后头，便使尽全身的气力飞奔去拦截母亲，但没能赶上他。我跑到平日人们捣衣的跳板跟前，正好这时母亲踩在很滑的木板上摔倒掉到水里，幸好这边的水不深。我当即跳到水里，抓住母亲的衣服，布尔加科夫也跟在我后面跳下水。我们俩把她举出水面并递给了气喘吁吁的胖子厨师谢明和仆人万尼亚，他们是跟在我们后面跑来的。

这一整天我们都寸步未离母亲。她好几次竭力想往外跑，一再威胁说要跳窗，要跳到外面的井里。

我向姐姐塔妮娅和几个哥哥都发了电报，向他们报告了所发生的事情并请他们立刻赶来。我还从图拉请来一位精神病医生。整个白天和黑夜我一直在照料母亲。

但是，当我更换湿衣服的时候，她打发仆人万尼亚到火车站打听父亲是乘哪一趟火车走的，并给他打了一封电报：“火速回来——萨莎。”我赶紧发了另一封电报：“放心。署名亚历山德拉的电报才是我发的。”幸好这两封电报父亲都没收到，他已经转乘另一列车了。

亲人到来之前这一天，我精神紧张的状态是难以描述的。图拉的这位医生不能使我得到多大的宽慰。他不排除这样的可能，即母亲在精神刺激突然加剧的情况下有可能自杀。

先是哥哥安德列，接着是其他人都来了，这时我才如释重负。

包括塔妮娅在内的所有亲人都不同意父亲的行为。都说他应该回到母亲身边，塔妮娅认为父亲作为一个基督徒应该将苦难忍受到底。只有谢尔盖一个人理解父亲并将他的这个想法写信告诉了父亲。

“亲爱的爸爸，”他写道，“我给你写信是因为萨莎说你将会很高兴得知我们（你的孩子）的意见。我认为母亲神经有毛病，因此在许多方面对自己的言行是不能负责的，我想你们应该分离（也许早该分离），不管这会给你们两人带来多大的痛苦。我还以为，如果母亲有个三长两短，那你丝毫用不着责备自己。没

有别的办法，我觉得你选择了一条真正的出路。请原谅我说得这么坦率。谢辽沙。”^②

除了米沙，大家都给父亲写了信并劝他回来。

“略沃奇卡！我亲爱的，”母亲写道，“回家吧，亲爱的。救救我，别让我第二次自杀。略沃奇卡！我终身的伴侣，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将完全摒弃一切奢侈的东西，我将和你一起友好地对待你的朋友，我将治病，我一定要变得温顺……”

“……所有的孩子都在这里，但他们自以为是，横行霸道，这对我毫无帮助。我唯一需要的是你的爱，我必须和你见面。我的朋友，允许我哪怕是向你道别，最后一次说一声我多么爱你吧。把我叫去或者你自己回来都可以。略沃奇卡，再见，我一直在寻找你，在呼唤你。我的心灵受到多么残酷的折磨啊！”^③

家人猜测父亲是到姑姑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那里去了，于是，妈妈便叫安德列到沙莫尔金诺修道院劝父亲回来。

10月28日在奥普京隐修院时，父亲便已在日记中记述了自己离家出走的经过：

“我十一点半躺下，睡到三点。醒来时和往常一样又听到开门声和脚步声。以往夜里我是不往自己

的房门那边看的，今天我看了一眼，从门缝发现书房里有亮光和沙沙声。这是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在寻找什么，也许是在翻阅什么。昨天她请求我，要求我别关门。她的两扇门也敞开着，因此我的轻微动作她都能听到。不管白天黑夜，我的言语行动她都要知道并且要置于她的监督之下。又是脚步声，轻轻地开门声、她正在走过去。不知什么缘故，这引起我无法遏制的厌恶和愤怒。我想睡，但睡不着，辗转反侧约一小时，点着蜡烛便坐了起来。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打开门进来，询问了我的‘身体情况’，看见我屋里亮着灯而感到奇怪……我越来越感到厌恶和愤怒，喘不上气，数了数脉搏——九十七次。我无法躺下，突然作出最后决定——出走。我给她写信，开始收拾最必需的用品，还是一走了之为好，我叫醒杜尚，然后又叫醒萨莎。他们帮我打点行李。万一她听到声响，大闹起来，歇斯底里大发作，就别想平平静静地离开——一想到这，我就浑身发抖……”

接着，父亲描述了动身前的准备情形……

“我等着她追赶，心里打颤。终于动身了。我们在绍金诺等候了一小时，我随时都在等着她的出现。不过终于坐进了车厢，车开了，我的恐惧这才消除了，与此同时，却对她怜悯起来。但我并不怀疑自己

这一步是否走对了。也许我错了，不过我觉得我救了自己——不是救了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而是救了我身上有时存在，哪怕是稍稍存在的东西。我身体很好，虽然没睡觉，也几乎没吃东西。从戈尔巴乔沃开始我坐在挤满工人的三等车厢，很好，很有教益，尽管感受不多。现在是八点，我们在奥普京隐修院。”^①

当时，周围的人没有一个了解父亲内心的复杂感受，不了解他解救的不是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而是他精神方面的东西。他感到自己快要离开人世，他要获得内心和外界的安宁，使他能潜心于迎接死亡的到来——当时他整个生活的意义主要就在于此。

10月29日，阿廖沙·谢尔盖因柯受契尔特科夫之托带了一封信来见父亲。契尔特科夫在信中写道：

“不能不告诉你，你的出走使我感到莫大的高兴。我衷心地感到你做得对，在已形成的这种条件下，你继续在雅斯纳雅那样生活下去对你来说是不适宜的。我相信你已经把这次出走的时间拖得够长了。因为你害怕这样做是‘为了自己’，你想使这次行动的主要动机不掺上利己主义，你有时一定会觉得在新的环境里你个人要安宁得多，愉快得多，轻松得多——这种感觉不应使你不安。精神得不到休息

是无法生活的。我相信，你的这一行动会使所有人都感到比较好过，首先是使可怜的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感到比较好过，尽管从表面上看这一行动对她刺激很大……”^⑤

我把母亲留给家人照料，自己到沙莫尔金诺修道院找父亲，瓦利娅和我同去。

孩子们的信使父亲感到伤心。他明白了他不能指望得到他们的支持。只有谢辽沙的信使他高兴和感动。父亲在日记中写道：“谢尔盖的信写得不错，简短而讲实际，用心是好的。”

读完了所有的信，父亲说：

“是啊，是啊，但不管我多么害怕，我还是不能回去，我不回去。”

“你没收到我的信吗，”他问我。我说这些信可能错过了。

“我本想让你转告塔妮娅和谢辽沙，要我回到母亲那里是完全不可思议的。”

下面就是父亲 1910 年 10 月 28 日给我写的信：

“亲爱的萨莎，我们平安到达了——唉！但愿你们那里不会太不平安。现在是七点半，如果还活着，过一夜明天就去沙莫尔金诺修道院。

“我竭力想保持安静，应该承认，就象往常等待

痛苦的事一样，我感到心神不宁，但我却没有在家时总是伴随着我的那种内疚、困窘和拘束的感觉。告诉契尔特科夫，说我很高兴，但也很为我的所作所为而担心。我尽力把梦幻和非常想写的文艺作品的情节写出来。我认为暂时最好不和他会见。和过去一样，他会理解我的。亲爱的，再见，吻你。

列·托”^⑥

在第二封信（10月29日写）里父亲写道：

“我亲爱的好萨莎，谢尔盖因柯会把我的全部情况告诉你的，难呀！我不能不感到身上的重负。主要是不作孽，难就难在这里，不用说，我已经作了孽，而且还会作孽，但愿作得少些。这点主要是希望你首先能做到，何况我知道可怕的重任已落到了你身上，这个任务对这么年轻的你来说是难以胜任的。

“我什么也没有决定，也不想决定。我尽力只去做不能不做的事，而不去做可以不做的事。从我给契尔特科夫的信中你可以发现，我不是在观看，而是在感觉……我现在还不叫你来，但只要一可能我就叫你来，而且不会很久。写信告诉我你身体怎么样？吻你。

列·托尔斯泰”^⑦

我曾向父亲提过一个问题，他是否为他所做的

事感到后悔？父亲用问话的口气回答我：“如果一个人没有别的办法，难道他能后悔吗？”

从我的叙述中父亲心里明白，家里人已猜到他的住处，母亲很快就会来找他。

姑姑和正在她家作客的女儿莉扎·奥波连斯卡娅想方设法安慰父亲。父亲没有感觉出她们有一丝一毫谴责和批评他的行为的意思。父亲和她们相处得很融洽。正是在这种也许是一生中最困难的时刻他来到这位亲人这里，看来并不是偶然的。

“玛申卡和可爱的莉扎给了我令人欣慰和愉快的印象，”父亲在10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她俩对我的境遇都很理解和同情。一路上我都在思考如何从我和她的处境中摆脱出来，但想不到任何出路，其实出路会有的，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会有的，而且不是你所能预料的。是啊，只应该考虑如何不作孽。要来的事，总要来的。这与我无关。我从玛申卡那里拿过一本《阅读园地》，读到第二十八页时，我简直感到惊讶，这正是针对我的处境所作的回答：我需要考验，考验对我有益。我现在躺下睡觉。上帝保佑。收到契尔特科夫一封写得很好的信。”^⑧

修道院那宁静优雅的环境总是那样吸引着父亲。他和奥普京隐修院的修士和修女聊天。他好几次

走近隐修院的圣门，看来是想和长老们谈谈。“我自己不想去，”他对杜尚说，“要是他们叫我，我就去。”^③

“父亲本来要留在沙莫尔金诺修道院。他已经在村子里为自己物色好一套住宅——一间小木房，每月交房租三个卢布。然而我带来的消息和信件惊动了

了他。

我们坐在玛莎姑姑一人独居的舒适、暖和的修行斗室里聊天。父亲默默地听，突然，他双手撑在靠椅的扶手上迅速站了起来，走进隔壁房间。显然他是作出了一个果断的决定。过了一会儿，他叫我去。“你把这封信寄给母亲，”他对我说。他给母亲的信是这样写的：

“我们会面，特别是我回去，现在根本不可能。这样做对于你，就象大家所说的，是极为有害的，而对于我则是可怕的——由于你的激动、生气和病态，即使我们可能相会或者我可以回去，我的处境也只能变得更坏。我劝你要安于已经发生的情形，在一时还不习惯的处境下好好地过日子，而主要的是要治病。

“即使你并不爱我，而只是不恨我，你也应该多少设身处地地为我想一想。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你就不仅不会责难我，而且还会尽力帮助我找到安宁，

帮助我找到某种人过的生活，帮助我自勉，你也就不希望我现在回去。你目前的情绪，你想自杀的愿望和企图最好不过地说明你已失去了自制力，这一切都使我现在回去成为不可思议的事。除了你本人以外，谁也无法使亲近的人、使我、而主要是使你本人摆脱目前所忍受的折磨。请你尽量不要费心去想获得你想得到的东西——现在就是想我回去，而应该把精力放在如何使自己、使自己的内心平静下来——这样一来，你便能得到你想获得的东西了。

“我在沙莫尔金诺修道院和奥普京隐修院度过了两天，马上就要离开了。这封信我将在路上发。我不说我到哪里去，因为我认为不管是对你还是对我，我们的分离都是必要的。不要以为我出走是因为我不爱你，我爱你，而且真诚地怜悯你，但我不能有别的做法……”

“亲爱的索尼娅，再见吧！愿上帝保佑你。生活毕竟不是儿戏，我们无权根据自己的意愿抛弃它。用时间的长度来衡量它也是不明智的。也许，我们这一生剩下的不多的日子比已经度过的那些岁月更为重要，应该好好地生活下去。

列·托。”^⑨

第二天早晨我们又启程了……父亲没有和姑姑

玛丽娅告别，甚至没有等我们把第二个马车夫叫来；我们想让这个马车夫把我们带到科泽尔斯克城的火车站。他就象离开雅斯纳雅·波浪纳时一样匆忙。我与瓦丽娅是和开进月台的火车同时到达车站的，刚来得及买车票，装上行李。

我们究竟往哪儿走？杜尚告诉我：“到诺沃契尔卡斯克城的杰尼先科那里，如果能弄到出国护照，就从那里到保加利亚托尔斯泰家族的侨居地，否则就到高加索。”

也许父亲又一晚没有睡，他在思考，激动不安。他决定继续往前走。清早四点他给姑姑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写了封信：

“寄沙莫尔金诺修道院，1910年10月31日晨四时。

“亲爱的玛申卡和莉扎：别感到奇怪，别因为我们离开时没好好向你们辞行而责备我们，责备我。你们俩，特别是你，亲爱的玛申卡，对我的爱，对我的遭遇所表示的同情，我是无法表达我的感激之情的。虽然我一直很喜欢你，但我不记得我曾经象这些日子这样，象现在离开时这样喜爱过你。我们走得很突然，因为怕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赶上我，而火车只有一趟，是七点多……”

“亲爱的朋友，吻你们。我心里很高兴，因为爱你们。

列·托”^⑩

姑姑为了和他哥哥告别来到旅店，她见到了我。当她知道父亲没等她时，很难过，但在她的谈话中丝毫没有责备，埋怨父亲的意思：

“天哪！天哪！”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我们连告别都没来得及，还有机会见面吗？唉！有什么办法呢，但愿他一切如意。”

我们等着马车，心里很焦急，因为离火车开车的时间已经很近了。马车夫终于来了。“如果你妈妈来，我会迎接她，”姑姑在我后面喊道，“要照顾好你父亲！”

在车厢里，人们认出了托尔斯泰，转瞬间，托尔斯泰乘坐这节车厢的消息便传遍了整列火车。好奇的人开始涌现了。列车员非常殷勤，他们把父亲安置在一个单间里，帮我在另一个单间里为父亲煮燕麦粥，还把好奇的人赶走。

三点多钟的时候，父亲叫我，他发冷。我给他盖得暖和点，量了体温——发烧。

我突然感到四肢无力，不得不坐下。我几乎陷于绝望。

车厢烟雾弥漫，二等单间闷得叫人透不过气，周围都是些陌生、好奇的人，冷漠的火车发出有节奏的隆隆声，把我们带到越来越远而又目的地不明的地方。这个虚弱有病的老人盖着一大堆衣服，把头埋在枕头里，低沉地呻吟着。应该给他脱去外衣，让他躺下，喂他点热水……而火车却继续向前奔驰……到哪里？何处是我们的安身之地？何处是我们的家？

父亲看出了我的心思，向我伸出一只手，紧紧地握住我的手。

“别泄气，萨莎，一切都好，非常好……”

到了下一站，我跑去要开水，杜尚说要用茶掺酒喂父亲，也许这管用，然而……父亲继续发冷，体温一直往上升。

在车站上，我发现了两个人，他们在跟踪我们，火车开动时他们跳上了我们的车厢。后来证明，我怀疑对了，别廖夫城的宪兵机关指示一名宪兵军士“立即查明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是否在这一趟列车上。”^①

我和杜尚商量后，决定不能再继续往前走。晚上近八点，火车靠近一个灯光通明的大站。这是阿斯塔波沃。我们决定就此停下。杜尚去见站长，想为我们找个安身之处。这个小地方没有旅馆，站长提议把我

们安置在他家里。

我们搀扶着父亲路过车站大厅时，聚集了一群好奇者。他们脱下帽子向父亲鞠躬。父亲勉强走着，吃力地把手举到帽子上，向大家回礼。

我们刚给他脱下衣裳并让他躺到床上，他便完全昏厥过去了。痉挛把左边面孔抽歪了，左手和左腿也在抽筋。我和杜尚以为父亲不行了。赶紧叫来了车站医生，注射了强心针。父亲终于昏昏入睡了。睡了两个小时，醒来后把我叫到跟前。他已完全清醒过来。

“萨莎，怎么啦？”他问我。

“还问呢！你病啦。”

我眼里噙着泪水，呜咽着说。

“别泄气，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我们不是在一起吗。”

近半夜时，我心里好受些了，父亲的体温下降了，睡得很好。

尽管身体很虚弱，可父亲还想继续往前走。但我和杜尚对他说这样做不行。他很伤心。“要是我能好一些，明天就走。”他说道，并给契尔特科夫发了一封电报：“昨天病倒，旅客发现了我，我走下火车时很虚弱，我怕张扬出去，今天好些，我们继续向前走，

采取措施，通知我。”

父亲没有料到，大家全都已经知道父亲现在在哪里。10月31日宪兵军士已用电报向宪兵大尉报告：“作家托尔斯泰伯爵乘坐12次列车病倒了，站长奥佐林先生将他接到家里。”（《俄罗斯言论报》）连珠炮似向站长奥佐林提出许多问题，询问托尔斯泰的健康情况。电报象雪片似的飞到省长手里，飞向侦探处，宪兵机关，有普通电报，也有密码电报……

早晨，父亲给我口授了一段笔记：

“上帝是无限的一切；人仅仅是他的有限的体现。上帝就是那无限的一切，人意识到自己只是他有限的一部分，实际上只有上帝存在。人是他在物质、时间、空间的体现。上帝在一个人身上的体现和在其他生灵身上的体现结合得越紧密，上帝就存在得越广泛。个人生命和其他生灵的生命的那种结合是靠爱来实现的。

“上帝不是爱，但爱得愈博，人体现上帝愈广，上帝就存在得越真实。

“我们只是因为意识到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体现才承认上帝的存在。由此意识所得出的一切结论，以及根据这种意识对生活的规范，总是能完全鼓舞人去认识上帝本身，并根据这种意识来指导生活本

身。”

过了一会儿，父亲又把我叫来说：

“我想给塔妮娅和谢辽沙写封信。”

我把铅笔削好，重新伸到他跟前。

“1901年11月1日，寄自阿斯塔波沃。”

“我亲爱的孩子塔妮娅和谢辽沙，我希望并且相信，你们不会因为我没叫你们来而责备我。只叫你们不叫妈妈会使她，也会使其他兄弟难过的。你们会理解，被我叫来的契尔特科夫（这天父亲嘱咐我发电报给契尔特科夫，让他来）在对我的关系上处于特殊地位。他把一生都献给了我近四十年来所献身的那个事业上。与其说我珍惜这个事业，不如说我认定——不管这个认识是否错误——这个事业对所有的人，其中包括你们，都是极端重要的。感谢你们对我这样好。我不知道是否要永别了，但我觉得有必要把上面说的话说出来……”

“别了。要好好安慰母亲，我最真诚地爱她和同情她。”

热爱你们的父亲

列夫·托尔斯泰”^⑫

“我死后你将这封信交给他们”父亲说罢便哭了起来。

11月2日早起父亲的体温便升高，咳嗽，痰里有血。是肺炎。我给哥哥谢尔盖拍了封电报：“情况严重。火速将尼基京带来。父亲只想通知你和姐姐，他害怕别人来。”

契尔特科夫来了。父亲详细询问了母亲的情况，问她是否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大孩子是否和她在一起。

11月2日，杜尚接到了下面这封电报：

“11月2日5时10分发自图拉，急电。乌拉尔—梁赞铁路的阿斯塔波沃站，托尔斯泰并马科维茨基。一小时前伯爵夫人租用专车携安德列、米哈伊尔、塔吉娅娜、弗拉季米尔，菲洛索弗夫并医生、医士前往阿斯塔波沃。”^⑬

太可怕了……怎样保护好父亲呢？难道家人就连这一次也不通情达理？不过谢辽沙来得早些，他清楚，父亲的心脏功能如此衰弱，任何激动都将意味着死亡。

谢辽沙犹豫了好长时间：该不该进去看父亲，他的到来会不会使父亲过于激动？他站在隔壁房间，远远地望着父亲。“不，我得进去看他，”他突然果断地说，“我告诉他，我是偶然得知他在这里才来的。”

父亲果真非常激动，他详细盘问谢辽沙如何得

知他的住处和他的病情，还问谢辽沙知道哪些有关母亲的情况，她目前在哪里，和谁在一起。谢辽沙回答说，他从莫斯科来，母亲在雅斯纳雅·波良纳，和医生、护士以及弟弟们在一起。

“不能让妈妈到他跟前，”谢辽沙从父亲的房间出来后说。“这会使他过分激动。”

谢辽沙走后，父亲把我叫到跟前。

“谢辽沙多么好啊！”

“怎么见得，爸爸？”

“他竟然找到了我！我看见他很高兴，他太使我高兴了……他还亲了我的手……”

医生决定，只能让谢辽沙和塔妮娅到父亲跟前。父亲偶然得知塔妮娅在阿斯塔波沃。杜尚把塔妮娅带来的那个柔软的小枕头枕在父亲头下。

“这是哪儿来的？”父亲问道。

杜尚不知所措。

“是塔吉娅娜·里沃夫娜带来的。”

当塔妮娅来看父亲时，他又开始询问她是如何得知他的住址的，母亲怎么样，她和谁在一起。塔妮娅发窘，不知如何回答才好，于是赶紧离开房间。

第三个来到的是医生尼基京。戈尔布诺夫和戈里顿维伊则尔也来了。父亲想见他们。他和戈尔布诺

夫长时间讨论了出版他的小丛书《生活之路》的事，戈尔布诺夫和父亲告辞时说：“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咱们再来打一仗，怎么样？”

父亲严肃地看了他一眼，然后说道：“你打吧，我可不行了。”

当晚，谢尔盖口授了一封给弟弟们的电报，内容大致如下：

“情况好转，但心脏极为衰弱，和母亲见面会对他带来致命后果。”

父亲根本没想到，关于他得病的消息不仅传遍了整个俄国，而且还传遍了全世界，也没想到全家人现在都已在阿斯塔波沃。一大群摄影记者聚集在阿斯塔波沃，收集从站长小屋里传出的每一句话。医生们每天发表简短的病情公告。电报局昼夜不停地工作。处于梁赞省偏僻地带孤零零的阿斯塔波沃站顿时成了整个文明世界注视的中心。

不过，这一切当时我们这些日夜全神贯注于父亲的心跳，呼吸、体温和每一句话的人并不知道。

“夜是多么难熬，”父亲最后一次在日记中写道，“我发了两天高烧。2号，契尔特科夫来了。3号塔尼娅来。谢辽沙是夜里赶来的，很使我感动。今天，3号，先是尼基金，然后是戈里顿维伊则尔和伊万·伊

万诺维奇来了。这就是我的出走计划……Fais ce que dois, adv…（只做你该做的事！）

“这对别人也有好处，但特别对我有好处。”^①

希望和绝望交替着。父亲的体温一下降，我们便高兴，而当他的体温升高时，我们又陷入绝望。肺炎由肺的一侧移到另一侧。心脏功能衰弱。呼吸加快了，脉搏不均匀，断断续续。

订购了氧气，谢尔盖打电报到莫斯科要一张舒适的床，安排了我们当中的一人和一名医生在病人床边轮流值班。

“而农民呢？农民是怎样死的？”当别人给父亲把枕头放好时，他叹息着说。

11月4日，父亲几乎失去知觉。他时而说胡话，想向我们解释什么，时而一动不动，静静地躺着。我觉得他那严厉的、仿佛能看透人五脏六腑的目光已经模糊，但却好象看到了某些我们看不见、望不着的东西似的……消瘦的双手和手指不住地抖动，触摸着被单，从这边摸到那边……

“不行了。”我心想。

他说着胡话，很难弄明白他想讲什么。

“探索，永远探索。”他突然清晰地说道。

当晚，当瓦丽娅进入房间时，父亲突然从枕头上

稍稍抬起身子，伸出双手，高兴地大声喊道：

“玛莎！玛莎！”

从莫斯科来了几位大夫：别尔肯凯恩、乌索夫和著名的休罗夫斯基，但希望已经很渺茫了。

11月6日，父亲对大家特别亲热。杜尚为他做了件什么事，他便说：“亲爱的杜尚，亲爱的杜尚！”

我们给他换床单，我支撑着他的背部，突然我觉得他的一只手在寻找我的手。我以为他想靠近我，但他紧紧地一次，又一次握住我的手。我将嘴唇贴近我这只手，竭力忍住不哭出声来。

这一天，我和塔妮娅一直坐在他身边。床放在房间的当中。父亲霍地一个猛烈动作欠起身坐了起来。

“要把枕头放好一些吗？”

“不！”他一字一句坚定而又清晰地说道。“我只想劝你们记住一点：除了列夫·托尔斯泰，世上还有许多人，而你们只看着一个列夫·托尔斯泰。”

这是他对塔妮娅和我说的最后的话。

傍晚，病情大大恶化了。给他输了氧气，撒了樟脑。父亲安静下来了。他把谢尔盖叫到跟前：“谢辽沙！正义……我爱很多……他们怎么……”他安详地开始打盹，呼吸稍微均匀了些……危急情况已经过去。除了值班的，其他人都各自去睡觉了。靠近半

夜，病情又恶化，所有的人都被叫醒了。

父亲安详、宁静地离开了人世……

母亲和几个哥哥都被叫来了……

* * *

第二天早晨，我便到雅斯纳雅·波良纳去了。

我独自坐在父亲的书房里……我觉得自己的生命已经完结。我还为什么、为谁生活呢……空虚、绝望……施米特老太太蹑手蹑脚走进来。“别哭，”她对我说，“不要……让我们读一读《阅读园地》11月7日所写的一段吧，这是他去世的日子。”

施米特老太太从父亲的桌上拿过这本书，找到了日期便读起来：“活着是做梦，死去才如梦方醒。”

11月9日。一清早一列送殡的火车开到了札谢卡站。从莫斯科开来的火车都挤满了人。聚集了无数的人，成千上万，也许有几万。送殡的队伍有好几俄里长。棺木由哥哥和雅斯纳雅·波良纳的农民抬着。队伍前面的横幅上写着：“列夫·托尔斯泰，我们——因失去了你而成为孤儿的雅斯纳雅·波良纳的农民——永远铭记您的恩典。”在这严寒而又静谧的早晨，几千个声音不停地唱着《永垂不朽》。

棺木停放在图书室里——这是父亲最早的书房。人们一个紧接一个从前室进来，然后走到石头阳

台，以便最后一次瞻仰托尔斯泰的遗容。

在禁伐区沟壑旁的橡树当中，在父亲童年时代寻找“绿色的棍子”的地方，挖了墓穴。这个墓是父亲以前的学生米哈伊罗·佐林挖的。

在树林的远处出现了骑马的宪兵。

棺木徐徐下放——人们跪在地上，唱着《永垂不朽》。

有人用很不协调的愤怒声喊道：“警察跪下！”

宪兵们乖乖地跪下了。

开始撒土……唱《永垂不朽》，有人发言……我们回到了家里。人群……吞噬人的空虚……

“世上还有许多人……”当时我并不理解这话的真谛。不过还得生活下去。

*

*

*

1911年至1913年。实现了父亲的遗嘱：出版了他尚未出版过的作品，从哥哥们手中把地买过来分给了农民，将父亲作战的版权交给了公众。

1914年。我以护士的身份要去土耳其前线，先回雅斯纳尔·波良纳和母亲告别。

痛苦使她苍老了。她沉默寡言，老坐在父亲生前爱坐的那把伏尔泰椅上打瞌睡。看样子什么也引不起她的兴趣，头部晃动得比以前更厉害了，她整个身

体都有点驼了，人也缩小了，那双原来炯炯有神的乌黑的大眼睛也变得无神了，她的视力已经衰退。

“去打仗做什么，”她说道，“父亲在世是不会赞同的。”

*

*

*

1917年。母亲、塔妮娅和塔尼奇卡留在雅斯纳雅·波良纳·塔妮娅的丈夫去世。

周围都在打击地主，焚烧他们的房屋。各种不祥的传言引起了雅斯纳雅·波良纳住户的恐慌，传说附近村子的农民正前来捣毁雅斯纳雅·波良纳。传说原来是事实。人群愈来愈近了，马车套好了，母亲、塔妮娅带着小女儿坐在安放好的箱子上准备逃跑……

但突然一个消息传开了——雅斯纳雅·波良纳的农民用斧头、火炉叉和干草叉迎头痛击了造反的农民，把他们赶了回去。雅斯纳雅·波良纳庄园保存下来了，这是州里仅存的几个庄园当中的一个。

*

*

*

1918年。我回到雅斯纳雅·波良纳。人们在挨饿。还是那个穿着白衣和带补丁手套的伊利亚·瓦西利耶维奇给摆饭，桌上铺着雪白的桌布，还有银餐具，可饭菜却是……煮饲料甜菜，没有油，带谷糠的

小片黑面包。

*

*

*

1920年。我到雅斯纳雅·波良纳来住了几天，探望母亲、姨母塔吉娅娜·安德列耶夫娜、塔尼娅和她的小女儿。她准备走的那天，母亲得了肺炎，我只好留下来照顾她。她温顺而又顽强地忍受着痛苦。

“萨莎，亲爱的，原谅我吧。我不知道我过去是怎么回事……我一直爱他。我们俩一辈子都彼此忠诚……”

“你也原谅我吧，我很对不起你，”我含着泪对她说……

她肺部积水，喘不上气。她进了圣餐，一边忏悔，一边安详地离开了人世。我合上她的双眼。

*

*

*

战争，革命，亲人的死亡，监狱，饥馑……失去家园。

我已到暮年，但并不感到孤单，因为我现在知道，“除了列夫·托尔斯泰，世上还有许多人……”

① 《亚·里·托尔斯泰娅日记》。

② 《全集》，第五十八卷，第574页。

③ 《亚·里·托尔斯泰娅日记》。

-
- ④ 《全集》，第五十八卷，第 125 页。
 - ⑤ 《亚·里·托尔斯泰娅日记》。
 - ⑥ 同上。
 - ⑦ 同上。
 - ⑧ 《全集》，第五十八卷，第 125 页。
 - ⑨ 《亚·里·托尔斯泰娅日记》。
 - ⑩ 同上。
 - ⑪ 《托尔斯泰之死》、苏联列宁公共图书馆出版社，莫斯科，1929 年，第 14 页
 - ⑫ 《亚·里·托尔斯泰娅日记》。
 - ⑬ 《托尔斯泰之死》，第 24 页。
 - ⑭ 《全集》，第五十八卷，第 126 页。